

客人？外人？

遷移在歐洲（1800～）


Guests and Aliens

Saskia Sassen © 著

國立編譯館主譯／黃克先 © 譯

曾熾芬（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兼系主任）© 導讀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巨流圖書公司印行

在《客人？外人？》一書中，這位享譽國際、研究全球化的卓越專家，廣泛且說服力十足地分析了遍及全球的移民現象。Saskia Sassen首先討論了在特定歷史脈絡下當前的移民問題的「危機」，將美國的經驗視為是全球橫跨邊界之歷史的一個階段來理解。她描述了19與20世紀中義大利人與東歐猶太人的大規模遷移，以及導致「難民」概念出現的國際間的流離失所現象——尤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藉由這些例證，Sassen探究種種使移入現象得以產生的原因，這些原因又是如何影響各國以歡迎的態度視新移入者為「客人」，或帶著鄙夷的眼光視其為「外人」。最後，她在如何改進美國與歐洲移民政策的問題上，為我們擘劃出了一個「深具啓發的方向」（《出版家週刊》）。

本書為爭執不休的美國移民政策爭議提供了極具價值的一課，（同時）煞費苦心找出了一段被遺忘的歷史以去除認為「歐洲並非是塊充滿移民的大陸」的迷思。

——《出版家週刊》

Sassen，這位研究全球化的頂尖社會學家，為當前的移民潮與難民潮現象寫下了深具洞察的見解，本書確實是一精心傑作。

Jagdish Snagwati，哥倫比亞大學經濟系亞瑟·雷曼講座教授

ISBN 957732243-3



9 789577 322432

客人？外人？ 遷移在歐洲（1800～）

Guests and Aliens

Saskia Sassen 著

黃克先 譯

國立編譯館 主譯

曾嫵芬 導讀

國立編譯館與巨流圖書公司合作翻譯發行

Copyright © 1999 by Saskia Sassen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y by 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Jia-xi Books Co., Ltd.

Complex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5 Chu Liu Book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客人？外人？遷移在歐洲（1800～）／Saskia Sassen

著：黃克先譯。--初版。--臺北市：巨流，2006

[民95]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Guests and Aliens

ISBN 957-732-243-3（平裝）

I. 移民-歐洲-歷史

577.694

94023864

書名：客人？外人？

遷移在歐洲（1800～）

原書名：Guests and Aliens

原作者：Saskia Sassen

出版者：巨流圖書有限公司與國立編譯館合作翻譯發行

著作財產權人：國立編譯館

創辦人：熊嶺

總編輯：陳巨擘

主譯者：國立編譯館

譯者：黃克先

封面設計：曾瑞靖

地址：106 台北市溫州街48巷5號1樓

電話：(02) 23695250 · 23695680

傳真：(02) 83691393

郵購：郵政劃撥帳號01002323

e-mail：chuliu@ms13.hinet.net

http://www.liwen.com.tw

總經銷：麗文文化事業機構

地址：802 高雄市苓雅區泉州街5號

電話：(07) 2261273

傳真：(07) 2264697

法律顧問：林廷隆

電話：02-2965-8212

出版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45號

ISBN：957-732-243-3

2006年1月初版一刷

定價280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本書如有破損、缺頁或倒裝，請寄回更換

序

艾瑞克·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曾問過我是否有意願撰寫一本書來討論歐洲過去200年的遷移歷史，當時我只回了句：「你說什麼！？」更令我驚訝的是在本書的研究過程裡，我發現要理解西歐的遷移歷史甚至必須回溯到200年之前，如果只從一般常見的故事起點——大規模的移往新大陸說起，那將有礙於理解。在我於哈佛國際事務中心針對西歐遷移現象的議題從事博士後研究時，偶然發現 Abel Chaterlain 研究法國 18 與 19 世紀季節性遷移史的兩大冊成果，自此它就一直伴隨著我成為歐洲的另類歷史，向我揭露主流文化傳承下歷史記載陰影外的另一面。重訪 Chaterlain 的研究讓我深信，我們有必須要打破歐洲是人口大規模遷出的地區這個圖像的迷思。

我知道，要能持續數年將精力投注在本書的研究與寫作上的唯一方法，就是讓自己像個抽絲剝繭的記者，揭露出歐洲其他遷移歷史來，而它們如今大多深埋在幾近模糊不清的學術文獻與博學者的收藏裡。本書很大一部分的努力是爲了提供大家對歐洲遷移歷史，一個更持平的觀點，讓我們明白國際間與區域之間的勞動遷移有多麼普遍，並如何構成過去三個世紀以來歐洲都市化與工業化的歷史裡，一個策略運用下的元素，不論是在 18 世紀末期從西發利亞前往阿姆斯特丹的「去荷蘭的人」這類遠距季節性遷移，或是在 19 世紀於德國各城市裡建造鐵路的義大利人遷移。來自或遠或近的移工聚集巴黎地區，爲 Haussman 的擴建與革新計畫盡一份力，鋪設了管子並建造了林蔭大道（譯註：Baron Haussman 是法國於拿破崙三世在位時

客人？外人？

的行政官員，為因應都市化過程裡造成巴黎的犯罪情事節節上升，而提出與執行大規模的市政改革與改建工作)。在巴黎的一角也有德國移工的社群聚居在此。歐洲無法逃脫所有經歷過快速成長的地區的共同命運：需要引進外部大量的勞動供給。

x 我主要的關懷之一是探索過往的這段歷史如何能幫助我們重新理解今日的移民問題，以發展出更具智慧與有效的移民政策，並且重新省思我們認為「歐洲並非由移民所構成的大陸」這個共享的觀念。本書當然不是以鑲嵌在征服的歷史中的新大陸過去的殖民方式來探討，而是採取不同的路徑。當我在進行研究，並於晦澀難解的文件與立法部門的辯論中，尋找移民現象在經濟、政治、社會中定位的蛛絲馬跡時，我也開始思考當前的論述，在討論到歐洲發展過程中的勞動遷移時，是如何以各種方式對過去來建構其敘事。因此，這本書很明顯地也是回應這類缺少某些元素的論述。

同樣地，在研究難民與流亡者的歷史時，我也認為重新探索難民與大規模難民潮，如何在歐洲成爲一個複雜的過程，深刻地受到國與國間的體系出現與現代歐洲國家形成的歷史影響。今天，當大多數的難民潮發生在非洲與亞洲，並且大多是內部的難民時，我們常遺忘了現代國家與難民及大規模難民運動之間，有著深厚的淵源連結著。

以一個明確的立場來撰寫本書的可能性，對我來說是別具意義的，Fischer Verlag的編輯也很明確地提出這樣的要求。要在這樣一本小書裡把過去200、300年來的遷移歷史，做一個全盤的描述是不可能的事，而無可避免地必須放棄許多主題不論。本書不是個調查報告，而是沿著歷史裡隱蔽的軸線去追溯事實的一項嘗試；這條軸線並不是個持續的過程，畢竟當中存

在顯見的不連續；但事實上，對我來說很重要的一個議題也就是遷移如何誕生，並在延續了一段時期後消失。我試圖從蔭蔽的歷史裡策略性地找出一些例證，來說明遷移與難民潮當中有多面向的動力，是如何與經濟、社會及政治的實體互動。

倘若未仰賴遷移與難民潮，以及如都市化、人口統計、工業化、戰爭與政治等相關議題的龐大學術文獻幫助，本書是無以寫成的。今日，有為數眾多的研究者針對歐洲的移民與難民這個廣大範圍內的議題做出了重要的貢獻，當中有許多已被含納在本書的參考書目裡，然而因為篇幅有限，有很多卻沒辦法寫入本書。我常選擇列出的書目是較不容易被察覺的，而不是廣為人知的；為此，我必須為那些無法包含入這本小書與簡要的參考書目的所有研究致上歉意。

xi

在我的研究裡有三項文獻異常地重要，因為它們扮演著龐大的檔案研究與編纂的角色，我要向這些呈現令人讚嘆成就的作者致上深深的謝意：它們分別是Abel Chatelain於1930年代首次出版的《法國1800至1914年間的暫時性遷移者》（*Les Migrants temporaires en France de 1800 a 1914*）；Jan Lucassen透過博士論文對拿破崙調查文獻的研究，寫成的《北海沿岸地區的吸引力：1600到1900年的歐洲勞動遷移的體系》（*Naar de Kusten Van de Noordzee. Trekarbeid in Europees Perspektief, 1600-1900*），以及Michael R. Marrus的《被拒者：20世紀的歐洲難民》（*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過去20年來，有許多朋友與同事都曾針對本書的內容與我討論或交換意見，我必須在此向他們獻上感謝，尤其是以下這幾位：Sophie Body-Gendrot、Catherine Wihtol de Wenden、Yan Moulier-Boutang、AbdelMalek Sayad、Mirjana Morokvasic、

客人？外人？

Czarina Wilpert、Aristide Zolberg、Rainer Munz、Jochen Blaschke、Enzo Mingione、Rainer Baubock。雖然本書的研究與寫作是在過去三年間進行的，但在過去20年裡我穿梭在這個主題裡，一步步地搜集資料、凝聚見解與概念。在過去這幾十年裡，許多人與許多研究中心皆在本書的醞釀過程裡扮演重要的角色，其中最重要的莫過於Daniel J. Koob，他是第一個提醒我過去20年裡西歐國際遷移現象的重要性的人，那時我才剛開始博士研究；另外，我也要感謝哈佛國際事務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的Joseph Nye, Jr.，支持我以遷移現象切入討論跨國關係的博士後研究；在最近，我也自以下這些機構、團體的同事、學者及訪問學人裡獲益良多：柏林的Wissenschaftszentrum、維也納的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紐約市的Russell Sage Foundation、薩爾斯堡的論文發表會、羅馬的American Academy、巴黎大學的Institut d'Urbanisme、蘭開斯特大學的Summer Institute。最後，在我研究與寫作初期有一些人曾幫助我，其中最要感謝的是提供慷慨又睿智的協助的Todd Kenworth。

XII 我同時也要感謝我偉大的雙親，身為荷蘭人他們毫不費力地讓我在五種語言的環境下成長，當我13歲時又很單純地告訴我該學些外國語言。在這個獨特的研究計畫進行期間，我無時無刻不慶幸自己通曉這些語言。

我的丈夫Richard Sennett是一位細心又寬宏大量的讀者，本書大部分都先經由他的閱讀，而他的建議也是十分的寶貴。我的兒子Hilary Koob-Sassen在當前移民與難民議題上，是一位熱心積極的對談者，而這個議題也受到他這個年輕世代愈來愈多的注意。

所有本書的錯誤理應由我自己來承擔。

英文版序

XIII

長期以來，歐洲的移民歷史被認為有莫大的殊異，事實也確實如此，但在這類通俗論述裡未被提及的是，在19、20世紀的歐洲裡產生了一系列的動力，包括反移民的情緒、種族化（racialization）、視移民為危機而欲加以控制的心態、從亟需外來工人到將大規模失業歸咎於外來工人的階段演變，這些動力不僅與美國的美國移民現象有關，也與過去歐洲的有關。

在歐洲所看到的難民產生的歷史，的確確是十分獨特的。永無止境的戰事與「革命」，讓19世紀與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歐洲創造出了今日被認為是「第三世界現象」的情景。歐洲境內這些移動的人群所組成的戲碼，清楚地向我們揭示了獨立自主的民族國家之形成，實際上與難民、尋求庇護者、流離失所人群的產生密不可分。歐洲的民族國家極力追求行政管轄上的主權，尤其是宣稱掌握了取得公民權利的決定權，使得難民被製造出來。光在20世紀裡，歐洲就有數以百萬計的人們，每每在世界性的戰爭後遭逢流離失所的困境，估計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就有6,000萬人民因各種緣故而離開家園，這種世界性戰爭後的結果是過去人類歷史上從未出現過的。戰爭的勝利者剷除了戰敗的國家，但大多數的勝利者卻不願接納被剷除國家的人民。

沒有任何一個歐洲國家的手是不沾染血腥的——沒有任何一個勝利者認真看待人道主義者的關懷或所謂的人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戰勝國卻是追求自身狹隘的利益，而這些各自追求自身利益的舉動集結起來，便創造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

客人？外人？

XIV

難以管理的情況，即數百萬以上流離失所的人們，這也是國際聯盟成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首要處理的問題。當我讀到這段歷史的文獻資料時，發現與今日認為前南斯拉夫的戰爭只是巴爾幹上「偏離」常態的特例的評論有所出入。基本上，這場戰爭只是未被言述的廣大歐洲歷史所造就的結果。

伴隨著美國成爲全球軍事強權的行動，創造出了由海外移入的難民潮歷史，1960與1970年代的中南半島及1980年代的中美洲是其中的兩個名例。雖然相較於歐洲大陸發生的流離失所情況相比，這仍是小巫見大巫，而且其中大多發生在美國境外，但我們仍有必要藉由承認這些難民的存在及他們的論述來面對現況。

而對美國而言，歐洲經驗所能提供的無價洞見則大多是在移民議題而非在難民歷史上。瞭解這段歷史或許有助於說明勞動遷移的基本特徵以及種族化的動力，同時幫助美國人民重新審視在移民政策上的選擇。本書試圖討論以下三個議題，以有助於美國移民議題上的辯論的進行。

到底檢視在歐洲這個範圍內各國這200年來的勞動遷移，能提供我們什麼樣的教訓？我們能找出經驗上的規則嗎？觀察到的勞動遷移有什麼共享的基本特徵可循嗎？規則與基本特徵是很重要的，因爲在決定政策時應該考慮這些因素，找出這些因素或許也有助於歐洲與美國走出當前將移民認定爲危機、大規模入侵的心態。

在19、20世紀的西歐發生的跨越國界遷移的證據告訴我們，這些遷移都有模式可循，具有固定的規模及持續時間，並受到一些特定過程的限制。遷移並非如之前所談到的「大規模入侵」的想像那樣，是由貧窮地區溢入的無區別人潮。如果光

是貧窮就能造成移出現象的話，那麼已開發國家確實將遭受到大規模入侵的威脅，但事實上只有極少部分的貧窮人口進行移民，而他們也來自十分特定的地區，同時前往同樣特定的目的地。本書討論了一些以這些遷移潮為題、十分細緻的民族誌研究，讓我們更清楚知道為何特定貧窮地區裡的某村落會發展出移民潮，但鄰近的另一村莊卻沒有，以及為何該村落特定的一群人會移民，而其他人卻留下來。19世紀的西歐同時告訴我們，儘管在特定區域內有明顯不均等的發展程度，但大多數的人仍不會從此區域裡的貧窮地帶遷移到較富裕的地帶。

xv

即便在國家尚未具備管控邊界的行政與技術能力的時代，情況就已經如此。再者，當時許多領土仍身陷在多種統治體系的影響力之下，以致於國家控制邊界的觀念還未被建立起來；事實上，即便能夠移往較富庶的地區，大多數的人仍不願離開家鄉的社群。我們在今日歐洲聯盟（以下簡稱歐盟）的這類現象裡，也觀察到了兩個有趣的類似情況。其一是東西德之間的移動，在柏林圍牆倒塌後的頭幾年，德國境內東西向遷移的人數仍被統計時，我們可以看到從東向西的移動有劇烈的增加。但沒過多久，這股風潮就平息下來，並且遷往西德的東德人只占總人口裡的一小部分而已。第二個例子是歐盟成員國國民在歐盟裡對自由移動的選擇情況。因為歐盟成員國國民可以任意進出歐盟任何國家，同時這些國家間的社經條件仍有明顯的差距，我們或許會認為很多人會遷移到歐盟中具有較佳的就業條件、薪資水準的國家裡；然而，歐盟總共超過35億的居民裡，只有500萬人並未居住在自己的母國。

西歐的經驗也顯示了絕大多數的遷移現象都會終止，大多數發生在歐洲的跨國界遷移持續的時間約在20年。之所以如

客人？外人？

此，有一個原因是因爲一般來說，遷移現象是與接受地區的循環與發展時期息息相關，義大利人與西班牙人移往北歐的大規模遷移就是個十分戲劇性的例子。數十萬的工人在1960年代時大舉湧現，而大致在1970年代時就劃上句點。今天，雖然義大利人與西班牙人能夠自由地在歐洲內移動，但卻幾乎未再產生遷移現象。當歐洲經歷了戰後的重建，並在1960年經濟快速擴張之後，許多條件不再延續的情況下，勞動遷移的特定時期便告終了。這或許向我們揭示了遷移現象的最重要特性：它們的存在是受到各種其他特定的過程所決定的，也因爲遷移現象這種受其他條件限制的特性，使得它們在時間與規模上都有限制。

xvi

第二項洞見是關於種族化的問題。不論是在歐洲所謂的文化距離（cultural distance）或是在美國所謂的移民素質（quality of immigrant），我們都能看到其中對移民的種族化情況。歐洲的歷史——尤其是19世紀與20世紀初——向我們揭示了外人（outsider）這個身分——即不隸屬於當地社群的人——是如何標示了移民，事實上，外觀特徵、宗教或「文化」從來都不是標示移民最重要的指標。在19世紀裡許多從歐洲某地區移往另一地的移工，遷移的距離都非常短，通常也都在廣義的同族裔／文化區裡。遷移者看起來與本地人沒有太大的差別，飲食習慣、宗教信仰也都相同，同時吟唱的音樂、生命禮儀（life rituals）（如洗禮、婚禮、葬禮）也很類似。但無論如何，他們就不是當地社群或小鎮裡的一員。

種族化的過程對我們理解當前美國或歐洲的移民現象至關重要，而在這段歷史裡，我們也可能發現它的存在。今日的一些情況同樣也頗具啓發，其中最令人熟悉的莫過於前東德的德

國人的例子，他們在德國西部被當成是截然不同的族裔團體來對待。

當種族化的現象鑲嵌在具體的文化、宗教、生命禮儀、語言或顯見外觀的這些差異情況下，我們很容易忽略了種族化的動力。例如在法國關於伊斯蘭或「非洲化」的爭論很容易把焦點帶向「非洲人」（或穆斯林）與法國人之間具有本質性的差異的這類觀點。在宗教、文化或外觀上實際的差異被視為是「客觀的」事實，因此成爲了一個「問題」。然而，檢視歐洲過去的歷史將清楚地向我們闡明，移民做爲一個外人或許是這些差異經驗的背後最主要的因素。

第三，歐洲的經驗能在國家管理遷移人潮上該扮演的角色與實施的政策等面向上，提供我們一些學習的方向。過去歐盟在移民政策上的經驗即受到這些限制的影響，而這也是要建立一個聯盟與實行創新體制下必須去面對的挑戰。各成員國在經濟政策上解除邊界控制以利資金流動，但在遷移政策上卻想對人群移動施予更嚴格的控制，因此各成員國們必須去協調兩者間的緊張關係。在美國，人們不願意承認試圖取消邊界的新經濟體制與想要完全控制邊界的移民政策間，彼此並不相容。面對著境內的自由移動的議題，歐盟必須想出因應之道，這不只是針對一般歐盟人民，也包括了非歐盟成員國國民；此舉勢必藉由多邊協商來進行，而這股壓力也會驅使歐洲實行比美國當前更開明的政策，來管理跨國界移動的人群。雖然斷言歐盟的政策已達到開明的地步是言之過早，但我們可以說某些具開明前景的政策已經蓄勢待發。今日在大多數歐盟國家內的政治修辭又明顯走上民族主義的情勢，可能使得上述的進程受到威脅，但是已被建立起來處理移民議題的基礎制度，從長遠看來

客人？外人？

仍能上軌道地實行下去。

相對地，今日美國移民政策的特徵是強調要能管理移民現象，同時堅持由單邊強勢主導此事務。於1996年通過的美國移民法是最近一次修法，也更加強了上述幾項特徵，而這類管理與單邊主義的作風都是在回應那些被視為是威脅到政府管控邊界的危機。在1999年時，移民現象不但被認為是對本地勞工的就業機會而言，也可能對「美國文化」以及政府在治理邊界、毒品、罪犯等議題上的權威造成威脅。

當然，這種將移民視為威脅的情況在20世紀裡並非首見，美國政府也不只在這個議題上大聲疾呼要採取強勢單邊作為，但是今時的脈絡與以往的時期大大的迥異，其中的轉變有三大特徵。當前的民族國家正面臨一股新的經濟局勢，迫使著邊界失去原先的作用，也讓國家主權與單邊政府作為被削弱（至少是有所改變）。再者，當我們把焦點轉到移民現象時，也會發現國家正遭遇了一些會限制其自主性的國際性因素，例如新興的人權組織也超越國籍地致力使人們能擁有權利，這也意味著國家不再是國際法律上唯一的主體，個人如今也成為了主體，即便仍是較微不足道的一個。最後，今日崇尚法治的各國政府面臨了愈來愈多的各種司法上甚至是憲法上的轉變，這種轉變也促使公民的權利得到鞏固，在許多例子裡，也讓我們看到公民社會的角色因此而被強化，這種公民權利的強化使政府在管理移民上的強勢作為受到限制。

XVIII

這三項在移民政策上嶄新的情勢，在歐盟間受到重視的程度遠勝於在美國內。我們看到在歐盟成員國裡也如同美國一樣，在放棄採取單邊主權控制移民現象的議題上，採取抵抗的作為；但是，歐盟存在的事實也迫使它們體認到新興的經濟體

制與傳統的主權行使之間是存在著緊張關係的。

在一方面受到經濟全球化的驅使，另一方面又受到公民權利及國際人權體制發展日益蓬勃的壓力下，美國政府在移民政策上回應的方式是訴諸傳統的信條：控制自己的邊界（甚至是以軍事力量），以及在移民問題上堅持絕對的單邊主權行動。雖然在一些議題上主權已被削弱，但在移民議題上卻訴諸絕對的主權，這種矛盾現象尚未被美國媒體發現，同時也鮮少被政策制定者們提出來討論；但是在歐洲，主權的這種矛盾情況卻已經清楚地成爲了一個顯著且困難的政策難題。

爲何有這樣的差異存在？爲求經濟上的整合而建立的細緻的制度性架構，使得歐盟居民跨國界移動的問題不可能被忽視；相對而言，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與服務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f Trade in Services，簡稱GATS）的制度性架構遠遠不如歐盟發達，因此容易導致至少其中一部分的這類議題被棄置一旁。然而，甚至是NAFTA或GATS也不至於在正式文件或協議裡完全忽視這個議題，更遑論在勞務、資本、資訊的貿易與投資上，跨國界流動的實際運作層面裡。兩項協議裡都包括了規範服務業工人的跨國界來回移動的特定條款，而這群人當中大多是技術專家（Sassen, 1998, ch2）。

因此，很顯然的是一旦形成了常見的貿易與投資地區，同時發展出了特定的制度，這時候人們的跨國界移動就不再會被忽視；高度的制度發展也會產生動力，使得國家以單邊主權行動的方式控制移民現象的情況漸漸減少。

因爲人權組織的興起，讓全球性的脈絡也有了改變，這在近期的歐洲經驗裡清楚可見。比起十年前的情況，如今人權法的文件更常被法官們援引，而也更常被使用。歐洲在國內法庭

客人？外人？

上援引國際人權文件的經驗遠較美國更加源遠流長（Jacobson, 1996），像歐洲人權法庭（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這個制度在今日也擁有可觀的權力，即使其中的法官們都是來自各成員國，然而此法庭的決議卻高於各成員國的決定。

至今在美國尚未有類似的制度存在，但是今日不論在美國還是歐洲的法院裡，人權及公民權利的法律文件都會被援引，而將公民權利列入憲法裡的這股趨勢也不斷在進展。一個全球性的公民社會——指著一個具有一定自主性的領域，在當中公民具有賦權（empowerment）的方式，同時也可能進行公民行動——的概念也逐步浮現，而公民組織也策略性地宣稱自己擁有批判各種政府部門作為的權利，尤其是治安機關，甚至希望能以司法的力量來制衡它們。例如曾有一群來自幾個非洲國家的非法移民，爲了躲避警方的遣返行動而藏匿於巴黎的一所教堂裡，幾個禮拜之後，一位法官授予這群反抗者中一些人居留的權利，而其他人則被授予另一些形式的許可而可以待在這個國家裡。在歐盟的其他國家裡也有類似的例子。

最後，在國家危機這種老舊的視野下管理移民現象如今不僅是不適用的，而且在法治的觀念底下也不可取。世界上的高度開發國家中，不論是政治上或公民間的秩序維持都大大仰賴於對法治的期盼；雖然法治的概念或許也有其潛在的危險及偏頗之處，而在實際執行上可能也不盡完美，但是在我們追求一個較民主或富裕的社會之際，它仍是一個較佳的工具。若往好的方向看，法治意味著公民的權利能免於被國家侵犯的威脅，但爲了控制移民現象而擴大使用治安工具的作法，是不可能達到這樣的效果的，這在美國近期的幾項措施裡可以讓我們清楚看到，尤其是在1996年的法案裡剔除了幾項原本移民警方

應受司法單位檢視的行為。治安單位的勢力同時也更密集地進入了移民的管理裡，這也與人權、公民權日益受到重視的情況間產生了緊張關係，並造成了一些後果。當警方的強勢作為把其目標擴張到愈來愈多的人們的身上時——包括移民女性、男性與小孩——國家遲早會發現自己也身陷於逐步擴張的人權及公民權的網子裡，而它的舉動將違反了這些權利，同時干涉了公民社會的運作。

這些情況都使得歐盟如今成爲一個實驗室，不斷測試著民族國家與超國家或跨國行動者之間變動的權力平衡關係。與歐盟相關的制度性變革勢必造成在處理移民事務的權限從民族國家到歐盟層次上的轉變。當與歐盟組織並存時，國家對各類跨國界移動的管理與行政措施也需要重新在制度上做調整，這不但發生在貿易與投資事務上，也在犯罪及文化事務上；同時，也顯示出了當前需要形成一個特定的跨國體制來處理移民與難民的事務。許多歐盟成員國發現上述情勢與它們保衛自身主權的期望並不相容，同時採取一些抵抗的措施，但它們也已經放棄了一些控制邊界的形式，同時接受法庭的判決，而這些判決保障了移民的人權以及公民控訴政府的權利，其控訴的內容則大多與違反移民與難民的權利有關。這個世界並不會就此結束，這些情勢也不會徹底摧毀民族國家管理移民的能力。

如今或許是重新打造移民政策的良機。觀察家們都同意在世界主要的移民接收國裡，其制定移民政策的意圖與實際的移民政策之間都存在著巨大的鴻溝，在Cornelius、Hollifield及Martin（1994）的重要研究裡指出，在主要工業化國家中的國家移民政策（包括了法律、各種規定及實際執行的行動）與政策導致的實際結果之間的差距不但不小，而且有擴大的趨勢。

XX

客人？外人？

這些研究者注意到了控制移民的種種措施，其成效正在下滑，同時在被研究的九個國家裡，其移民官員對政策的成效，比起15年前更缺乏信心。

XXI 兩個極度不同的體制之間的矛盾——一個是爲了資本流通，另一個是爲了移民流動——帶出以過去的遊戲規則難以解決的問題。歐洲共同體（European Community，簡稱EC）及各成員國政府都發現了一個事實，即各式各樣因應移民潮及其他流動人潮而設立的歧異體制共同存在時，是非常難以去協調處理的，然而現在是必須正視這個問題的時候了。美國基本上還未體認到這個問題的存在，然而它確確實實是存在的。近期爲了要加強取締毒品交易，同時控制移民入境而提議要檢查通過美墨邊界的卡車計畫，引發了來自美墨雙方與貿易相關的團體的諸多批評，他們認爲這項政策將對此地區的自由貿易帶來災難性的影響。此事正足以做爲不同體制之間引發張力的縮影。

歐洲的經驗確實告訴我們，如果能把握住國際遷移現象裡的幾項關鍵特性，將有助於我們找到更爲恰當的政策可能性，這也比美國認爲可行的政策更爲適切。如果我們瞭解國際遷移是受到條件的限制，具有模式可循，同時是有範圍的一個過程，那麼原本將它們視爲國家危機的心態將被調整爲視它們爲管理的對象——雖然困難，但仍是可以被管理的過程。姑且先不論世界貿易組織（WTO）或國際貨幣基金（IMF）的金融援助、環境上的迫切問題以及軍事干預，歐洲與美國都必須研發出新的方式以處理複雜的過程，同時對過程及情況有更加多邊的理解。管理移民仍舊是個複雜且困難的事務，需要相當大幅度的創新之舉才能因應，但如今正是著手啓動的時刻。

導讀：遷移的歷史長河

曾熾芬

台大社會系教授兼系主任

Saskia Sassen：一位撼動人心的政治經濟學者

有一次在社區大學教國際遷移，正式上課前，我詢問大家對新移民的看法，一位經營麵攤的學生，約五十多歲的男性，提了許多對於新移民遷移動機的質疑。接下來兩小時的課，我主要以本書作者 Saskia Sassen 更早的著作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中的政治經濟學觀點來討論遷移為什麼會發生。上完課，請同學寫下上課心得，那位麵攤老闆學生在紙上寫下了：「人為夢想而遷移」的句子拿到我面前。

雖然 Sassen 研究國際遷移向來主張，遷移不只是個人的動機與行爲，是經濟過程與地緣政治將兩國的遷移管道打通在前，個人的遷移行爲在後，因此，這位麵攤老闆的「遷移乃爲夢想」論點，不盡符合 Sassen 要強調的立場。但是，這位麵攤老闆先前「反移民」態度的確有了改變，改變他的力量大多要歸功於 Sassen 從政治經濟學觀點出發，將當代的移民現象與千里以外一直在運轉的世界體系關聯起來的努力。

知識有時是透過拉長現象在時間與空間上的座標來改變我們的視野，再進而改變我們的觀點。我個人認爲，巨觀層次的政治經濟學比微觀個人層次的分析更可以達到這樣的效果。不過，由於政治經濟學的觀點往往過於抽象或宏遠，以致於不像個人層次的分析或故事那樣帶有直接撼動人心的力量，但是本書作者 Saskia Sassen 卻是一位異數。以前讀她的書時，雖然經

客人？外人？

常必須想像有一個政治經濟的世界體系在左右與影響個人的遷移行為，但是，我往往能夠找到穩固的踏腳石繼續跟著她的思路前進。

Saskia Sassen 是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教授，她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全球化中人口遷移與都市發展的議題，以政治經濟學的分析見長。她在1988年出版的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是國際遷移領域中的經典之作，該書從世界體系理論出發提出一系列的重要命題至今歷久不衰：勞工的跨國流動與生產國際化之間有密切的關聯；勞動力的遷移通常在一個相互關聯的經濟體系中進行，這相互關聯性在二次大戰之後最重要的是由國外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所連結。外資帶來了兩國間的文化連結與工資比較的機會，資本投資國成爲吸引資本吸收國的人前往的目的地。

《客人？外人？》是 Sassen 對遷移在歐洲的歷史研究，也是她學術研究中的一項重大努力。Sassen 在這本書的序提到：「我知道，要能持續數年將精力投注在本書的研究與寫作上的唯一方法，就是讓自己像個抽絲剝繭的記者，揭露出歐洲其他遷移歷史，而它們如今大多身埋在幾近模糊不清的學術文獻和博學者的收藏。」研究這些被埋沒的文獻固然困難，要在一本小書中整理呈現「300年來歐洲一直是由移民所構成」的故事主軸更是艱鉅的任務。研究300年的歐洲遷移史，讓 Sassen 得以在這本書中提出對遷移的基本理解，其中最重要的看法是：國際遷移的流量通常在時間、區域和規模幾個面向有一定的限制；國際遷移不是隨機發生在窮國與富國之間，結構性的因素影響遷移發生的區域、移民數量、以及遷移潮期間的長短，在這些結構性因素中，地主國的移民政策與勞動力市場通常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Sassen所提的這些基本理解和地主國社會一般性的看法截然不同：一、地主國社會通常有一種恐慌，憂慮這些移民從四面八方而來、無止無盡。二、地主國（尤其是政府）往往將自己視為國際遷移過程中無辜的旁觀者，但事實上，在民族國家界線清楚的今天，若不是地主國的政策設計新的管道，移民往往不容易進入。因此，地主國政府在移民政策的制訂過程通常經驗一種分裂，一方面打開國界的門讓更多移民進入；一方面又表達擔憂移民的到來。這種分裂起因於地主國政府往往自認為是遷移過程中的被動接納者甚至是受害者，當社會大眾對於移民有疑懼時（通常是經濟衰退的時候），它們就信誓旦旦地要嚴守邊界；但當社會大眾遺忘移民議題（通常是經濟景氣的時候），它們又開始擴充移民管道。以致於歐洲歷史中的遷移者，在當地人心目中，有時是受歡迎的客人（guests）、有時是誤闖的外人（aliens）。究竟政府、市場、媒體、以及大眾在何時、如何、以及為何將遷移者視為外人或客人，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問題。

新移民的台灣

讓我們回到台灣本身的移民課題。在1990年以前，台灣並無具體接納移民的制度設計，也一直沒有吸引顯著數目之外來人口的結構性因素，因此台灣社會也沒有機會想像有一天會有外國人加入成為不折不扣的同胞。自1990年代開始，各種類型的國際移民逐漸成為台灣一項重要的社會變遷來源。首先是1990年初開始外勞政策大量引入外國（東南亞）勞動力。1995年中，因為婚姻而移民到台灣的東南亞與大陸籍女性日益

客人？外人？

增加。東南亞籍勞工與婚姻移民的移入使得台灣成爲亞洲內部遷移的一個主要目的地，當代台灣再度成爲眾多移民的目的地。但是這些移民與台灣社會的關係仍然處於相當不穩定的狀態，她／他們處於像 George Simmel 所說的陌生處境，與台灣社會既遠又近，空間距離很接近，但心理距離可能很遙遠。首先，外勞政策引進移工是以暫時性勞動力的方式，他／她們和台灣社會的關係從這樣的起點直到今天都還是處於法定地位的暫時狀態；另一方面，因爲婚姻而移入台灣的新移民也遇到很多被接納的障礙，雖然這些絕大多數爲女性的外籍配偶比外籍勞工起碼在法律地位上更具備成爲台灣社會永久成員的資格，但是，也正因爲政府無法透過配額等像水龍頭開關一樣的機制來管制以這種資格移入台灣的人口流量，反而進一步引起台灣社會極大的焦慮與關切。政治人物發表各種對移民的言論，加上媒體大篇幅的報導，幾乎讓一般人也都可以認知到變遷中的台灣，新移民一定是一個重要的議題。

就移民的台灣而言，我們可以說站在一個移民歷史的轉捩點上。我們亟需建立一個接納移民的傳統。雖然現在很多人提出台灣人口多來自外來移民，因此台灣是移民的下一代所組成的社會，做爲台灣的「接納」移民傳統。但是，台灣早期的移民雖來自島外，但都爲漢人，並建立了一個將原住民邊緣化的漢人移民優勢社會。面對台灣今天的新移民，這套漢人強勢的移民傳統並不適合成爲我們面對新移民的基礎，新移民來自多元國籍，有著不同的種族與族群文化背景。因此，我們要建立另一種新的移民傳統，那就是體認國家組成的成員更加國際化與多元化乃是必然的趨勢，我們社會對於不同國籍的遷移者成爲我們的一分子，要予以正面的回應與接納。

移民傳統的建立需要對於一個國家的未來組成成員應該是誰的問題，提出看法，對於此一問題，大致有兩類型的回答：第一種是主張一個國家的成員身分取決於共享的族群性與民族性，又稱族群國家；第二種主張國家成員是基於社群參與及對民主價值的共同看法，又稱公民國家。族群國家以維持種族同質性為主要的價值，將來自外國的各種移民視為構成對於國族統一性與共同性的嚴重威脅。這些國家採取以血統做為公民身分唯一的基礎，傾向相信基於血統而自動成為公民的人們，比後來志願選擇成為一國成員的人，可以組成更真實、更可靠的同胞關係。在這樣的思維之下，那些出生即擁有公民權的人，比後來因為婚姻、或者其他選擇而遷移到該國的人應該享有更穩固的公民地位，該國其他成員也會覺得與本地公民，相對於後來才抵達的移民，分享一種更強烈的國家歸屬感與忠誠度。

族群國家對移民通常不友善，它也往往帶給整個社會對於移民的負面觀感，移民以及其下一代在這樣的國家更容易被排斥，因為族群身分乃無法由後天努力所取得，而是由先天（祖先）的身分所決定。

公民國家的原則強調國家的組成基礎在於由公民參與的民主政治社群，在其中，一個合格的公民乃是遵守做為公民的權利與義務，尊重民主中平等與參與的價值，這樣的原則對於新增加的國家成員比較具包容性，因為它不以任何不可改變的、先天的族群、文化的理由排斥新移民及其下一代。Sassen 在本書中想要理解誰會被設定為「外來者」並被明顯地拒斥在融合的可能性之外時，她發現既使在採取族群國家定位的德國，族群文化原則並不是歸類「外來者」最明顯的判準。一方面，並不是所有的異族群者都會被排斥（高階的人經常被接受），再

客人？外人？

者，往往不是文化、語言、族群差距最大的一群人被排斥（德東人是德西人最排斥的外來人之一），這揭穿了族群國家往往以族群之名行歧視之實的虛偽。

在全球化的今天選擇走族群國家的路，要付出相當多的代價。以族群國家為定位的日本，當它需要移工時，爲了要控制不讓其他族群進入，選擇用海外日裔族群做爲移工的來源，並賦予高於其他外國人族群的權益，但又不想長期接納他們，於是在外國人群體中創造出各種族群階層，重重的人爲界線掩蓋了各種外國人一樣對日本社會經濟貢獻良多的事實。

這也是爲什麼 Sassen 對於移民政策有跨國化的主張，她認爲資本跨國化過程中，國家之間一直擔任協調者的角色，甚至可以催生跨國的經濟聯盟（像 EU 和 NAFTA），國家之間也應該積極地協調出更合理的空間讓移民來來去去。Sassen 主張應該向歐盟學習在區域經濟體的協商中，加入人口流動的自由化。特別是情況比較相似的 NAFTA，在資本與商品自由化的同時，卻將低階勞動力流動的障礙調高，甚至大量投入警力，嚴守邊界造成更多非法偷渡者喪命，這是 Sassen 不贊成美國移民政策的主要重點。Sassen 研究移民史，帶有強烈的使命感，那是因爲她希望移民能活在一個不會再因爲她們的來源或國界而受到不同待遇的世界。

我們可以從國際遷移史學到什麼？

讓我用歷史對於移民研究者的重要性這件事做爲這篇導言的結語。法國史學者 Fernand Braudel 在他討論 15 世紀到 18 世紀資本主義動力的書中，寫道：「記者、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在研究工作中的缺陷，是極其經常地忽視了歷史的範疇和前

景。許多歷史學家不也是這樣的嗎？他們所研究的歷史時期好像是一個自在的孤立的時期，自生自滅。」有人類就有遷移，因此如果只研究遷移的當代剖面，無法像 Sassen 那樣地指出遷移的模式與變遷，也就不能夠將當代的遷移放在一種相對的角度予以比較。

在本書中，Sassen 發揮她一向一邊拋出問題、一邊提出關鍵線索的寫作風格，使得讀者得以透過這本書一窺過去三世紀以來，國際間與區域間的勞動遷移如何構築歐洲都市化和工業化的歷史。這樣複雜的故事，被 Sassen 一層一層的剝開，讀者竟也不太費力地跟著 Sassen 跨越 300 年，南來北往在歐洲各地穿梭。令人吃驚的是，Sassen 最後抵達的時空終點站是當代的歐洲與美國移民政策的比較與出路。儘管她在英文版序中說，她寫遷移在歐洲的歷史，意在給予她最熟悉的歐洲與美國移民政策一些建議，但是，讀者一路讀來不免心中疑惑，Sassen 能夠穿越歷史的長河抵達當代現實的岸邊嗎？讀完這本書的時候，對於歐洲遷移史與當代歐洲及美國移民政策的關聯性，清楚呈現。佩服之餘，更應效法 Sassen 的企圖，從對遷移的歷史閱讀，思索個人所處之社會所面對的移民問題與出路。

目 錄

序	i
英文版序	v
導讀：遷移的歷史長河 曾熾芬	xv
第一章 導言	1
第二章 1800年	9
在早期勞動潮與難民潮中的國家	12
在世紀之交的經濟脈絡	17
性別與勞動遷移	25
拿破崙時代的主要勞動遷移體系	27
北海體系：這群「去荷蘭的人」	31
結論	38
第三章 1848年之後	41
流亡者（exile）與難民	44
經濟成長的多重意義	48
勞動遷移以及歐洲的建立	51
延續與改變：往葡萄園去的季節性遷移	57
第四章 國族與遷移：德國、法國、義大利	63
德國：短期遷移的典型國家	65
法國：愈多愈好，並且讓他們都變成法國人	78
義大利：他們在農田與礦坑裡工作， 也為歐洲其他國家修築鐵路	85

結論	91
第五章 國家與外國人	93
猶太人的西遷	96
巴爾幹諸國與種族清洗 (ethnic cleansing)	
的早期版本	99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其餘波盪漾	101
邁向第二次世界大戰	111
結論	118
第六章 模式、權利、管控	119
移入	122
非法移民	126
尋求庇護者及難民	129
新的遷移模式	133
嶄新的以及重新恢復的東西向遷移	134
成爲接收地區的中歐	138
移民的政治權利	143
移入議題與來回移動的自由	152
第七章 今日的移民政策該如何制定	161
勞動遷移是鑲嵌在特定脈絡的過程	162
遷移的地緣政治	166
跨越國家的管制	170
從外籍工人成爲定居者	174
移民政策的跨國化 (transnationalizing)	181

結論	188
附錄	191
參考書目	201
索引	232

第一章

導言

今時的移民常以具威脅性的外來者的形象出現，離開原居地而向較富裕的社會叩門，或是撞進、偷偷潛進門內。移民之接收國的反應顯示他們自以為接收國並未參與整個移民的過程；但事實上，他們確實參與了。國際遷移是受到許多經濟或地緣政治的過程交錯影響下的產物，而在這些過程裡也將許多相關的國家連結在一起；國際遷移不僅是追求較佳機會的個人的加總結果，欲理解移民問題，我們也必須去探索在移民的過程裡，包括政府、經濟行動者、媒體，以及高度開發國家的整體人民，是如何、為何、何時參與此移民的過程。

難民潮同樣也是眾多過程交錯下的結果，而在 20 世紀大多數的時候，我們也都看出，難民是一群心不甘、情不願地離開本國的人，他們完全是迫於自身無法控制的大環境使然，而非企求在富裕國家裡擁有更好的機會。國與國之間的政策或協議，皆視難民潮為其他行動者採取行動下的後果——尤其是國家的行動。這樣的認識已經被仔細探察，甚至是被攻擊的。相同的普遍流行的意像，也在有關國際遷移的瞭解上，逐漸獲得優勢：如今，難民也常被視為是企求在富裕國家裡擁有更好機

客人？外人？

會的個人。

2 關於移民或難民，不論是國際法、政府的政策走向，或是日常生活的論述，都未觸及到產生移民或難民的政治和經濟情勢。例如，移民或難民潮如果真的只是一群企求在富裕國家裡，擁有更好機會的個人，那麼，在這個世界上許多遽增人口與貧窮的地方，早已創造出數目十分可觀的窮人入侵高度開發國家，而且這將是一群毫無區別，都是從悲慘處境湧向富裕的人潮。但是，事實絕非如此。遷移本身是高度選擇性的過程；只有特定的人們會離開，同時他們前往目的地的路徑是高度結構化的，而非盲目地湧向任何他們所能進入的富裕國家。遷移之所以具有如此高度結構化的形式，乃是跟移出國與移入國之間的互動及相互關係有關。

一旦政策制定者和一般大眾誤認遷移只是因為落後國家的貧窮或迫害，在政策制定的選擇上將沒有太多的空間。對於大規模入侵的合理回應似乎就是關閉所有的邊界。在此選擇下，一個國家的政治文化最極端的表現方式，恐怕就是恐外症（xenophobia）及種族主義；這種對移民和難民「關起門來」的較溫和的版本，在所有高度開發的國家中屢屢可見。

在本書中，我希望先藉由對「這些移動的人們為何存在」做一較廣泛的詮釋，以便我們在處理移民或難民問題時，有更多、更廣的選擇。欲達此目的，意味著我們要檢視歐洲本身，看看它自己的移民與逃難的歷史，因為今日這些在遷移潮（migration flow）的體系中積極參與的富裕國家，乃是在不斷演進的歐洲脈絡裡才發展出來的。

尤其，透過我針對過去200年來歐洲的遷移與難民的歷史做一探索，或許可讓我們得到一個免除「大規模入侵」之想像

的詮釋。首先，我將揭示不論是過去或是今日，各式各樣的遷移在時間與地理的面向上都是有模式可尋，並被時空所限制的。其次，我將闡述這些遷移，是如何超越那些僅停留在迫害、貧窮和人口過剩的冷酷事實上。當然，我們不能，也不會否認這些力量所起的作用；但必須說的是，這些冷酷的驅動力只是原始元素，還需要在更廣大的政治和經濟結構中互相結合或加工後才能使人們產生行動。當迫害、貧窮及人口過剩不再被視為是對遷移潮充分的解釋時，那些基於入侵的想像或隱喻也將不再能滿足我們；同時，關於移民的政策制定也將更具開創性，因為它所處理的將是一個界限明確的事件、被形塑的經驗以及可被操控的過程。

3

要瞭解遷移者在歐洲發展過程中的地位，我們必須回到現代工業化發軔之初，尤其是轉變為以工廠生產為主的形態，以及鐵路發展的那個時點。從18世紀末到19世紀末的經濟轉變，與當時國家處理宗教和政治難民的方式相互補充。在現代化道路上產生的轉變，在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在不同的時間裡，以不同的速率進行著，但一般而言，這些轉變是發生在鮮少有邊界管制，並且政府缺乏科層體制及技術，因而無能力控管的時代裡。遷移所發生的模式由於夠複雜，因此可以對流動的規模大小及持續與否加以設限，並決定此流動的地理位置。我將探索這些形塑此流動的力量，是否會左右欲遷移人們的意願，並限制有意遷移者的數目。並且，我將進一步分析，遷移的這種系統性條件（system conditioning），是否以及如何以近乎於準平衡式機制的方式產生影響。

我們知道，在整個殖民擴張時期裡，因著高度的成長，因此需要動員外來勞動力的供給。上述對外來勞動力的依賴有幾

客人？外人？

種形式：在礦區或大型種植園裡工作的龐大強制勞動運動，其中最極端的形式就是奴隸制度；但也有數以百萬計的契約勞工（indentured workers），從印度半島乘船到加勒比海地區的人，或是前往北美洲的歐洲白人契約奴隸，以及強加在南非原住民身上的強制勞動體系，像是米塔制（mita）¹或委託監護制（encomienda）²。因為當時尚未得知有其他的來源，因此委內瑞拉即被攻打，以獲取勞動力來供給西印度群島的大規模種植業。上述這些熟悉的描述，咸認是美洲、亞洲、非洲經濟史裡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在這個脈絡下，日本也是相當值得注意的例子，它是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間經歷大規模成長的同時，唯一沒有以進口勞動力來配搭的高度開發國家，但最近日本已求助於移工（immigrant worker），以解決一些產業的需求，包括農業、漁業、製造業，以及預期將因老一輩日本人即將退休而大量出缺的低工資服務業。

4 然而，歐洲的情況又是如何呢？關於歐洲與遷移間最具支配性的想像，就是數以百萬計的人正離開這塊大陸。在過去二個世紀以來，在歐洲境內的勞動力遷移究竟占多重要的地位，而又是如何構成遷移圖像裡的一部分？西歐國家們已根深蒂固地堅信他們並非移民進入的國家（immigration countries）的信念，因為遷入歐洲的移民基本上要到1960年代才開始，並且這罕見的統計數字之所以會在當時浮現，是因為戰爭造成的大規模摧毀以及重建的需要。我試圖要呈現出歷史的事實與這個

1. 是一種政府有權力藉由支付當地公民金錢，而強制他們執行政府認為有必要的工作，這常是殖民者藉以獲取原本沒有勞動報酬觀念的原住民之勞動力的體制。

2. 在此制度下，殖民者認定當地原住民必須向「土地擁有者」，也就是殖民政府繳交部分田地產出為貢賦，或是必須為殖民者執行勞務。

信念的差異有多大。

雖然我的資料大多是充滿數字與地理名詞，但在講述這個另類版本的歷史時，卻不能不考慮在不同的時期、不同的情況裡，遷移者的政治與文化的表徵。今天有些人常常宣稱，當代移民所產生種種問題之一，就在於種族、文化與宗教的距離——可以想見這些因素，都將創造出同化移民上的障礙。因此我要問，當移民具有相同的種族，或者廣泛地說，共享西歐文化時，是否種族主義或反移民情結就較不會發生？

在探索邊界（borders）的意義過程中，這些議題的意義將逐漸被凸顯出來。今天我們看見了有些力量為要創造無邊界的經濟空間而集結起來，有些力量則是為了排除移民與難民，而重新調整邊界的控制。今天為了阻止移民的努力，都是基於這樣的脈絡下，即預設了他們對我獨特的意義，就是當前於資本、貨物、資訊及文化的流動上跨國化的傾向，高度開發國家中的政府與經濟行動者，想盡辦法要在上述流動的過程中，逐漸減少國界的角色以創造跨國的空間，但已開發國家當前的移民政策卻與其他國際體系下的主要政策架構，以及全球經濟整合的逐步達成反其道而行。

歐洲共同體以及其下會員國的政府已經發現，這些意見分歧的政權並存於一架構下，在政策的處理上是十分困難的。的確，所有高度開發國家在過去10年間，已接收了在數字上快速成長的移民，不論是合法或非法的；沒有國家認為它們的移民政策奏效，這些國家正向外來的投資與貿易敞開他們的經濟體，去除他們在金融市場上管制。一個新經濟制度的出現，劇烈地削減政府以及國界在控制國際交易上所扮演的角色，然而這些國家的移民政策架構，卻仍然把焦點擺在民族國家及國界

客人？外人？

這些過時的概念上。當討論到經濟交易時，移民政策必須顧及到經濟快速國際化、國家政府相對應的轉型、對邊界的重新定義等事實。

而類似的兩難也在難民議題上逐漸成形。始於第一次世界大戰，西歐國家已發展出一套技術與官僚系統，能控制他們的邊界，並越來越能夠管制發生在領土境內的活動與事件。建構起這個過程的一項重要的元素，就是國際組織（interstate system）的強化。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不久，所簽訂的日內瓦公約裡對難民的定義是非常狹義，同時是國際組織運作下的產物，基本上只有自共產鐵幕裡逃出的才叫做難民，而國家也參與在這個對難民界定與管制的過程裡。這個定義在往後維持了50年，這50年是國際組織世代來臨的時期。

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20年及之後的10年間，歐洲充斥著數百萬的難民，開啓了現代大規模難民的時代，另一頁的歐洲歷史，而在隨後的1930年代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歐洲又見到數百萬的難民，我將探索是何種機制，讓歐洲國家得以在分歧的處境裡協商，這處境可以從一些表徵看出，如狹義的「難民」定義、廣大可以及不能被分類的難民的現實、對於難民處置上國家的絕對主權，以及國際組織所導致的嚴格管制等情況。

隨著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終結，國際組織開始在現代難民的定義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但在近10年來，一個新的定義逐漸浮現，這有部分是因為在日漸走向全球化的世界裡，國際組織的角色必須轉變，部分因為冷戰的終結導致對「難民」的正式定義有所轉變的必要，部分則因為今天在亞洲與非洲正上演的大規模難民轉變的戲碼。在西歐國家的框架裡，最終將因著這

個日益普及的信念，即認為難民們實際上是偽裝成政治受害者的經濟移民，而將「誰是難民？」這個問題給複雜化。誰是難民？那些來自戰禍頻仍或普遍壓迫地區的人們，被經濟上的絕望所驅動，像是在188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間離開東歐或俄羅斯250萬猶太人，他們算是「合法」難民嗎？如此廣泛的定義會對難民的地位造成傷害嗎？在西歐這個標榜著日益跨國化的新政治與經濟體中，國家對難民定義這樣的控制是合理的嗎？

6

關於移民與難民的這些問題，以及他們所引起在政策上的兩難問題，形成了這本書的架構。去地域、失根、遷移的人們在歐洲歷史上，似乎居於一個模糊的灰色地帶，他們住在不屬於他們的地方的陰暗角落。但是，我稱呼移民及難民為「今日的定居者」(today's settler)，以便指出老舊的歸屬概念並不適用於當前的事實。遷移是安頓及定居在一個世界上的動作，在這個世界裡，起點與終點的區分不再等同於對他者的區分，在這個世界裡，國界不再將人類的存在狀況 (human reality) 區分開來。

第二章

1800 年

隨著拿破崙戰爭的展開，刀劍與槍炮構築了這個新時代的主要圖像，除了戰爭之外，數十萬的男人、女人與小孩以不同的方式在過活。法國山地上的人民下到地中海平原，利用幾星期的時間來收成穀物及葡萄，這種每年都有的季節性遷移持續了整個 19 世紀。來自西發利亞（Westphalia）的農民，即所謂的去荷蘭的人（Hollandgänger），每年有三個月的時間，會遷移到北海地區以挖掘沼澤裡的泥炭、砍伐乾草。整個歐洲的農戶也會以年度契約的形式，把家中的兒子與女兒送到不同的主人家中，幫忙農地或家務的勞動。但直到晚近為止，這些人都如沃爾夫（Eric Wolf）設計的巧妙詞彙所稱呼那樣，是「沒有歷史」的人。

7

然而，戰爭與宗教迫害形塑了拿破崙世代對遷移的理解，而在我們對歐洲歷史的瞭解裡，因為戰爭與宗教不寬容產生的遷移，確實遠較勞動力的遷移要來的印象深刻。當談到 17 和 18 世紀的人口移動狀況時，不論是發生在 1685 年之後，為數 50 萬的胡格諾派教徒自法國被驅離而遷移，或是在 1732 年從薩爾斯堡（Salzburg）被驅逐的路德派信徒，都是常被提及

客人？外人？

8 的；大家記憶猶新的舊帝國政權間的戰爭，如鄂圖曼、奧國、俄國，也導致了東南歐與小亞細亞地區的大規模的人口劇變。現代的學術著作也讓這樣的記憶更加精確，我們已經知道發生在鄂圖曼帝國境內，為西歐或中歐強權所支持，藉此欲削弱鄂圖曼勢力的民族主義或族群運動，也造成了人口迅速的轉變。被統治的少數族裔團體常被鼓勵遷出：普魯士想要逐出居住在自前波蘭奪得的土地上的波蘭族裔，奧國則鼓勵克羅埃西亞人遷移出去。

但是，雖然戰爭與宗教迫害是導致人口移動的主要因素，拿破崙軍隊本身的計畫者卻知道他們也必須考慮勞動遷移。在18世紀晚期的這段時間裡，為求工作而進行的暫時性遷移也在歐洲各地持續進行，構築成一群動態同時也是可移動的身體。欲將戰事擴展開的法國軍隊，十分在意招募軍人的問題，因此針對暫時性勞動遷移舉行了第一次的官方調查，這次自1808到1813年間進行的拿破崙調查（Napoleonic Inquiry）試圖建立帝國內的人力資源的資料，而這個帝國在當時包含了今天的法國、比利時、盧森堡、荷蘭與大部分的德國西部，以及一部分的義大利與瑞士。今日，這則調查成為主要的資料來源，為那個時期的季節性遷移提供了巨細靡遺的資訊，同時也是經濟史中一份諷刺的文件；很多遷移的路徑後來因為帝國發起的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動亂，而停滯中斷。

在拿破崙戰爭開始的當時，有幾條主要的勞動遷移路徑，將工人們帶到北海地區、地中海平原、巴黎、馬德里以及倫敦，這些路徑是從中世紀結束後開始發展的暫時性鄉村遷移所逐步演進而來，在前工業的歐洲裡，所有的都市地區都有著遷移者：不論是貧困或富有的遷移者都聚集在或大或小的城市

裡。今日對當時最可靠、確切的歷史知識，是來自於對住在城市中公民（burgher）的記錄，例如德國在18世紀的這種記錄告訴我們，約有居住在貿易城鎮的半數城市公民都是遷移者，但許多較不富有的城市居民並未進行登錄，因此讓我們難以確知到底這些遷移者在前工業歐洲城市裡占有多大的比例；而拿破崙調查使我們能知道更多在鄉村裡的平民百姓的情況，帝國在對他們控制與瞭解要較對城市的居民成功的多。

今天我們已經能確知，不論在舊體制下的城市內或是城市外，都存在著頻繁的移動。在當時城市內的死亡數目勝於出生的情況下，遷移者是使這些城市裡的人口規模保持穩定，甚至是提升的重要因素（de Vries, 1984）。在鐵路開始出現的200年前，暫時性遷移者也是在歐洲境內四處巡迴，Poussou（1988）的研究顯示，在這個時期的生命模式，並不像一般想像的，是定居於一地不動的。像是Clark（1979）的發現，就說明了在1660到1730年間的英格蘭南部中，移動是常態。事實上，從Chatelain（1976）的觀點來說，遷移者比起商品貨物還要更有效率地在各地巡迴。

如果這些遷移的人對拿破崙的調查人員有意義，認為是潛在的軍事資源，那他們對現代歷史學家的意義，則在於瞭解滑鐵盧（Waterloo）之後的政治經濟情勢。做為一位重建19世紀勞動的歷史的先驅，Chaterlain寫到1920年代與1930年代時指出，暫時性的勞動遷移雖然被歷史學家忽視，但卻不是經濟體系裡的邊緣機制：他們就像鄉村工業（rural industry）一樣，都很重要地形塑了19世紀的經濟與社會生活。今天我們或許有可能罹患一種新形態的歷史健忘症，只因為這些暫時性遷移在20世紀的進程裡變得不起眼。關於19世紀的歐洲勞動遷

客人？外人？

移，如今記載下來的歷史所強調的是發生在那個世紀的其他類型遷移，如較永久性地往城市移動，以及在19世紀後半葉發生的大規模的遷往海外的遷移。

這一章試圖要在工人們暫時性的移動，以及直到19世紀中葉為止較永久性的遷移之間，描繪出一幅平衡的圖像，並將焦點放在拿破崙的調查人員想要繪製出的世界，以及不斷改變這描繪的地理、經濟、社會的力量。本章的最後，將以拿破崙的研究員們所繪製出來的其中一個遷移系統的細緻圖像做結論，這也是由當代學者Jan Lucassen（1987）所重建而成的：阿姆斯特丹繁榮的經濟操控著，每年由西發利亞到北海地區的農民季節性遷移。如果這段歷史中絕大部分都鮮少為人關注，如果它許多特徵已經消逝，但是它的結構仍對我們在瞭解當前歐洲的遷移有莫大的助益，因為當前經歷過第二世界大戰後的情況，與當時經歷過拿破崙的征服與挫敗後的歐洲十分雷同。

在早期勞動潮與難民潮中的國家

10 在19世紀之前，歐洲已經歷過許多與工作相關的不同類型的遷移，始於中世紀的手工業工匠之遷移，或許最爲人所知，在爲期最高達10年的學徒生涯後，師傅會把學生派至能增進他訓練的更大中心，或只是派他到另一個中心來實踐他的技術。這些由行會（guild）所管制的遷移，最終促使手工業工匠，以及在不同地點間工作的新興工程業裡的特定成員，更普遍的遷移。法蘭西之旅（Tour de France）以及結伴式遷移（Gesellenwanderung）就是這些類型遷移的代表。在歐洲各地都有對技術工人的招募：義大利的鑿石工與砌磚工在歐洲各地

都有需求；德國的傢俱師也被招募到法國去；瑞士的酪農工人也被招募到德國。

長距離的季節性遷移體系在17世紀歐洲大部分繁榮的地區裡，是另一種常見的遷移模式（Hart, 1974; Lucassen, 1987）。當一些遷移者待在他們的終點站，並開始籌組家庭，與更多自他原生社群向外遷移的人們構成連帶時，這些循環不斷的遷移體系最終就演變為連鎖遷移（chain migration）的元素。

這樣的遷移最令今天的我們感到大相逕庭之處，就在於整體而言，當時接納的社群是很歡迎這些遷移者的。四處遊歷的旅者帶著少見的高超技術前往遙遠的地方；會停留在一個新地方的季節性遷移者，也讓歐洲境內飽受疾病摧殘使其人口驟減的繁榮地區，居住人口得以增加。

阿姆斯特丹就是個因遷移而為經濟帶來正面效果的好例子。做為17世紀商業與金融的核心，這個城市受益於富有與貧窮的移民甚多：從1600到1650年，阿姆斯特丹的居民從六萬人成長到17.5萬人。可以肯定的是，這些成長當中有些是從施行宗教迫害與不寬容政策的法國逃出的難民，或是從實行不寬容政策的西班牙或西班牙掌控的安特衛普（Antwerpen）逃離的富商。但是阿姆斯特丹的經濟以及社會生活，漸趨大量地仰賴外來的工人，將近60%的當地水手及船員都是外國人，其中大部分來自德國及挪威（Hart, 1974）。1700年時，每年約有1.5萬名的德國工人前往阿姆斯特丹，在1730年，每年也有介於1.5萬到二萬名的德國人遷移到荷蘭；在這個世紀結束時，也就是在法國大革命所引發的一系列戰爭之前，這個遷移的數字可能高達三萬名（Lucassen, 1987）。這些在德國被稱做去荷

客人？外人？

蘭的人的外來工人，構成了這個關於季節性遷移的龐大體系裡的一部分，他們集中製磚、商販、街頭叫賣、修築運河、碼頭搬運或是農業等行業。

經濟移民與宗教難民在舊體制下的歐洲是互相重疊的兩群人，而在這當中我們也可以看到國家是如何介入到遷移的過程裡。在16與17世紀的新教及天主教的宗教改革期間或之後，我們看到了大量難民的產生，都是因著在歐洲發生的宗教迫害與宗教戰爭所導致的結果。¹在這二個世紀間，歐洲有超過100萬的難民，但這個數字在18世紀有了顯著的下降。在國族建構過程裡，希望創造出一個在政治與文化上較為同質的國家，而在經歷這過程的時代與地區中，宗教都成了宣誓效忠的關鍵標誌。一個團體裡有著另一個勢力龐大的宗教認同被視為是不可取的，因為這將有礙其內部的忠誠，威脅政治的權威：西班牙的猶太人、法國與西屬尼德蘭的新教徒、宗教改革年代裡中歐的一些公國及邦國的新教徒或天主教徒。宗教難民的分布是十分廣闊的：在17世紀起自鄂圖曼統治下逃至匈牙利的塞爾維亞人；在1688年之後跟隨著他們統治者四處流亡的英格蘭、愛爾蘭與蘇格蘭的天主教徒；在18世紀離開斯堪地那維亞與中歐的各種新教教派。

宗教戰爭摧毀了經濟的成果，但同時也進一步促成了受經濟吸引而產生的遷徙。像阿姆斯特丹這樣一個宗教寬容的城市，吸引了這些宗教難民前來，日後也獲得了相對應的收成。

1. 猶太人第一次被驅逐出伊比利半島是發生在1492年，在法國也發生了宗教戰爭（1562-1593）；尼德蘭地區（Netherlands）反叛西班牙是發生在1562到1593年間；而戰火遍布大部分德國的30年戰爭則發生在1615到1648年間；英國也曾有過宗教衝突，最終並演變為自1642到1660年的內戰。

經濟遷移者與宗教難民的路徑恰好在此交會。身為接受一方的舊體制對遷移者與難民的流入，並未像後來20世紀那樣採取限制的政策。首先，重商主義下的政策認為人們的遷入是一件有正面助益的好事，並附帶有許多資源。同時，遷入對當時人口飽受高死亡率、短暫的預期壽命、飢荒和連綿的戰事而遽減的歐洲而言也具補償效果，而歐洲人口一直到19世紀中葉之前，都不曾顯著地向上成長。在許多地區，從周圍腹地及「本國之外的地區」吸引人口以形構為城市的過程中，都有一個明確的政府政策：只要遷入者擁有財富的數量與當地市民相仿，即授與他市民該享有的權利。

在17和18世紀中，許多政策的確都積極地尋覓有才幹與資源的人，這些人因著各種原因而被迫或不得不離開他們的國家。²當法國撤銷南特詔約而將境內的新教徒驅離時，普魯士國王腓特烈威廉還邀請這些新教徒來定居，日後普魯士的政令一直持續這個政策。彼得大帝與凱瑟琳女皇也試圖吸引移民，最後使得上千萬的人先到南俄羅斯，以及稍晚至西伯利亞定居。在「新俄羅斯」中，從1763年開始推行低價購地以及對移民各種優惠的政策，以鼓勵外來人士在此定居。在凱瑟琳二世的執政期間，有為數可觀的德國人在此定居，稍後將證明德

12

2. 這樣的例子在更早之前就發生過。在1511年西班牙政府強制從那不勒斯王國驅逐猶太人後——當時是在波旁（Bourbon）的統治下——一些城市要求國王能讓猶太人回來，他們宣稱假使沒有猶太人的勞務付出，他們將無法繳稅給國王。Sennett（1994）描寫到因為猶太人的金融事務對威尼斯經濟良好的運作是不可或缺的，因此在威尼斯的猶太居住區內，猶太人的地位及安全都受到保障。因為猶太人是整個歐洲網絡裡的一部分，我們知道像是威尼斯的猶太人就與法蘭克福的猶太人有連繫，他們動員資本的能力，是當地極少數的經營者有辦法相比擬的。

客人？外人？

國人難以融入時，又換成許多斯拉夫人在此定居。

這個過程的另外一個面向是，許多政府在17與18世紀中，對於境內移出的遷移設置了許多限制。Colbert（譯註：Jean Baptiste Colbert, 1619-1683，法國政治家，路易14時期的財政大臣，實施重商主義政策，積極建立法國經濟霸權）就明令法國居民的遷出是不合法的，甚至將非法離開的人們處以死刑。遷出在斯堪地那維亞也是非法的，而在英國則是特定擁有技術的工人不得離境。英國的鐵匠與紡織機製造匠是禁止離境的，因為他們可能會在離開時同時帶走商業機密，就像是Samuel Slater一樣；他背記下了Arkwright（譯註：Sir Richard Arkwright, 1732-1792，是英國水力紡紗機發明者）建造的步驟方法，並將羅德島打造為新興的棉織工業中心，與他所拋棄的祖國的紡織工業打對台。更廣泛地說，在那個時代裡，戰爭勝敗取決於人口的密集與否，加上低人口成長率、短暫的預期壽命，政府們都竭力要緊守他們境內的人口。勞力短缺是當時歐洲，從北海體系到地中海平原都普遍存在的問題，國家對遷出人口的政策一方面受限於勞力短缺，另一方面也想藉由驅逐那些異議分子與偏離者，來建立國內一致同質的想法所影響。

從一個國家對遷移採取特定立場，也可以部分反映出它在世界體系中的財富有多少（Zolberg, 1978; Hansen, 1961; Plender, 1972; Thomas, 1973）。在1800年代的早期，開發度最高的英國自覺實力夠強，可以放鬆反遷出的立場並開始採取較放任的政策，雖然英國並未立即撤除阻止遷出的障礙，但至少有三項因素有助於減少障礙：從1811年的人口普查中，其人口成長達15%；持續不斷的內部遷移補足了做為工業重鎮的新興城市的勞力需求；有一派政治經濟學家認為遷出與定居於國

外，有助於開創英國商品的國外市場，而他們的影響力日漸增加。其他的歐洲國家像是法國、德意志的一些邦國以及俄羅斯，因為他們的經濟並未如此活絡，因而到19世紀時仍維持他們強硬的反遷出政策。例如，法國有很充分的理由去反對遷出。在拿破崙時代，法國的工業化以及勞動市場的普遍化並不像在西歐其他地方發展得那樣完全，單依賴農業維生的情況仍十分普遍；農地規模小，並由個別的家庭所管理；一個兒子的遷出就會導致這塊農地耕作上的危機。除此之外，法國的人口成長也很緩慢，遲滯地新生人口也被軍隊需索無度的需求所徵召，以維持殖民帝國的運作，而這帝國也不像英國的那樣，無法以貿易來繁榮母國。因此，法國內部的經濟結構以及它在世界經濟中的位置，決定了它與英國截然不同的利益所在。

可以確定的是，即使在被英國所控制、整合良好的北大西洋地區，對人員以及貨物的移動限制比純粹自由放任觀點所告訴我們的，更加普遍、有效率（MacDonagh, 1961）。國家透過管制有差別的交通費用，試圖來控制遷出。但是藉由這兩個國家間的比較以及阿姆斯特丹的歷史，都告訴我們一個普遍存在於舊體制下政治經濟體的簡單真理：對於貧困的國家而言，遷出的威脅遠大於移入，然而對所有國家來說，有人民移入都是他們的福氣。

在世紀之交的經濟脈絡

從1792到1815年之間，歐洲因為戰爭而遭受大規模的破壞，一個現代經濟秩序也在承平後的歐洲乍現。雖然這個秩序是在不斷發生的飢荒以及普遍貧窮的陰影之下茁生，但這些困

客人？外人？

14

境本身在結構上十分不同於戰爭或瘟疫這種毀滅性的重傷，後者曾大大破壞早期的現代歐洲，並讓整個歐洲人口處於可能突遭重創的威脅中。從18世紀的後半葉起，歐洲經歷了分布不均但卻穩定的經濟與人口成長。歐洲的人口從1700年的8,100萬成長到1800年的12,300萬人；這樣的成長大多發生在1740年之後，³並且是配合著各種類型同時成長的脈絡，像有更多人參與廣泛分布的勞動遷移，成為歐洲社會及經濟歷史中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戰爭與瘟疫並未促成勞動遷移（雖然飢荒一定程度上可能促進遷移，就像我們可以明顯在19世紀中葉的愛爾蘭，以及1880年代的德國看到的那樣）。在財富橫流之地，如今歐洲人必須意識到，貧困與富裕在結構上似乎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遷移讓這個統一體的兩面都顯露無遺。

拿破崙的調查人員，雖然他們沒有精確計算人數的方法，且是出於一時奇想，但今日的我們相較於此仍沒有更好的條件來理解這場「鉅變」的樣貌。在這個時期並沒有普遍的人口調查，居住人口登記的品質也參差不齊；最終，過去所遺留給我們的，只有不盡完美的統計數字。針對早期工業以及城鄉之間

3. 德國的人口在1680到1820年間成長了51%；法國是39%；西班牙是64%；義大利是53%；英國則是133%（Guttmann, 1988; Wrigley, 1983; Anderson, 1988）。這時期出生時的預期壽命也顯著地提升了，在英格蘭估計從36歲上升到41歲；在瑞典則從38歲上升到46歲；在丹麥從35歲上升到44歲；在法國從29歲上升到41歲。而嬰兒存活率也反映了預期壽命延長的嶄新情勢，因此在英國1740年代前期出生的所有男孩中有將近四分之一活不到一歲，而有一半活不到約28歲；在1830年代前期則只有6%的男孩在嬰兒期就死亡，而有一半可以活到44歲。在法國1830年代的人也達到類似的水準；這象徵著一個十分顯著的進步，因為在1750年代出生的男孩裡有一半活不到九歲（Anderson, 1988: 81）。

經濟連結之發展的學術研究，常常只能提供瞭解勞動遷移的間接資訊（Tilly, 1983）。社會情況也讓統計上的偏差更加嚴重，例如鄉下的佣人並未擁有土地，經常必須受僱在為期一年的契約之下，並且據估計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每年不斷更換工作的，因此這類的佣人是如何遷移便很難去追溯（Kussmaul, 1981; Todd, 1975）。相對於此，我們必須仰賴他們那時身處的特定地點與區域的詳細歷史記錄。

從這個來源，我們確實能知道人口成長以及資金進入鄉村經濟，是有助於小地主的無產階級化（proletarianization）。⁴人口成長也意味著一塊土地必須再去切割，但常常這些土地已經小到無以維持擁有者的生計。稅制的引進加上各種來自國家或封建領主要求以現金支付的額項，為小地主製造極大的壓力，使他們寧願去工作以換取工資。遷移是唯一能換取現金支付眾多稅項的方法，但是受薪工作的快速成長，並未使愈來愈多的個人與家戶的經濟停止下滑。很多工作的薪資都很低，這也為歐洲創造了一個全新的赤貧階級。在這個世紀裡，我們看到幾種遷移快速地擴張：以往的地主太過貧窮，以至無力再待在村子裡，也無法維持一個家庭及養育孩子，因此棄嬰的數目也持續成長，在這裡意義上，遷移者於是被視為是流浪漢。

15

4. 例如在Blaschke（1967）告訴我們，從1550到1750年裡，薩克森（Saxony）將近半數人口都成為無產階級，這包括在城市與鄉村。在Wigston Magna的Leicestershire村中，在1765年時仍有40%的土地為農民所擁有，但到1831年止，農民已經消失，都被迫出賣或出租自己的土地。Soboul（1970）估計在1790年的法國裡，有40%的鄉村人口已成為半無產階級或無產階級了。類似的過程也在城市裡發生（Lis and Soly, 1979）：例如在史特拉斯堡，受薪勞動者的比例從1699年的21%上升到1784年的45%（Moch, 1983）。

客人？外人？

這股歐洲的赤貧現象透過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政治體系裡展現。在英國，地主可以自由地將農民逐離土地，並圈地來從事任何他希望的用途。生產力提升了，只是代價是農民為求生存，淪為受薪勞動者。在法國，小地主繼續持有土地，而貴族受制於絕對王權下的政府，因此無法驅離小地主；但是這個絕對王權的政府同時也向小地主抽取高額的稅金與貢物，貴族也繼續向沒有離開土地的小地主抽取封建稅，彷彿稅金還不夠高似的，這也進一步將他們推向貧窮。

假使我們將每個國家當成是整體看待，18世紀歐洲各主要國家的生產力與技術發展的程度其實是相當接近的。因而Bairoch（1982）估計英國、比利時、法國都有類似的生產力水準，並只稍稍領先德國與義大利；瑞士則落後上述的國家一些。但這情況並未持續到下一個世紀，那時的英國遙遙領先其餘的歐洲國家，並成為世界工業的火車頭。

但透過較細部的地理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在18世紀的成長與技術發展，加劇了空間上的極化現象，繁榮地區與貧窮地區的數目都同時上升。可見的資料顯示，鄉村工業主要集中在幾個少數的地區（Guttman, 1988）。我們以棉及亞麻紡織製造業為例來說明，在英國鄉村工業裡最大的雇主包括了集中在West Riding及約克夏的棉紡織製業者，以及Ulster的亞麻紡織製造業者。而在歐陸中最主要的工業——亞麻紡織業也明顯集中在荷蘭的Overijssel省、西發利亞的幾個地區、萊茵河下游地區、薩克森、波希米亞、西里西亞與奧地利南部，其中法蘭德斯的平原是亞麻紡織業的中心。

亞麻製造的成長也造就了一些地區的繁榮，伴隨而來的是工作機會與遷入人口的顯著增加。在一些製造業的主要中心，

居住人口大多數受僱於亞麻製造業，女人與小孩擔任紡紗工，男人則為操作手工紡織機的編織者。因為每一台手工紡織機需要至少四名，甚至多達10名紡紗工，因此女人在這產業裡的角色便很重要。繫帶的製作也是仰賴密集的勞力，因此僱用了大量的女性，至於傳統上隸屬男性工作的鐵釘製造則僱用較少女性。包括上述工作在內的很多職業都說明了鄉村工業可能僱用女性多於男性的事實。

鄉村工業製作了繩線、鐵釘、衣物或工具，讓商人能供應到距離遙遠的市場。這群正在成長的鄉村工業的工人則變得要仰賴世界的市場、國際貿易協議以及國際政治局勢。例如，1786年制定的條約就允許英國紡織業進口到法國，這意味著法國北部數以千計的工人將遭遇失業以及沉重的貧困（Gullickson, 1986）。

勞動遷移對那些身處貧困地區的人而言，是能否存活下去的關鍵；對正在擴張的繁榮地區而言，勞動遷移也是提供其勞動力不可或缺的部分。必須離家謀生計的人，以及能待在自己的村子裡生活的人，這兩群人中一個顯著的差異就這麼浮現。鄉村工業的成長創造了新的經濟空間，在此情況下城市也成為這嶄新局面裡的關鍵元素：城市是完成製造以及行銷的中心，也創造了龐大的就業機會。在18世紀裡，我們見證了許多中型城市的出現與擴張，這是繼17世紀成長集中在大型首都與港口城市的趨勢後，一種嶄新的模式。在1700年之後，人數在5,000到9,900人之間城鎮大部分都向上成長，在18世紀則有大約3,000到4,000個負責行銷、行政以及生產的城市中心（de Vries, 1984），在鄰近地區的村民們可以在城鎮與城市中找到非農業的工作，因此不必再進行遠距離的巡迴遷移。

客人？外人？

17 對於遷移入城市的記載最詳盡的莫過於 Poussou 對 18 世紀波爾多的研究，在當時波爾多已成為一個主要的國際港口城市，在 1700 至 1790 年間，人口從 4.5 萬增加到 11.1 萬人，其中的成長是仰賴多區域間以及國內的遷移；城中即將成婚的女子裡有四分之一是來自 12 個他縣的遷移者；女性在地方性的遷移裡占很大的比例；她們有三分之二的遷移者是來自本地；從較遙遠的內地前來的巡迴遷移則無例外地都是男性；直到 19 世紀，女性才漸參與這類的遷移，因此當她們永久定居在波爾多時，也有助於連鎖遷移的形成。

在那些鄉村工業特別有活力的區域，家庭並不仰賴這樣的遷移：愛爾蘭的 Ulster、法國北部的低地區、尼德蘭地區、萊茵河沿岸地區以及今天的比利時。活力十足的鄉村工業能讓家庭不需因為要維生而必須遷移（Head, 1979）。根據 Lucassen（1987）所言，以西發利亞的「去荷蘭的人」為例，在 18 世紀時只有非常貧困的人才會被迫進行這些類型的遷移。

因此 19 世紀開始後，在粗糙的舊體制下遷出與遷入間的不均衡情勢有了新的特質，尤其是當我們用經濟區域而非民族國家為單位來檢視時。如果勞動遷移比較限於繁榮的地方，比較算是發生在地方性複雜網絡裡的移動的話，那麼勞動遷移仍對促進這些地區生氣蓬勃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Souden, 1984），這不僅因為它提供了有彈性的勞動供給，也在於遷移者藉由勞動遷移，能到這些以新方式提供他們居住及擁有房子的自由地區。Levine（1977）注意到，在英國鄉村工業發達的那些村落，其領主都未限制定居的自由，同時也能享受保有不動產的自由；而在對新移民的定居以及土地分割設限的地區，其鄉村工業都萎縮不振。Kisch（1981）也提到在西拉西里的

例子裡，在封建領主限制自由定居的區域，鄉村工業唯有在一些移工對封建領主負有部分工人的義務時，才能發展順利。移動自由與鄉村工業發展與否之間的互動關係，也在奧地利Waldviertel的例子裡清楚可見：在這個地區中，盛行亞麻製造業，當地的法律則對定居、土地所有權的分割，還有新屋的建造與否設有限制。這意味著男性唯有在他們不在田地上工作，將農事都交付妻子與孩子時，才能夠從事亞麻製造業；根據Lutz的研究指出，這種情況限制了奧地利鄉村工業的發展，因為這樣的體系恰好排除了那些最能滿足充分就業的勞動力：那些沒有土地及其他資源，因此最需要一個支薪職業的人。

地方的網絡會影響工作報酬的高低。製造鐵釘的工人與紡紗工在鄉村工業裡都算薪資最低的工作。倘若這些鄉村工業是設立在普遍較貧窮的區域，像是法國中央高地，那麼薪資也會跟著較低（Poitrineau, 1985）；如果相同的產業活動發生在普遍較繁榮的地區，像是法國的低地，那麼薪資將會較佳。此外，地方的網絡也可能變得極為緊密，就像法國與西班牙記錄，告訴我們地方的次體系是如何在一個地區的遷移模式之中運作的：一份記錄大西洋沿岸城市Cadiz（譯按：西班牙的一個城市）當地的法國移民列表裡顯示，他們來自彼此間相距不到20英哩的約18個村落；並且，地中海沿岸城市瓦倫西亞的移民，也來彼此間相距不到18英哩的約17個村落（Poitrineau, 1985）。

也有因經營家族企業而產生的正式遷移，這類遷移能夠動員資金，並且其中不但包含了高階的主管人員，也有出賣勞力的遷移者隨著。Poitrineau（1985）描述了一個名叫Chinchon的公司，它的總部就設在馬德里南方，一個與其公司同名的城

客人？外人？

鎮上，其成員全來自亞維農南部，特別是 Aurillac 以北的約 20 個教區中。這個公司貿易的商品包括羊毛、亞麻、釘子、鈕扣、針、緞帶等。來自法國的教區居民像沿街叫賣的小販一樣兜售這些物品，在這公司營運最高峰時，整個西班牙境內還開了 25 家分店。

以上是關於鄉村發展的一些情況，這也為 19 世紀勞動遷移的大規模成長鋪好了道路。鄉村工業與遷移之間的生產關係是非常重要的議題，並且並不像我們一般對現代經濟秩序發展的理解那麼簡單而已。

在一些社會改革家與政治革命者的渲染下，19 世紀發生的遷移特色，是我們所熟悉且理解的。這段血淚歷史是由城市無產階級勞動者的增加，以及鄉村工業與農民在財富比例上相對應的縮減所構成，這也是勞動遷移在本質上發生激烈轉變的預兆（Tilly, 1983, 1990）。在 1780 年後由於貧窮情況加劇，以維生為目的的遷移隨之增加，並且因為貧困與嚴重的失業問題，導致流浪漢四處可見。然而新經濟秩序也開始以更一致，但或許較以往少見的形式來組織遷移。

- 19 遷移者可被僱用從事的工作類別有明顯的不同。前往巴黎盆地的工人成為協助採收葡萄園的工人；在城市裡，他們也受僱為挑水員、苦力、建築工人與低階勞工。這些工人大多來自法國的中央高地。進一步來說，某些團體是與特定類型的職業有關聯（Chatelain, 1976）。從德國東部來的「去荷蘭的人」，長期以來也從事農業、築堤的工作，或擔任船員、僕人（Lucassen, 1987）。那些遷往倫敦及其周圍地區的人若不是在田裡幫忙採收穀物或割乾草，就是在城市裡擔任建築工人、小販或苦力（Redford, 1976）。前往科西嘉島、羅馬或義大利中

部的工人，則在田裡或葡萄園內幫忙採收，或從事建築業、商品買賣或服務業。到波河谷地的工人則在稻田裡工作，到都靈（Turin）與米蘭的則從事營建業、服務業與商品販賣（Lucassen, 1987）。在其他主要的遷移體系，像是前往西班牙或是地中海沿岸平原的移民，情況也都大同小異。新經濟清晰地描繪出了一些關於移動的輪廓，而這些移動的模式都是經年累月所形成的。

然而不論是有組織或沒組織的移動裡都必然存在一模糊不明的面向：我們對這些移動中女性的瞭解遠少於對男性的認識。

性別與勞動遷移

在18世紀與19世紀的最初幾年裡，大多數的家庭都發現正參與在各經濟次體系中。某個特定的產業或經濟次體系，很少能夠主宰一個地區，雖然後來隨著工業化與工業城鎮的興起，讓這件事的確發生了。家庭形成分配的中心，按照年齡與性別，讓各個成員從事不同類型的經濟活動。

在許多地區可以看到，一個家庭與幾個經濟次體系：農業生產、為當地的市場生產，以及為了出口到其他地區而生產的鄉村工業。在一年裡頭的某段時期進行勞動遷移，也是十分常見的。除了家務生產與農事外，女性經常會藉由編織緞帶或製作繫帶來賺取現金，而男性則透過製造鐵釘來賺取現金。

在17世紀時，離開家鄉去當農地工人或是家務幫傭就已經很常見（de Vries, 1984; Moch and Tilly, 1985），大部分的年輕遷移者都在鄉下擔任僕人，在法國被稱為農莊的男僕

客人？外人？

(valets de ferme)，在德國叫 Gesinde，在英國則叫農僕 (servants in husbandry)。從遺留下來的教區資料顯示，在鄉下擔任僕人的不只是男性，也包括女性。男性遷移者常成群移動，而此群體就成為工作團隊，藉此有互相保護與支援的效果，同時也因為他們當初就是一同離開村莊 (Chatelain, 1976)。女性遷移者則當家務幫傭，並做裁縫或在製絲坊裡替女主人從事家務勞動 (Garden, 1970)；也會成群結隊地到葡萄園工作。

但是，女人在 19 世紀社會中的地位，使得她們的遷移情況變得模糊而難以得知。軍隊並不需要女性，因此對欲掌控男性遷移概況的國家，自然對她們的移動情況興趣缺缺。因為女性多半從事小規模、私人的家務勞動，所以其勞動遷移的概況並未被歷史紀錄或政府調查所記載下來 (Berkner and Mendels, 1978)。

我們至少知道的是，在鄉村工業發達之際，有許多女性找有薪水的工作，並進行短距離的移動；在女性當中，長距離的暫時性遷移似乎還不常見，畢竟遠途旅行耗力費時，路途中還可能遭遇重大的意外，這都讓許多女性卻步。當女性遷移者不被賦予權利與保護時，接受的社區就可能成為一個危險的地方；在遠離家庭與親戚的情況下，女性遷移者很難防衛自己免受男性的侵害。

我們也略知懷孕與遷移之間的關係。從 18 世紀以來的一些證據顯示，在小鎮或城市裡的單親媽媽，大多是女性遷移者，也有資料顯示這些女性中，有許多人曾喪失過雙親中的一位；例如在里爾 (Lille) 有超過一半的單親媽媽曾失去她們的父親，而有 70% 曾喪失雙親中的一位 (Lottin, 1970)。而在這

些人中似乎只有極少數是為求匿名而來到城市中完成生育，之後還計畫要回自己村莊的鄉下女性；相對地，帶著孩子移居到城市裡的單親媽媽，是要待在此地工作的（Tilly, Scott and Cohen, 1976）。

拿破崙時代的主要勞動遷移體系

我們已經討論了促使人們遷移的原因，以及在舊體制下賦予遷入與遷出的不同評價。當經濟生活開始轉變，遷移的地區性網絡以及遷移的社會經驗就變得更加複雜了。拿破崙調查人員由於認定遷移就是戰爭與宗教迫害導致的，因此並未創造太多其他的類別，來歸類那些其他形式的遷移經驗。在有限的類別裡，其中一種是衍生自歐洲人的殖民經驗；另一種則是衍生自他們每年在整片大陸上都可觀察到的經驗，即工人的季節性遷移。

21

事實上，這些類別都容易誤導讀者。在歐洲內部就有幾種顯著的殖民遷移發生，以德國為例，在17世紀土耳其人被打敗以後，就有德國人被徵召到東南歐的平原上定居；從1748到1786年間就有六萬名殖民者應官方政策而來到匈牙利，之後隨之而來的又有18萬人自行到這裡定居。從1763到1800年間，大約有3.7萬名德國人抵達俄羅斯的Volga地區或是黑海邊，大約有30萬人在腓特烈大帝的鼓勵之下，往東邊遷移以在普魯士的領土上殖民（Fenske, 1980）。德國人也徵召其他的殖民者來他們自己的土地，最有名的就是那群對溼地排水饒富經驗的荷蘭工人。

在歐洲之外，北美洲成為德國殖民者最常前往的地點，在

18世紀末時，就有12.5萬名德國人定居在北美洲，絕大多數是在費城；並有1.7萬名是在北美洲發生獨立戰爭時受僱的德國傭兵，日後也待在此地定居。其實，美國對所有歐洲人而言，是用來達成殖民目的再適合不過的社會，對難民以及因經濟因素移民的企業家而言，到美洲就好像回到家一樣，當地的「土著野蠻人」也不積極地主張自己對這片土地的擁有。

在17世紀晚期，英國與法國想到美洲來殖民的遷移浪潮湧現，但緊接著在18世紀初期時，卻只有少數人遷移至美洲。於1763年七年戰爭的終結更加確立了英國對北美洲的控制，開啓了一股新的跨越大西洋、大規模的遷移浪潮，在18世紀中，光是英國就有大約150萬人，至於愛爾蘭、瑞士、德國也有數目較少的人遷移至此。在1760到1775年間，亦有84,500名來自非洲的奴隸抵達（Bailyn, 1986）。在拿破崙戰爭後，歐洲由於經濟的破壞與糧食的歉收，因此每年約有三萬至四萬名的移民潮流向北美洲；在1840年，隨著歐洲飢荒的範圍日趨擴大，開啓了規模更大的遷移。

22

季節性遷移是這個時期另一種主要的遷移類型。居住在山地的人們發展出了一種獨特的季節性遷移模式，遷往天氣適宜餵養畜隻之處，這也是放牧業的特徵，另外也就是尋求販賣畜隻時會進行遷移。拿破崙時代對這類事件的描述，後來也被當代學者進一步地補充（Poitrineau, 1966; Chatelain, 1976; Lis and Soly, 1979）。他們描繪出從庇里牛斯山區下山的山地居民，或是到西班牙、正在發展中的波爾多的城市，以及朗格多克（Languedoc）西部的低地來工作；他們也描繪了為數不少的人們，從法國中央高地下到西班牙，或是法國南部的平原與城市及巴黎。其他的季節性遷移還包括從瑞典南部到丹麥的西蘭島

(Sjaelland)，從北海沿岸到Schleswig與Holstein間的區域，從洛林南部到亞爾薩斯等路線的工人。或許，在18世紀的這類型勞動遷移中，規模最龐大的就屬每年從西發利亞赴荷蘭地區的遷移了。

而在此我們也想介紹其他一些拿破崙時代的人群遷移潮，我們目前理解他們移民所屬的類型並不是他們用來理解自己的方式。我們較他們能瞭解更多的，是當時的政治經濟局勢，以及此局勢與經濟區域的關聯，而不是民族國家的狀況。我特別想在這裡舉出Lucassen（1987）的研究，他曾估計歐洲在18世紀晚期時，有七種內部遷移體系在進行著，這些遷移構成了歐洲各地各個接受與輸出移民的地區，其經濟體的關鍵部分。這些體系裡總共涉及為數30萬名的工人，每年朝著七個主要的地點移動，其中三個在歐洲北部，四個在南部。Lucassen估計遷移的起終點地區，其中心間的距離介於300到700公里，但遷移者很少會旅行超過350公里的，大多數的人所旅行的距離都遠小於這個數字。

Lucassen是根據拿破崙調查所搜集的資料為基礎，描繪出七個體系的圖像，因此這並不只是當代人對過去強加的想像而已。調查資料所呈現在他以及我們面前的如下：

23

第一種顯著的移動體系發生在英國東部：每年在收割時節，約有二萬名遷移者來到Lincolnshire與東英格蘭，在倫敦四周的鄉間從事園藝工作，或在倫敦裡找如公共建設計畫下的工作。他們大部分都是來自遠在西邊的愛爾蘭，尤其是Connaght省，但也包括從蘇格蘭、威爾斯及英格蘭來的工人。

第二種遷移發生在巴黎盆地四周：每年約有六萬名工人來到這地區，其中大多數的人是進到巴黎，這個充滿公共建設、

客人？外人？

服務業及商業工作機會的城市裡；而在周圍的區域中，遷移者則被僱來採收穀物。他們大多來自法國中部高地（Massif Central），少數則來自阿爾卑斯山與法國西部。

第三種遷移成形於馬德里及其所在的卡斯提爾地區：每年至少有三萬名人遷移至此，大多來自 Galicia 地區，少數來自 Asturias 地區。直到拿破崙戰爭之前，每年都還有來自法國的移民，爲了收成穀物、公共建設、服務業的工作而來，但後來拿破崙入侵了西班牙，導致了當地人對法國移民的憎恨，同時將他們強制驅離出去。

第四種遷移自加泰隆尼亞省順著地中海沿岸地區，一直延伸到普羅旺斯地區：這個體系是在拿破崙戰爭之後又重新開始運作，並在 19 世紀末達到最高峰。在稍早的時期裡，約有二萬人包含在這遷移裡，大多是來協助穀物收成，有極少數是來協助葡萄收成，葡萄在當時比較起來是較少人種植的作物。當葡萄園在這個世紀晚期擴張起來後，移工的數目竟增至 10 倍之多，他們大多來自阿爾卑斯山區、法國中央高地及庇里牛斯山區（下一章裡有針對這個遷移體系運作的細節有更多的描述）。

第五種遷移發生在波河谷地：每年約有五萬名工人到此從事農業工作，尤其是稻米的耕種，或者在像米蘭或都靈的城市裡找尋公共建設與服務業的工作。他們大多來自附近的山區：北邊貝加莫附近的阿爾卑斯山區（Bergamasque Alps），以及南邊利古里亞地區的亞平寧山區（Ligurian Apennines）。

第六種遷移發生在義大利中部較偏南的地區，包括托斯卡尼及 Lazio 的南部、科西嘉群島及厄爾巴島：每年大約 10 萬名工人來到這裡協助穀物採收，或是從事農業工作，或是在城市

裡找尋營建業、商業、服務業的工作，尤其是在羅馬這個大城。

最後一種是發生在北海四周地區的有系統的移動現象：每年有三萬名遷移者從東邊或南邊的地區前來，大部分是從德國來的。

爲了將這些遷移體系在經濟與社會上展現的效果傳達出來，我將針對這七種裡的最後一種遷移體系——在北海四周地區組織形成的移動模式，做較深入的描述。

北海體系：這群「去荷蘭的人」

從拿破崙調查的記載以及 Lucassen 進一步的研究裡，我們知道北海經濟區域所含納進來的，是從法國加萊（Calais）到德國不加梅間大約200公里長、50公里寬的狹長沿岸地區。這個地區的特徵在於它繁榮的經濟發展，以及在運輸上的基礎建設，包括港口及道路的建設，都十分健全，吸引了甚至遠達300公里外的人們遷移至此。在這個廣闊的地區裡，也存在著一些輸出移民的區域（push region）；以及一些沒有遷入或遷出的，或者說其勞動遷移的規模還未達顯著的區域。

我們之所以能標舉出這些體系的特徵，主要的資料來源就是所謂的「1811年問卷調查」，這也是針對暫時性勞動遷移所進行的拿破崙調查計畫下的一部分。問卷裡問到遷移者從哪裡來及往哪裡去，有以法蘭西帝國下的行政區爲單位來提問，也有以工人所在特定地區爲單位來發問。然而，這些資訊還必須輔以其他類型的才足夠；問卷所提供的資訊裡，無法幫助我們瞭解是什麼樣的家戶類型會產生移工；移工的薪資又占整個家

客人？外人？

25 戶收入比例的多少；移工的家戶形態是否相異於非移工的；以及爲何在同樣地區裡的某些家戶會有人遷移，但其他的家戶則不會。這些地區裡爲求勞動而遷移的人們是少數，在北海體系裡只有3%的人們是住在這些輸出移民的地區；假若以其來源的地區做更細緻的觀察，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比例會上升到12%，若以更小的地區爲單位，則可以上達26%，但終究仍是少數。這份問卷也無法讓我們得知有關時間的問題：接受遷移的地區裡，在遷入達到高峰的季節中，準確的遷入時間爲何時，以及遷移者離開故鄉的準確時間又是何時。

(一) 誰離開了，以及誰留下來了

Lucassen 試圖要回答的其中一個問題，就是爲什麼有一些地區會成爲輸出移民的區域，而其他的區域卻不會。他發現那些家庭工業 (domestic industry)，尤其是織布與採礦工作發達的地區，較難成爲輸出移民的區域。因此，他所稱爲法蘭德斯走廊 (Flemish corridor) 及較東邊的畢勒費德走廊 (Bielefeld corridor)，都是主要的亞麻紡織與亞麻製造的地區，在那裡每1,000人當中，大約就有50台紡織機，這是非常驚人的比例，意思就是說大約每四戶人家裡就有一戶擁有紡織機。這也意味著這些經濟相當活絡的地區在當時也未吸引移工至此，雖然或許仍有僱請一些當地十分鄰近地區的移工。再者，在一些地區裡，農業需要專職的工人，並足以藉著收成維持一個家戶的經濟，此地的勞動遷移發展也較不可能產生。有幾個坐落在較廣輸出移民地區的地方，其以織布爲主的家庭工業也十分發達：有些地方中，每1,000位居民裡就有40到60台紡織機。因爲織布工作的過程裡，每一台紡織機至少需要四名紡織工來操作，

這意味著織布業將吸收可觀的勞動力。簡而言之，這些地區裡對資源特殊的整合方式，有助於平衡遷出與遷入的情勢：勞動力的需求在當地就可以被滿足，而也有足夠的工作來維持大部分家庭的生計。

有證據顯示，在一些亞麻製造業發達的輸出移民地區，遷移者都來自特定條件下的地區，即在其中亞麻紡織只是副業，通常是在農忙過後的冬季時節裡進行的，在這些地區裡有著許多租借田地的小農集中在此，他們就是所謂的Heuerlinge，構成了這些輸出移民地區大約20%的家庭。在18世紀時這些佃農所耕種的農地平均只有1.14公頃，而很多人甚至比這個數字更少。在人口移出區裡的農地往往比較大，佃農較不常見，而家戶紡織業也是主要的經濟活動，以上三個條件讓勞動力的移出鮮少發生。Lucassen發現，在遷移者的家庭裡，紡織的工作要常見的多：紡織工人的需求龐大，而紡織工作大多在冬季時進行，因為那時較容易找到勞動遷移者來幫忙這項工作。在一個家庭裡的任何成員都可以幫忙紡織工作，而這項工作也不必投資太多的資本。紡織業是貧窮家庭裡常見的家庭工業。在我閱讀Lucassen的分析裡，發現了一種特殊的勞動力市場的結構：遷移者的家庭常可能是比較貧困、租賃田地、從事紡織或比織布所得要更低的工作。就西發利亞整體來看，Lucassen認為以亞麻製造業，尤其是織布為主的家庭工業與勞動遷移是難以同時發生的。

26

在這個世紀早期，擁有密集的家庭工業的地區是不會輸出勞動力的。在萊因河以東的地區中，其鄉村經濟體中最主要的構成元素就是紡織業與採礦業：在19世紀初期，在普魯士Regierungsbezirke的Arnsberg與Düsseldorf，以及Landkreis的

客人？外人？

Mülheim 都有著發達的家庭工業。再往西邊與南邊走，在 Aachen 與 Verviers 也有高度發展的棉紡織業，而在 Liege 附近則有採礦業。最後，在法國北部省分——里爾附近，也有高度發展的工業。

同樣地，農業地區既不會有遷出人口，也不會吸引移民至此。Lucassen 檢視了這些地區的農業經濟的性質，發現存在著土地分配上嚴重的不平等狀況，或許這可以解釋為何沒有勞動遷移的產生。小地主擁有的土地狹小，經濟狀況又貧困，以致必須出賣勞動力給大地主，而大地主也透過當地徵集的勞動力來補足其所需。進一步來說，當小地主因為孩子漸漸長大，而使家戶裡出現剩餘的勞動力時，鑑於自己擁有土地之狹小，因此必須分配這些勞動力到大地主那裡去。因為這個體系是在大型農業經濟體下運作，然而大小地主所栽種的農作物性質，使他們需要勞動力挹注的時節是非常不一樣的。事實上，Lucassen 在一些記載詳細的資料裡發現，在比利時未產生勞動遷移的地區，廣大的農地所栽種的農作物是不同的，穀物能在大農地上生成順利，但卻不能在小農地上；另一方面，在 Brabant 的小地主大多種植蔬菜以銷售到市場，但所栽種的蕃茄只供己用。針對比利時其他地區的資料裡也有類似的描述；然而，並未有充分的證據顯示對所有未產生勞動遷移的地區，都有這種現象。⁵

遷移者的家庭通常握有的土地十分狹小，大約只有 1.5 公頃，並會從事其他的生產，其中就可能讓家庭一個或更多的男

5. Lucassen 的確發現了，在尼德蘭的核心區域裡，有河流穿過的地區是未有遷出或遷入產生的中性地區，當地土壤不均的性質造成經濟活動上與農作物上很大的變化。這也確保了整個年度當中都需要勞動力，

人，離家到北海體系下工作三個月。穀物生產則不允許這種現象發生，而在如此狹小的土地規模下種植穀物也不可能獲利。因此，遷移者的家庭似乎很可能種植蕃茄以供己用，並種植蔬菜以賣到市場，而這些農作物的耕種也都是此家庭裡其他成員可以應付的來的。Lucassen 也發現特別在家庭的生命週期到達某個階段時，為勞動而遷移會出現而成為一個生存策略：當有了孩子，因此需要額外的開銷時，或當孩子們成長到十來歲，家庭裡有能力勞動的數目多於這個家庭所需的時候。

北海地區的工資相對而言是優渥的，因此這個數目往往可以讓來這裡工作三個月的人獲利不少。但是當這些僱請移工的產業遭逢疾病、作物歉收或是經濟蕭條的衝擊時，所能付給工人的薪資就會很低。在異地生活的開銷也比在家要高的多，因此遷移者都會試圖在身上攜帶多一點的補給物，帶著這些食物與必需品來移動，也常帶著一批亞麻布在價錢滿意的情況下販賣（我們並不清楚這些亞麻布是遷移者的家裡自己織成的，還是他們僅紡紗，而將織布的工作交給其他家庭）。

有些遷移者移動的距離並不遠，但許多人則要走上好幾天的路程。因為有時得穿越河流，因此遷移者們都會聚集在特定的地點，共同搭乘船隻過河。數以千計的人們會在這些地點集合，然後儘早快速過河，時間對這些工人而言是非常重要的。多花一天來等待過河，就意味著少賺一天的錢，以及多用了一天的包括食物在內的資源。

而透過女性與小孩在各種工作需求上的大量參與，讓一整年的勞動力供給似乎都不虞匱乏。Lucassen 在一份評估 19 世紀時尼德蘭地區實行強迫教育體系成效的報告裡，發現這個地區的學齡孩童的上課缺席比率是最高的。

客人？外人？

28 這是場由東向西的移動，而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說是由南向北的。在沿途的道路上有一些標的物，工人們每年會在那裡碰面相聚：像是一株名叫 Friessische Eiche 特別的樹、遷移者每年都會歇腳的幾間客棧，或是位在 Ankum 與 Üeffeln 之間一顆名叫巨石（Breiten Stein）的大石塊。

（二）去荷蘭的人（Hollandgänger）

Lucassen 重新建構了一條特別的遷移路徑，這條路徑源自奧爾登堡（Oldenburg，在 1811 年時的 Ems Superieur）南方的 Münsterland，一直往北海地區的中心，即阿姆斯特丹南部的溼地區。在每一個輸出移民的地區，到了三月就會有工人齊聚，以步行方式開始這趟遷移。音樂與歌謠是旅途中的一部分：這群漫步旅行的小伙子正是以歌聲聞名，隨著旅途的開展，漸漸會遇到來自別地方的團體，最終在同一條道路上前進。在抵達了「巨石」之後，這群人的數目將達到數百人甚至更多。此地對遷移者來說是很有名的集合地點。對這場遷移而言，是有個地圖以及圖像可循的，遷移者似乎習慣於年復一年地在相同的地點停留，不管是特定的樹木、石頭或客棧。

直到有橋建造完成前，他們都必須在 Lingen 乘船渡過愛姆斯河（Ems）。那個時候他們已達上千人，日後取徑 Bentheim 的 Neuenhaus 與 Uelsen，透過邊境城市 Venebrugge 而前往尼德蘭地區，直到 Overijssel 的 Hardenburg。快速的行動在這裡是很重要的：目的是要讓沉重的行李能藉由船載運，以便自己能輕便地儘快向前步行到 Hessenweg 道上的須德海（Zuiderzee），而沿著此道向北走可抵達 Vecht 的 Dalfsen 與 Ommen，向南走就會到達溼地了。同樣，在此或許又是個殘

忍競爭的時刻，人們必須藉由乘船，在Hasselt、Zwolle或是其他幾個城鎮來穿越須德海。⁶在往Hasselt的路上有一所天主教的小教堂，這裡似乎對前往荷蘭的天主教徒來說，是很重要的地方，它可回溯到14世紀早期，並曾因為在這裡發生的神蹟，而使教宗下詔大赦一百天，許多遷移者都會在此歇腳。他們將拿起先於他們抵達的行李穿越須德海，一次只能有100名工人搭著用來運送牛隻的船過海。

在船上過了一天後會抵達鄰近Oude Brug的阿姆斯特丹，上岸之後，遷移者若有攜帶任何肉品，必須馬上繳交自治市的稅款，這項命令持續實施到1865年為止。他們可以在德國交易所（German Exchange）或稱為Moffenbeurs裡，找到可以睡覺、吃飯或購買工具的地方。隔天，他們將前往他們的終點站：泥炭挖掘工將帶著一船船的泥炭下到溼地去，而在此季稍晚，割草工也會向北邊去。

遷移者在酪農場上做的事就只是割草以及預備乾草；他們不被允許做其他種類的工作。在1811年時，至少有1.2萬名移工來到這些農地上。招募工人的方式有二種：一種是年復一年地僱用相同的工人，只要這些酪農願意的話，他們也會根據同

29

6. 在Hasselt、Zwolle與其他城鎮間對運送這些遷移者的利益上有著激烈的競爭。Hasselt已與阿姆斯特丹的船運行會達成了數項協議，以取得運送這些遷移者的獨占權利，但Zwolle卻使用各種手段，包括設置路標告訴遷移者方向，或是警告走別條路可能受罰，以迷惑並混淆遷移者，使他們來到Zwolle，當上述方法失效後，Zwolle更找來軍隊以強迫遷移者來到Zwolle；當這也失靈時，Zwolle還與行李運送的船運業者立下秘密協定，要他們不要將行李送到Hasselt，而是送到較「友善」的這裡來。Lucassen搜集的資料則顯示，大部分的遷移者可能還是選擇前往Hasselt，因為這是最方便橫越須德海的地點。

客人？外人？

業的推薦來僱用其他的工人。雇主會讓他的割草工知道他什麼時候需要草，以及他希望工人什麼時候能來幫忙。第二種方法是遷移者只要人到並提供勞務即可，從一個農場做到另一個，或是前往日工介紹所（day-labor markets）等待聘僱。因為割草的工作是在這個季節末期進行，因此許多割草工人在季節早期都會一併在泥炭溼地或堤防上工作，或從事其他農業工作。

那些從事穀物收成工作的移工，都是以一群 10 人的方式來到南部地區，並也是一群群地被聘僱為農夫。在這個季節的稍後，也有著挖掘茜草的工作，茜草有著半公尺長的根需要被連根拔除。在那時移工會在溼地或堤防上工作，然後也會有一些仲夏時節的工作，像是穀物的收成。

在高峰時期，移工能從事的產業十分多樣，其分布從農業到泥炭的採收、挖掘的工作以及製造業。遷移者幫忙採收亞麻、蕃茄，並協助剝除櫟樹樹皮。遷移者也協助土地開拓的計畫，從事挖掘、割砍泥炭的工人，也擔任維修堤防、港口或是整理溼地的工作。他們擔任的工作從工業到運輸業、商業與服務業。以團隊的方式進行工作是很常見的，遷移者與當地工人及雇主，則很少有接觸。

結論

歷史學家早就不在舊體制與現代政治經濟的開啓之間，劃上一條清晰明確的界線，然而遷移的歷史並不是一段從遙遠的過去到近代之間平穩整齊的變遷過程。在舊體制下的經濟遷移常與國家相關的難民潮互相重疊；而經濟遷移者與難民則象徵著一個國家，在阻礙與促使人們移動的兩難問題裡的兩個面

向。當遷移者與難民抵達另一個邊境敲門時，接受他們的國家、地區或城市可是樂於從這兩難當中獲益。

在舊體制裡具有一個特殊的性質：與工作相關的遷移，在17與18世紀，不管是地區性或當地的勞動遷移都具有週期性循環，有個來與回的模式在運作。在當時我們也看到了一些連鎖遷移的發生——在阿姆斯特丹、法國與西班牙定居的德國人。但是生涯性的遷移（career migration）則僅限於任職於政府或教會的高階人士；也就是說，工人在地理上的移動並不像在19世紀時那樣，是與社會流動連結在一起的。在歐洲的勞動遷移者既不是利慾薰心的人也不是窮途末路的流浪漢。唯有在殖民的過程裡，舊體制下的遷移者才會以尋求新經濟地位的經濟行動者形象出現。

在1750年後發生了一些改變，包括在人口上急遽的上升以及鄉村工業的驟然增加。雖然每個地方結合這些力量的方式不盡相同，我們仍看到了一個趨勢，就是在幾乎沒有鄉村工業的地區，因為人口上升導致農用土地分配上的壓力，以致遷移情況增加了，也看到在鄉村工業快速發展的地區遷移減少。鄉村工業的擴張驅動了資金移往鄉村，這也會反過來對以農業維生的生活形態造成壓力。在17世紀後半葉與18世紀前半葉裡，有二種模式正在浮現：一種是擁有大量人口與不夠土地的社區正在成形，在其中的男男女女漸漸必須要遷移以賺錢補貼家用；另一種則是因為鄉村工業帶來人口快速增加與經濟活絡的繁榮社區出現，在裡頭勞動遷移變得十分少見。最終這些條件創造出了在1750年之後大量貧窮的人口。

在鄉村中以村舍為工作地點的製造業快速的擴展，也為許多城市帶來新的成長。城市與鄉村在18世紀時仍同屬於一個

客人？外人？

31 經濟體系之下，但到了19世紀隨著在城市裡以工廠為主力帶動的工業化，改變了這樣的局勢。城市是服務業、商業以及特定技術的中心，而主要提供外地市場的鄉村工業產品，也在這裡進行分配調整。製造業這樣的進展也開始將工人們安置到遙遠的村子裡，整合入與世界市場相連的生產鏈中，並且也使工人們因著這些市場的波動而受到傷害，同時加速了商業貿易及工業上的資本成長。

假使當進行拿破崙調查的人員在記錄下這些外顯的改變現象，就如北海的遷移時，未能明白這些轉變的意義，那麼他們也將無法預測未來將發生的情況，也就是我們接下來將討論的內容。

第三章

1848年之後

雖然以確切的日期標示出歷史鉅大改變的發生，這種作法是十分可疑的，但是1848年卻足以適切地被稱為是歐洲事務上的轉捩點。在這一年發生的革命讓19世紀初期呼籲建立統一的民族國家，並剷除家族王朝政權的呼聲更加急切。這群在1848年呼求改變的激進分子，常常淪為必須離開祖國的政治流亡者（political exiles）。然而，1848年也標示出了一種情況的產生，即這群通常擁有高教育水準、經濟富裕的愛國分子，在淪為政治難民者後，也迷失在身無分文、流離失所的大批經濟難民人潮中，而這些流離失所的不幸人們，只是在1848年革命失敗後急速擴張的新經濟秩序下的其中一群受害者。

33

卡爾·馬克思認為在1848年急遽地倒台只是提供了工業資本主義在發展的路上，資本對勞工施以殘酷治理的正當性；他說，歐洲已自聖西蒙和傅立葉所認為這二股鉅大勢力間是有合作可能的美夢中驚醒，不論這個論證一般來看是否為真，但可以確定的是在1848年之後，勞工的移動隨著更大的經濟體變遷而有所改變。城市的建立、鐵路的鋪設、以工廠為主力的製造業蓬勃發展，都創造了對工人大量的需求。而這成長背後

客人？外人？

也隱含著失落與衰退，最令我們耳熟能詳的就是農民的無產階級化在此發展完成，俄羅斯與奧地利解除了農奴制，之後普魯士也進行了初步的改革，這創造出了一群人數眾多且無土地的遷移工人，同時伴隨而來的是日益嚴重的不幸。

34

在這些歐陸變遷的震撼下，殖民行徑也取得了一個新的意義，不再是征服的行動，而是逃離苦難的大規模遷移。許多橫越大西洋的遷移者都是為求生存：最為人所知的例子，或許是本世紀中期發生在愛爾蘭的飢荒，導致100萬人死亡，也促使另100萬人橫渡了大西洋；而汽船的發明也大大降低了海外旅行的花費為原本的五分之一，讓數百萬的窮人也負擔得起橫越大西洋的旅行。

在這新經濟秩序裡，製造業要能獲利，得大大依賴有效率的商品與原料運輸。鐵路的底架支撐物以及鐵軌連綿地鋪設，在1848年（或更準確地說是1849年）有了重大的技術突破，使得載重物下的長途鐵路遷移成為可能。這些進展也都有助於勞動遷移，尤其是歐洲歷史最悠久的遷移形式：季節性遷移。在鐵路設施的完成減少了在歐洲旅行的花費後，為工作所做的季節性遷移，其距離變長，而進行此類遷移的人是日益增多的一群無產階級工人，他們快速地在城市、工廠或建築工地間穿梭。

一些近期以來的學術研究成果已對工業化的歷史重新詮釋，強調在這過程裡資本與勞動力的流動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並批評單單強調技術做為推動工業化過程之動力的說法（Tilly, 1983; Guttman, 1988）。但是，在資本主義高度發達時代中的遷移者也知道，新機器的誕生與他（她）們本身遷移流離的經驗密不可分——機器不但摧毀了傳統上在農地或工作坊裡謀求生

計的生活模式，同時也帶領他（她）們去尋求解決之道。

季節性遷移的路徑大致直到1800年代中期都還算穩定，特別是在工人們來源的地點與年復一年地前往的目的地，都是相同不變的。但到了19世紀晚期，遷移的地理景貌就變得十分不穩定：新城市、新工廠、新鐵路、隧道的建立，都意味著目的地的一致正在改變中。並且，因為鄉村經濟的日漸無產階級化，導致工人來源的地點也在變動，因為遷移者已經沒有任何田地或工坊可讓他們回去。資本在這些工人的生活中產生了新的意義。在1848年後隨著工廠體系的成長以及鄉村經濟銳減，絕大多數的小地主或工坊主人必須仰賴在其他地方賺得的現金，而不能僅靠土地或工坊的生產來度日。這些季節性移工就像新的殖民者一樣，都是身處在這個金錢世界裡，為了生計奮鬥下進行的遷移。

35

在舊體制裡，宗教流亡者與勞動遷移都是國家運作上兩難的體現；統治者常想要讓某種人進行遷移，但又想留住另一種人。站在國家這個有利的位置來看，流亡者與勞工的遷移是不同類型的。但在1848年之後，這二種類型在政治經濟的考量下卻漸漸混為一談，都被視做是在絕望的處境中才會選擇的遷移。

然而，歷史是不會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劃上一條明顯可見的分界線的。本章最後所討論的，正是這則真理的註腳，我們將以從歐洲遷移到葡萄園的季節性移工為例，這類遷移開始於17世紀，儘管遭遇了種種危機，但一直持續到了20世紀仍存在著，然而即便是如此長壽的經濟體制，它仍反映了19世紀許多的轉變：經濟擴張、新技術的衝擊、新的所有權結構，以及人們對鄉村經濟的連繫變弱等事實。

流亡者（exile）與難民

在1848年之後的歐洲，流離失所的系譜有著急遽地變化。流亡（exile）這個詞彙與西方文化本身一樣古老，但直到19世紀，難民（refugee）這個字絕大部分仍指稱那群在17世紀末，被強迫離開法國的新教徒而言；法國與英國的字典裡，都認為「refugee」一詞單指在南特詔令的撤除下產生的受害者。這個情況在1796年發行的大英百科全書第三版中出現了首次改變：「refugee」不再單指著某些特定的新教徒而言，也包含了那些在危難時期離開祖國的人們，成為了一個可以含納其他特定事件的普遍詞彙，像是用來指稱於法國大革命時期離開祖國的法國貴族「emigré」也包含在「refugee」裡頭。雖然Marrus（1995）也提到並沒有明確證據可證明「refugee」字義上的轉變，在當初曾被普遍採用。

36 在德國，直到19世紀中葉之前都還沒有指稱難民的詞彙出現。「Heimatlos」或「staatenlos」是在1870年後才開始被用來指稱特定無國家歸屬的難民，而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目前通用的「Flüchtlinge」才開始被使用。然而對於流離失所者在用字上的系譜考察而言，1848年仍可被稱為是轉捩點。

在19世紀早期，受到良好教育、擁有文化的流亡者所代表的是那種因為政治因素而必須離開祖國的難民，而不是像20世紀所認為的，是代表著一大群貧窮的無家可歸者。對這群大多能力過人的流亡難民而言，倫敦、巴黎、日內瓦都是很重要的城市，因為在這些地方，他們被盛情接納。這些難民的組成包括在1831年後逃出來的波蘭民族主義者，以及來自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與德國等國家，全都因為各式各樣的政治

因素而變成難民。在1848年時，接二連三的暴動最終形成反革命的鎮壓行動，因此導致了新一波的政治難民潮在歐洲各地產生，範圍包括了現在的德國、奧地利、捷克、匈牙利與義大利。瑞士或許是接受這些政治難民的主要國家，當時收容了約1.5萬人，其中大部分是來自德國與義大利。但在1850年代，倫敦卻成爲是歐洲流亡者聚集的主要城市，在那裡具體反映著這一代流離失所的難民們，是如何急切地計劃著返回且進行復仇。

施予這些難民的友善接納或許在某個角度來看，令我們十分吃驚，因爲這些接納他們的掌權政府本身並非懷抱著相同的革命熱情。例如馬志尼（Mazini）在1831年於馬賽建立了青年義大利運動，向世界宣示了他們想打造一個義大利共和國的目標，揭示了在歐洲各地興起的共和主義之願景——當時的法國是由一名國王來統治，但是馬志尼卻未自法國政府那裡，遭遇到實質的阻礙，雖然他所創設的青年歐洲運動在1834年的確令當權者感到憂心忡忡。

雖然19世紀早期，歐洲各國也曾針對難民合法化做過某種形式的努力，但這大多是基於這些流亡者是菁英分子的考量。因此在1832年，當法國接收了一群大多爲波蘭貴族菁英的移民的同時，國王路易菲力普也將其他來自西班牙、葡萄牙、義大利、德國的流亡者，一併立法給予他們法律上的地位。按照這些法律，法國政府有權驅逐他們，並對他們採取各種方式的管制；只是這些權力很少真的被使用，取而代之的是在國家政策的執行上，乃按照他們各自的等級提供不同的津貼與援助。

除了菁英之間彼此的連帶之外，或許還有另外一個原因導

客人？外人？

致政府對難民的寬容對待，就是從1830到1848年間的難民，從未被認真地看待過，而在1848年之後的難民數目則持續減少。這些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難民，由於數目很少，因此似乎並未對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造成威脅，而在1850年代及1860年代時，這些政治流亡者組成的團體急速減少，主要因為他們的母國實行大赦，讓很多人都能返回家鄉。

1848年的難民是最後一批流亡在外仍像度蜜月般的流亡者。在19世紀最後30年間，情況有了改變。發生在1864至1871年間的德意志統一戰爭，創造出一種全新類型的難民，並且數目十分可觀。普法戰爭期間，北德意志邦聯（North German Confederation）號召起1,200萬人與法國對抗（這是拿破崙在1812年派往俄羅斯的軍隊數目的12倍之多）。在這場戰爭中摧毀了許多村莊與城鎮，同時也製造出了一種直到20世紀仍有影響力的難民經驗。

在19世紀晚期，民族主義的熱潮擴散至大批民眾內，這也創造了規模更大的難民潮，因為這些難民比起以往要更不願意被「外國人」統治。因此在1867至1871年間，有相當多的中歐人民向外遷移，他們都來自剛被普魯士所併吞的省分。統治外國人這件事，似乎問題也變得更大：法國在亞爾薩斯與洛林被新興的德意志帝國併吞後，也自境內逐出了八萬名的德國人，同時也有13萬名法國人逃離上述區域而來到法國。來自德國東邊省分的波蘭人也變成難民，只因為他們持續渴望建立獨立的國家，因而被當權者視為威脅。界於被迫驅離以及自願遷出之間的界線，的確變得很模糊，就像是居住在俄羅斯的德國人的例子一樣，他們從彼得大帝時代就住在俄羅斯，但後來卻淪為難民而逃至德國：在1900到1914年間，大約有五萬名

住在華西尼亞的德國人（Volhynian Germans）離開，後來住在波羅的海地區的也都離開了。

這些情勢發展所製造出的難民多半很貧窮，當中常常混雜有當地的工人階級。許多人很積極參與政治，是工會裡的成員或是鼓吹社會主義的人士。沙俄製造出了一批全新的、大量的激進革命難民，他們在流亡期間積極地組織政黨，以獲取最終革命的勝利。這些政治難民所訴諸的是破壞，以及始於1890年代的無政府主義運動，因此與1830年代和1848年的前一輩流亡者非常不同，後者是以理想主義或浪漫主義為依歸。

38

遵循著重商主義原則的舊體制城市在制定政策時，像是阿姆斯特丹，認為人群的遷入是一件好事，是一項額外取得的資源。很顯然恐怖分子與無政府主義者不可能被這樣看待，而在19世紀中，我們看到了政府在與難民母國的合作下，為遣回這些激進分子而驅逐他們。像是法國扭轉了原本傾向自由主義的政策，在1894到1906年間驅逐了超過1,600名支持無政府主義的外國人，但仍有必要一提的是，並非所有歐洲國家都這麼做，像大英帝國、比利時與瑞士就拒絕合作，仍維持他們自由主義的政策走向，其中也包括了保障難民的權利。

但是更常見的情況是難民的地位因著他們的背景與數目，不能再根據「難民對接收國的社會而言是項資源」這項重商主義的預設來寬宏對待。因此，政治難民開始與身處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年代中的移工等而視之，而在這個年代裡的人力短缺，也不再全都意味著外來的幫助都是受歡迎的。

經濟成長的多重意義

從1830年代起，歐洲的人口開始暴增。在一些國家裡，整個19世紀的人口成長甚至遠遠超過18世紀後半葉的34%這個數字。歐洲在1800年時有1億8,700萬人，到了1850年卻攀升到2億6,600萬人，而在1913年時甚至增加為接近二倍的4億6,800萬人。在這個世紀裡，丹麥、芬蘭、大英帝國的人口增為三倍以上；在比利時、荷蘭、德國、奧匈帝國及義大利，人口則增為二倍或二倍以上，而法國人口成長了50%，相形之下就慢了不少。

39 食物的生產也因為有更多的土地被開耕，以及新作物的引進而增加，像是著名的根類作物蘿蔔與馬鈴薯。像在英格蘭的食物生產，在1700到1870年期間就成長為三倍之多，而最顯著的成長出現在1840到1870年期間。戰爭、飢荒與瘟疫的減少，加上食物的供應增加，讓死亡率也隨之下降。像Armengaud曾報告說，在1800年代早期，只有62%的女性能活到20歲，但到了1900年代早期，已有四分之三能活到讓她們成熟育兒的年紀。

弔詭的是，人口與食物急速的成長，卻使得人們更難以靠著鄉村經濟來過活，因為仰賴農民階級與工場工業的鄉村經濟，正時緩時遽地解體當中。資本進入了農業與製造業，這當中包括了以鄉村為基礎的工業，再加上在城市以工業為主力的工業如雨後春筍茁生，都破壞了原本生產方式的活力，這種生產方式是仰賴小規模的所有權，其特色即為由農民經營的農業以及工場為主力的工業。Tilly（1983）曾注意到原本在16世紀時歐洲鄉村大多居住著農民的情況，在1800年代中期時卻

變成只有五分之一的人是農民，並且大部分的人都未擁有土地，頂多只有自己的房子與菜圃而已。

我們或許會想說，如今有了更多的食物，應該可以提供給鄉村裡更多人吃飽，但食物的生產之所以會增加，是因為資本進入農業當中並發展了經濟作物（cash crop）的緣故。而這也讓情況並未朝想像中的那樣發展：比起以往小農民擁有土地能主宰農業生產的形態，如今對食物的控制與所有權則更加集中。政府也透過政策，支持土地的合併、圈地，並將以往用來放牧的共有地私有化，而促使食物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的情況更嚴重。相較於舊體制，如今的鄉村地貌變得更具有生產力，但卻更無法讓其居民維生。

在鄉村的製造業情況也沒好到那裡去。原本在工坊裡使用的工具與機器變得過時而被廢棄不用，這也導致破壞了許多家戶維生所繫。手工業的生產曾支持著數十萬村民的生計，但在工廠生產模式的發展下，不只工坊工業的市場大幅萎縮甚至消失，也使工廠生產的模式逐漸在大城市裡擴張，使得整個區域裡不再有任何類型的製造業能生存下去。工坊工業由於產出的商品失去了市場，再加上工資快速的減少，導致它不再能滿足當地的勞動力的需求（Levine, 1987），許多村落在規模上不僅萎縮了，也變得幾乎單單從事農業生產而已（Pinchemel, 1975）。

鄉村經濟的解體影響了人們的家庭生活以及男女之間的關係。多虧有當代學者 Gullickson（1986）的研究成果，讓我們能深入描繪這些效應是如何呈現在法國 Auffay 村的。在這裡鄉村紡織工業的衰頹，對男女尋找配偶、結婚與生育都產生影響。當男人原本從事的織布工作減少後，男人出外工作，而僅

客人？外人？

剩女人留在村子裡，然而女人是較少移動的。在村子裡尋找配偶變成是件麻煩事，因為年輕的男性都想要離開村子，但是父母都想將女兒們留在家裡，遠離城市，尤其是省會盧昂（Rouen）。這麼一來，讓結婚率下降，並使未婚生子的情況增加。發生在 Auffy 村這種因鄉村經濟危機導致的效應，也不斷地在許多其他的村落中重演（Grafteaux, 1985; Chatelain, 1976）。

各個鄉村遭逢轉變的時機因地區而有很大的不同；在德國甚至有些鄉村工業，直到 19 世紀末都還在持續成長，但在英國則在 18 世紀晚期就開始解體了。在歐洲各地，這些轉變都以相同的形式體現在勞動力的聘僱時間上：長期的工作漸漸被短期的工作所取代。當鄉村工業衰頹時，很多人仍選擇從事農業的勞動，但是有愈來愈多是按時薪工作的短期工人，所賺取的工資常常都是極低的；像是修剪葡萄藤與花卉、鋤田、割乾草、採掘馬鈴薯等工作，全都是聘僱時間很短的工作。像甜菜這類新作物以及如打穀機這種新機器的引進，都一再使每年對勞動力的需求只集中在夏季期間的短期活動。¹這也促使了大量的工人長時間處於無工作且無所事事的狀態。

鄉村經濟的解體大大地驅動愈來愈多的人進行遷移，以便尋找工作。尤其在每年合約到期時，都導致另一次為期一年的移工潮，四處找尋可做的工作，不管它有多短期、多危險以及薪水多低。

1. 打穀機取代了農地工人在冬季工作時間的 80%；除此之外，打穀工作必須持續到夏季結束，這麼一來也減少了淡季時工作的主要來源。

勞動遷移以及歐洲的建立

在19世紀後半葉興起了新的遷移體系，其所含納的距離比以往更長，所前往的目的地比以前更多。魯爾地區的幾個新城市成爲來自德國東部的人們，一個新的遷移目的地，這些人以往若不是從未遷移過，就是曾是往荷蘭遷移潮裡的一部分。愛爾蘭人則大量地移往英國的城市裡。1840年代的危機也驅使男男女女的工人們從法蘭德斯，到法國的城市與鄉村裡工作。在奧地利與俄羅斯分別在1848年初與1861年解放了農奴，這也使得工人們可以自由移動，在奧地利與俄羅斯的波蘭人則在1861年之後遷往德國與法國。

這些流離失所的鄉村居民可以前往其他在農業上需要短暫勞動力的地區。在1841年時，位在英國的愛爾蘭季節性農業工人有五萬人之多；他們在2月時會栽種自家的馬鈴薯，在11月時採收，而在這二段時期之間則到英國工作（Harris, 1989）。在1800年代中時，在法國有超過35萬名季節性農業工人，其中超過四分之一是女性，此外還有近百萬的季節性工人會來採收葡萄（Chatelain, 1976）（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同的採收時期，有些工作是由同一個人擔任；這都是由雇主決定的）。

19世紀晚期在城市裡及建設鐵路上對營造物大量的需求，也支持著新的大規模遷移的形成。鐵路的建設需要可觀的人力來挖掘、開通隧道、搭建橋樑，在當時北歐與西歐的多數地方都在進行這項工作，而大多是由移工所完成的：英國早在1830年代及1840年代就僱用他們；之後的低地國、法國及德國也跟進，從1850年代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間鋪設了數百萬哩的鐵路。這個工作不但辛苦、受人輕鄙，而且很危險，資料顯示

客人？外人？

外來的工人要遠比當地工人，更願意接受艱困的工作以及很不舒適的宿營生活（Chatelain, 1976; Bade, 1980; Rosoli, 1978）。

42 有些學者（Chatelain, 1976）曾描寫在鐵路上的移工工作情況。像在法國南部的 Ales 煤礦區以北 51 公里處，為安置穿越山區的鐵路，來自中部高地及 Piedmont 地區的工人建築了 47 座隧道以穿越 16 公里長的山地。位在法義邊境阿爾卑斯山區的 Frejus 隧道是另一項艱鉅困難的任務，在 1857 到 1871 年間耗費了 2,000 人日復一日地在高山上，為建造這條 13 公里長的隧道而努力。位在 Gothard 的隧道也花了九年才完工通行。Rosoli（1978）曾這麼描述在阿爾卑斯山區為建造鐵路與道路的義大利移工：在 1900 年時，光在瑞士就有 4.4 萬名義大利人受僱建造鐵路。義大利人成了全歐洲建造鐵路所使用的季節性勞動力的主要來源。

鋪設鐵路的工作不只引發新一波的季節性遷移，同時也促成了包括花卉以及新鮮蔬菜等季節性產品的運送，也朝向一個更大區域的市場來供應。來到地中海平原的季節性移工不只幫忙傳統的穀物採收，同時也協助收成將來要以鐵路外送的水果、蔬菜與花卉。有很多種季節性的循環遷移，都鎖定特定的區域以及農作物來進行：女人們在 5、6 月時在隆河谷地採收草莓，而男人們也在稍後的夏季晚期採收蕃茄；也有很多蒙塔格納德人（Montagnards）來到地中海平原幫忙採收葡萄；在隆河以東，每年有 1.5 萬名義大利人來到普羅旺斯，在這裡女人負責栽種與採收花卉、蔬菜與橄欖，而男人則在葡萄園與花園裡工作；布列塔尼的季節性移工則採收即將運往巴黎的草莓與菜豆（green bean），以及將運往倫敦市場的新作物馬鈴薯（Boyer, 1934; Rosoli, 1978）。

土地所生產的作物發生變遷，也會導致人們在各地遷移。例如，當甜菜成爲重要的作物後，它所導致更密集的勞動力以及快速擴張的需求，都使得進行季節性遷移的人更多。在德國，最早一些到甜菜田的季節性遷移開始於1840年代，並被稱爲是「去薩克森的人」(Sachsengangerei)。到了1914年，甜菜園更吸引了約45萬的外來移工，他們分別來自義大利、斯堪地那維亞、白俄羅斯、羅塞尼亞 (Ruthenia)，以及來自俄羅斯與奧地利的波蘭人。

最大規模的遷移仍非海外跨洋的遷移莫屬。殖民帝國的擴張以及汽船的發明都讓大批湧向跨洋遷移的人們得以成行，他們的目的地是拉丁美洲、澳洲、紐西蘭以及北美洲。超過5,000萬的歐洲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在這個世紀內起身前往海外的目的地。在1840年代末時，每年有20到30萬人離開歐洲，在1840到1900年之間，估計共有2,600萬的歐洲人離開，接下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時間內，則共有2,400萬人。其中有3,700萬人（或說72%）是前往北美洲，有1,100萬人（或說21%）前往南美洲，而有350萬人到了澳洲與紐西蘭。

43

但是談到超長距離的遷移，並不僅限於海上的旅行而已。在歐俄的南部平原上，以及稍後在西伯利亞的領土上也都發生了遷移。對於這場遷移的人數估計，各方說法差異甚大；其中較可信的一個認爲從1815到1921年間，有1,000萬名遷移者來到這裡 (Dollot, 1965)。這個數字比起遷移北美洲的人們要少，但卻十分有意義，因爲這說明了不只在美國與加拿大有便宜的土地，在俄羅斯的南部與亞俄也同樣擁有這樣的條件 (Hoerder, 1985)。

客人？外人？

以上是當時遷移的背景，而這對那些移動的人們而言，又具有什麼意義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或許我們可以再回到 Auffay 村的例子上。雖然在這個村子裡也像別的地方一樣，儘可能想將年輕女性留在家裡，只是經濟上的需求往往不允許讓這願望成真。就像以前一樣，年輕女性不斷或多或少地短暫遷往城市裡，擔任家務幫傭、磨坊工人及製針工人。但有些女人所進行的遷移與上述的完全不同，她們改變了原本居住的地方並向上流動。這群擔任新興職業學校老師的女性必須離開家鄉去受訓或任職，因而成了「職業遷移者」(career migrant)。

現代民族國家與海外帝國的勢力擴張，以及新國家的建立（1871年的德意志帝國與1870年統一的義大利）也為男性的職業遷移開啓了其他的機會，例如擔任公務人員、司法系統裡的職員、殖民地的警察等（Moch, 1988）。如韋伯（Max Weber）所言，這類職業遷移是現代理性官僚體系發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官僚體系意味著只要符合資格要求，任何人都有機會進入任職，而不像以往職位是世襲或不對外開放的；而職位的位階升遷同樣也是開放的。韋伯相信在民族國家日益鞏固下，其官僚體系中若有空缺，也會帶動民族國家內因應職業所需的遷移者的變遷。

44

19世紀的偉大小說家在描繪擴張經濟下的遷移情景時，也都會摘取職業遷移為題材，雖然很少是發生在官僚體系底下的。我們聯想到了巴爾札克《幻滅》（*Lost Illusions*）裡的 Lucien Rembrenpre、斯湯達爾《紅與黑》（*The Red and the Black*）裡的 Julien Sorel，以及薩克萊（William Thackeray）《浮華世界》（*Vanity Fair*）裡的 Becky Sharp。城市之光的誘

惑、懷抱野心的流動以及對安定的深切恨惡：這些移動中的人物主宰了 19 世紀的文學作品，然而那些出於經濟困頓而必須遷往城市，以尋求工廠或建築工作的勞工們，卻很少成為作家筆下的英雄。

小說家雖然缺乏社會學的專業訓練，但這不代表他們就缺乏社會洞察力。人們透過遷移來取得機會的想法在小說裡傳達出來，這也反映了當時因為經濟與國家官僚體系同時成長之下，職業流動創造了無限可能的真實世界。而裡頭誘人城市的意象也反映了當時在市鎮中的機會遠多於鄉村的真實情況。關於「職業遷移」的描寫，小說裡所欠缺的是城鄉之間的相互連繫，以及更重要的一個事實，即對遷移的人們而言，特定的城市或某個國家並非總是不變、固定的目的地。

在真實世界裡，人們經常不願意或是不能待在像倫敦、巴黎、柏林這種大都市裡。也有很多的移動是在區域內、歐洲各國間，甚至是跨洋遷移來來回回的（Langewiesche, 1977; Hochstadt, 1988）。在跨洋遷移裡返回故鄉的比例又特別具有意義，因為這數字挑戰了常識上認為到了國外尋找機會的移民，將在那裡定居下來的預設。例如，近期資料顯示，從 1899 到 1924 年間，到美國的海外移民中約有三分之一，會返回他們的母國（Thernstrom and Orlov, 1980）。而德國與英國移民的返回比率（return rate）也比一般想像中要高。19 世紀的遷移故事裡包含了許多不確定目標在何方的生命史；像是有些德國居民搬到俄羅斯去，但在他們特權被削減的時候又搬往美國；而有些搬到美國去的芬蘭人，由於想尋找一個較不受壓迫的工作條件，又搬到俄國的卡累利亞（Karelia）（Kero, 1975）。這些與自鄉村搬往城市的移民有著同樣的現象：最近的研究也發現，

客人？外人？

這並非永遠都是單向式的移動。

當巴爾扎克描寫移動的人們時，他想像其書中的角色是因為想放棄熟悉的一切而開始新生活。但在小說之外的人們的現實經驗可要樸實的多，很多遷移——不論是在歐洲境內的國家間或城鄉間——的產生，都是因為人們想賺取養家薪資，以支持鄉村裡的家戶生計，或是買更多的土地，或是改善自己的農業生產與工坊工業的條件。

當我們討論到許多職業遷移者為何能成功，而其他許多像 *Julien Sorel* 及 *Becky Sharp* 的人為何會失敗時，藝術與現實生活間的關係或許是很難釐清的。在 19 世紀小說家的想像中，這些野心勃勃的移民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他或她想往上爬的慾望過於強烈所致，在小說之外的世界裡，野心是受限並且更加集中的；Sennett (1970) 的研究顯示，以對絕大多數的工人來說，他們的野心是集中在財富或是想確保自己擁有新的房子等事務上，近來的研究也發現不像傳統上想像的那樣，事實上移民在美國的向上社會流動的情況要遠較在歐洲來的少 (Kaelble, 1981)。我們或許可以中肯地下這樣一個結論，即職業遷移所發生的範圍十分有限，最可能進行這類遷移的人就是那些工作與國家關係特別密切的，像是老師或是殖民地的官僚；對其他人而言，因工業化導致的大規模地理遷移，並未相應地帶給他們顯著的向上流動。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次看到新移民的情況與政治難民是很接近的。占去他們精力的是為生計而打拼奮鬥，並不是不斷求升遷的野心。對這群新興的移民與難民而言，地理上遷移的方向是不斷改變，沒有固定的目的地的，他們跟隨著財富的巨輪而運轉，而非想掌握自己的命運。

延續與改變：往葡萄園去的季節性遷移

在本章的一開始，我曾評論到歷史是不會在過去與現在之間，劃上明確的分界線，而在大略描繪了1848年後遷移的人們所遭遇的情況之後，我想在這裡透過更深入、在地的觀察過去是如何影響現在的，來為本章做結束是十分合適的。為此，我們要引用當代學者Chatelain的研究，來討論人們是如何在法國葡萄園裡遷入與遷出。

46

在19世紀初時，葡萄園已是法國很重要的一部分了。大部分地區耕植葡萄園的目的是為了自己的消費所用，只有一些是為外銷而大規模地集中生產。葡萄生產最快速成長的時期是在19世紀中期以後以及20世紀早期，在葡萄根瘤蚜蟲病大肆流行前，在1873年時有250萬公頃的土地在栽種葡萄；到了1879年時，其生產量已高達70億升之多，但到了1900年，乃至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下降到了50億升。因此在這個世紀間，葡萄園大量的擴張需要數量龐大的短期季節性勞工來配合。

經歷過了危機與興盛，葡萄園在時間與空間的向度上不斷的演變，也在豐富的短期遷移史裡寫下其中的一頁。往葡萄園去的遷移有二種，其一是協助打造一座在未來能有豐富產出的葡萄園工作，原本負擔這工作的遷移都發生在早春之際，但最後演變為一年中的任何時期都有可能；第二種發生在收成時節，同時這也是短期季節性移工主要從事的一種。

Chatelain計算出來，直到了第二帝國瓦解時，大約還有50萬名的季節性移工沿著法國的道路遷移，以尋求在葡萄園裡工作的機會。在第二帝國的時代過去後，葡萄根瘤蚜蟲病所造成

客人？外人？

的傷害也漸漸復原，移工人數達到了未曾出現的高峰。根據1929年的農業統計，有接近10.8萬名季節性移工在法國四個鄰近地中海的行政區裡，從事葡萄園內的工作。在這個世紀裡，短期季節性遷移的來源發生了顯著的改變：來自中部高地的蒙塔格納德人持續遷往葡萄園內，但從阿爾卑斯山及庇里牛斯山區的移民卻日漸減少。在來自山區的季節性移工愈來愈少之際，葡萄園裡所需的勞動力則由城市來的移工取而代之，而他們往往透過仲介和招募機構前來；這個改變影響了大型的葡萄園，而小規模的栽種業者仍然依賴家庭成員及鄰居的幫忙。

47 在本世紀的前半葉，南大西洋地區所吸引的短期遷移要多於地中海平原地區。這個區域內靠著大西洋沿岸的港口，而可以與法國北部甚至更北的地方，有良好的連繫。有二種類型的移民會到南大西洋地區來，一種是冬季時遷來的蒙塔諾爾人（Montagnols），或稱為 *défricheurs*，他們大多來自庇里牛斯山區的男性，在此受僱從事種植、*défrichage* 及 *fumage* 等工作；另一種是在9月及10月時前來協助收成的，裡頭有男有女，像是從 Lot-et-Garonne 省就來了400位男男女女及小孩，到吉倫河（Gironde）地區的葡萄園裡工作，他們花了三天的時間步行而來，身上帶著工作用具、寢具及食物；從下沙倫特河（Charente-Inferieure）地區則來了850人，其中多是15到20歲的年輕人，在他們返回家鄉時一共獲得了8,500法郎為報酬，也就是每個人拿到10塊法郎。在這二段高峰期之外，吉倫河地區仍需在淡季時僱請外來工人。

除了吉倫特河區外，近地中海的葡萄生產區是第二大種植葡萄的區域，包括 Roussillon、Bas-Languedoc 及 Basse Provence 等。在1808年的一項調查報告裡，我們找到了一段有

用的記錄，告訴我們每年到東庇里牛斯山地區的葡萄採收團隊，都是從 Aude 與 Ariège 兩地來的，約有總數 1,000 名的男女到這裡來工作，為期約 15 天，賺取還算不差的薪資：男人每天能賺 1.8 法郎，女人則有 1.2 法郎；食物必須自備。就像吉倫河地區的情況一樣，即便他們只是臨時工，但薪資實在很微薄，並且工作也很辛苦，有位 Morelot 博士曾記載說，這些工人都被過度地使用與監控，所提供的食物不但供應不足，而且住的地方還很簡陋，辛苦的工作最後只換得十分低額的薪資。

葡萄園主人們並不信任這些移工們，認為必須不斷監視他們，一方面確保生產力，另一方面也避免工人在工作時吃太多葡萄。Morelot 博士也提到，園主的妻子有時會奉命跟著這些工人，撿拾他們未能撿起的葡萄，同時確保他們不會吃太多葡萄。一天供應工人兩餐，通常分別是在一大早還未去葡萄園之前，以及下午一點或兩點時：第一頓常是一盤馬鈴薯、豆子，再加入一些牛奶調味，還有一塊劣質麵包；第二頓則是一條大蒜麵包。

葡萄園主雖然害怕且歧視這些低薪移工，但仍必須仰賴這些勞動力，移工們也知道雇主們是怎麼看待他們的，就像是移工們在前往勃艮弟（Bourgogne）的路上吟唱的歌詞這麼說：

爲了五毛錢，來葡萄園打拼，
睡在稻草上，搜集著跳蚤，
吃著臭味令人惱火的起士，
喝著薄酒，我要走向四方。

然而，在 19 世紀後半葉裡，各個鄰近省分在徵募季節性

客人？外人？

移工上有日趨激烈的競爭。有些葡萄園主會前往他們以往從未徵募的省分尋找工人；有些園主則要求政府在考慮法國境內的勞動力需求下，禁止國內工人移往美洲工作——早在舊體制下就有希望政府禁止勞力外移的呼聲，並一直持續到當時。19世紀末的一則報告曾抱怨高達6,000名工人的大規模外移，其實都是被與勞工訂約的商人，以鉅額財富的誘惑，以致被騙到美洲去。類似的情況也可以在法國其他地區看到，像在製酒業擴張時期，勞力短缺的問題也四處可見，像在索恩河（Saône）與羅亞爾河（Loire）流域，以及黃金坡（Côte d'Or）、勃艮弟與下羅亞爾河地區（Loire-Inferieure）。

憑藉著鐵路所打造出城市裡的嶄新工業世界，讓一些園主採用了現代的說法，來解釋以往就存在的勞力短缺的經驗；他們譴責公共建設的擴張占用掉了愈來愈多的移工，然而這些雇主們卻不覺得自己強加在移工們身上的惡劣工作環境，是造成這結果的原因，雖然在某些地區的一些園主已意識到必須提供給工人更好的對待與薪資，且他們也的確這麼去做。

我們再一次看到，在1860年代之後，當耕種與整地的特定工作被部分機器侵入而取代後，所開啓的新經濟秩序減少了春季時對勞動力的需求，然而在夏季採收時節對大量工人的需求仍然存在，尤其在生產擴張後，這個需求變得更加迫切。

第二帝國結束的同時也是葡萄園的擴張達到最高峰，擴張背後最主要的因素之一，是因著鐵路建設而大幅成長的酒類市場，然而這段大約為期20年，經歷大量擴張與勞力嚴重短缺的特殊時期，也隨著葡萄根瘤蚜蟲病大肆傳染與破壞而畫下句點。²能啃蝕掉作物根部的葡萄根瘤蚜蟲導致了葡萄藤的死亡，也讓許多工人放棄遷往葡萄園內工作的念頭，這場葡萄根

瘤蚜蟲病帶來的危機，也啟動了新一批的勞動遷移：這促使了一些當地工人與小園主本身成爲移工。例如一些在朗格多克地區的當地工人前往葡萄生產正在擴張中的阿爾及利亞，但這反過來也意味著，當朗格多克的葡萄園重獲生機並開始擴展之際，缺乏足夠的勞力供給的問題也回過頭來報應當地，雖然此時對法國移工，尤其是蒙塔格納德人的招募再度展開，然而勞動力的供應仍是不足。

在度過天災後，從國外招募工人變得十分必要，尤其從西班牙與義大利；西班牙人早已藉由鐵路來到地中海平原，尋求建築方面的工作，義大利工人也被普羅瓦斯當地的園主招募來工作。因爲外國工人願意接受低薪，許多地區的葡萄栽種業者開始準備僱用西班牙與義大利的工人，而捨法國移工不用，不令人意外的是法國工人對外國工人並不友善，認爲是他們拉低了薪資水準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幾年裡，從西班牙來到葡萄園內工作的季節性工人數目達到1.8萬名，這類遷移在大戰結束後又重新恢復，並在1922年時達到24,755人的最高峰，其中約有1.1萬人是女性。他們都是搭著整輛被包下的火車，大批地來到法國，在車站有馬車等著將他們載往即將工作的葡萄園裡，這類馬車在當時塞滿了整條道路上，使交通十分壅塞。

在20世紀初期，像那種每年前往同一個地方工作，之後帶著自己的積蓄回鄉的移工已不復見於遷移體系裡。新興的移工常常沒有固定的家，而是不斷地在找尋工作。這種臨時、不固定的性質也漸漸標示出那些西班牙與義大利移工的處境，同

2. 這場葡萄根瘤蚜蟲病的流行開始於1863年的Gard這個地方，但真正大規模的侵毀葡萄園是到1872年後才開始。

客人？外人？

時也適用於法國境內的移工身上。那種不斷重覆為工作遷移的節奏漸漸消失了，只是就像這段短暫歷史清楚告訴我們的，並不是因為鐵路、建設計畫或是從鄉村勞動力轉變為短期受薪的契約勞工，而使得這種遷移突然間消失；相反地，這些轉變只是在更早的時期，就開始在鄉村生活裡結構的裂縫中擴大。

第四章

國族與遷移：德國、法國、義大利

民族國家究竟是如何看待這些新興的遷移模式呢？19世紀的德、法、義三國，正可以向我們說明民族國家是如何介入或不介入遷移的三種方式。德國代表的是在境內發生短期遷移的民族國家典型；法國則是按照永久移民的原則來行事，認為愈多移民愈好，並試圖讓他們都變成法國人；義大利在19世紀晚期時，相較於德法，其走向較不明確，但在國家一統之後不久，即成為主要的人口輸出國。雖然義大利因著自身做為人口輸出國的歷史，而在1951年的日內瓦難民公約裡被豁免接收難民的義務，這事顯著地說明民族國家的影響，但在義大利人口的遷出過程裡，民族國家扮演的角色似乎是微不足道的。

可以確定的是，相較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民族國家要辨識與分類外國人士，同時又要管制他們的移動、進出與居住情況，19世紀的民族國家所扮演的角色要來得模糊許多。然而，19世紀告訴我們的是，當代的移民政策是如何深深鑲嵌在國族與政治文化、經濟與地理位置的問題上。它同時也告訴我們，即使一個國家可以不斷的將自己再製為勞動力的輸出者時，我們仍可看到這過程中有一明確的模式可循，包括其延續

客人？外人？

的時間長短以及擴及的範圍。即便在像國家內的地區這種更小的地理單位，情況仍是一樣。

52 從經濟以及地理位置的角度看來，這三個國家彼此間構成了強烈的對比。德國 19 世紀的遷移歷史是同時被解體與成長所主宰；誠如上一章所言，當以工廠為主力的工業經濟模式日益成長，農業經濟與鄉村工業即面臨解體，伴隨而來的是漸漸增多的無產階級人口。早期在農村經濟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生活模式解體之後，加上工業化創造出了低薪移工的就業機會與需求，如此製造出了遷出的情勢。在 1880 年代的德國有 100 萬人移至海外，大部分來到了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之際，就有超過 300 萬的德國人身在海外，而德國反過來也接收了 100 萬的外來工人。

相較於歐洲其他主要國家，法國擁有更長且未曾中斷的遷移歷史。在 19 世紀的法國裡，移入所扮演的角色是比遷出重要的多。不像德國的是，法國人在 19 世紀從未大規模地從歐洲遷往北美洲；法國直到進入 20 世紀前都能維持龐大的農業部門，這確保了在鄉村謀生的可能性，同時也創造了對移民的需求。雖然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法國都從未像英國那麼徹底地都市化，但法國快速茁生的城市也創造了對工人大量的需求。

直到最近為止，由於海外移民眾多的關係，使大家認為義大利與愛爾蘭是歐洲最主要人口移出的國家。但較不為人知的是義大利人在 19 世紀時，就移往許多歐洲其他的國家裡。早在 19 世紀，甚至是 18 世紀時，義大利人已大批流向法國與瑞士，之後又往德國與瑞典去。義大利人在歐洲內的遷移對外人而言，似乎只是短期季節性的事件，缺乏像海外移民那樣明確

的遷移模式，但對義大利人而言，這些歐洲內的遷移同樣具有高度的結構性特徵，同時也會令國內紛紛擾擾。

本章提供更多的細節資訊，透過檢視這些事實與數據，今日民族國家在面對遷移時的難題，也將漸漸浮現。

德國：短期遷移的典型國家

直到19世紀晚期前，德國都存在著顯著的人口移出潮。除了大規模海外移民潮，還有在第二章提過的早期從西發利亞遷往北海的移民，以及在19世紀早期遷往法國與瑞士工作的德國人。在19世紀後半葉，由於礦業與工廠的發展、鐵路的建設以及城市的建造，都吸引了許多來自東歐及南歐的外國工人來到德國；另外，農奴制的廢除以及與之相關的農民無產階級化，也造成了大量為尋求工作的內部遷移與海外移民潮（Bade, 1987; Benz, 1985）。

53

在1800年代末，德國的東北部成為進行這些不同遷移潮的主要地區，在這裡召募德國人前往海外的活動是最密集的；同時這裡也是最多東歐人來到德國工作的地方；這裡也是德國境內移往西部的內部移民的主要來源地，尤其是在廢除農奴制之後。德國的西部地區，尤其是魯爾—萊茵河流域，成為了國外或內部移工的主要接收地。

移往北美洲的遷移從1880年到1890年代中期迅速攀升，這也是19世紀最後一波的大規模移民潮：分別是1846到1857年間、1864到1873年間，以及1880到1893年間。在第三波裡我們也看到了整個世紀以來最多人數的遷移，在這波結束之後，德國即不再是一個人口移出的國家（Bade, 1987）。移出德

客人？外人？

國的人們大多是要前往美國，在1890年時德國人在那裡也占了外來人口的30%；之後在1910年時降至18.5%，在1930年時則只有11.3%。大部分1800年代晚期移出的人都來自東北部的農業地帶，到了1880年有巨幅的躍升，正是在這個時候，東北部成爲了主要的人口移出區；而在前二波外移民潮時，主要移出地是德國的西南部地區。

這二個地區有著相同的土地所有權、繼承權的模式，這也導致了靠著土地維生的可能性下降不少，使得愈來愈多的人必須離開鄉村。在西南部，傳統上會根據繼承人的數目平均切割土地，這種持續不斷的農地分割也造成各人擁有的土地，愈來愈不能使人依其在經濟上生存下去。在東北部的繼承傳統是把土地整片傳給長子，這也創造出了愈來愈多無土地的人；更進一步來看，當地農業主要充斥著這類大地主，都以相當低的薪資聘僱契約工或季節性農工。大批貧窮無土地的工人階級也有助於遷移的發展，尤其是對德國西部那些最貧困的人們而言。轉種根類作物的勞動力需求大多集中在夏季，而到了冬季時只有薪資極低的工作可做。不管是到海外或德國其他地區，很多人之所以遷移是希望賺夠了錢後，能回鄉買下足以維持生計的土地，因此薪資不但是爲補貼生活所需，也爲了維持有土地做爲家戶生計的基礎，因爲替大地主幹活所賺得的薪資實在太低了。

54

不像歐洲其他的一些國家，正在興起的德意志民族國家對移出的現象採取自由的立場，但就像我們看到的，它在19世紀時對遷入卻採取十分嚴格的控制。在1830年代針對移出問題的激烈辯論後，在1849年通過了移出法案（Emigration Bill），並仔細考慮設立掌管移出事務部門之可能。在帝國時

期，直到大規模移出停止後，政府才在1897年執行一項關於移出的法令，此法令本身仍傾向自由的立場，除了對可能藉由移出來逃避兵役的年輕人有所管制之外。

針對在1890年代早期移出現象突然的中斷，已有人做出各式各樣的解釋。其中一種是引用Turner以美國西部為例發展出著名的邊區命題（frontier thesis）：Turner認為在19世紀末期時，當不可能再取得無人居住、廉價，更重要的是無人管制的土地後，美國向西部移動的情況有了轉變；想獲取這種「免費」土地的渴望確實激發了早期來自東普魯士的移民，如今在1800年代晚期來到美國的德國移民則大量湧入城市之中：在人口普查裡，有51%的德裔美國人居住在超過2.5萬人的城市之中，相較於在德國則只有35%。再者，美國在1890年代早期經歷了一次經濟大蕭條，但在同時德國卻在1890年代中期享受一波經濟成長，這樣的榮景也讓德國境內有充分就業機會，甚至還需要召募國外的工人來補足勞動力的需求。

當移出現象在1890年代早期迅速減退時，內部移民於是成為主要的遷移潮。在德國內部遷往工業發達的地區，尤其是西部，取代了海外遷移。在1880年代與1890年代期間，我們看到浮現出一股內部遠程的遷移潮，尤其是移往魯爾區。從東北部來的移民首先被柏林的工業吸引而前往，稍後在1870年代時，他們開始往德國中部的工業區前進。對一些早期移民而言，是有可能找尋到短期的工作，同時在東部仍維持靠土地維生的家戶。在像梅克倫堡州（Mecklenburg）的一些地區仍存在著海外與內部遷移並存的悠久傳統。而在1880年代時，內部遷移的規模已超越海外遷移。

55

在農民最貧窮、農工薪資最低的東普魯士，並沒有海外遷

客人？外人？

移的現象，對最貧困的這群人而言，遷移並不是一個選項，這個命題在 20 世紀時將再度浮現。這些貧窮的農夫得不到援助，以致支付不起海外旅行的船票；他們缺乏跨洋網絡提供的支援與資源，因此無力形成連鎖遷移。取而代之的是，他們有相當多人往德國西部去做內部遷移，而在這些地區裡建立了網絡（Bade, 1980）。在 1910 年時，有近 50 萬從東普魯士、西普魯士以及波茲蘭（Posen）的德國人住在西部各省（Bade, 1980）。

在德國境內從北部遷往西部各省的遷移人口裡，包含了許多族裔（Barfuss, 1986; Benz, 1985）。其中波蘭裔的勞工成爲被隔離的一群，形成了所謂魯爾波蘭人（the Ruhrpolen）的次文化團體（Crew, 1979）。在 1870 年代，他們開始在煤礦坑裡工作，這群不會說當地話的農夫們生平第一次踏進工業的世界裡，很多人進行短期遷移是爲了賺得足夠的錢後，回到東部去買土地，然而對大多數人而言，最終卻成了永久性的遷移。類似的情況也可以在許多遠赴美國的人身上看到，雖然同樣想回鄉置產，但最終卻未能再回來。

就像遠赴海外的移民一樣，這些來到西部經濟開發地區（western economic 「frontier」）的移民也認爲在那裡有塊土地正在等待他們。在歐洲境內的向西移動就像在美國的情況一樣，新移民遭遇了類似的問題，像是疏離與難以融入當地，以及家庭與朋友間基於連帶而要求幫忙、依賴的負擔。倘若更仔細地檢視德國境內的西遷現象，我們將更清楚地瞭解，在 19 世紀末的民族國家是如何藉由對短期遷移的政策制定，來追求一個理想德國的願景。

各種向外遷移而人口銳減。即使仍住在鄉村地區，但居民往往拋下鄉間的工作，而去尋找像在布蘭登堡這類城市附近的，或是像在上西利西亞地區這類工業區的就業機會，像是逃離土地以尋找職業的行為模式（*berufliche Landflucht / occupational landflight*）就是個例子（Quante, 1933）。甜菜做為一種勞力密集的作物，它的生產擴張也引發了一陣對大量季節性移工的全新需求，這需求是德國其他地區難以比得上的。包括礦業與工廠的發展、鐵路與城市建設等所創造出來的就業機會，都促使原本住在德國東北部的人民被吸引到國內其他地區。

而當地產生的勞動力中空即由那些跨越德國邊境的歐洲移民填補，其來源也有愈來愈靠東的趨勢（Benz, 1985）。來自波蘭中部（當時仍在俄國控制之下）及奧地利的加利西亞的這些農業工人當中，男女和小孩都有，他們在1900年代初形成一股每年有25萬人的遷移潮（Bade, 1980）。這群貧窮到無以復加，以致無可選擇地要從事報酬低廉工作的移民，在雇主眼中是既順從又廉價。移往德國的波蘭人中，超過一半是女性，因為她們掘根的技术高明，比起男人更加順從且願意領低薪，因此甚得雇主的喜愛（Perkins, 1981），我們不得不聯想到，這與今日在亞洲與墨西哥以出口為導向的工廠雇主，對女性的觀感是如此類似。波蘭人因著農奴制在俄國與奧國的廢除，自己的生計將備受破壞（Morawska, 1989），而且在普魯士、俄國與奧地利三分波蘭後，也使波蘭人在那本是自己民族國家的土地上，轉變為「少數族裔」。

猶太人也參與在這股穿越德國由東向西的推進裡。從188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間，對很多猶太人而言，德國是他們朝美國邁進之路上的第一站：從1905到1914年期間，大約有70萬

客人？外人？

57

名猶太人從東邊來到德國，這些貧窮、前現代、來自東方的猶太人，令許多已經在生活上同化為德國中產階級與專業人士的猶太人感到震驚與厭惡。雖然基督教徒對猶太移民的敵意仍然很高，但德國從未將德俄邊界給封鎖起來。事實上，德國政府是希望貧窮的猶太人能離開，而有錢的可以留下來。雖然政府有時會驅逐一些貧困的猶太人回到俄國去，但卻有更多猶太人被送往美國；船運公司也會與政府及猶太救援機構合作，將猶太移民送往美國。在1910年時，在德國只剩下七萬名來自東歐的猶太人。

可以確定的是，這些由東到西的遷移潮並非唯一流經德國的移動人潮。在1900年代初的整個德國境內，不但有從義大利、斯堪地那維亞以及白俄羅斯合法入境的季節性農工，同時還加上那股最具影響力的遷移潮——從奧地利與俄羅斯向西遷的波蘭人；單在1914年間進入德國的人數就將近50萬人。

民族國家要如何回應這股遷入潮呢？在當地政府以及雇主團體的多項聲明裡，我們都可看出這些移工對東普魯士的農業、上西利西亞的礦業、魯爾工業區有多重要。普魯士的行政部門也坦承倘若沒有這些外來移工，「對其農業而言將如敲響喪鐘一般」；上西利西亞的採礦業也宣稱若無外來勞動力，工業將無法持續運作（轉引自Bade）。然而有這樣的認識並不意味著移工就能支領與當地工人同樣水準的薪資與待遇，也不意味雇主們與當地政府就想幫助移工融入當地社會。早在有土耳其工人出現在德國人們眼簾之前，這群東歐人就被國家視為是「客工」（guest workers）。

雖然德國對移出現象採取自由的立場，但在移入的政策上卻傾向對永久移民設限，鼓勵短期遷移。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

的是，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有一套嚴格的系統可以控制移工。幾乎所有來到這裡的人都被要求領取特定職業的工作證（在德國被稱為 *Legitimations Karten*）；當要更換工作時必須領取另一張新證。如果有外籍工人在工作時被發現沒有工作證，或在找工作時被發現工作證已被前一任雇主取消，那他將被驅逐出境。這套制度設計之初是針對農工，但最後被推廣到所有的工作類別上都適用。另外針對占境內移工之半數的波蘭工人，政府還設制了授權識別證（*Legitimationszwang*），以便更嚴格的管控他們。

結果，我們看到在德國形成了一股移動快速，但同時為居留權及工作證所控制的外來勞動力。德國估計境內的短期移工的數目超過 100 萬人；在 1890 與 1910 年間，居住在德國的外國人從原本 43 萬人增為三倍的 126 萬人，其中約有 20 萬人是在德國出生，儘管這個數字仍少於世紀之交時移出德國的 350 萬人，但仍是十分值得注意的數目，而且這還未包括那些令政府頭痛的非法移民在內，他們往往定居在德國成為永久居民。

社會哲學家傅柯（*Michel Foucault*）在《*規訓與懲罰*》（*Discipline and Punish*）裡提到，現代國家的權力有一部分，是透過指認出當代社會的少數或偏差者而發展出來的，例如對犯人與精神病患的點算與分類。類似的處置也同樣可以在對待移民的事務上看到，雖然德國政府對移民的控制並不是為了將這些少數族裔者整合入德國社會裡，當然也不鼓勵這麼做。而將政府與社會完全切割開來的做法，也在「西部的波蘭化」的論述裡表露無遺（*Knocke, 1911; Benz, 1985*）。在這裡我們所看到的，恰可與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對移民的觀感遙相共鳴。

在政府機構的眼中，住在被德國所兼併領土上的族裔波蘭

客人？外人？

人（ethnic Poles）與住在被俄國、奧國兼吞併領土上的外國波蘭人（foreign Poles）是不同的。德國政府僅允許外國波蘭人持有短期移工的身分，而不准他們在此定居；他們在每年的12月20日前必須離開德國，直到次年2月1日後才可以返回，而且他們只准前往東部的省分而已。政府把波蘭人視為是永難同化的外人，認為他們想重建波蘭這個國家，因此他們出現對德國東方的邊境而言是個威脅。即使這個波蘭人是來自德國所統治的領土，也無法改變政府不願接納、拒絕整合他們的態度。政府對在西部省分工作的族裔波蘭人的文化活動，採取鎮壓或管制的方式；他們的報章雜誌或組織活動都受到監視與審查，其民族的象徵符號也不允許出現（Crew, 1979）。這些措施確保了即使是永久居民，也無法將自己文化的歷史與當前的生活環境相互連結；文化被迫噤聲，同時伴隨著難以被同化抹去的異地記憶。這些觀點都反映了政府的信念，認為「外來的特性」（foreignness）是難以移除的，這股信念自然也推導出僅把外來工人與德國的關係當成短期的想法。

59 但是，因為對波蘭人的政策在德國有關國族與公民權的政治裡占有核心地位，因此上述的態度並無法直接機械化地轉譯為具體的行動；不管是政府控制與社會整合間切割的作法，還是想像從前一樣，在波蘭人待在德國期間壓制他們的生機，然而日後都將證明這些舉措會造成重大的創傷。波蘭人民雖然四處遷移，但他們擁有強烈的民族情感以及自己的領袖。政府一開始試圖想讓波蘭人能效忠德國，然而眼見到這項計畫失敗也導致了1885年的大規模驅逐行動。本來主要是針對移民當中的國族主義煽動者，但後來這項政策卻變成不論是外國波蘭人或是東歐猶太人，一律都加以驅逐。在1885到1887年間就

有超過三萬名擁有俄國或奧國公民身分（citizenship）的猶太人及波蘭人被逐出（Neubach, 1967）。

接下來，政府試圖透過一項新的定居法來誘使德國人遷居東邊靠近邊界的地區，藉此取代當地的波蘭人，這場內部殖民的計畫在1886年開始執行，使得二萬名德國人移居至此，若包含其整個家庭的話則有12萬人。然而這項計畫並未成功，波蘭社群本身擁有十分強大的宣揚文化與國族主義的組織，此時這些組織便成為反對這項殖民計畫的施力點。除此之外，德國的西部邊界仍持續具有吸引力，使得德國人離開東部邊界地區的要比進入這裡的多。計畫的失敗使政府採用更加嚴格的措施，在1904年時頒布一項新法令，要求所有新居民都得獲得當地行政機關的許可；雖然在1898年頒定的法令裡已有行政官員以推動德國人的認同（Deutschentum）為己任，但在1904年的新法裡，更是大刺刺地歧視在此定居的波蘭人。1908年頒定的徵收法，允許在西普魯士及波茲蘭用徵收土地來做為強化德國人認同的手段，但此法引起國內外群起憤慨，也使得它僅被使用過一次而已。

農業與工業在經濟上的需求，也使得德國境內政府想管制的努力打了折扣。例如，在1885年施行驅逐後，政府開始禁止波蘭人再移入德國，但因為海外移民與向西部地區遷移不斷進行，使得勞動力持續短缺且有更嚴重的傾向。甜菜的栽種日益增加，而做為一個比穀物更勞動密集的作物，甜菜的耕種需要更多的工人參與，於是農業利益讓政府再度向波蘭勞動遷移敞開大門。

在俾斯麥政權崩潰後的1890年政府承諾了一項妥協，將奧地利與俄國的波蘭人再度授予許可，但仍施以嚴格的管制以

客人？外人？

避免他們成爲永久居留者：波蘭人受到限制而只能在邊境地區從事農業工作，其中未婚者必須每年冬天時返回母國（Herbert, 1986），即使面對這麼嚴峻的環境，德國仍對波蘭移民有很強烈的排斥，儘管如此，季節性移民依舊持續增加。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普魯士的情況也能讓我們看出，政府與經濟力量間互動的結果。外國工人裡就有大約四分之三到五分之四集中在普魯士，這本身就是一個可以用來說明遷移也有模式的有趣例證。在20世紀初期位在普魯士的外國工人裡，就有40%是受僱於農業，在這些人中又有三分之二是波蘭人；在1913年時，受僱在普魯士從事農業的波蘭季節性移工就有大約24萬人（Bade, 1980）。在工業、採礦業或其他產業裡，波蘭人則只占移工數目的5%到10%。事實上，在德國的外國工人裡只有大約三分之一是波蘭人，但因爲大部分的波蘭人只在某些季節來到德國，因此占居住在此的外國工人的比例又要更小。然而，關於移民議題的公共討論與爭辯卻始終環繞在「外來波蘭人」（the alien Pole）的想像當中；更廣泛地說，是環繞在來自東方的斯拉夫人及猶太人大規模入侵的想像當中。

然而，假如我們以爲在1930年代的排外情緒與種族主義只是1880年代與1890年代德國的反映而已，那將大錯特錯。不管是政府還是國家面對所有外國人，像瑞典人與義大利人的反應，都與對波蘭人的反應如出一轍；事實上，假使不是德東波蘭問題的觸發，在德意志帝國裡的移民現象將只是一個隱而未見、大眾鮮少關注的議題。此外，1880年代與1890年代的「政府」並不是單一的政體，不同的德意志邦國有著十分歧異的歸化（naturalization）政策；因此普魯士可以不受約束地制

定一個限制重重的政策，而它也的確這麼去做，巴伐利亞與薩克森也同樣如此，一般咸認這二個德意志邦國面對來自東方移民的威脅最大。而就在1885年初的普魯士，俾斯麥最終嚴禁俄籍人（幾乎都是波蘭人與猶太人）的歸化，在稍後則更進一步執行1885年的大規模驅逐行動。

除此之外，來自東方侵入的威脅也促使德國社會中特定的機構採取抵抗的態度，雖然這抵抗的態度有些自相矛盾。例如在工會裡便分裂成二派，一派抱持著國際主義式的政治態度，另一派則注重勞工大眾當前的利益。在德國的工人工會曾試圖組織這些移工，但卻無法成功為他們爭取到平等的權利與利益。同時，這些願意領低薪、增加工時的外國工人也成為眾矢之的，抗爭、批評與污名都針對他們：這些外國人似乎無庸置疑地就是「罷工運動的破壞者」、「導致減薪的原兇」等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到來終止了這一連串的分裂、爭議與矛盾情結。社會與政府如今都希望強迫這群移工留在國內，尤其是那些農業移工，在戰爭結束時他們在德國仍有37.4萬人，假若少了他們，勞動力短缺的危機將雪上加霜。戰俘同樣也被派到農業中工作，在1918年時他們共有約90萬人。

在這波蘭政策的討論裡，我們凸顯了德國在國家（nation）這個特定概念上，其實是根據血統主義（*jus sanguinis*）做為基礎，也就是說這個國家，是基於其成員為同一「血統」而構成，彷彿這個國家之所以形成是因為生物上的繼承關係，而不是共享一個文化。在19世紀時，這樣的信念並非僅見於德國。達爾文（Darwin）在反對拉馬克主義者（Lamarckian）所強調文化與生物適應的觀念下，以《物種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所建立起的觀念也成為血緣原則的理論源頭；林肯

客人？外人？

(Abraham Lincoln) 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也曾多次徵引這觀念，來證成本屬同血統的南方與北方，應共為不可分割的一個國家；親斯拉夫派 (Slavophiles) 也訴諸血統，認為這個神祕的連結緊緊繫住分散在幾個不同國家領土的斯拉夫人。

德國與眾不同的地方在於，它試圖把這個普遍存在的血統主義信念付諸實行於法律上。德國在 1913 年制定出的法律，對公民身分採取嚴格的限定，並體現血統主義下的國族概念，此法允許在國外定居的德國人 (Auslandsdeutsche) 保有公民身分，並傳衍到其子女。在此法通過之前，假使有人定居在國外超過十年的話，將喪失其德國的公民身分，除非他 (她) 按照繁複的程序向領事提出申請。1913 年的法律也駁斥了一些與出生地主義 (jus soli) 相關的合法歸化條例，而出生地主義意指根據人們出生和居住的地點來決定其公民身分。事實上，在新法之前，德國關於公民身分取得與否的法律就一直在舊體制下出生地主義的版本，以及 19 世紀血統主義的版本之間搖擺不定，前者適合用來規範王朝統治下之領土的居住問題，後者則強調一個血緣共同體間經年累月逐漸形成的社會連帶優越，這共同體是因著血脈相通而緊緊焊連在一起，不管皇室之間是如何通婚、定約或互為親族。

62

在這個逐漸形成的民族國家裡，1870 年的法律已經宣告了血統主義的原則，但卻未挑戰原本出生地主義的條例，之所以還能存在是因為這個國家當時的經濟情況；在 1871 年全德國共 4,000 萬人中，有 20 萬的外國人是永久居民。對於將有更多移民湧入這件事，一般人並無預期，但卻在人口統計上可以看到。在 1913 年統計調查中呈現的人口與經濟轉變，讓人們不再允許讓二項原則並存 (Brubaker, 1992)。在 1913 年的新法

裡，不但去除定居取得公民身分，讓血統成爲判斷上最主要的標準，同時增加了兩項收回某些德國人公民身分的判準：取得他國國籍者，以及未服兵役者。還有很多的例外與條件，其中一項是針對遷出德國的人，倘若他們所前往的國家，其法律是以出生地主義爲準，則他們仍可以保留原本德國的公民身分。儘管有例，但這二個判準已讓很多德國人無法再持有德國的公民身分。最後，這新法也使遷出德國者以及他們的子女，儘可能更便於重新取得德國的公民身分，這也再一次反映出國家想藉由收納更多的德國人，以打造新德意志的希望。

韋伯也曾以這項新公民身分法爲例，視之爲對現代國家官僚體系理性化的反擊，然而此法也顯示當政府想根據單一原則對公民身分立法時，其權力是有侷限的。出生地主義的原則無法輕易地被拋棄。德國社會民主黨人也多次建議讓歸化制度走向自由化，以便某些人可適用出生地主義，像是出生或成長在德國的人們，他們之中有不少人是第二代波蘭人。當社會民主黨人被指控爲想透過出生地主義來污染國族時，他們就拿在其他主要國家的法律裡，都看得到出生地主義的影子來反駁，最常被提到的例子就是法國。

但是，訴求於當時其他國家法律情形的作法是與德國特定的記憶背道而馳的。德意志人與斯拉夫人間的族群界線對德國政府在理解國族上十分重要，而這界線的決定，受到了在高中世紀時期（high Middle Ages，譯註：約在西元 1050 至 1400 年）以及在 16 世紀以後，都有德意志人向東遷移所影響。這幾場向東的遷移也使得在東歐與俄羅斯等地，都可發現在那裡定居的德意志人的身影（Hagen, 1980）。他們一定程度上已被同化，但其認同仍然是德意志人，並在異地維持自己的語言與儀

客人？外人？

式；甚至因為身處異地，尤其是俄羅斯與波蘭，反而使他們更努力發揚自身的文化。基於血統原則的法律似乎為這片四散各地的文化網絡賦予意義，然而文化歷史卻在這過程裡被倒置為生物學，藉著此來理性化國家的作法，使國家得以區分出誰是永遠屬於我們的，而誰只是暫時跟我們生活在一起的。

法國在處理人群遷移上則朝相反的方向來努力。

法國：愈多愈好，並且讓他們都變成法國人

在法國的傳統裡，普遍的政治價值並不是用血統或血緣來界定誰是我們的一員。在這個國家當中，制度、帝國及地方的整體架構提供了法國人界定國族與公民身分的元素。早在舊體制下就已強調國族是在政治層面上構築的，不是基於血緣形成。一個共享的文化也提供了經驗，據此可以將人們打造與同化為同一國族。

同化的達成有賴於中央政府，藉由深入領土各地的學校、公共行政體系、軍隊以及相互聯絡的基礎設施，而逐步地達成。想說明同化主義者如何把對國族的理解給制度化，一個最顯而易見的例子，就是 19 世紀末的對內傳播文明的使命（Mission Civilisatrice）這個計畫，它是由第三共和底下的學校老師組成的軍隊所推行（Weber, 1983）。在法國的右派以及自由主義者都分享著這種傳播文明的使命感，這包括了對國族榮耀的關切，並在很多時候將它擴展到更大的帝國疆土上，不論是在海外或是在歐洲境內。事實上，這些同化主義的政策跟法國內部的地區文化一樣，常常都帶著類似殖民者的心態（Weber, 1983）。

這個藉由共享的文化來同化的計畫，在許多領域裡推行著，包括內部、地方差異以及移民問題上。這也讓人聯想到法國在帝國擴張上那種獨特的模式：法國身負著文明教化與解放的使命，其制度化的程度要遠遠勝過英國與德國，後二者僅在大城市與海外領土上施以法律及政治上的同化。在1880年代，伴隨著基礎教育及軍隊徵召制度的改革，內部的同化政策也一併推行，這也替法國的公民身分法，製造更朝向同化主義方向改革的氛圍，而這套法令裡的主要條例仍沿用至今。雖然歷經各種排外情緒的階段，包括了在19世紀末的反閃主義（anti-Semitism），法國仍然認為國族在本質上仍是種政治概念，因此國族是超越種族與語言的問題的。¹

有一種分析（請參考Brubaker的著作）認為出生地原則的引進並非如一般所說的，是工具性考量下的選擇；也就是說，其目的是想增加人口成長以及可供徵召入伍的人數。在這些改革背後，有更鉅觀的政治的與意識形態的因素在作用著。Brubaker認為在1851年歸化條例之所以走向自由化，絕不是為了回應人口及軍事上的需求，因為這二項問題在當時都還未被提出。

但是，移民對法國經濟留下的經驗的確也助這項政治文化一臂之力。做為一個移民接收國，法國揭示了十分有趣並深具意義的模式。在19世紀與大半的20世紀期間，法國一直是歐

1. 法國在1889年6月26日制定的法律裡擴大了對國籍的定義，當中主要的條文仍沿用至今。此法授予出生在法國土地上的人們法國國籍；移民的子女若出生於法國也能成為法國人。此法也讓歸化更加容易，將原本五年的等待時間縮短為三年。假如移民願意向法國進行一年額外的服務，像是服兵役，或是引進工業、帶著出色的能力來到法國的，也都可以獲得法國國籍。

客人？外人？

洲主要的移民接收國，其移民政策的走向與實行深受一項更廣泛的政治認知所影響，而絕不僅是因為國家擔憂人口成長的停滯，以及可被徵召兵役的年輕人不足。這個理性的、國家為中心的、同化主義觀點的國族概念，雖然在舊體制下就已有上述的種種元素，但直到法國大革命時才被具體執行推動出來。這也導致了對住在法國的外國人，採取接納的立場，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國的確與德國大不相同。

在19至20世紀間，法國移民問題上最主要的話題是法國逐漸下滑的人口出生率。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60年間，相較於歐洲其他國家的人口快速成長，法國人口卻遲滯不前（Dyer, 1978; van de Walle, 1974）。普遍認為至少有以下二個因素，使得近代法國歷史上對移入的重視更勝於移出（Fohlen, 1985: 11）。第一個因素是，因為19世紀間歇性的農業危機所產生離開鄉村的壓力，而這股壓力也被法國城市的成長以及隨之而來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所平衡。在第二帝國時期成長最多的就是巴黎，然而當時許多地區的鄉村工業與習俗都使人們仍附著在鄉間。法國缺乏像在愛爾蘭於世紀中葉，或義大利與德國東北部在1870年代之後所產生的那種離鄉壓力。

65

但是，雖然法國移出的程度明顯較歐洲其他各國小，但仍仍然存在。根據Fouche（1985）的說法，整個19世紀中能使法國發生移出的潛在力量仍是相當可觀的：法國鄉村經濟間歇發生的危機，例如在飢荒的推動下，甚至有可能達到大規模的程度，但卻從未發生——再一次我們看到了遷移被模式化的程度有多大。事實上，人口移出的區域並不是那些靠近有助於遷出的大港口地區，而是在內部發生危機的地區。

雖然數字並非完完全全可靠無虞，但仍告訴我們住在法國

本土之外或殖民地上的法國人口，從1861年的31萬提升到1911年的60萬人。在1880年代及第一次世界大戰前10年，移出的人數也有增加（Chevalier, 1958）：在1881到1886年間有42.6萬人；在1901年時有49.5萬人；到了1911年時則有60萬人，這跟德國在世紀之交時的350萬人比較起來可算是小巫見大巫。法國移出人口裡有40%到45%是在19世紀大半時候，即在1890年前往海外遷移的，而有20%是前往法屬殖民地，剩下的是前往歐洲其他國家。在1890年後，海外移民的比例下滑，同時移往法屬殖民地的也在30%到10%之間來回擺動，而在歐洲境內的遷移則穩定地向上成長。在1901到1910年期間，法國移往其他歐洲國家的比例已達到所有移出者的54%。

在他對遷移詳盡的歷史分析以及其他關於1816到1889年間的記錄裡，Fouche（1985b）發現移出法國者的典型是為：較可能前往南美洲各國和加勒比海地區，而不是北美洲；是來自法國西南部鄉間的年輕男性，但曾居住在波爾多且從事商業活動、航海或港口工作。再一次，我們看到了遷移的模式浮現出來。Rougie（1985）也在處理1865到1920年間的記錄時發現，有更多人是以拉丁美洲而不是北美洲為目的地。Guey（1980）則認為在1830年代從阿爾卑斯山間貧窮且孤立的巴塞隆納特谷地（Barcelonette Valley）往墨西哥去的移民，可視為一種連鎖遷移。

在19世紀末，倡議多多生育的態度是與更廣泛的殖民地計畫有關，後者認為把法國人移居到殖民地將讓法國下一代子孫享有更多的土地與機會。但在1850到1925年期間僅有五分之一移出法國者真的前往法屬殖民地，這個比例相較於英國

客人？外人？

與荷蘭要小的多。

北美洲的殖民化行動在1848年後才開啓。遷出在法國政府也有系統地安排遷移的情況；根據法令，從巴黎遷往阿爾及利亞三個省所新設立的42個農業殖民區，其固定配額為1.2萬名（Katan, 1985）。雖然後來很多巴黎人都返鄉，但從法國南部遷出的情況卻因為農業與商業上的危機，以及著眼於政府的鼓勵而持續增加。第三章已經提到，在葡萄根瘤蚜蟲病的危機下，使阿爾及利亞發展成葡萄生產的新據點。在1875到1890年間葡萄根瘤蚜蟲病肆虐地中海平原之際，遷往北美洲的移民潮也是最興盛的。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口數從1851年的66,050人，1872年的129,601人，1881年的233,937人，到1891年的271,101人（Chevalier, 1947: 167）。到了1880年代，移往拉丁美洲的情況已衰退，朝向北美洲殖民地的遷移則成長了，雖然就程度上而言，仍不及法國移往其他歐洲國家，尤其是比利時、瑞士與西班牙。

但是原則上，法國仍算是個移民接收國。網絡式的遷入在這個時期的人口成長上扮演著重要角色，估計在1851到1886年間的人口成長有三分之一要歸因於此，從1886到1891年間則更占了人口成長的80%（Rebut, 1974）。據人口普查的數字指出，外來人口從1800年的10萬人上升到1857年的38萬人，到了1881年超過了100萬人，在1911年時有120萬人，在1931年時達到了270萬人。

跟其他國家一樣的是，法國移民人口的來源變得更加複雜，雖然法國一直在國籍的數目上設限，但仍有少數情況下有例外。根據19世紀最後一次人口普查，在1896年時最大的移民來源仍是義大利與比利時，接下來的是德國、西班牙與瑞

士，數字上都與前二名差很多。義大利做為最主要的來源國，在1896年時有29.2萬人，到1911年時有14.9萬人。其他較具規模的也都是與法蘭西有交界的國家：比利時、瑞士、德國、西班牙及英國。而他們多半定居在邊界省分裡，除了巴黎地區外，在1907年時有153,600名外國人集中於此，是法蘭西境內外國人次多的地區（Didion, 1911）。

定居的地點也形塑了移民勞動力受僱的特徵，反之亦然。因此，在南部的農業中，我們可以看到義大利與西班牙人，而在北部與東部的工業中可以看到比利時、德國與義大利人。移民大量集中在工業領域中，1891年時有50%的移民受僱於工業，到了1911年時則有43%，而在這二個時期受僱於工業的法國人占其整體的比例，分別是26%與30%。另一方面，在這兩個時期皆有約45%的法國人從事農業生產，相較於此，則分別有19%及12%的外國工人從事農業（Mauco, 1932: 48）。

在1889年時自由化的走向之所以遭受挫敗，因為法蘭西人民不滿於多半在此定居已久的外國人，竟得以免除兵役的情況。在1870年代徵兵的比例上升時，這股憤怒也隨之升高，特別是在1880年代，當共和國飭令人民無例外地皆服兵役後。更廣泛地來探究其脈絡，是一般人尊敬地將軍隊視為是法蘭西榮耀的體現與工具，以及用同化主義及國家中心的觀點來理解國族概念，而這個概念也會將移民歸化為法蘭西的人民。

法國的輿論分裂為二方，有人視移民是經濟上所不可或缺，且認為他們是可以變成法國人的；另一派人則認為移民將對法國的文化、經濟與社會造成威脅，今日我們也常在大多數的移民接收國裡聽到後者的論調（Wihtol de Wenden, 1988; Green, 1985）。種族主義在這個時代也並未缺席，在1883年到

客人？外人？

68

1914年間有大約50個與移民相關的法律提案，其提出的目的在向他們或其雇主課稅，或是要限制他們進入。他們被視為法國工人的競爭者、貧窮的人或是罪犯。在1899年曾通過一條法律，限制外國工人在公共建設計畫裡被僱用的比例。但是，這50個法律提案幾乎全數被駁回。在實際運作上，工業生產的利益仍占上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被默許的作法，是鼓勵遷入，更常見的是積極地去招募移工。

我們清楚地看到，移工之所以存在，並不只爲了人口統計上的目的而已，他們被招募到通常是不受歡迎領域，日復一日地從事困難與倍受鄙視的工作。Longwy的故事就是很好的例證（Noiriel, 1984）。在1905年時東部鑄鐵委員會（Comité des Forges de l'Est）開始招募來自義大利及稍後來自波蘭的工人，來到Longwy從事採礦與製鋼工作。Noiriel發現在1880年代時，這股工人遷移潮就已經存在。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這個地區已成爲全法國最大的移工集中地，從很多方面來看，這裡都是移民的邊緣地區，用Noiriel的話來說就是「遠西」（far west），在這裡男人遠多於女人，還有高死亡率、嚴重的疾病問題，同時居住條件與生活機能上都非常的差。這些情況中也有不少是明顯存在於歐洲許多的採礦城鎮裡。

發生在1889年的一個事件凸顯出了當時面對移民議題時的立場。在1889年期間，世界博覽會在巴黎舉辦，同時齊聚了新舊世界的代表，召開一場討論「政府如何介入移出與移入問題的國際會議」（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with regard to Emigration and Immigration），會中密集地討論了許多議題，像是移出與移入各自帶來了什麼收益與代價、政府應該做什麼、遷移如何被管制等等。然而最終，代

表們回到了這樣的共識，即認為自由市場是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的最佳協調者，因此應採行自由放任的政策。

義大利：他們在農田與礦坑裡工作， 也為歐洲其他國家修築鐵路

義大利人在1876到1976年這個移出的世紀裡，主要的目的地是歐洲（Rosoli, 1978; Sori, 1979）。有近1,260萬義大利人前往歐洲其他國家，比起往海外遷移的人數要多出100萬人。雖然以國家為單位，擁有570萬人的美國是最大的接收國，國土規模較小的法國落後這個數目不多，仍有410萬人，瑞士則接收了400萬人，德國有240萬人，而奧地利也有近120萬人。在海外接收國裡，阿根廷是僅次於美國的，有297萬人，而巴西有146萬人；澳洲接收了42.8萬人，加拿大有65萬人，其餘的國家則接收了數量較少的移民。若把歐洲與海外的國家全算在內，一共接收了義大利超過2,000萬的移民。

69

義大利的向外移民，只有在世紀之交時是呈現出大部分都前往海外的情況。但在1861年義大利統一之後，以及在1920年美國關閉移民大門之後的時期，義大利的移民大多都以歐洲國家為目的地。

若從不同遷移潮的來源來看，都可以發現清晰的模式。往法國與瑞士的季節性與短期遷移，在義大利北部有著悠久的傳統，而當進入了大規模移出的階段時，這股遷往歐洲的人潮仍大多來自義大利北部。南部的移民大多是以海外為目的地，而一旦建立起模式後，它又會自我再製：連鎖遷移意味著已經到了海外的南義人會帶他們的親族也到海外來，而北義人則帶親

客人？外人？

族往歐洲其他國家去。但是，這些遷移潮的塑造也取決於某些不期然的因素。南北之間發展的顯著不同也加劇了移民模式之間的差異，在北部的皮埃蒙、利古里亞及倫巴底都發展成義大利最先進的地區。再者，像旅費這種現實問題，也在遷移過程的一開始，很自然地產生影響：一般來說，從義大利南部要到紐約去，要比去德國北部的花費便宜。不同國家間的招募模式也可能在很早就導致不同的遷移模式，並且會持續複製。在1920年後到今日為止，歐洲做為義大利移民的目的地，逐漸地變得愈來愈普遍。

70 在義大利盛行移出的這個世紀裡，工業與國家也逐漸發展，但卻有顯著不均的現象。工業成長與人口外移之所以能並存，一個重要的因素是工業化帶來農業的重整以及農夫被無產階級化；同時製造業裡的工廠體系也讓經濟組織遭逢鉅大轉變，許多人都被迫離開鄉村的工坊工業。義大利在這一點上，與其北方的歐洲諸國並無不同，但發生的時間卻有差異。和德國東北部移出現象的例子一樣，1880年的農業危機也有助義大利移出現象的增加。除此之外，原先在保護主義下，南部工業的發展不僅停滯不前，也在日後自由貿易政策的實行下受到傷害。再者，在毋需太多貨幣的農民經濟下要償還貨幣債務也迫使人們去尋找薪資勞動。最後，國際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請參考Rosoli, 1985）也是開啓並再製這些勞動遷移潮的重要因素：想尋找有彈性、廉價的勞動供給，特別是當面對工會主義盛行的情況下，工廠都十分樂意見到承包商與職業仲介能推動遷移的形成，引進移工。

在1876到1915年間，有1,400萬的義大利人離開他們的國家，其中每個10年都較前一個有更高數目的移出潮，到了

1906到1915年這10年裡以近600萬達到最高峰。這40年裡的移出，歐洲接收了44%，其他則到了海外。在歐洲主要的目的地是法國，有約818萬人；奧匈帝國有640,400人；德國有約35,400人；瑞士有32.7萬人，他們大多來自北義地區。移出率在主要人口移出區是非常的高：在Veneto於1880到1891年間達到每1,000人裡有40個人移出的比例。移出的幾乎以男性為主；在最初幾年，女性只占17%，到了本世紀末則有25%。大約有40%的移出者是農工。

義大利的移出是在1901到1915年間達到巔峰，這現象不但導致了不穩定的情勢，甚至摧毀了社會與經濟的結構（Rosoli, 1985: 101-2）。在這15年裡，有大約880萬義大利人移出，當中有約20%是女性，而農工占的比例則從35%持續下降到26%。這個時期也是義大利乃至整個歐洲無產階級化日益嚴重的階段。有500萬人前往美洲，其中多數是到了美國；在歐洲則以瑞士、法國、德國、奧地利為主要目的地。義大利主要的人口移出地區就是西西里，在這15年裡就有超過110萬的人移出，並在1913年時達到每1,000名居民裡就有40個人移出的比例。以今天畏懼大規模移民的心態來看，值得注意的是離開西西里的「大規模遷出」在這個不大的區域中達到了人口的4%。

關於移民回流的現象，我們擁有的資料十分有限，時間上只涵蓋了1905年以後，並且只有海外移民的這部分。根據這些資料，從1905到1915年間，大約有200萬義大利人返回故鄉，其中有120萬是從美國回來的，因此大多都是回到南部。而從歐洲國家返回的移民資料是從1921年後才開始記錄。

在19世紀末，義大利人是法國最大的移民團體（Bezza,

客人？外人？

1983; Wlocevski, 1934)，其數目在1851年是63,300人，占所有住在法國的外國人的六分之一，在1886年時上升到264,600，占所有外國人的四分之一，到了世紀末已有超過414,200人，占所有外國人的四分之一強。1906年的人口普查發現，在農業與林業的外國工人裡，有40%是義大利人，在製造業有40%，在運輸業有三分之二，在商業中則有三分之一。在一些種類的工業裡，義大利人不單是在外國工人中，也在全法國的工人裡占有顯著的比例；他們占有所有化學工人的8%，採石工人的7%，但這些數字仍低估了義大利工人的普遍存在，因為就像前幾章所說的，調查已排除了很多季節性工人（請參考Rosoli, 1985）。

這裡頭也存在著女人與未成年者：在里昂的義大利社群裡包含了絕大多數的女人與小孩（Bonnett, 1977）。絲織業僱用了許多義大利女人，而玻璃製造業也僱用了多達4,000名的義大利童工，這些工作是法國禁止自己的未成年者從事的。義大利的小孩是在義大利接洽好後，徒步走到法國；後來則改採乘船的方式，從那不勒斯被運往馬賽（Cafiero, 1901; Schiaparelli, 1901）。馬賽成爲義大利人最龐大的聚集地，在這裡僱用了許多義大利人，從事辛苦且低薪的港口工作；在馬賽2,400名漁民中大多是義大利人。此外，他們也從事製鹽、生產肥皂以及建設公路的工作。

一般而言，工廠或職業仲介業者都是直接到義大利與當地人接觸。在法國，義大利人從事的都是最辛苦的工作，卻住在惡劣的環境裡，所領的錢也比法國人少，也常被認爲比法國工人要順從的多。他們在礦業、製造業與鐵公路的發展上，扮演舉足輕重的勞動力供給角色，但法國工人與工會人士對待他們

的態度並不友善，儘管彼此之間也合作了好幾次（Milza, 1977; Bezza, 1983）。然而，也發生了好幾次意外的暴力事件，例如在1983年時，法國工人曾野蠻地攻擊在Aigues Mortes的義大利製鹽工人，結果造成了50人死亡，150人受重傷（Vertone, 1977）。

德國境內的義大利人之所以在1860年後日益增加，是因為1860年代的Brenner鐵路以及St. Gothard鐵路的修築帶來大量的工人（Jacini, 1915; Knoke, 1911; 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1903）。在每年12月間許多季節性工人返鄉時進行的人口調查，無法讓我們明確知道義大利的移民究竟有多少。據估計，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這段期間，夏季時約有17.5萬名義大利人。除了修築鐵路外，義大利人集中的產業還包括了製造業、採礦業與營造業。在1860年時，就已有幾百位義大利人在西發利亞的礦坑中工作，在德國南部的黃銅工人、編椅匠及流動小販裡也有從義大利北部來的，也有販售大理石與石膏像的商人是從盧卡來的；義大利人也在巴伐利亞、Württemberg及萊因法耳茲（Rhine-Palatinate）當地的製磚廠工作（Rosoli, 1985: 109）。在1906年的人口調查中發現，製造業裡的外國工人，義大利人幾乎占了半數，也是製造業裡第三大的移民團體。與義大利到法國的移民不同的是，在德國的義大利人並未定居下來，也不從事農業工作。

在德國的義大利工人同樣領著低薪來從事辛苦的工作。例如，在巴伐利亞的製磚工廠裡，義大利人每天不間斷地持續工作11到12個小時，比起當地工人要長的許多；包括女人與小孩在內的工人，常常要清理熔爐，在裡頭塞滿原料或取出成品，並推著沉重的推車，還得在夜間工作。絲織、棉織及黃麻

客人？外人？

織造業也會僱用女人與小孩。

義大利人是被德國的承包商及工廠所招募前來；他們常常花上好幾天的時間搭乘特定的火車，主要前往的目的地是西部，因為在那裡有歐洲最大的鐵礦與煤礦正被開採著，包括在魯爾、洛林以及薩爾盆地。

對義大利人的偏見似乎一直那麼強烈，而且他們也融不入德國社會。義大利人從事低薪的工作，鮮少有晉升的機會。嚴重的疾病，極度威脅健康的工作環境，每天16個小時的工作時數，過度擁擠和不衛生的生活條件，以上都是義大利移工在德國工作經驗的特徵。德國工人與工會並不樂見義大利人接受低薪，並且工會人士與工人們都認為他們既軟弱又無效率。儘管如此，德國當地的工會仍盡最大的努力來組織義大利人，德意志總工會（Central Federation of Trade Unions of Germany）就在19世紀時發行了一份義大利文報紙*L'Operaio Italiano*。工會代表也希望在冬季時在義大利境內組織他們。

73

義大利人已在瑞士工作幾十年後，才在1870年代因為St. Gothard隧道的修築，開啓了較大規模的義大利工人遷移（Amman, 1917; de Michelis, 1903; Bezza, 1983）。在1880年時有41,500人，而到了本世紀末則有9.5萬人。1910年的人口調查計有50萬待在瑞士的外國人，占全國人口的15%，而在某些省裡甚至高達30%至40%。德國人與義大利人的人數相去不遠，兩者加起來占外國人口裡的五分之四，義大利人占瑞士總人口裡的6%，這個數字是在歐洲國家中最高的，並且還未將義大利可觀的季節性工人計算在內。

在瑞士的義大利人從事的工作是最危險與最辛苦的，對道路、鐵路與隧道的修築來說，他們是很重要的：他們的工作地

點是 Mont Cenis (1857-1871)、St. Gothard，還有 Rigi、Pilatus 與 Albula 等地的阿爾卑斯山區的鐵路，包括 1914 年開築的 Brig-Furka-Disentis 鐵路、Simplon 隧道以及稍後的 Loetschberg 鐵路。在 1914 年時，有三分之一的營造業工人是義大利人。義大利人從事的工作還包括製磚、絲織、棉織、生產巧克力、製鞋、製造煙草等產業。

與其他國家一樣，瑞士工人與工會人士也認為義大利工人侵蝕了他們的努力，並常稱呼義大利工人為工會運動的破壞者 (scabs)；也曾爆發暴力衝突，像 1896 年 7 月在蘇黎士就有瑞士工人攻擊義大利人。在這裡也有一些義大利移工的工會，像是義大利製磚工會 (Federazione Muraria Italiana)，義大利人也成立了一些互助性的社團。一般來說，瑞士並不積極將這些義大利人整合進入當地社會，在這裡也存在著不少公開的輕視；而且在惡劣工作與居住環境下，義大利人常患疾病，健康情況不佳。

結論

這些國家各自都代表一條複雜的軌道，因此無法用簡單的摘要來正確無誤地掌握它。我只想在這裡抽絲剝繭出一些元素，以凸顯出本書所關心的一些特定議題，也就是出現在當前移民爭論中的議題。

74

德國的例子凸顯了一個事實，即一個相對而言數目不多的移民仍能占據大眾的想像，而將他們視為是威脅民族與國家完整的代表。在德國獨特的處境下，威脅的再現是具體鑲嵌在對波蘭人的政策裡。波蘭移工雖然未占外國工人的多數，但卻屢

客人？外人？

屢成爲爭論所在，在1800年代至1900年代早期成爲德國擔憂、恐懼的對象，以及移民政策管制的目標。我們看到了某個特定移工團體，如何成爲龐大國家計畫下權力競奪與自我再現的場域，我認爲這種情況也可以在當前一些歐洲國家以及美國中找到共鳴。

法國的例子則告訴我們，即使是一個國家急於藉由移民來增加人口、獲取兵源，對於移民的態度往往仍是曖昧不明的。移民的薪資較低，待遇較差，也常爲人厭惡；這將令我們深思，畢竟法國的共和理想是讓每個住在其領土上的人們都享有公民身分，並有完善的法律來保障人權。但是，禁止孩童從事某些工作與產業的法國，卻準許這些產業去招募義大利童工。今天，我們再一次看到國家決心要尊重與強化法律的規範，但同時卻容許許多侵犯移民人權與公民權利的行爲，包括增加管控措施以管理移民。

義大利的例子告訴我們，再現的力量是如何在忽略事實爲何的情況下運作的。義大利從1876到1976年的這個移出世紀常被認爲與新大陸聯想在一起，但事實上大多數的義大利移民是前往歐洲的國家。他們在歐洲各地的隧道、公路、鐵路與城市裡工作。再者，我們以爲義大利移民現象都是出於貧窮而無選擇的遷移潮，但事實上絕大多數有模式可循，同時只有這個國家裡的特定地區才會產生大量移民。絕大多數的移民可歸類爲二種模式，一種是來自北部特定地區，前往歐洲其他國家的，另一種是來自南部特定地區，前往新大陸的。

75

以上每個國家的例子，各自都捕捉到挑戰今日移民政策制定上的議題。

第五章 國家與外國人

另一段歷史在 1880 年代開始成形，並不時與遷移歷史交錯，甚至成爲它的一部分：大規模難民移動的歷史。從本書關注的焦點來看，值得一提的是二種情勢在這個時期的結合：第一種是西歐國家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就相對程度而言，較少介入到管制或控制難民潮的事務上；第二種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大部分發生在歐洲東部大規模難民潮，在形塑西歐國家之間的關係上，幾乎未產生任何衝擊。

77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現代歐洲國家強化了對自己邊界的管控功能，以及對自己領土的主權控制能力；突然間要檢查護照了。在第一世界大戰後可以很明顯地看到關於難民與移民上的激烈轉變。我們可以看到當代關於移民與難民控制的爭議，是爲了回應一段相當近期的歐洲歷史，這段歷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算起的。

在 1880 年代早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間，發生過好幾次大規模的難民潮。大約有 250 萬名猶太人離開東歐，19 世紀晚期與 20 世紀初期因爲鄂圖曼帝國的逐漸崩解，以及隨之而來的民族主義者間無情的戰爭，也產生出數十萬的難民來。我們

在此尤其關注的是這個時期發生在巴爾幹半島上的事件，向我們清晰無疑地揭示了一個對於「外國人」(foreigner) 或「外人」(outsider) 這個概念的嶄新意義如何出現，而這個新意義與幾個世紀以來普遍存在於西歐的認知是大相逕庭的，雖然這個認知到了19世紀中開始面臨改變。族群(ethnicity) 轉變成了渴求保持獨立地位及民族統一的新國家，為求結盟而去動員的標記。

在東歐與俄國猶太人移出的例子裡，歐洲各國基本上毋需調整它們的移民政策，因為還有美國在那裡等著接受這股龐大的人潮。巴爾幹半島諸國的難民潮也不會重新定義19世紀的難民概念。

但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國際體系形成，龐大的難民潮使國家在人口流動上的角色產生變化，也為「外國人」概念帶來改變。這將標示出現代意義下的難民「危機」之開始，這也就是我們今天理解這個詞彙的方式。在西歐，國際體系的強化、主權的集中及必然導致的邊界控制；在俄羅斯，共產主義之崛起；美國移民大門的關閉，種種條件匯合之下，都迫使歐洲國家必須面對來自東方的難民這個問題，這些人如今不能再送到前往美國的船上。在國家集權掌控邊界管制的脈絡下，對難民分類與辨識的這件事本身，迫使國家必須彼此共同協調難民的問題。

與尋求在其領土上施行主權的國家相關的民族主義，加上國際組織的力量，使得「外國人」這個詞彙不同於前幾世紀那種寬鬆的指涉，形成了全新的定義。在非民主的政治體制內，當權者施行壓迫是屢見不鮮的；而在許多涵蓋幾個民族或地方區域的帝國裡，異族(alien) 就被當成是外國人的情況下，來

自「外國人」的壓迫也常見。國家主權與國族主義的結合下對邊界要求管控，使得異族就成爲了外國人，國家可以相應地把難民界定爲不屬於自己國族社會的、不具享有公民權利的人。不像早期難民被認爲和短期居留者或流浪漢一樣，都算是外人，20世紀的難民被認定爲一個獨特的範疇；如今國家擁有權力與制度上的正當性，把難民從公民社會裡排除出去（Arendt, 1958）。

在20世紀第一個25年間的歐洲，很特別的是我們看到了二個情況的結合，不但有大規模難民移動的形成，同時國家也開始介入到辨識難民與管制他們的事務上。過去接收的國家並未積極參與辨識抵達國境者是否爲難民的工作，也未介入他們居住情況。但當國家認定要掌控邊界，並控制愈來愈多領土內所發生的事情時，它的角色就有了根本的改變，而難民潮就是這樣的事件。再者，難民潮也開始影響了國與國之間的關係，雖然國際關係本身隨後也製造出一些難民潮來。

79

就是在這樣的脈絡下，西歐國家面臨第一此世界大戰及其殘局所導致的龐大難民。爲了因應這樣的局勢，國際聯盟（League of Nations）設立了一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讓歐洲各國承認這個國際難民危機的存在，因此政府也有義務要對這些難民團體訂下正式的界定。

國家的新角色以及國際體系也有助於延長難民地位的時間，而使這個地位有時可傳於第二代。之所以如此延續下去，有一部分是因爲難民如今被辨識爲一個獨特的範疇；例如在新國家形成與一些舊國家消失的情況下，一個人假使不具任何國籍地位或是無國家歸屬，就將被視爲難民。另外有一部分是因

客人？外人？

爲取得新國籍的手續所耗費的時間太長；還有一部分是因爲有太多人要辦手續。這種種因素累積下來的結果，就是難民營裡收留了大量的人，這是在早期未曾發生過的。

20世紀的難民潮在規模上也迥異於以往。第一次世界大戰與隨後的內戰，孕生了大規模的難民潮，但相較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仍是小巫見大巫，後者據估計導致了600萬的歐洲人被迫遷移（Marrus, 1985），這個數字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及餘波所產生難民數的10倍，這也讓歐洲成爲難民充斥的大陸，只是如今這個稱號已轉到非洲與亞洲身上。

猶太人的西遷

80 在1880年代早期與第一世界大戰之間，250萬猶太人大批地離開了東歐與俄羅斯，這些地方在1870年代時原本有560萬猶太人定居於此，而這場遷移就一些層面來看，稱得上是第一場現代大規模的難民潮。大部分的猶太移民來自沙皇統治下的俄國，特別是波蘭省分，也有極少數是從奧地利的加利西亞及羅馬尼亞來的。¹在1863年後官方的反閃主義逐漸升高，最終在1881年時爆發了第一次一連串的大屠殺——當地居民集體攻擊，通常有警方、軍隊與政府方面的官方代表在後唆使慫恿。導致自此後每年有平均二萬名猶太人遷往美國，而在1905年的革命後到1910年間，則有急速的增加，平均每年有8.2萬

1. 在19世紀到第一次世界大戰間，大多數的東歐猶太人是住在俄羅斯帝國之下。在1870年代，大約有400萬猶太人住在帝國西部的猶太人強制聚居區，也就是所謂的佩利安置區（Pale Settlement）；大約有75萬人住在加利西亞與布科維納（Bukovina）以及哈布斯堡的領地上；大約有70萬人住在匈牙利，和20萬人住在羅馬尼亞。

名猶太人遷往美國。猶太人就大約占去所有俄國前往美國的移民之半。

然而，雖然存在著激烈的反猶情緒，但以重商主義觀點看待人口的想法也浮現。在俄國對移出設下種種限制後，大多數猶太人必須非法離境，即使是在 1891 年廢除其中一些障礙後仍是一樣。Marrus (1985: 28-34) 認為即使對猶太人迫害而造成他們的移出，俄國卻未曾商議計畫要驅逐猶太人。除了迫害外，也有其他因素促使猶太人想要離開這裡，包括在猶太社群裡急速加劇的貧窮情況，以及在迫害情境的約制下難以克服貧窮的窘境。上述所有因素都讓美國行看起來充滿希望，但許多猶太人也會返回自己的母國，只是這個特色並沒有延續到 20 世紀的難民遷移上。近來的研究發現，返鄉的比率在 1880 年代及 1890 年代大約是 15% 到 20% 之間，遠比長久以來認為頂多到 5% 的比例高的多 (Sarna, 1981)。

因此這股猶太遷移潮與稍後 20 世紀的大規模難民潮在返鄉與否的層面上是不同的，後者並未抱著回鄉的希望。在這個意義上，前者仍屬前現代的難民潮。²對 Marrus 來說，這股東歐猶太人的大批遷移仍具有一些大規模難民潮應有的元素，但就僅是一些而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是不存在所謂難民「危機」的，因為歐洲國家基本上並沒有必要去調整自己的移民政策，也沒有必要擔心難民的安置問題，美國又對這股龐大遷移潮敞開大門，而美國似乎也是大多數人嚮往的地方。在這個意

2. Marrus (1985: 32-33) 也認為，來自奧地利加利西亞的猶太移民，主要是被這個地區極度的貧窮所驅動，而不是因為迫害的緣故。從羅馬尼亞來的猶太移民或許是受迫害影響最大的一群，但在當地仍存在著悲慘的貧困現象，生命朝不保夕。

客人？外人？

義上，東歐猶太人的遷移並未重新定義19世紀的難民概念。

81

在歐洲其他地區並未有法律限制猶太人的移動：在哈布斯堡的帝國、法國、比利時、荷蘭、大不列顛境內都是如此。在整個西歐裡，猶太人移出的情況都十分顯著：在巴黎、維也納、阿姆斯特丹；在漢堡與不來梅的靠海地區；在特定的鐵路交會處與邊境城市。在這個世紀末以前，反對猶太移民的聲浪四處可見，包括反閃主義、排外情緒以及偏見。然而德國做為猶太人前往美國的重要轉運地，從未關閉起它與俄國的邊界，同時政府也鼓勵一些猶太人移出，希望留下其他那些擁有資源的。與政府合作的船運公司載送猶太移民赴美，有時政府也會遣返一些回俄國，但大部分仍被送往美國。在1910年時，只有約七萬名東歐猶太人還待在德國。

英國也採取門戶開放的政策，不加控制地允許任何窮困的外籍人士進入；在當時英國是與其他歐洲國家不同的，俄國革命分子與猶太移民都可以自由進入。這項政策在1905年頒定外籍人士法案（Alien Act）後告終，法案針對那些不受歡迎的移民設下限制，並在移民與難民之間做出區別；裡頭所定義的難民是政治運動者或是遭受迫害的革命分子，而不是大批被迫害的貧窮人，因此猶太人不被視為難民。在實際上，新的管理辦法只是間歇地被要求執行，並未讓情況有太大的差異，猶太人仍可以自由進入，而他們也持續移入。

在西方所組成的猶太社團，一方面源於對來自東方猶太同胞的關心，另一方面又因為害怕自己在西方新取得的地位會受到影響，因此組織了各式各樣的救援行動，以促進猶太人的跨洋遷移，幫助猶太人回到俄國，或是讓他們不要想離開俄國。³

巴爾幹諸國與 種族清洗（ethnic cleansing）的早期版本

影響現代難民遷移概念出現的另一重要過程，發生在巴爾幹諸國。巴爾幹諸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幾十年的歷史是非常複雜的，裡頭充斥著許多的行動者以及不滿的情緒，還有國族主義的計畫。在此不可能公正無誤地描寫這段歷史，而且這也不是本書的目的。

82

鄂圖曼帝國在全盛時期曾統治從維也納到地中海地區，東至俄羅斯大草原，但從18世紀開始漸漸喪失了對歐洲境內領土的控制權。不只是俄羅斯人以及哈布斯堡帝國，就連發生在19世紀數不清的民族主義運動也都宣稱這是它們的土地。鄂圖曼帝國境內涵蓋了多種語言、種族與宗教團體，它們各自都享有高度的地方行政自治權，而衰退的帝國結構也讓各團體自治的期望更加強烈，甚至要求獨立。

這些要求獨立的呼聲是立足在特定的「民族」（national）認同之上，在戰爭的情境下，這種「民族」認同很容易以絕對且排他的形式出現，而導向印度總督寇松（Lord Curzon，譯註：生卒年為西元1859至1925年，在1898至1905年為英國駐印度總督，在1919年任英國外相）所謂的「人群的不相容」（the unmixing of people）。這種情況下就很容易產生難民潮，

3. Marrus提到，根據猶太救濟聯盟（Jewish Board of Guardians）的歷史學者說法，這個負責協調倫敦的猶太人慈善團體機構，在1880到1914年間送走了五萬名猶太人回到俄國，但他也提到這些偶爾出現的慈善救援行動並未形成一個以協助難民為目標之組織的網絡，這類組織在後來獲得了鉅大的評價。

客人？外人？

而確實也產生了。有基督徒遷移潮逃離土耳其向北移動，以及穆斯林遷移潮逃向土耳其。在不相容原則大行其道時，也有許許多多更地方層次的難民潮產生。難民試圖找尋一個由具有相同「民族」身分的人統治的地方。打鬥與屠殺等殘暴的行徑使得難民只能絕望地逃離，以尋求一個友善治理他們的避難所。鄂圖曼帝國努力想維持對以往領土的控制，因而產生了許多衝突，導致更多難民的形成。但是，巴爾幹在1912到1913年間及往後的衝突，都是圍繞在民族主義的論述上，巴爾幹內部的對立，再加上哈布斯堡君主與俄羅斯帝國的擔憂，都使難民潮變得更加龐大。這些衝突所帶來的野蠻與殘暴，或許是現代歐洲歷史上前所未見的，雖然土耳其人摧毀亞美尼亞的這件事仍不能被拋諸腦後。這些衝突事件的出現，部分也導因於想將敵人根除殆盡的欲念，而狂熱的民族主義在為自己獨力而奮鬥的同時，也讓難民潮的規模更加龐大。Marrus（1985）描寫了這股民族主義如何無法為這些被鄂圖曼迫害的受害者，創造一個避難所，反而創造了一個想像上「純潔無瑕」之種族的束縛。

83

因為在巴爾幹人們之間的互動與通婚，讓長久以來許多不同的地區被連繫起來，在這種情況下，不相容的原則無法被完全實現，所以基於獨特的種族身分建立起的國族概念，或許注定會不斷導致衝突而無藥可救。似乎唯有在強而有力的至高權威，不管是強盛時期的鄂圖曼帝國或是狄托（Tito）統治下的南斯拉夫這種超越個別國家的政權，而不是各別自主的實體統治之下，才有可能換得這個區域的和平共存。想在排除所有外人或「外國人」的前提下解決問題是天方夜譚，這一點在此是很重要的，同時也向我們揭露了宣稱追求獨立的「民族」認同其神祕本質所在（Sennett, 1993）。

在巴爾幹的難民遷移是國家建構（state-building）過程的一部分，Zolberg（1983）提到「整合的危機」其實是引發現代難民潮的重要因素，特別是在種族成爲國族認同其中之一指標的那些地方。當時的觀察家都認爲巴爾幹諸國間的衝突，是一個特殊的殘暴個案，湯恩比（Toynbee）稱它們是「混亂、不像鄰居的東南歐種族」，他並不是唯一抱持這種觀點的人。Marrus（1985）指出在西歐有很多人把這整個地區視爲野蠻的，並且認爲這裡並不算是歐洲的一部分，無法達到像西歐那樣的國家行爲標準。

在同樣的這種氛圍下，絕望的難民大規模地在這塊區域裡向各個方向來回遷移，卻對當時的西歐政治少有衝擊。西歐仍把大規模難民遷移，不論是來自東歐的猶太人或是巴爾幹的難民，當成某種特定事件，是與西歐國際體系，或更廣泛地說是歐洲體系無關的。第一次與第二次世界大戰正在逼近，將揭發另一些關於國家的本質與大規模難民遷移的真相。

第一次世界大戰與其餘波盪漾

第一次世界大戰象徵著一個時代的開始，即現代歐洲國家及其政治軍事計畫，設置了種種條件因而創造出規模上迄今難以匹敵的大型難民遷移。引發國家能具備「生產」難民能力的機制，就是在這個時代密集的国家建構過程，以及相應的國際體系之重要性與角色，而後者具體化地形成了國際聯盟，前者則導致了大規模逃亡與大規模驅逐。而國際體系的出現也成爲無國家歸屬的人民，也就是難民的識別之所以產生的關鍵，同時加強了難民的管理或控制。

客人？外人？

第一次世界大戰使得國家成了最具威力與組織化的殺戮毀滅機器，歐洲國家共同將7,400萬人送上戰場，其中有1,000到1,300萬人被殺，有2,000萬人受傷，摧毀了城市、工廠、農業，其規模是前所未見的（Best, 1980）。⁴國家的官僚機器已成為毀滅敵人最精良的設備。

這造成的結果有那些？其中一項是戰後10年產生約950萬的難民。這些難民裡有逃離革命動亂與迫害的，也有身在仍根據國族認同在尋求建立自我的脆弱民族國家裡，因為具有錯誤的「民族」或種族身分而被驅逐的。一般而言，這些眾多的難民都是靠自己而生存。每個參與巴黎和約的政府，有時都會引述一些條例，來執行極端的迫害與驅逐。國際聯盟創設了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的部門，指定獲得高度肯定的科學家與探險家南森（Fridtjof Nansen）掌管，而他也成為了支援難民行動的主要推手。但最終，這個時期的難民是「那些被1919年的安置所遺忘的人們，簽定的和約無法令人滿意地處理他們，大國間也認為他們不太重要，甚至完全沒想到他們」（Marrus, 1985: 52-53）。

隨著過去主宰東歐，包括鄂圖曼、羅曼諾夫（Romanov，譯註：1613至1917年間統治俄國的王朝）、哈布斯堡、霍亨索倫（Hohenzollern，譯註：1415至1918年間的普魯士王室，1871至1918年間統治德意志帝國）在內的四大王朝帝國的崩解，讓國家建構的過程在東部是如火如荼在進行（Zolberg,

4. 希臘在歷經10年戰爭後，於1932年首先宣布自土耳其獨立出來。塞爾維亞與摩爾達維亞（Moldavia）隨後效仿。蒙特尼哥羅（Montenegro）、波士尼亞、黑賽哥維那（Herzegovina）也為獨立而奮鬥，過程中俄國與奧地利涉入日深。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土耳其已經喪失除了東部的色雷斯之外，在歐洲的所有領土。

1983)，而大規模難民遷移在戰爭期間與之後也是如此。在戰爭裡充斥的民族主義氣氛讓那些無法被確認忠誠的戰地人民遭受迫害：除了長期以來就被視為是「外國人」的表徵而無法被信任的波蘭人與猶太人之外，德裔人如今也被波及，這三種人都被強制離開東歐大部分的地方以及俄國。除此之外，在巴爾幹諸國裡那些不「屬於」該民族的人也有許多被驅逐。這些逃亡過程中最悲慘的一段故事，就是在同盟國（Central Powers，譯註：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同盟國主要為德國、奧匈帝國、義大利與鄂圖曼帝國，敵人是英、法、俄為主的協約國）軍隊的大屠殺之後，50萬名被戰火與疾病一再蹂躪的塞爾維亞人民與士兵，他們艱苦跋涉到亞得里亞海地區的過程。據估計塞爾維亞人裡有10%被圍捕，送往位在匈牙利或保加利亞的集中營裡，大多被強迫去做工。

85

俄國也必須為很多難民潮的產生負責。當1915年中期俄國軍隊必須撤退時，由於採取焦土政策，使得許多村莊整個被毀壞殆盡並被迫離鄉。德裔人士也秘密地以運貨火車被載往西伯地亞及中亞的方式，大量地遣送（Koch, 1977）。⁵在1915年12月時，俄國境內有270萬的難民（Kulischer, 1948），這個數字持續上升，而沙皇政府卻坐視不管，許多筋疲力盡又極度飢餓的難民抵達城市或村莊後，製造了暴動與衝突。有人估計在1916年初在俄國境內有多達500萬的難民四處遊蕩，雖有貴族

5. Koch提到了這個可怕的經驗：「一整輛裝滿被當成貨物的人的火車被擱置在一旁，因為調度上的先後順序、混亂的情況、交通的管制，或只因為只有收到賄賂才會變勤快的懶散俄羅斯駕駛的粗心大意，而使火車被遺忘了數日。當這個有輪子的牢籠之門終於被打開後，旅客已受盡了折磨，並因為飢餓、口渴、疾病、嚴寒或熱到虛脫而死，只留下僵硬的屍體」。

客人？外人？

仕女組成的慈善團體與政府的委員會及地方自發團體合作，一同協助難民⁶，但飢餓與嚴寒持續在威脅著生命。在1917年革命事件爆發時，許多難民仍未有棲身之所，在革命的早期階段，另一個全新的移出潮又產生——舊菁英中有許多人逃至國外，其他則跑到這個新俄國的領土邊緣地帶。而當恐怖與壓制的手段被使用，以確保新政權的鞏固時，再一波的新移出潮隨之到來。難民遷往芬蘭與舊制下波羅的海的省分，或是波蘭、烏克蘭。反革命勢力試圖控制各個區域的同時，也讓這些地方淪為戰場。那些逃離布爾什維克與反革命分子的難民潮朝著另一個方向前進。

波蘭是另一個發生衝突及形成難民潮的主要地區。1918年俄國、德國與奧國的崩潰，解除了波蘭領土被瓜分的情勢，然而波蘭必須與其鄰國爭戰，以建立自己的邊界，直到1921年簽訂里拉條約（Treaty of Liga）後才劃定邊界，並開始有組織地處理那些來自各國流離人民的移動。大多來自東邊漂流回國的波蘭人，回到了滿目瘡痍的土地上，尤其是東部地區；有些地方根本已經不適人居，也無法耕種。一個奧地利的援救工人描寫，山丘都被俄國士兵的骨骸所佈滿，而他們已經死了好久，但屍體仍躺在原地（Marrus, 1985: 57-8）。根據波蘭當局的說法，在1920年時已有超過125萬波蘭人返回（de Bryas, 1926: 56）。有許多資料都記載這些歸國者曾經歷的艱苦，其中提到有一輛原本載運1,948人的火車，從窩瓦河畔的喀山（Kazan）開始，以緩慢的速度花了三個月的時間，行駛了

86

6. 其中一項是由托爾斯泰女伯爵（Countess Tolstoy）所組織的自發性巡邏隊，拯救被遺棄在路旁的嬰孩；在1916年初就救回了400位這樣的嬰孩（Marrus, 1985: 54-55）。

1,700公里，途中很少供應食物，抵達時只有649人還活著，另外那1,299人則死於筋疲力竭、缺乏維生必須品、疾病。以上的描述似乎是許多返國者間相當普遍的經歷。

破壞與難民危機也隨著1921年發生在俄國的飢荒而達到高點，估計有500萬人死亡，這場飢荒或許是歐洲史上最慘重的一次。在飢荒蔓延的地區，估計有150萬的孤兒，還有數千名死於飢荒和疾病而陳屍路旁或街頭的（Nansen, 1923）。內戰、政治動亂、鎮壓行動、普遍的經濟危機一併到來，釋放出另一波的難民遷移來。大量人民離開，並有幾場撤退行動。⁷ 在1920年代早期，有超過100萬俄國難民流落在國外。除此之外，蘇維埃政府也開始驅逐流放那些不受歡迎的人，他們大多是知識分子、專業人士或政治家，很多人後來往東邊跑，上海便成為俄國在東方的重要移民集中地，在1924年時中國境內就有六萬名俄國移民。這些人也會遷往滿州、蒙古、敘利亞及巴勒斯坦，而最大的俄國難民集中地則是計有50萬名的德國，法國以40萬名居次，巴黎更是這些難民的政治首都（Nansen, 1923），⁸在1920年代晚期，因為死亡、返國及定居

7. 最為人所知的就是蘭格爾（Wrangel）的軍隊，此軍是僅存反布爾什維克的軍隊中的一支。在1940年底，超過13萬士兵與眷屬搭船從克里米亞，撤退到由當時提供緊急支援的同盟國（Allies，譯註：這裡中譯的同盟國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以美、英、蘇、中為主的結盟，敵人是德、義、日為主的軸心國）軍隊所控制的君士坦丁堡。這件事後來成為一件醜聞，因為抵達的難民擁有豐富且幾乎淹沒他們的補給，但卻讓許多君士坦丁堡街上的俄羅斯人苦於沒有食物、醫療用品及住所，然而他們畢竟也是同盟國的朋友、布爾什維克的敵人，但卻鮮少受到國際社會的關愛眼神，或許這群人也向我們預告了，難民的概念最終將被定義為逃離共產主義的人。

8. 雖然接下來的資料分析讓我們察覺南森的數字或許是高估了，但在最高峰時有50萬名俄國難民似乎是無庸置疑的。

客人？外人？

國外，使這些數字有顯著的下滑。

87 根據 Marrus (1985: 61) 的研究指出，東歐與俄國的猶太人在當時的經歷可算是他們在現代歐洲歷史上受到最血腥的一頁，武裝衝突的雙方都對他們採取攻擊。在俄國西部邊區有系統的迫害猶太人，在猶太人居住超過一世紀的佩利安置區 (Pale Settlement) 上發生的戰役，以及在波蘭、匈牙利、烏克蘭發生的大屠殺，讓數十萬的猶太人流離失所。俄國軍隊在 1914 年開始驅逐猶太人，不久後這個政策就被廣泛地執行 (Marrus, 1985: 61-63)。這些驅逐大多在 24 小時前進行通知，並且執行的方式很粗暴，猶太家庭被逐到街頭，隨後立即有人開始肆意破壞他們所擁有的東西。人們可以在火車站或路旁看到數以千計的猶太人，因生病、飢餓、氣力用盡而漸漸死去。約有 60 萬猶太人因此無家可歸，也有數千人被軍隊扣為人質，另有許多人被狂暴的軍隊攻擊。當在奧地利的猶太人看到俄國軍隊向奧地利前進時，也因為害怕落入俄國統治而向西逃亡。當德國軍隊東進時，他們也侵入猶太人在 Lodz、Vilna 與華沙的勞工中心，強迫猶太人上車，有大約 3.5 萬名猶太農工或工廠工人從波蘭與俄國西部，被送往德國去 (Tartakower and Grossman, 1944)。

戰後對猶太人的敵意以非組織化的方式四處爆發，有人估計在 1917 到 1921 年間，在東歐發生了超過 2,000 次的反猶暴動。因為在俄羅斯與烏克蘭的暴力事件，讓 50 萬名猶太人無家可歸，俄羅斯人、烏克蘭人、波蘭人、奧地利人不但摧毀猶太人的房子，也殺害他們，而在蘇聯內戰以及波俄戰爭中猶太人也被捕，罪名都是一樣的：「所有猶太人都是叛國賊。」在像奧地利與匈牙利這些過去曾對猶太人提供些許支援的國家

裡，如今反閃主義瀰漫，一再重演東歐的模式。在1920年代早期的猶太人在東歐各處流竄，大多是往西移動。西部的船運公司的仲介會在華沙與Kovno（譯註：在Nemunas河畔的立陶宛第二大城，曾在1918至1940年時為首都）組織猶太人，以便將他們直接運送到漢堡、不來梅、鹿特丹與安特衛普的碼頭，然而直赴美洲。

猶太人占前往北美移民的極高比例，然而在北美洲關閉移民的大門前，西歐各國從不把難民危機當成危機，或說一個影響國際體系的危機。在此之前，大批難民都被安全地用船送往北美洲，而在1924年美國訂立強森法案（Johnson Act）以及1923年加拿大訂立了類似法案之後，兩個國家都關閉了對大部分跨洋遷移的大門。許多在政府驅逐威脅下的波蘭猶太人向美國大使館懇求，希望能核發他們美國的移民許可，大約有10萬人成功了，但有更多的人失敗。歐洲國家的邊界開始禁止猶太人遷入，並把境內的猶太人驅逐出境。

難民數的攀升與緊閉的邊界二者結合下，讓國際聯盟及各國政府看清，的確存在一個難民危機，而且這是個會影響國與國關係的國際問題。但是，國際聯盟並不具備處理這個危機所需要的物質與組織上的資源。在1921年設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這個部門之前，主要負責幫助難民，以及協調國際救援工作的是私人的慈善團體，他們與領事館及政界人士協商，擔負起政府不敢碰觸的任務。有12個以上的猶太社團在國際上運作，目的就是要組織對猶太難民的救援行動。它們在東歐與西歐各地都設有辦事處，來組織猶太人移出與遣反的事務，並提供基本的協助。

除了猶太人之外，還有其他的難民存在。儘管凡爾賽條約

客人？外人？

的起草者非常關心在「異族」統治下的人們，希望確保他們都有選擇，能取得他們原本國家的國籍，也認為這是原本國家理所當然應承認他們的，但條約仍未涵蓋到許多議題。有很多人不用這個條約所設計出的法定與政治範疇，也有很多人不想取得根據此條約他們應該隸屬的那個國籍，因為那個國家的統治者正在壓迫他們。我們可以看到條約的規定與當時的地緣政治如何結合製造出一大批「無國家歸屬」的人。在當時幾乎掌握所有歐陸領土（而且在殖民主義擴張下，幾乎是掌握了整個世界）之完全控制的國際體系，以及此體制裡國家成為大多數權利與權益的來源情況下，「無國家歸屬」並不是一個優勢。再者，在中歐的領土改變，尤其是德意志領土中很大一部分的分裂，造就了難民潮的出現。

德國人必須交出以往德國的領土以供戰勝國來劃分。經常是已定居在此數代的德國人，必須在強制之下離開各個東歐國家。德國政府援助在前帝俄領土上的德國難民，當地如今已形成了新的國家，並帶有強烈的國族主義與反德意志傾向。德國對這些難民的援助（*Flüchtlingsfürsorge*）盡了很大的努力，並象徵著國家在這些難民議題上的介入，已達到前所未見的規模（Marrus, 1985: 71）。德國政府設置了集中營與處理安置事務的辦事處來照顧難民及後來他們返回德國的定居情況。除此之外，政府還必須照顧200萬名被遣返德國的戰俘，他們來自各個同盟國，並包含數十萬名戰爭期間被迫移出德國的勞工（Kulischer: 1948）。⁹這標誌出了政府介入難民危機的新層次，

89

9. 在威瑪共和時，外國工人的數目有下降，部分是因為國界向西移了，而許多波蘭人返回，或是自動成為新波蘭領土上的一員；有些波蘭人則到了法國去。另一部分的原因是在德國大規模失業導致的，強制性

並在實際操作上開始採取類似今日的運作方式。

在歐洲也有許多其他地方在第一次大戰之後，乃至於進入到1920年代時，仍非常重視難民議題的。最引人注意的是土耳其政府屠殺約100萬名亞美尼亞人的事件，多項估算認為這大約占了亞美尼亞人口的三分之二。在1915年8月時，土耳其內政部長發表了至今仍然爲人所知的這句話：「亞美尼亞問題不再存在了。」自此之後它成爲了大屠殺歷史上的一個記載（Chaliand and Ternon, 1980: 41-42）。在1919年時，有數十萬倖存的亞美尼亞難民，爲了逃離大屠殺而走上流亡之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多年之後，大規模的戰事與難民潮仍然在土耳其與巴爾幹許多地區發生，因此製造出了大批的難民。解決各種難民議題的一種協商方式，就是組織一場秩序安排下的人口交換。基督徒想離開土耳其，穆斯林想離開基督徒統治的地區，而在巴爾幹的鄰國間還存在著許多不同類型的交換方式。聯合國難民專員（U.N. Commissioner of Refugees）也使得土耳其與希臘、保加利亞與希臘在1920年代中期各自簽定了協議，進行總數200萬秩序安排下的難民交換，¹⁰其中希

的識別過程如今擴大地要求每個外國工人，必須每年申請工作證（Genehmigungspflicht），只有在國內找不到本土工人的情況下才發給外國工人這種工作證，同時外國工人也被高度管控。1930年代的大蕭條也進一步減少德國的外來勞動力，留下來的大多是有德國血統的，或是已待在德國很久的；在這兩種情況下，種種對外國工人管控的限制就不再適用。

10. 保加利亞與土耳其在1913年11月簽定的艾德里諾普爾協定（Convention of Adrianople），被認爲是現代史上第一個人口交換的國際條約，然而規定裡的這種交換其實早就開始：土耳其人離開了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人離開了土耳其。但條約將組織化這種交換的程序，以及重新安置的要求給寫成條例。

客人？外人？

臘接收了比例上最多的難民，做為一個500萬人口的貧窮國家，希臘突然必須吸收超過100萬的難民，其中大多是生活十分匱乏。難民營裡到處充斥著挨餓、食物供應不佳以及極高死亡率的情況，交換協定對希臘而言運作的並不順利；國際聯盟則採取特殊措施，並發起國際救援行動，來供應食物與住所給希臘這些生活匱乏的難民，這項努力或許立下了先例，整體而言可算是成功的行動（Macartney, 1934）。

90

普遍上來說，1920年代中期是歐洲比較穩定時期的開始，國際聯盟認為透過高級專員處理難民問題的努力已獲成功，而高級專員自己也宣稱，難民問題有結束的一天，並可以透過國際組織來解決。難民潮的活力減小了，移民到美國是最關鍵解決方法的一部分，在1920年代早期，每年約有100萬歐洲人移往海外，關閉移民大門的加拿大與美國必須解決歐洲本身尚存的難民問題，因為光是南美洲與其他目的地是不夠的，況且移民往往有很高的返回比率。

法國成為歐洲主要的移民接收國，在世界上僅次於美國。¹¹法國在戰爭中失去了150萬的年輕男性，其傷亡數字造成的影響也是歐洲各主要國家中最嚴重的。全國男性人口裡約有7%都喪生了，殘廢的比例也很高。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保障外國工人變得很重要，也開始覺得開放移民的政策有所不足：為了進口勞動力，政府在1919與1920年時與波蘭、捷克斯洛伐克（Czechoslovakia）、義大利簽定了雙邊條約（Cross, 1983）。

11. 在此我們看到了，前面章節所討論的1889年立法的衝擊仍延續至此。此法律在1927、1945、1973年的修正版本，就整體而言有進一步擴大此法含納的本質的效果。1927年的修正大幅擴大適用歸化的規定，允許嫁給外國人的法國女子仍保有法國公民的身分，並且如果她的孩子出生在法國，也能因此而擁有公民身分。

移民總會 (Société Generale d'Immigration) 在組織外國工人的移入上扮演重要的角色 (Noiriel, 1984)，法國也一直鼓勵移民，以做為調整人口的策略 (Mauco, 1932)，同時也招募難民。法國招募人員確實曾赴某些充斥難民的問題地區，例如到君士坦丁堡招募希臘人，將他們送上開往馬賽的船上，抵達後先安置在營區裡，再配置到全國各地的各種工作場所 (Pluyette, 1930)。也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才有一些重要的難民社團形成，像是猶太裔的西班牙人社團出現在巴黎的第11區，來自鄂圖曼帝國，逃離土耳其、希臘、保加利亞的難民也如此組成社團 (Benveniste, 1989)。在這10年結束時，約有150萬外國工人移入法國，其中有很大的比例是難民。

邁向第二次世界大戰

在戰爭期間有二股新的難民潮湧現：在1920年代逃離法西斯政權的義大利人，以及1930年代逃離納粹政權的德國人。開始是以政治菁英為主，後來演變為大規模的難民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不久，佛朗哥掌握西班牙政權，也促使數十萬共和黨人逃往法國。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數十萬的難民，其中大多是東歐猶太人。在獨裁者掌權與納粹勢力擴張，迫害社會民主黨人及反納粹分子的手段日益醜陋並危及生命的許多歐洲國家裡，也產生許多難民。

超過150萬義大利人在法西斯掌權的前五年間移出，大部分是因為經濟因素。即使在一個人口移出國裡，這仍算是個可觀的數字，在1927年住在國外的920萬義大利人就是很顯著的一部分 (Cannistrano and Rosoli, 1979)。墨索里尼在1926年後

客人？外人？

對移出採取控制，看守邊界的警衛可射殺任何未經許可而擅自離境的人。所有護照都被取消，離開國界時必須要政府的許可。法制化的恐怖統治製造了新的難民；後來有約一萬人離開義大利，大多前往法國，而在1920年代中期時，法國已有多達約90萬人的義大利移民社群。墨索里尼一再向法國政府施壓，希望禁止接收他視為「罪犯」（*fuoriusciti*）的這些難民，法國政府拒絕了他的要求，甚至允許在法國舉行反法西斯活動，同時也有幾個這類組織在法國成立，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難民相較起來，義大利難民的待遇要好的多了。

逃離納粹的難民故事，其中所有恐怖的細節都已為人所知。包括裡頭雜有很多有權有勢的德國人的第一波逃亡，或是1933年因為害怕才開始進行的猶太人逃亡，直到1935年，甚至在對猶太人剝除公民權利後，在猶太人及歐洲觀察家當中普遍以為這只是暫時、無組織化的暴力行徑，過不了多久就會停止，而納粹主義也將不復存在。事實上，數萬名猶太人在1933年後確實還回到德國。德國因為重新備戰（*rearmament*）而帶來的經濟成長，與其他身處大蕭條的國家形成強烈對比，這對一些人產生了吸引力。我們持平地來看，可以發現這些未正確解譯未來局勢的人與組織，事實上各自的背景分布很廣。德國想在舉辦奧運前成為大家的好友邦也有助於此幻相的形成。還沒等到在1938年種種迫害與鎮壓的極端形式達到頂點之前，大規模的逃亡就已經展開。但是種種今日看來都是嚴重違反猶太人人權的行動，包括暴力行徑、合法的鎮壓，以及有系統地榨取猶太人所有資源與財產，這些都是除了戰爭期間的組織性大屠殺之外，另一種形式的迫害。然而，戰時對待猶太人的作法是否與戰前的作為有連續性，或是受到第四章簡略討論到的

德意志政治文化所影響，還是第二次世大戰時德國政權的情形使然，以上的這些爭議本書無力進行討論。

在當時不論是國際聯盟或是個別的國家，似乎並無意願來有效率地處理難民危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做的就更少了，或許這跟法西斯主義的擴散，以及做為一個體系，法西斯政權在歐洲各地受到讚賞的情況有關。結果，各國看待逃離法西斯難民的眼神並不友善與尊敬，即使是在義大利的非法西斯主義者施行的迫害，愈來愈暴力並危及性命時也一樣。

政府在決定是否准許難民進入的政策時，其關鍵因素就是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在1931年的金融危機之後，在所有俄羅斯以西的歐洲國家裡都普遍發生了大蕭條。大規模的衰退與失業情勢並無助於創造一個對接收難民、移民友善的氣氛，也就是這股發生在威瑪德國的600萬大規模失業潮讓共和國崩垮，而迎接納粹上台。當時歐洲能想到的解決方法就是保護主義，避免勞動力供給的增加，減少政府的開銷。對難民而言，問題就是接收國政府並不想看到他們的人口增加；管理難民潮的方法就是避免難民拿到永久居留權，在歐洲政府對難民的討論大半與一件事有關，就是為了避免失業的情況更惡化，因此不想看到勞動力的增加。這些討論並非政治性的，也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常見的「猶太人就是叛國賊」的論調無關，這些討論是立基在經濟學的計算上，要想對難民釋放出空間來，就得先等各國能吸收自己的勞動力再說。

這種對難民危機採取去政治化（depoliticized）的處理方式，成為了那些以往對此議題曾最自由開放的國家，在思考政策上的準則：法國、荷蘭、比利時。最終政府們建立了檢查制度，以確保難民不會成為負擔；這也發生在1929年後的美

客人？外人？

國，這個國家曾在1920年代訂下了每年2.6萬名德國移民的配額，但卻每年都未達到這個數字。在1933年，羅斯福爲了回應來自猶太領袖的壓力，允許更多移民進入，其中大多是猶太人，但數字仍然小，在1936年前每年只有4,000到6,000名，到了1937與1938年才到達一萬名。

對猶太人的擔憂主要是發生在東歐，在那裡的猶太人共有約430萬人，在德國則有52.5萬人¹²。再者，德國猶太人的發展頗成功且整合入當地的情況良好，但東歐的猶太人則仍舊貧窮，並在文化上非常不同。東歐的情況令西歐的政府們感到擔憂，它們怕一旦幫助猶太人逃離納粹，將打開防止來自東邊大規模遷移潮的閘門。東歐各國政府事實上一再呼籲組織猶太人撤離東歐各國，同時東歐猶太人的經濟情況也急速惡化，反閃主義的程度與迫害卻向上攀升，像是波蘭在1935到1939年間的「對抗猶太人的戰爭」，這當中包含了經濟上聯合抵制行動、隔離、驅逐與屠殺等行徑。但西方已關起大門；即使是最自由的國家也這麼做。在極度迫害的情勢昭然若揭之後，仍沒有人想收容這些逃離納粹德國的猶太難民。

長期身爲歐洲主要移民接收國與流亡者、難民避難所的法國，向我們揭示了幾項問題。在整個戰間期裡，法國是主要接收逃離法西斯難民的國家：近50萬人名西班牙共和黨人來到這裡，義大利的反法西斯人士也一樣。在1920年代，法國是歐洲唯一遷入多過遷出的國家，也是唯一在難民移入的政策上抱持非常開放態度的歐洲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使得法國進步的社會政策（在19世紀即禁止童工，稍後並在1919年立法明

12. 波蘭有300萬猶太人，羅馬尼亞有75萬，而匈牙利有大約50萬。

定八小時的每日工時)被批評,認為因此減少了勞動供給。法國招募來自波蘭、比利時、義大利及其他國家的外國工人,此舉也提升了其移民人口,在1931年時幾乎達到300萬人。

然而,經濟的危機讓情勢有了轉變,並且是迅速地發生。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法國具有下列的特點,包括大規模招募低技術工人,境內義大利人成長為主要的外國團體,並招募來自中歐,尤其是波蘭的新一批工人(Girard and Steetzel, 1953; Noiriel, 1984)。在1931年開始的經濟大蕭條強化了排外情緒,凸顯義大利與波蘭移工的存在。在戰爭前進入的早期移民團體已在一定程度上被同化,包括了老一代的義大利與西班牙移民團體。針對來自新移民歧視性的法律也在1930年代初通過:義大利人、波蘭人、猶太裔波蘭人都包括在內(後來這些移民當然也會被同化,而排外情緒再轉向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的「新」一批移民身上)。在1931年時開始襲擊法國的經濟大蕭條,導致了在1934年有超過25萬人失業,企業界與政界人士都呼籲要修正移民政策。緊縮移民、送回外國人的要求日益急促,人們也不再認為外國人將有助於法國力量的增長。

於是,「外國人」價值何在的問題,在希特勒施行的政策創造出一波波新難民之前就已經在法國浮現。第一波逃離納粹政權的難民在1933年來到法國,他們進入時未遭遇任何限制,且博得許多同情,這樣的情況持續了六個月後,開始有執行限制。1933年結束時,進入的條件更加緊縮,有些來自德國的難民甚至被要求回去,也有人在官僚體系的蓄意阻撓下使得進入之日遙遙無期。在法國,難民發現要取得工作證是很困難的事,而非法進入者將被驅逐出境。但是,法國一直以來對迫害下的受害者都維持著提供庇護的一貫政策,確實也比歐洲

客人？外人？

其他國家接收更多的難民。但令人覺察的到的改變正在進行著：在嚴重經濟蕭條與大規模失業的情況下，包括對法國庇護政策與自由民主體制的反對聲浪、排外情緒、反閃主義在內的種種現象都在蔓延著（Bonnet, 1976; Schor, 1985）。伴隨著當代意義下的新階段，其腳步聲逐漸為人聽見：即難民不斷地搶走法國人的工作機會，同時破壞了法蘭西的文化純淨性。

95 在1936年李昂·布律姆（Leon Blum）領導社會主義人民陣線（Socialist Popular Front）所組成的政府，鬆綁了入境的限制，同時大量減少一度在1934至1935年達到頂點的驅逐出境人數（Livian, 1982）。勞工部支持發給已經住在法國的難民工作證，但法國人民反移民的情緒仍在，並且害怕難民大規模的入侵。社會黨（Socialist Party）並未如預期地改變法國的移民政策，它只在執行面做了改變，讓核發許可的程序更加便利與快速，在經濟危機的情況與站在工會的立場，它到底仍是反對新移民的到來。

經濟危機於1938年將這個政府拉下台，換上了一個激烈反移民同時反工會的政權。即使只是暫時居留許可，難民也很難取得。法國向全世界擺出的姿態就是它已被難民給「塞滿」了。Marrus（1985）說這或許只是誇大之辭，一來是中歐人在法國的數字沒那麼多，二來是在1933年之後逃出納粹德國的非法難民，在法國從來未超過三萬人，甚至較可能是一萬人這個數字，與住在法國總數250萬的外國人口相比，這些數字是很少的。

英國也未採行庇護與自由移入的政策。如果有難民被允許入境，那多半是因為個人權利的因素，而不代表政府採行收納逃亡者的政策。在1933年時發生大規模失業現象，人數上達

250萬人。因為海島的優勢，英國可以對入境採行嚴格的控制，它頂多有條件地允許難民入境，每個入境的人必須持有另一個國家的簽證，因為英國不希望對方永久居住在此，它自認已經過度擁擠，而且有太多失業人口了。來自德國的猶太人被允許入境，因為英國的猶太社群認為應該不計任何代價地收納並支援這些難民；除此之外，也因為原本他們很多人都錯誤地預期難民的數目，以為只有3,000到4,000名。很少有德國難民真的想到英國來，而難民問題也從未出現在國會的討論當中。在1938年德國合併奧國後遽增的難民，使得民意批評政府日益限制入境許可的政策，在1939年政府解除了限制，並資助難民能來到英國，這個時候其他政府大多在緊縮它們的入境許可。

對英國而言，真正的難題是巴勒斯坦。英國很希望與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民建立良好關係，這也讓它不願意見到太多猶太人被允許移民到這個區域來。在1930年代中期，在巴勒斯坦有大約40萬名猶太人，占其人口總數的三分之一，並在經濟上十分富足。波蘭與德國的難民人數正在攀升，然而正當德國與東歐對猶太人的暴力行徑愈趨嚴重，猶太人最需要尋求庇護的時候，英國決定要緊縮猶太人移入數目。英國在接下來的五年裡，將原本在1935年時每年能進入巴勒斯坦的猶太人的六萬名配額，大幅減縮到只剩一萬名。在此之後，非法移民的現象就變得十分普遍。

在這裡值得一提的是，從西歐種種試圖對來自東方的難民與移民關閉大門的努力，可以預知今日存在於許多歐洲國家的爭議；但今昔之間的政經局勢，其差異相當的大。在1930年代這些經濟體自閉門戶，並想尋求穩定而非擴張；然而今天這

客人？外人？

些經濟體卻想盡可能地提升國際化的程度，而擴張也是它們經濟政策裡的關鍵概念。

結論

在 20 世紀初期種種情況的結合下，改變了歐洲對難民的想像，以及難民在歐洲人心中的地位。這是現代難民歷史的開始。今天我們認為難民歷史主要發生在非洲與亞洲，其實深層地來看，它是歐洲的產物。它的誕生源於 20 世紀初期獨特的歐洲國家組織。大批難民的歷史是 20 世紀歐洲國家與國際關係歷史的另一面，也是較不為人知的一面。邊界與對國內領土掌有主權的重要性日益提升、國家的力量更加無所不在、各種國族認同的想像建構愈來愈被視為民族國家的一部分，以上所有趨勢都標示出這個階段在歐洲國家歷史上是多麼新穎的一頁，構成了大規模難民潮得以滋長叢生的肥沃土壤，少了任何一股力量，我們就很難想像這幅圖像，同時在這個意義上我們也可以說，在 20 世紀所看到逐漸成形的國家，也是一個歐洲的產物。

第六章

模式、權利、管控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進入 1950 年代，數量龐大的難民、流離失所者及自殖民地返回母國的人，最終提供了急欲全面重建的歐洲經濟體所需的額外勞動力。這個經濟體系吸收這數百萬的能力，與僅相隔 10 年的 1930 年代的體制，形成強烈的對比。最值得注意的是西德，它從 1945 到 1988 年間共吸收了 1,400 萬人。在各國情況殊異的去殖民化過程裡，「白人」殖民者與殖民地官員返回母國；有些歐洲國家也授與前殖民地的人民公民身分，或一些方便他們遷移的其他形式的地位。從 1954 到 1962 年間發生在阿爾及爾，為求獨立所發動的戰爭使得當地有超過 100 萬的法國人回到法國。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阿爾及利亞曾斷斷續續提供法國所需的外籍工人。印尼人則在 1950 年代來到荷蘭，隨後在 1970 年代抵達的是來自蘇利南與安地列斯群島的人。葡萄牙接收了來自它在非洲前殖民地的難民與移民。

99

在主要歐洲國家身上看到的吸收能力，象徵著在很短促的時間內一個鉅大的轉變：從 1930 年代害怕外籍工人侵入的感覺，轉變為在 1950 年代與 1960 年代對他們熱切的，同時似乎

客人？外人？

100

是永不餓足的需求。事實上，對額外外籍工人的需求也促使積極有組織的招募外籍工人工作的產生。在1950年代，義大利是歐洲主要的勞力輸出國，而西德、法國、瑞士則是主要招募義大利人的國家。到了1960年代，西班牙與葡萄牙成爲主要的輸出國，接著是希臘與南斯拉夫。這些國家裡有幾個直到1960年代爲止，都還擁有顯著的海外移出現象。阿爾及利亞、印度、巴基斯坦、加勒比海國家都在1950年代乃至1960年代成爲非歐洲的主要勞力輸出國。在1970年代，土耳其、摩洛哥、突尼西亞成爲了重要的勞力供應國。

到了1980年代晚期，難民、移居者、尋求庇護者再度成爲西歐一個重要的因素。1980年代初期，來自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簡稱OECD）14個成員國的尋求庇護者要少於10萬人，但到了1990年代初時，這個數字已增爲數倍。德國再次成爲移居者與尋求庇護者的主要目的地，到了1990年代中期，整體數字已經下降，因爲大部分的國家，尤其是德國對於移入採取緊縮的政策。

外籍工人占西歐勞動力的比例在1970年代初達到高峰，再來就像以前曾發生過的那樣，另一個急遽的轉變隨之而來：在1973到1974年間，大多數歐洲進口勞動力的國家關閉了移入的大門，並試圖遣返這些外籍工人。到了1980年代中期，即使在像法國這樣相對自由的國家，也可以看到反移民情緒以及恐懼入侵的聲音再一次出現。人們不得不注意到每段轉變竟是如此迅速，並且密集出現，看來好像是不斷循環運轉一樣。

今天，這個關鍵的嶄新年代之所以出現，取決三項過程的結合：首先是遷移現象在地理上的分布除了在東歐與前蘇聯

外，還擴張到包括北非與西非，而創造出了新的移民潮。遷移現象在地理上的擴張，包括了新的目的地出現：像義大利、西班牙、希臘這些長期以來做為勞力出口國的國家，如今搖身一變，成為勞力輸入國，而以往身為許多移民者故鄉的中歐，如今其中一些發展良好的國家也成為接收移民的新區域，像波蘭、捷克共和國以及匈牙利。

第二個主要過程就是以往被視為外籍工人的，到了1970年代後轉變為移民或族裔社群（ethnic communities），能攜家帶眷，擁有地方性的組織、政治運動者以及一些渴望達成的目標。儘管移民大門關閉，但外籍住民因為家庭團聚與自然成長仍使其人口有持續的增加。社群的形成有助於在社會議題上的政治運作，並在政治主張上能超越1900年代只將移民當成外籍工人時所關注的工作與薪資問題。第二代的產生也進一步促成這個明顯的改變。

101

第三個過程是馬斯垂克（Maastricht）關於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簡稱EU或歐盟）之條例的執行，讓歐盟內部來往的自由達到另一嶄新的境界。這也導致一些問題的浮現，一方面是關於經濟活動跨國化（transnationalization）的廣泛趨勢，另一方面則與試圖控制移民潮有關。這類控制涉及各種不同的移民類屬，較常見的就是想進入歐盟的非歐盟移民、有權住在歐盟成員國內但無法任意在歐盟境內來去的非歐盟移民。多個政權並置所引發更大的問題是：（a）資金的流通與歐盟國民的移動，是否絲毫不受邊界的限制。（b）非歐盟的居住移民是否受到較嚴格的邊界管制。再者，當我們擴及進入歐盟的問題時，這種採雙重標準的管制方式是否仍適用：一方面在WTO的架構下解除非歐盟的工廠、投資、資本、商品的

客人？外人？

種種限制，並普遍地開放歐洲經濟體內的金融市場；另一方面對移民與難民構築防禦措施以保衛歐洲。

本章首先將檢視在過去幾十年間，在移民與尋求庇護歷史裡的基本趨勢。再來的小節則集中在1980年代末東歐社會主義陣營解體後開啓的一些主要發展，並提供更多的細節描述。接下來的小節則討論在遷移政策領域中的移民政治（politics of immigration），包括公民身分的法律，以及歐盟的規範與各民族國家政府之間的互動。本章所提及大部分國家的討論裡，都涉及龐大的文獻資料，本文不可能對包含在內許多重要的細節都做出合適的處理，我們想做的是呈現出經驗上可見的趨勢與政策，藉此為本書下一章結論所要做的前瞻性討論，提供一個基礎（附錄裡附有表格，提供更多的數字以供參考）。

移入

102

在1950年，當時還未開始普遍召募外籍工人，在目前歐盟18個國家及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uropean Free Trade Association，簡稱EFTA）內共有總數達510萬的外來住民，¹光是法國就占了總數三分之一，約有170萬，德國只有56.8萬，但這個數字排除了上百萬戰後移居此地的德裔人；在大多數國家裡，數字都很少。²從1960年到大多數國家關閉移民大

1. 若想知道各種移民與尋求庇護情況的各方面統計資訊，請參考附錄裡的表格。
2. 比利時有36.8萬名外籍住民；瑞士有28.5萬名；奧地利包含東歐來的難民，有32.3萬名。其餘國家都只有略多於10萬的數目，像荷蘭、西班牙與瑞典，或介於義大利的4.7萬名與列支敦斯登（Liechtenstein）的3,000名之間。

門的1973年之間，在當時12國裡的外籍工人數目增加了一倍，從占勞動力3%的330萬到占6%的660萬，³例如德國外籍勞動人口從1960年占2%的43.1萬名成長到1973年占11%的250萬名；法國從1960年占6%的130萬到1973年占11%的190萬。

在1970年代初期，大多西歐國家停止了勞動力的移入。有一部分是因為1970年代初期石油價格危機的衝擊而導致經濟不景氣，以及一旦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重建工作已經達成，加上去工業化的趨勢讓愈來愈多的地區減少了對外籍勞動力的需求。外籍工人總數在不同的國家減少的幅度不同，在德國與法國從1973到1980年間外籍工人數下滑至少於50萬，德國還剩下210萬人，法國則剩150萬人。但在比利時、盧森堡以及荷蘭，外籍工人所占的比例從1960年代開始，就持續成長而不曾停止。

在1970年歐洲六大勞工輸入國（德國、法國、瑞典、比利時、瑞士、奧地利）的主要移工來源國依序是輸出82萬的義大利、77萬的土耳其、54萬的南斯拉夫、39萬的阿爾及利亞、32萬的西班牙。以上數字都不包括非法工人，而這個現象在幾個國家裡似乎也愈來愈普遍。

在西歐所有主要的移民輸入國關閉門戶之後，外籍人口數字的增加往往是透過自然增加、家庭團聚或各式各樣讓新外籍工人流入的制度。在主要接收國裡，外籍人口的數字在1980年代與1990年代都有顯著成長（請參考表格1、2、3、4）。⁴

3. 因為各國移民政策以及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條例不同，使得搜集外籍工人資料的工作變得較為複雜；這些差異一定程度上也減低了資料彼此間的可比較性。

客人？外人？

如果所有在國外出生的居民都被算在內，那實際的遷移數字將會更高：歸化的外國人及返國者，後者還包括了移出者的後裔以及來自前殖民地而有權成為公民的移民。⁵即使像瑞士與瑞典這類在1973年後外籍人口下滑的國家裡，後來到了1980年代與1990年代又再度上升。⁶在1990年時，西歐國家共擁有1,500萬的外籍人口，大多來自同屬歐洲的其他國家。在包含EU與EFTA國家在內更廣大的區域裡，在1990年時則達到1,800萬人，其中有800萬人是外籍工人。

在1980年代期間，大多數國家在大半時候，每年非歐盟工人進入人數都在下滑，而從1989年開始則有顯著的上升（請參考表格5）（底下的數字排除了歐盟居民）。在排除了德裔人與來自前東德共產政權（即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簡稱GDR）的移民後，根據德國在1980年時的記錄，約有8.3萬名外籍工人進入，而在接下來幾年中，這個數字每年都向下掉個二萬至三萬，到了1988年時又爬升為六萬，之後是1990年的13.9萬與1996年的26.2萬。法國在1980年時有1.7萬名，在1980年代早期持續上升，在一段時期的下

4. 各國取得歸化的難易程度將造成外籍人口整體數字極大的差異，因此在歸化相對容易的法國與比利時，在國外出生而歸化的人口與其自然增加，就算在本土人口的增加數字裡；在歸化非常困難的德國與瑞士，自然增加算在外籍人口上。例如在法國1982年的人口統計中，在國外出生的就有600萬，但外籍人只有368萬（請參考SOPEMI, 1992: 126）。
5. 從在決算表（balance sheet）的另一端來看，遷移人潮的真實數字不會反應在返回自己母國的移民數字、進出歐洲人數與死於母國的人數上。
6. 瑞士與瑞典之所以會下滑，最主要因為不發給工作證，而在所有其他國家裡儘管用盡各種誘使人們回到母國的方法，但外籍人口仍在增加。

降後，在1992年又向上升到4.6萬，在1996年則再度下降到1.6萬；英國在1980年有1.9萬名，接下來幾年向下滑落，之後向上增加為1990年的3.5萬，以及1996年的37,700名；瑞士的軌跡與奧地利雷同，後者從1980年4.4萬巨幅升至1990年的10.3萬，然而在1980年期間卻急速的下滑，到了1996年也下降到1.6萬名⁷（請同時參見表格7）。

關於季節性工人與邊界工人（frontier workers）的資料，記載最詳實，同時也是數目最可觀的就是瑞士，在1980年時有約11萬名季節性工人、10萬名邊界工人，到了1990年時這二項數字分別上升到153,600與180,600人，在1990年代則有顯著的下降。法國在1980年時有12萬名季節性工人登記有案，到了1990年時下降到5.8萬；盧森堡在1980年時則有1.2萬名邊界工人，在1990年時有3.4萬人。

雖然在西歐各國間，工人所任職的行業或產業分布有十分鉅大的跨國差異，但不論在哪個國家，從以前到現在都可以清楚看到移工多數受僱於低薪工作。整體而言，西歐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只有32%，相較於日本的39%與美國的42%是較低的，但這並不意味著女性移工就享有較好的工作機會。有許多文獻記錄了兩性的移工在勞動力市場的情況……證據顯示早在1880年代，移工就超出應有比例地集中在特定產業，例如營建業、裝配製造業、農業與低階服務業，這種情況直至今日仍未改變。

104

7. 在1986年之後，奧地利改變了計算的方式，但是趨勢的轉變是在這項改變之後才發生。

非法移民

在所有現實的移民情況下都會存在的非法移民，在過去幾年來已成爲一個重要的議題。關閉勞動力的移入以及近來對庇護條例採取緊縮，被認爲是造成非法移民增加的因素。國際勞工組織（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估計在1991年就有260萬名非法住民，占外籍人口總數的14%（Böhning, 1991）。義大利被認爲是非法移民比例最高的國家，估計在1991年時有60萬名，而法國則有20萬名。德國估計有35萬非法移民，還得再加上30萬名的非法難民。在1993年時有些資料估計總數達400到500萬的非法移民，在美國的我們很難確知這些數字是否可靠，只知道以美國的經驗來看，隨著1986年移民改革與管控法案（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的規範計畫之後，發現以往一般認爲美國有500到600萬非法移民的數字超過實際太多。不論確知歐洲的估計數字是否有灌水之嫌，處在今日對大規模移民浪潮日益憂慮的脈絡下，我們也很難去建立正式的統計制度，而只能停留在可能數字的猜測上。

歐洲國家基本上已發展出二種類型的政策來回應非法移民：對移民設定一連串的條件來管制非法人口；另一種是懲罰性的處理方式，包括把非法移民驅逐出境，或對聘用他們的雇主施罰。⁸大多數的歐洲國家已在1980年時採行處罰雇主的方

8. 在一些國家裡，非法移民沒有權利對被驅逐的決定進行上訴。若要讓上訴的程序得以運行，政府機關對驅逐的決定必須要公開，且讓移民能知道；但在德國的情況就不是這樣。其他控制非法進入的措施還包括連帶懲罰載運的交通工具，像如果飛往歐盟國家的飛機載有未帶適當文件的旅客，該航空公司也必須被罰款。

式；另外還有一個特定的文獻，專門探討政府用來管制非法移民的措施的成敗（Weil, 1991; Wihtol de Wenden, 1990）。大多數的國家也在1971到1991年之間進行了制定管制規範的計畫；但德國並不這麼做，因為它認為這些措施只會更加鼓勵非法移入（Castle and Miller, 1993: 90-96）。

105

地中海地區被視為是非法移民聚集的其中一個主要地點。在這裡具備了接下來所提到的幾項條件，以致產生了這些非法移民。首先，在移民大門關閉前曾僱用外籍工人（也包括非法的）的工廠，儘管面對著各種處罰這類聘僱的法令，仍在當地政府默許之下繼續僱用。第二，在國際競爭的壓力之下，工廠必須不斷尋求更彈性的生產，如此促進一些工廠想規避法令保護一般全職工作的成本。第三，非法移入部分與非正式經濟的連繫關係，讓吸收非法移民的工作有可能變得較容易。上述條件再加上地理上的位置，使得地中海地區成為非法移民的重要集中地。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臘這些一度是移民出口國的國家，不僅其邊界容易被穿越，政府也缺乏嚴密邊界監視與控制的能力。進一步來說，各種地緣政治的因素與能捍衛個人權利的司法力量，也會對過於粗暴的逮捕及驅逐出境政策造成限制。基本教義派（fundamentalism）的興起也加入了額外的人道主義考量，對以外交和經濟理由來回應來自西非及北非之非法移民的增加，而採取一連串規範化的方式來進行管控。

地中海地區國家非法移民的數目，估計介於100到150萬之間，雖然也有很多人估計的區間要遠比上述的大多了，甚至還有人認為光是義大利的非法人口就達到了這個數字的水準。在1990年時，北非移民占法國的非法移民約60%，占義大利

客人？外人？

的非法移民約30%，占西班牙的40%，占葡萄牙的15%，占希臘則少於5%。在這些國家裡，非法移民最大的來源地區就是馬格雷布（Maghreb，譯註：非洲西北部的一個地區，由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的沿海地區，以及亞特拉斯山脈組成），總數就有53.6萬人，其中義大利占最多（25.5萬），其次是法國（15萬）與西班牙（11.7萬）（Khader, 1991: 42-43）。

106 因為歐盟各國對控制非法移民、統一彼此政策的種種努力，尤其是在申根協議（Schengen Agreement）達成之後，使得地中海地區各國竭力終止這現象。1991年西班牙針對每年估計有100萬來自馬格雷布的來訪者設置了簽證的要求，這些人當中大多是來自摩洛哥的季節性移工。義大利政府也試圖透過一項大赦，以減少非法移民的人數（Veuglers, 1994）。葡萄牙政府撤回原本授予巴西人自動成為葡萄牙公民，以至於成為歐盟國家之公民的權利。所有這些南方的國家都加強了其外部邊界的管制。

在新一波由東向西的遷移情況形成後，出現了非法移民聚集的第二個主要地點。在這段發展過程裡很重要的轉捩點是德國在1993年將其庇護政策緊縮的舉動，德國這項新政策或許更導致了非法進入德國的人數增加，尤其是穿越捷克－德國邊境而來的。在捷德邊境上，1992年時就有1,200人被逮捕，而遣返的數目（包括那些進入德國之後才被逮捕的）則達到1,600人；同樣的條件下，在波蘭－德國邊境上的數字分別是2,617與1,200人。根據報紙的描述，每晚都有上百名來自貧窮東歐國家以及非歐洲國家的人被德國邊境警方抓起來。最終，關緊邊界造成了我們在許多其他類似情況下看到的後果：一批要價數千元來助人非法穿越邊界的人，在世界各地各自用各種

不討喜的名稱稱呼他們，像是豺狼、人蛇，而他們也成爲了遷移神話裡的一部分。1990年代早期，在所有主要的邊界上，最常被逮捕並驅逐的就是羅馬尼亞人：在波蘭邊境占64%，在匈牙利邊境占的比例超過50%（Okolski, 1992），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羅馬尼亞的遷移人口裡有很多是吉普賽裔，或稱爲羅姆人（Roma people，譯註：即吉普賽人，他們源自北印度的一支遊牧民族，現今散居各國之中，所說的語言是印度語支裡的一種），他們長期以來被迫害，沒有自己的土地，因此他們的遷移程度無法做爲指標來告訴我們東歐遷出的情況。估計這些人共有250到400萬，其中多數在羅馬尼亞、匈牙利，以及前捷克斯洛伐尼亞與前南斯拉夫的領土上；也有極少數是在波蘭。

尋求庇護者及難民

另一項在1980年代晚期開展新面貌的趨勢，就是尋求庇護者的人潮湧現，光在1992年裡就有高達70萬人。雖然隨著特定難民危機或政策的轉變而使數字有劇烈的波動，但整體而言這個數字仍一直快速成長到1980年代末（請參考表格8），在多數西歐國家裡，我們可以看到從1980到1991年，這個數字增爲五倍之多。在1992年後，大部分的這些人潮都衰退了。德國在這些年來都是遙遙領先的最大接收國，在1991年時有256,100名尋求庇護者進入，在1992年時則有超過40萬名，這個數字大約是1980年時的四倍之多。在1991年時，英國以7.3萬名尋求庇護者進入而居次，這也是1981年時的9,900名以及1980年代大多數時候數字的七倍。法國在1989年時以61,400名排在第三，這也是1980年接收的18,800名及10年之

客人？外人？

間大多數時候的三倍之多。瑞士在1991年時以41,600名尋求庇護者達到高峰。另外一些急遽的增加也發生在義大利1991年的31,400名，以及瑞典在1992年的8.4萬名。

就如稍後要討論的內容所說，西歐對庇護第三國的相關政策改變造成申請者數目的變動，並提高了幾個中歐國家的數目，尤其是來自前蘇聯以及東歐較貧窮的國家。特定幾個國家的政策變遷也減少了來自歐洲之外的尋求庇護者的人潮；德國就是個很明顯的例子，直到最近它可能都算是這塊大陸上採行最自由傾向的庇護政策國家。

事實上，即使在兩德統一之前，德國所接收的尋求庇護者仍比整個歐盟還多。在實行社會主義的集團崩解以後，再加上前南斯拉夫的戰爭，使所有國家接收了更可觀的數目。到了1992年，只有德國與瑞典仍持續增加數目，在1990年時德國接受了44%來自東歐尋求庇護者的請求。在法國，尋求庇護者人數的下降始自1989年，在西班牙始於1990年，在英國、奧地利、義大利則始於1991年。下滑的趨勢一般而言，導因於想對進入人數以及取得難民地位加以限制的政策轉變。

德國也緊縮了其庇護政策，規定一個人如果已經身處安全的國家裡，就無資格申請德國的庇護，這也對中歐國家產生重大的衝擊。重重的壓力被施加在中歐國家身上，要求它們必須協助，以限制那些想進入西歐的難民與尋求庇護的人潮。波蘭在1993年5月簽署了一項條約，每年要讓多達一萬人重新返回，而要實行這條約並不容易，因此條約內容也包括了每年提供1億2,000萬馬克做為波蘭財政上的補助。如今各國取得了一定程度上的共識，假使尋求庇護者所在的母國是安全的，那就應讓他待在原本這個國家裡。

難民及尋求庇護者在中歐仍算是規模不大的團體，但是數目卻一直在增加。在1990年時，匈牙利有2,000名尋求庇護者⁹；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的報告，估計在1992年因南斯拉夫內戰而產生了2.9萬名的難民，其他一些資料的估計則介於五萬到10萬名之間。波蘭希望每年能接收最多五萬名來自各國的尋求庇護者，但當前波蘭的難民卻傾向離開這裡，前往其他國家（例如南斯拉夫人，在丹麥、芬蘭、德國、瑞典他們的難民地位是能持續擁有的）。捷克共和國也希望每年能有最多1.2萬名，但事實上進入的人數卻遠低於這個數字——例如在1991年時就只有約1,200名尋求庇護者，而且這個國家裡，大多數的難民在稍做停留後都會離開。

西歐政府已試圖在尋求庇護者與難民的進入上加以限制，並試圖在這個議題的政策上取得一致的做法。它們的努力絕大多數是透過政府之間的協調，很少是藉由歐盟的制度來達成。申根條約（Schengen Treaty）與都柏林協約（Dublin Convention）裡包含了許多想擴大控制的法律與行政措施。¹⁰在1992年11到12月期間於倫敦由歐盟各國部長、官員所召開的會議裡，當時12個成員國針對未被發現的庇護申請如何處理，以及從尋求庇護者非法停留的第三現居國所提出的庇護申請問題做成了協議（Butt Philip, 1994）。移民工作小組（Working Group on

9. 匈牙利是東歐共產集團國家裡第一個簽署1951年關於難民問題的日內瓦公約，波蘭則在1991年9月簽署。

10. 對申根條約的簡要描述可參見本章稍後的小節。都柏林協約是用來防止在歐盟成員國內，多重或連續申請庇護情況的產生，以確保核發庇護的決定是由第一個申請的國家，而毋需這協約裡的其他締約國再次檢視相同的申請。對某些國家而言，這協議是有問題的，兩個協議都呈現出締約國彼此之間的問題，請同時參照本章關於外部邊界協議（External Frontier Agreement）的註釋24。

客人？外人？

Immigration) 這個特別的團體研擬出了一套「沒有嚴重被迫害的風險」的測驗方法，可以自動拒絕那些居住在歐盟所認定為安全的國家者提出的申請。這些希望達成共同行動的努力已經產生了一些效果，因此德國政府與議會事實上也修正了基本法 (Basic Law) 的第16條，以限制過去幾乎未設限的庇護權利；在1993年7月也採行了一套更具限制的庇護制度。

109 目前的資訊也向我們透露出更具限制的措施。美國難民委員會 (US Committee for Refugees) 根據1992年的資料顯示，歐盟各國在承認難民的比率日漸下降。在1992年各國分布的比率如下，法國是28%，西班牙是6.5%，義大利與德國是4.5%，英國是3.2%。歐洲在比例上，承認其他較低層次之正式地位的比率要來的高一些：像是人道原則的類別，或在英國「例外留下居住者」(exceptional leave to remain)，這些類別都不在聯合國難民協約 (UN Convention on Refugees) 內容裡，同時它們所提供的權利要遠比完整的難民類別少的多。

但這些政府限制難民與尋求庇護者進入的努力也面臨新的束縛，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捍衛某些權利普遍性的法庭，例如在1993年8月，法國憲法委員會曾挑戰都柏林與申根協議的認定，認為協議裡想避免尋求庇護者進入本國的規定是違反日內瓦協議中與難民相關的部分，以及法國憲法裡特別是人權的部分。新移民法的51條裡也有八條受到譴責；德國憲法法庭在1993年9月的兩項裁定也抨擊了都柏林和申根協議裡的另一項核心認定，法庭拒絕承認對尋求庇護者而言，希臘是個「安全的第三國」，同時授權認可在德國有訴案的特定原告之申請。即使希臘也共同締結了歐洲人權公約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都柏林與申根協議，但法庭仍認為在該國人

權無法受到保障。

於是，我們一方面看到在庇護及難民政策上急遽的緊縮，另一方面又增加了許多法律工具及法庭決議，誓言保障同時促進尋求庇護者與難民的權利。

新的遷移模式

到了1980年代晚期，新形態的勞動遷移變得顯而易見：以往主要的勞力輸出國已變成勞力輸入國（請參考表格1和表格2）。在1981年時，義大利有21.1萬名外國人居住在此；1996年時，這個數字已增加到超過100萬。據估計，假如包含非法移民的話，義大利今日或許擁有多達200萬外籍居民。西班牙在1982年時有20.1萬名外籍居民，在1996年時則有50萬名。雖然數字相較起來仍算少，但葡萄牙及希臘也變成了人口輸入國。除了在數字上的轉變外，在組成分子上也有劇烈的改變。過去的外籍居民裡，很大一部分都是由高階的專業工作者及其家庭所組成的。在1970年代期間，西班牙接收了許多逃離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地獨裁政權的高教育難民，義大利的外籍居民長期以來包括高教育的藝術家及知識分子。在1980年代末期，外籍居住人口，包括非法的在內，其組成分子裡有愈來愈多的受僱勞工，像是義大利南部的農工、西班牙北部的礦工，還有所有國家都能看到的家務勞工。很多人都是來自貧窮的國家，其中非洲國家占的比例正快速的上升。

在1980年末期以來，至少還有另外三種新興的主要模式正在發展。第一種是在過去勞力輸出國，像西班牙與葡萄牙成為歐盟成員後所形成的。歐盟境內可以自由移動的權利致使

客人？外人？

許多西班牙、義大利與葡萄牙人從德國、法國與荷比盧返鄉。¹¹這也涉及了在歐盟境內來去這個更廣泛的問題，同時也引發了一種可能性，即我們可能看到通勤及季節性遷移的增加，將取代一些過去較長期及永久地居住的人潮。

另外二個模式包括在對移動的解除限制以及更大的政治制度轉變之後，嶄新的以及重新恢復的東西向遷移，還有另一個日益增多的是從東方往前景較看好中歐國家進行的遷移。下一節將對這二個模式進行更細緻的討論，我們將從東西向的遷移開始進行。

嶄新的以及重新恢復的東西向遷移

柏林圍牆的倒塌以及普遍來說對來自前蘇維埃集團的移民、旅遊之限制的解除，都創造出幾個西歐國家在1989年後外籍人口的遽增。在圍牆傾倒後的前18個月裡，大約有160萬人離開這地區。在開放之前，每年只有約10萬人離開經濟合作委員會（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簡稱COMECON，譯註：在1949年由蘇聯發起，於1989年解體的區域性組織，成員皆為蘇維埃集團勢力所及的國家）涵蓋的地區，而對總人口約四億而言，這個數字並不算顯著。

11. 隨著美國在1986年移民改革與管控法案（Immigration Reform and Control Act）的實行，我們看到了非法的墨西哥人在合法化後，也有類似的模式出現，尤其是居住在靠近墨西哥邊界地區的：在獲得在美國的居住及工作權利後，他們覺得較可以自在地回到墨西哥去，在那裡的生活花費要低的多，同時也讓他們較可能擁有令人滿意的社群生活：這種想法就是既然可以不受限制地進入，他們就會在有需要時才這麼做，而不必經由困難重重、昂貴費用且常是極度危險的非法越界後，想盡辦法要待下來。

以德國來說明上述情況是再適合不過。¹² 在1989到1990年期間的德國，有約150萬來自華沙公約組織（Warsaw Pact，譯註：為反制1949年成立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蘇聯及東歐七國在1955年成立的軍事政治同盟）之成員國的人被允許進入，當然也包括東德人民在內。這個數字大約是1980到1988年間進入人數的二倍。在1989年，德國計有97.7萬人是因為網絡關係而移入，其中包括了工人與家庭成員。約有三分之二的人宣稱自己擁有德意志血統；37.7萬名德裔人來自波蘭、羅馬尼亞、蘇聯；有12萬人是難民、尋求庇護者以及現已取得合法地位的非德意志人的親戚；而有383,500人是來自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國（Statistisches Bundesamt, 1992: 91）。這些數字都遠比過去東西向遷移的規模來的大。從1963到1987年間，每年平均從東德進入西德的人數約有1.3萬名（OECD, 1990: 21 ff.），在1980年代開始上升，在1987年達到了43,300名。從東向西德的遷移持續在1990與1991年成長，從1990年第一季的12.9萬人上升到1991年第四季時的38.2萬人。而從前東德進入的就不再算進移民的人數。

111

不論是德裔人或來自前東德的德國人，都是在非常特別的環境下產生的特殊類型遷入潮。這兩個團體都有權成為永久公民，而不像德國境內其他的移民團體。然而，德裔人（前東德人民不算在內）的特權已有了一些改變，以至於進入德國變得

12. 例如，在1980到1990年這10年期間，西德接收來自東德的移民是法國所接收的60倍。在1990年，法國來自東方的移民占其移民總數的10%。雖然法國已關閉勞動遷移的大門，但仍有因為經濟因素來到法國的波蘭移民，其中包括被組織化地招募來法國從事農業的季節性工人，其是透過國際遷移辦事處（International Office for Migration，簡稱OIM）針對這類工人在華沙開設招募辦事處來引進的。

客人？外人？

較爲困難。¹³

這些發展爲移入德國人潮的組成帶來了戲劇性的變化。在這之前，大多位於地中海地區的老牌勞力輸出國是多數外籍工人的來源；在1989年，這個比例掉到三分之一之下，而來自東歐及東南歐的比例則上升到44%；波蘭工人是其中最大的一群，占了三分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很多東德人早在統一之前就離開母國，大部分但不是全部都來到西德。因此，從1971到1981年間，約有91萬人離開。東德政權從形成到垮台爲止，共有約390萬人離開，規模最大的移出潮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即我們在上一章討論過大規模難民潮、流離失所者裡的一部分。在1980年代移出東德的人們大多想前往西德，因此在1986年離開的5.5萬人裡，就有25,400人到了西德；在1988年離開的77,600人裡有40,400人到了西德（Central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of the GDR, 1990: 2）。

112

在柏林圍牆倒塌前，匈牙利與捷克斯洛伐克已於1989年9

13. 從1967到1990年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國裡的東德公民身分是分開的。但從德國聯邦共和國的觀點來看，公民身分只有一個，一直都包括了民主共和國的公民在內。因此在1989年後，所有來自東德的公民都有權在西德定居、工作、要求公民的權利。至於德裔人在法律上的定義，規定不但得是德意志血統者（Volkszugehörigkeit），同時必須擁有被強迫逐出者（Vertrieben）的地位，也就是說必須是因爲德國的族裔身分，而被逐出東歐或前蘇聯的人才算是德裔人。最初定義德裔人時，限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實際被逐出的人，最後則把定義放寬，含納進了所有來自東歐與前蘇聯的德裔人。在1989年後因爲藉此方式進入的人數過於龐大（尤其是來自波蘭、羅馬尼亞與蘇聯），光是在1989到1991年間就超過了100萬人，因此德國方面對被逐出者的自動認定進入修正，這也使得德裔人上不再那麼自然而然就能成爲公民。

月解除多重限制，讓想離開這兩個國家的人較容易往西德移動（即使不是從那裡來的）。這也反映在圍牆倒塌前幾個月的數據上。在1989年10月何內克被迫辭職之後，東德政府在強大的壓力下，於11月開放其邊界，在該年裡這一個月是由東德向西德登記的遷移人數最多的一個月，大約有八萬人。兩德在經濟、貨幣、社會上整合後的頭一年，也就是從1990年7月到1991年7月間，又有24萬人遷移到西德，在此之後，這類遷移不再被計入移民人數裡，而被視為是內部遷移。

在統一後，我們看到很多仍住在東部的德國人，開始通勤到西部工作。德國聯邦勞動局（German Bundesamt für Arbeit）曾針對這些新進的聯邦成員（neue Bundesländer）對勞動力市場的影響做過一個調查，其中一項發現是，在1991年7月時通勤上班的人數已成長到44.6萬人，而在1990年7月時只有約20萬人。¹⁴在同一時期裡，在前東德的就業總數也從800萬滑落到750萬以下。超過50%的通勤者得花一個小時以上去工作，而25%的通勤者無法每日回到自己的家裡。

在1991年，前東德地區的平均工資水準只達到西部的60%，如果考慮到實際領到的薪資，則只有50%。通勤到西部工作者的薪資，平均比留在東部的多出50%到60%。除此之

14. 這個人潮流動的調查所測出以下的特徵，在兩個不同時間點裡並未呈現出太大的變化。約有三分之一的通勤者前往西柏林；少於四分之一的來自東柏林，而約有20%的在圖林根（Thuringen）。約有80%是男性，這比起前東德勞動力中有55%的比例要高的多；這些通勤者裡有一半的年齡介於25到39歲間，同樣較前東德勞動力裡所占的比例要高的多；59%的人已婚，低於前東德勞動力的71%。最後，通勤者比起前東德平均受僱者，也具有較高的教育水準，雖然兩者的工作條件並未有顯著差異。這些證據顯示，通勤者所擁有的條件要比他們在西部擔任工作所要求的多。

客人？外人？

外，能達到東部平均薪資以上的通勤者比例，也從68%上升到82%。在1991年7月，通勤者在西部所在的工作部門分布如下，約三分之一的人在營造業，48%在總稱為服務業的範疇下，這包括了在商業裡的19%。在這三個部門裡充斥著許多的臨時工作機會，這個事實或許也解釋了為什麼來自東部的通勤者，比較容易進入這些部門的原因。當被問到是否真的要移居到西部的問題時，通勤者中願意考慮或想這麼做的人，占了約60%，比起東德人口也這麼想的35%之比例高出不少。

113 來自東部的新形態遷移雖然主要是以德國為目的地，但也有前往奧地利、斯堪地那維亞以及一些中歐國家。斯堪地那維亞較可能因為族群與經濟的連繫關係，而接收到來自俄羅斯西北部的新移民；另外，波蘭、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與匈牙利所接受到與日俱增的移民，則被認為來自前蘇聯，這即將是下一節討論的主題。

成為接收地區的中歐

長期以來做為人口輸出地區的中歐與東歐，如今向我們展現多種的模式（欲知更多數據，請參考表格1、2、4、7、8）。所有中歐的主要國家，都同時接收並送出移民、尋求庇護者、非法勞工，以及像小販般賣東西的「旅客」（譯註：「跑單幫」）。

對來自羅馬尼亞以及前蘇聯各國的移入潮，它們同感擔憂。在1991年5月20日蘇聯通過了對人民移動的新管制規定，並在1993年1月於俄羅斯開始執行後，俄國公民可以自由離開與進入國境。發展得愈好的中歐國家，如波蘭、捷克共和

國與匈牙利，就愈害怕會有數百萬「觀光客」從前蘇聯進入境內並待下來。再者，來自第三國而想去西方的遷移者發現愈來愈難達成心願，只能在這四個主要接收國「擱淺下來」。¹⁵政策上的改變導致了如下的情況發生：爲了向西歐要求解除對自己公民申請簽證上的限制，這些國家交換的條件，是接受那些本想在此通過，但卻被西歐拒絕進入的第三國移民可以再進入其國境。這些國家在政策上所面對的難題與挑戰，還包括了在這些議題上的相互合作關係。

此外，它們也害怕數以百萬計的東歐人可能回來這裡，這些人當初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大多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遣返」或「重新定居」於蘇聯，這個情況我們已在第五章裡討論過了。波蘭人是其中最大的團體，根據1989年蘇聯的人口統計來看，共有120萬人，但估計實際數字是二倍之多，甚至有些資料估計高達400萬人。¹⁶隨後，還有匈牙利人、保加利亞人以及其他中歐人民的後裔。這些團體裡有不少都宣稱它

15. 波蘭不可能有效控制與前蘇聯之間長達1,000公里邊界的情況，令中歐各國十分關切，它們害怕那些來自東方的移民與難民，在被西方的國家拒絕後，最終會居住在它們境內。

16. 雖然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想回來波蘭，但對波蘭來說，遣返回國並不是可欲的選擇，在經濟的考量下也不可行。據估計，要在五年間把100萬波蘭裔人整合進來得花費超過20億美金：在開放後的那一年也就是1991年裡，被遣返回國的人數還不到1,000人（Morokvasic and Tinguay, 1993）。波蘭所採行的政策是要支援海外的波蘭族裔人士，以確保他們能待在原國境內，並享有少數族裔的權利與保有自己的族裔身分，爲此波蘭在1990年時與烏克蘭，在1991年時與白俄羅斯簽訂了友好條約。匈牙利也跟著採用類似的策略，支援並讓匈牙利裔社群能待在原地，藉此拒絕遣返回國的行動，它與烏克蘭簽訂的友好條約，這個舉動並非毫無爭議，因爲匈牙利接受現存邊界的行爲被一些人認爲是背叛了烏克蘭當地的匈牙利族裔社群。另一方面，政府也鼓勵自羅馬尼亞遣返回匈牙利人（Sik, 1990）。

們源初的語言才是母語，這也可以被視為有移出傾向的指標。

從1987到1991年間，大約有100萬人離開了蘇聯。這個數字相較於在這之前的40年來說是非常高，在40年來的總移出人數還比1990年一年的數目來的少，但相較於原本預測可能到達的500到1,000萬人來說仍有很大差距。再者，這100萬人裡只有極少數真的待在中歐；大部分都往西到了德國、以色列與美國。德裔人與猶太人是這股移民潮中的主要組成分子。在此，我們再一次看到遷移過程裡模式化的程度，同時值得注意的是在1991年8月的鉅變之後，只有一些蘇維埃公民離開而已，來到波蘭尋求庇護的人也僅數百名，但是二萬名住在波蘭，因工作緣故而必須通勤者，只有50%尋求庇護，其他人則一如往常地工作與回家（*Wall Street Journal*, 21 August, 1991）。發表在《解放》（*Liberation*, 25-26 May, 1991）上一項1991年3月於莫斯科所做的調查指出，只有6%的受訪者說如果要離開這裡，將會選擇中歐做為目的地。

其他可能成為移民的人群，像是之前討論過的少數族裔，並未表現出傾向遷移的動力，或許位在羅馬尼亞略多於3.5萬名的匈牙利少數族裔是個例外。在羅馬尼亞這個例外之地，國際遷移組織發現有多達30%的人想要離開，而在此組織於1992年在俄羅斯、烏克蘭、阿爾巴尼亞及保加利亞所做的調查裡，也得到類似的回應。有不少證據顯示，許多前蘇聯的公民都想出國，但很少人是為了功利的目的（IOM, 1993; de Tinguy, 1991; Brym, 1992）。

根據一些分析家的說法（請參考Morokvasic and de Tinguy, 1993），對中歐產生最大衝擊而導致遷移的因素，是前蘇聯所發生的政治變遷以及經濟結構重組，這也促進了包括通勤現象

在內的巡迴遷移之發展，並且在這個地區裡更容易進出自己的國家也有助其發生。在過去離開國家的決定往往僅能做一次，在1990年代常見的模式是以「觀光客」的名義進入，待幾小時、幾天或幾個月，以從事小型貿易或販售活動。雖然這種情況已持續多年，但在邊界開放後仍使數字急遽攀升。

115

下列一些數據可以說明這種現象。蘇聯的觀光客數目多少，可以做為增加的可能幅度指標，雖然這數字裡包含了幾種不同類別的觀光客，許多人進來也不是為了工作。在1980年時，波蘭有72萬蘇聯觀光客，在1988年時有174萬人，在1989年時則有300萬人，到了1992年初時已超過500萬人。他們待在這裡的時間，同樣從幾個小時到幾個月都有，而這個總數裡可能重覆計算了某些人的進入。許多人由各種類型的旅客或觀光客組成的，也有許多人是小規模的非正式商人或小販：他們在街頭的市場、街角或火車上販賣東西；所販售的東西是由俄國製造的香煙、玩具、衣服、食物、酒以及手工製品。類似的模式也出現在捷克共和國裡，每天有數以萬計來自前蘇聯的人民進到這裡來做小生意。估計在1991年初，有五萬到七萬名羅馬尼亞人在波蘭境內，同時估計有多達30萬名來俄羅斯、白俄羅斯、烏克蘭的工人也在波蘭；他們棲身的產業是營造業、礦業以及農業，或是當計程車司機。一般熟知這些非法勞工所獲取的薪資，要比身為公民的工人低，但仍比在自己母國能賺的多。1992年在匈牙利，估計有多達10萬名非法勞工，他們是從其他東歐國家、中國或中東來的。

也有涉及犯罪以及準犯罪的經濟活動，是包括遷移活動在內的。聞名的犯罪集團在波蘭與捷克共和國裡向外運作，如今已逐漸與美國的芝加哥和紐約有所連繫。在武器與賣淫上存在

客人？外人？

著跨國交易的非法市場，如今又有許多的資訊顯示，有東歐與俄國的女子透過西歐或其他地方而被販賣來從事賣淫，而在中歐則有從前蘇聯（其中大多來自俄羅斯與烏克蘭）、羅馬尼亞與南斯拉夫來的女子。例如一項資料估計在1990年初時，光是在華沙當地就有3,000名來自前蘇聯的女子賣淫（Morokvasic and Tinguy, 1993）

116 對這些國家而言，主要的挑戰還是來自難民潮與非法移民。這四個中歐主要國家已召開多次會議，研商採取什麼策略，才能最有效地管控其邊界。在捷克共和國，尋求庇護者必須在邊界表明其來此的意圖，並在內政部尚未接受前不得進入。除了邊界巡邏外，也在此配置了愈來愈多的軍隊以更嚴密地控制移入與移出的人們。中歐其他國家也採取類似的措施，像更嚴格地審核尋求庇護的申請、愈來愈多申請簽證的要求、邊界巡邏愈來愈頻繁同時配置更多軍力，這些舉措都是為了控制進入的人們。結果就像匈牙利在1991年底到1993年4月之間，就拒絕了130萬人進入國界內（Larrabbe, 1992）。

在此區域的政策也浮上檯面了。匈牙利與奧地利、斯洛文尼亞（Slovenia）、克羅埃西亞、羅馬尼亞等國達成協議，讓非法的移民能重新進入，波蘭及捷克共和國也依循著同樣的方式去做。在1993年3月，波蘭、捷克共和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亞及奧地利的內政部長齊聚一堂，尋求在邊界管控事務上更有效的區域性努力，這些政府也積極地尋求西方的合作，不論是在技術上的協助或是在經濟與社會上的支援。在它們的眼中，發生在其國境內的遷移與難民事件，都是更大脈絡的歐洲變動中的一環。

歐盟與這四個國家間的合作協議並不意味著人們享有完全

自由的移動權利，即便簽證的要求都已解除了。在德國與波蘭、德國與捷克共和國之間，都已就邊界與遷移的事務，還有雙邊的協議進行合作；在此合作的前提下，德國願意提供經濟的援助，並且爲了要換取對方更嚴密的邊界管控及更嚴苛的庇護制度，德國也提供了金援以及實際上的協助。可以預見的是，這將讓想移往德國的波蘭非法移民數目大增。

西歐人以往在冷戰局勢下要求保障那些穿越邊界而來的東方人民之權利，但如今卻要求中歐能管制其東或西邊的邊界，並希望能擋住尋求庇護者，同時讓那些非依正確管道進入西方的人能再回到中歐。

移民的政治權利

自從 1970 年代以來，整個西歐各國的移民政策都採取愈來愈相似的立場：對進一步的移民採取嚴格的限制，鼓勵自願遷移回母國，對成爲永久居民及第二代的移民進行整合，同時除了法國以外，其他國家都在歸化的法律上趨向自由化。大多數國家都立法賦予定居的移民更多的權利，同時爲幫助他們整合，也制定政策來提供他們住屋及教育。各國確實有匯合之處，儘管它們在一些方面有顯著的差異，像是過去移入的歷史、殖民與遷移的關係、庇護的政策，以及特定移民與難民的人口群成爲每個西歐國家擔憂的源頭——從德國對尋求庇護者的憂慮，到法國對非法移民的擔心。雖然各國在公民身分與歸化政策上十分殊異，但在移民政策上卻日益匯合，這就是本節要探究的主題。

117

在 1980 年代西歐大多數的移民接收國所普遍採取的走向

客人？外人？

是自由化，並賦予移民各種權利，包括地方性的投票權以及移民自身及其家人定居的權利。瑞典、荷蘭、比利時都是採取最自由化政策的國家，法國則略遜一籌。瑞典與荷蘭的政府會資助移民社團，幫助他們學習母語，也讓他們在勞動力市場上享有平等的機會，同時允許移民在地方性選舉擁有投票權。大多西歐國家在1980年代中期時都將其歸化的法律朝自由化的方向做修正，然後在1990年代初期再一次雖然經常會經歷立法的拉鋸戰。在這樣的脈絡下，英國是一個特例，其公民身分概念本從一個以帝國為出發而較寬廣地想像的，但後來加入了愈來愈多的限制；在英國內部面臨視移民為英國臣民之敵人，而希望對移民施以控制所產生愈來愈多的壓力，使其愈來愈難一如以往地用自由化的方式來定義誰是英國臣民。

118 簡單地說，在歐洲大多的政治體系中，取得公民身分的制度，若非按照出生地（即出生地主義），就是按照血統（即血統主義）來設計。其實，大多數歐洲國家都兼具有這二種主義的特性，只是孰重孰輕的問題而已。像在英國、荷蘭、法國與比利時，出生地主義較占優勢，公民身分可以直接為大多數出生在該國的外國人所取得，或是在雙重出生地主義的限制下取得，意即自己及雙親裡的一位得出生在該國。在瑞典、德國、瑞士則是血統主義占上風：外國人的孩子即使出生在該國，仍無法取得公民身分，除非事先已歸化該國。但是，一套血統主義或出生地主義為本的制度可以結合不同種類的法律在裡面，以血統主義占優勢的瑞典為例，出生在當地的外國人可以選擇去登記歸化，相較於歸化極度難以取得的瑞士與德國，瑞典在這點上算是十分開放的。

在所有這些國家裡，具有特定條件而居住在此的外國人都

可以向有關當局提出申請，由後者來決定是否授予，而申請者對此決定通常無權要求上訴。在法律上對於透過歸化來取得公民身分有著不同的條件要求，例如在德國必須放棄之前的國籍，在法國卻不必；在既存的制度下也存在著顯著的差異：因此瑞典雖然要求人們必須放棄之前的國籍，但在許多個案裡愈來愈容許雙重國籍的存在；德國卻不然。

另外，還存在著更多一般性的差異。¹⁷因此，德國缺乏一個一般性的文化來支持歸化，同時主管歸化的行政官員也宣稱德國並非移民組成的國家。在法國對移民來說，不歸化是十分異常的事；像前幾章所說的那樣，法國是歐陸上唯一擁有讓移民定居、願意推行歸化這類傳統的國家（Brubaker, 1992; Wihol de Wenden, 1988; Weil, 1991）。在德國的概念裡，一個人不能藉由像在北美洲的自願表示效忠的形式，或是像法國透過由國家參與其中的同化，而能夠加入民族國家（Kohn, 1967；請同時參考Hoffmann, 1990; Oberndörfer, 1991）。

在幾個國家針對歸化政策進行修正前的1980年，每100位外籍居民裡（大多是同一年）歸化的比例分別是德國0.3%、比利時1%、瑞典3.5%、荷蘭5%及法國3.4%。嚴格來說，這些數據之間並不可比較，這是由於資料來源與含納進入的標準不一，以致計算某些個案的結果也不同；例如德國把德裔人取

17. 當我們針對為組織而起民族國家進行的整合計畫時，就會發現最普遍存在的差異。Castle與Miller（1993）的研究發現存在著四種可能的結合形式：由某個族裔團體來統治多族裔的帝國；由相同血統者來統治的單一族裔形式（血統主義）；共和形式——視國家為政治共同體（出生地主義或者是藉由出生地來取得公民身分）；多元文化形式——從共和形式做修正的嶄新形式，容許文化與族裔間的差異存在。Baubock（1994）曾檢視過公民身分的種種可能性，包括一些為了因應日漸增多的移動工作者而設計的跨國公民身分。

客人？外人？

119

得公民身分也算在內，將提高它們的數據，而法國將自動取得的公民身分也算在內，同樣會提高它們的數據。在大多數國家都明顯向自由化進行調整後，1991年時的歸化比例變成奧地利2.5%、比利時0.9%、¹⁸瑞士0.8%以及德國0.5%（這個數字排除了德裔人，假使算進去的話，將達到2.4%）、法國2%（假使把自動取得的算在內，估計有2.7%，這些自動取得者大多是出生在法國的小孩）、荷蘭4.2%、瑞典5.7%以及英國3.4%（請參見表格9；同時可參考Baubock and Cinar, 1994）。在1996年時，德國與荷蘭有顯著的爬升。

Rath（1990）曾針對七個主要國籍在1980年代中期時，於六個西歐的移民接收國裡的狀況做出了細緻的比較，發現取得公民身分的比例差異性，在不同接收國間比起在同一國裡的不同國籍團體間要來的大，這說明了一個國家規範公民身分的法律比起歸類於特定國籍團體的歸化傾向是較顯著產生影響的。瑞典與德國是二個極端：在瑞典沒有任何一個被考慮的國籍團體其歸化率低於1.8%，而在德國則沒有任何一個高於0.6%。

爲了再強調規範公民身分的法律到底有多重要，我們再比較二個彼此差距很大的國家，一個是到1993年針對第二代移民改變政策前，都實行自動取得公民身分的法國，另一個是從未這麼做過的德國。就移民及其後代能融入成爲公民的整體比例而言，法國比德國高出10倍。如今法國擁有愈來愈多的第二代葡萄牙裔法國人以及馬格里布裔法國人（譯註：馬格里布Magreb指的是包括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斯的非洲西北

18. 但必須注意的是，1992年實行新法讓數字比前一年增加了六倍，高達約46,500人在1992年完成歸化。

部地區，有時也包括利比亞），他們也都成爲了法國公民。但是在德國出生、成長的50萬名土耳其第二代移民卻不是公民，這鉅大的差異發生在自1960年代以來對移民類似的工作條件脈絡下。但是，我們也看到了日漸匯合的現象。1993年在法國新的國籍法改變原本自動獲得公民身分的規定，如今絕大多數人得要先宣誓其意願才能取得。而1990年德國的外籍人士法（Foreigners Law）卻放寬第二代的歸化程序（Faist, 1994）：在德國居住滿10年的所有外國人，都有權提出歸化的申請；另外，年紀在16到23歲間的外籍青年只要在德國就學滿四年，也可以進行歸化。1990年後期，在法國由社會主義政黨以及在德國由社會民主黨所領導下的新政府推動自由化的改革，使得這股匯合的趨勢持續增強。

然而，或許最值得注意的是，當我們排除了自動取得的公民身分後，所有這些比例將有多麼稀少。當我們以跨國比較特定國籍團體時，最明顯的差異將顯現出來。以德國與瑞典爲例，摩洛哥人在德國只有0.1%的比例，但在瑞典卻有20%，是德國的200倍，這個倍率也是這個研究所有國籍團體與國家中，最極端的數字。另外一些明顯的差異發生在希臘人身上，在德國只有0.1%的比例，在瑞典卻有10.5%；此外土耳其人的比例分別是0.1%與6%；西班牙人則是0.2%與7.4%；義大利人是0.2%與2.2%；南斯拉夫人是0.6%與1.8%。雖然這些差異都在相當小的範圍內變動，但一個國家規範公民身分的法律確實發揮了作用：因此，在1985年荷蘭實行新的國籍法（Nationality Act）後，在一些國籍團體裡歸化的比例增加了四到五倍之多。

很多因素會影響這些比例：是否鄰近其母國；其母國是否

客人？外人？

為或即將成為歐盟成員；母國規範公民身分的政策——例如摩納哥與希臘並不容許放棄他們的公民身分的舉動。

在1980年代晚期，各國間大致的差異如下所述：瑞典、英國和法國採取自由的政策走向，在外籍居民的公民身分取得上，這三個國家都僅做適度的條件限制：出生在該國的小孩可以自動或經選擇後取得公民身分、五年甚至更短的居住年限、申請手續上適度的花費、對良好行為的有限要求、簡易的申請程序（Rath, 1990）。荷蘭與比利時於近年來也自由化了其手續，但仍要求必須確認申請者融入該國的意願，同時必須接受有關當局的調查，因而手續較為複雜。德國與瑞士在歸化過程上有許多條件限制與要求，移民的後代申請程序同樣如此，必須有10到12年的居住年限、高額的規費，以及由當局任意指派的複雜手續，以證明申請者融入當地社會的情況良好。在德國與瑞士的歸化被視為是同化的最後階段。

121

透過對英國與瑞士之政策較細緻的描述，將讓我們更清楚明白何謂自由與較不自由的申請程序。或許最令人注目的現象是較自由的制度日漸緊縮，而較保守的制度卻日漸（這類舉動似乎永遠都是這麼漸進）放寬，這也正是我們在今日西歐許多國家裡可以看到在移民與難民的政策上，整體來說已漸趨相似的情況，不論這些國家在歸化與公民身分的法律上，原本以及持續以來的差異有多麼鉅大。

英國的制度傳統以來就力行出生地主義：所有出生於英國在世界任何角落領土上的人都可以擁有英國的公民身分，即使其父母並非英國人，雖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原大英國協的諸國都各自立法來規範公民身分，但英國公民的身分仍舊保留下來。移民控制的措施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開始實施，限制

了公民進入與定居的權利，因而破壞了英國原本較包容的公民身分定義，最終較狹隘的定義在1981年時透過英國國籍法案（British Nationality Act）予以明文規範，認定一個出生在英國的人要成為英國公民，必須在出生當時雙親之一是英國公民，或是定居於英國；而一個出生在英國之外的人要成為英國公民，除了在血統上的認定外，還必須在出生當時雙親之一是英國公民，或是雙親之一必須是在軍隊或其他政府機關裡服務，或是在歐洲共同體的機關中服務。生於英國但出生時不符取得公民身分的資格者，在10歲時可以申請成為公民，但必須在這10年間出國的時間不到90日。另外還有各式各樣跨國取得公民身分的規範；這一切規定在1987年12月31日時被終止。在幾種情況下可以申請歸化，其中之一就是居住在此三到五年，但是否接受申請是內務大臣（Home Secretary）的職權所在，而且毋需提供予以拒絕的理由。¹⁹

瑞士的公民身分是立基在三個自治的行政層級上：聯邦、州以及區（commune d'origine），一個公民即使從未住在瑞士，也能繼承「城市的權利」。申請歸化者必須同時為三個層級接受，因此歸化成功的比例在不同的州與區裡變動很大。1952年頒行的聯邦國籍法（Federal Nationality Act）雖在1984

122

19. 在法國，能否歸化最終仍是政府的自由裁量決斷，但很少會被拒絕的：據估計，只有10%到12%的申請會被拒絕，其中許多是第二次嘗試的（Costa-Lascoux, 1987）。另外，據支援移工的組織CIMADE（譯註：法國一個救援團體——離散者救援委員會的簡稱）的估計，申請被拒的比例約在30%。

客人？外人？

12年以及「有歸化的意願」，後者是透過複雜的程序，希望能確認申請者及其家庭融入瑞士式生活的意願，而這項要求必須同時得到三個層級的認可才算完成。在州與區的層級裡，許可與否的決定往往是透過立法機關或是公民集會做成的，這都會受當時的政治氣氛很大的影響。

幾次針對歸化政策舉行的公民投票，其結果減少了一些限制：1983年讓女人同樣和男人一樣，享有轉移公民身分給孩子的權利，在1987年的條例則把這項能力延伸給配偶。歸化政策一直以來受制於反移民主張的政黨——反民族與祖國過度外來化之國家行動黨（National Action Against Overforeignization of People and Fatherland）的攻擊，此黨透過憲法的修正，希望將每年歸化的人數限制在4,000人，但這項提議在1977年訴諸投票時卻以二比一的比例被否決。

荷蘭的例子告訴我們，一個積極推動自由化體制的嘗試是如何要求移民負起整合入社會的重責大任。1985年新版的荷蘭國籍法（Dutch Nationality Act）取消了不久之前（1982年）的版本，准許自出生後即居住在該國的18至25歲外國人，可以經選擇而取得荷蘭的公民身分，這是一項簡易的申請。在1987年之前這段過度時間裡，母親為荷蘭人的外籍小孩也能經選擇取得公民身分，很多人當時也都這麼做了。雙重國籍在當時是被允許的，而父親或母親是荷蘭人的也可以取得公民身分。出生在荷蘭的外國人之子女，只要出生在荷蘭，就能成為荷蘭公民。至於其他的外國人得先歸化，而進行歸化前得在荷蘭住居住五年、年滿18歲、無特定類型的犯罪記錄，同時可以用簡單的荷蘭語與人對話；假使歸化申請被拒絕，還可以上訴。

在這項法律裡，主要的改變條例在於賦予男女有同樣取得或轉移公民身分的權利，以及有權對歸化被拒的決定申請上訴，還有以行政的程序代替原本立法的程序。新的法律包含在荷蘭「少數族裔政策」的大架構下，這個政策希望把嚴格的控制與自由傾向的歸化與入境制度做結合，同時認為外籍公民及居民的文化認同應該被尊重，因此針對歸化僅設立了最低程度的整合要求。

123

在1990年代初期，一些歐洲國家遭遇到極大的壓力，希望能對那些被視為是洪水湧入的難民與移民進行控制，因此改變了政策，實行了對入境更多限制的規定，這也導致了西歐國家在政策上的匯合。包括法國在內的一些自由傾向國家，對取得公民身分及歸化設下了更多的限制（請參考1993年的新國籍法規）；而像是德國這類的國家則鬆綁了歸化的條件，讓取得公民身分前必經的這一步更容易達成。瑞士修改了規範公民身分的法律，如今允許在歸化時保留其原本的國籍，在荷蘭也不必先放棄原先的國籍，這使得這二個國家與主要的人口移入國家以及允許多個國籍的國家更加相似，前者像美國、加拿大、澳洲，後者則有英國與法國。德國、奧地利與盧森堡如今仍維持放棄原本公民身分的要求，但瑞典已大致容許雙重國籍的存在（Baubock and Cinar, 1994）。在德國，「社會公民權」（social citizenship）的擴展已增加了移民的政治機會，同時也有規模不小的運動，要求允許出生地主義的某些概念以及雙重公民身分存在。同時德國在1993年也修改了規範庇護的法律，加入了更多的限制。對於遷移與庇護政策上的匯合的確是當初歐洲共同體形成的目標之一。希望能減少多重國籍現象而於1963年訂定的歐洲議會公約（Council of Europe Convention）

客人？外人？

已透過等待追認的第二次議定而減少了限制，同時在不久的將來，也預估將有更實質的轉變發生。

124 以上透過很簡要的描述，討論了幾個國家的規定。這樣的描述方式排除了整套手續與控制如何實際執行的面向，也排除了以下幾個更廣泛的議題，包括移民如何在法律與政治實踐裡被再現為特定的社會政治類屬，來自不同地區、背景的移民如何再現自己、當西歐看待難民與移民的方式，以及西歐的移民問題如何從勞動力市場的考量轉變為認同議題並將他們種族化，這個重新界定的過程（Schnapper, 1991; Wihtol de Wenden, 1988; Faist, 1994; Weil, 1991; Miles and Phizacklea, 1984），²⁰這些議題也很可能動員起廣大群眾的情緒，我們將留待第七章再多做討論。

移入議題與來回移動的自由

歐盟的成立讓各國必須在下列議題上採行一致的政策，包括政治難民的承認、非法移民的處理、外籍居民的地位。在歐盟境內撤除邊界的舉動導致各國在居住、停留、簽證、工作許可、犯罪上的規範也必須要一致。令當前政策制定者頭疼的主要問題之一，在於許多政策與法律裡將移民區分為兩種等級：隸屬於歐盟成員國的人，以及歐盟之外的人。前者已逐漸被授予一些權利。更進一步是當前歐盟的護照所象徵的發展——公民身分的超國家形式，更加深了規範不同種類居民體制的差

20. Wischenbart (1994) 也曾用另一種方式來闡明移民政策的現況有多複雜與重要。他認為從奧地利的移民政策可看出奧匈帝國的文化遺產又再重新運作起來。

異，尤其是在歐盟人民與非歐盟人民之間。促使在歐盟境內普遍的公民身分應享有之權利得以發展的馬斯垂克條約，裡頭也賦予在歐盟境內公民投票的權利，此約也迫使我們必須面對移民與難民的議題，還有這些人歸化所伴隨而來的問題。

1990年代初期在討論政策一致性的問題時，移入議題之所以浮上檯面，一方面是因為規範人群自由移動的條例，這個權利是實現歐洲單一市場的梦想裡不可或缺的元素，另一方面是因為外籍居民人口、非法移民與尋求庇護者的數目大幅增加。移入人口的遽增是因為家庭團聚、自然增加以及來自東方之新移民的關係。1991年時，估計有260萬名非法難民，到了1993年時則增至400到500萬人之間。尋求庇護者的人數在短短幾年裡就增為四倍之多，光是在1992年就有70萬人，占流入歐盟地區的移民人口總數約四分之一。

在1991時有愈來愈多人擔心在難民與尋求庇護者之中，有許多其實是經濟移民，他們利用庇護的理由以便在關閉勞動移民大門之際，有更好的機會能進入。也有愈來愈多的批評與關切指向申請程序進行太過緩慢，導致尋求庇護者在地位尚未被確認前，無法工作而使生計產生困難，另一種情況是在地位尚未被確認前，無法支領提供尋求庇護者優渥的福利津貼。發生在前南斯拉夫戰爭所導致的大規模難民潮也加深了以上的疑慮。事實上，各國共同努力的目標是將這些難民留滯在母國，或儘可能將他們留在「距母國愈近愈好的地區」，以及前南斯拉夫的範圍內。

歐盟境內人身自由移動的原則長期以來就是個爭議不斷的議題，即使是歐盟成員國國民的權利都有異議了，遑論非歐盟的國民。因此直到1988年以前，希臘公民仍不允許自由的移

客人？外人？

動，而在1992年以後西班牙與葡萄牙人才享有這項權利。

原則上，成員國在這些議題上〔包括特維小組（譯註：特維小組（TREVI Group）全名為Terrorism, Radicalism, Extremism and Violence International，1975年成立，由成員國內政部長及相關部門官員組成，一年召開兩次集會，負責恐怖主義與內部安全事宜；請同時參見註釋23）與申根協議等等〕所採行的措施並未明顯排除非成員國的國民，但民族國家在這些事務上仍是擁有主權的決斷者，即使整套可凌駕在國家決斷之上的權利義務規範，以及制度正對它運用主權的權力產生侵蝕。我們將在第七章時再回到這個議題的討論上。

在這個脈絡下，對移民所施行的規範集中在限制工作證的核發、非法勞工的逮捕與遣返、鼓勵已失業的人志願返回母國上；這麼做的目的是要讓成員國的工人可以優先取得工作機會，而這種就業規範上的緊縮政策也造成了對移民工人的傷害，因為他們通常都缺乏訓練與專業背景。²¹

歐盟成員國許可那些來自非成員國的合法移居者，就像那些成員國的國民一樣，享有同樣的權利可以在境內來回遷徙。荷蘭則要求所有移民必須在該國定居至少五年才能享有這權利。而簽署涵蓋特定國籍的雙邊及三邊協議，在原則上是可行的：因此，法國、比利時與荷蘭境內都擁有一些摩洛哥人，而這三國也都因為遷徙自由使三國能在不同失業情況的地區內，有效率地分布勞動力，讓這三國顯著的受益。但要如何設定擁

126

21. 對於北非移民而言，這種現象特別嚴重，他們其中有85%是住在法國。除了緊縮對移工的控制之外，各國政府與歐盟機構還必須著手執行一些支援移工的政策。法國在1984年2月1日開始實行的第84-05號公告就是個很好的例子，其重要措施裡有一項就是提供失業的移工職業訓練。

有那些國籍的人可以享有，同時人數的上限要如何設定？

至少有一些人認為這類在幾個簽署國內達成自由遷徙的協議，應該適用於這些簽署國境內所有國籍的外國人，才不會造成另一種區別。這也解釋了為何有些政府不願意向所有國籍的外國團體，或是向今日尚未出現在其領土內的外國團體敞開大門。而對自由遷徙有區別性的設計也強化了當前移民之間在國籍上的分布情況，複製了在特定國家內有特定國籍團體特別集中的現象。

在單一歐洲市場的計畫以及難民、移民情況不斷改變這二種情勢匯合在一起的背景下，我們看到了浮現出來的是歐盟組織對移民、難民政策上更深的介入，這是在數年前猜想不到的。即使各國政府長期以來在這個議題上，從不願放棄自身主權的行使，同時歐盟組織在這些事務的許多方面仍無法勝任有餘，但事情真的這麼發生了，並實行了一段時間了。在馬斯垂克，歐盟各成員國政府並未給予基於簽定條例而成立的歐洲共同體，在移民事務上除了簽證的政策之外的領導權。因此，各國政府必須共同協調其行動，以制定執行有效的政策與程序，同時避免把問題推給鄰國。各國政府訂定了跨國協議，並共組工作小組以掌控歐盟境內的政策制定情況，而針對移民與難民事務，歐盟組織介入的興趣日益濃厚，也漸漸發展出了一套專業方式來管理（Voisard and Ducastelle, 1988）。

在歐洲共同體的成員國之間簽定政府對政府的協議其傳統由來已久。²²在1970年代我們已經看到各式各樣政府間合作的

22. 政府間的協議能容許各別國家針對不想在歐洲共同體的架構下處理的事務進行運作，包括一些歐洲共同體同樣有權處置的議題。這類協議受到國際法而非歐洲共同體機構的約束：而因為歐洲共同體條例沒有

客人？外人？

團體出現，大多是與外交政策相關。因此，歐洲議會在1986年針對移民議題成立工作小組這件事，並不新鮮、少見；這小組之所以會出現，主要因為特維小組的成立，以及大家日漸認同一件事，就是單一歐洲市場將使各國面臨移民議題的挑戰，而此議題必須透過政府間的努力才能解決。²³事實上，1988年6月漢諾威（Hanover）的歐洲議會討論移民議題後，幾乎每次歐洲共同體高峰會都必須碰觸這話題；而在單一歐洲法案（Single European Act，簡稱SEA）通過後，政府間針對人身移動自由共同的努力，主要的結論就是1990年頒布的都柏林協約以及1991年起生效的外部邊界協約（External Frontiers Convention），兩者都隱含著遷移與移民的議題在裡面（Butt Phillip 1994）。²⁴

127

更廣泛來說，有些歐洲共同體的國家也倡議透過1985年的申根協議（法、德、荷、比、盧都有簽訂），在歐洲境內打造一個無邊界的區域。這五個申根協議簽訂國無法在1989年11月簽定第二份協議，因此無法按原訂在1990年1月1日推行無邊界區域的計畫；這項計畫的失敗除了因為柏林圍牆倒塌後外部邊界的控制問題浮上檯面，也因為在銀行保密、毒品、資

規範歐洲議題的權力與功能，因此後者也提供了一個制度性的大傘，可容納政府間的協議。像1993年對家庭團聚議題的處置，這類政府間協議的處理方式在國際法與歐洲共同體法律內並無依據。

23. 特維小組成立於1975到1977年間，它讓各國的內政與司法方面的官員與部長們，得以藉由政府與執行機關間的合作來處理一些事務，包括打擊犯罪活動與保衛境內安全等。
24. 都柏林協約在本章前面已簡要地陳述過。外部邊界協約則讓各國承認彼此提供非歐洲共同體國民的簽證；如今定居在歐洲共同體其中一個國家內的非歐洲共同體國民，假使想進入另一個成員國，若停留不到三個月的時間，毋需申請簽證，但前提是必須不是去那裡就業的。

料保護等議題上的歧見。第二份申根協議雖然在1990年6月簽定了，但許多問題仍未解決，實際執行的時間也一再延緩：1992年1月1日、1993年12月1日、1994年2月1日。其間的困難一部分是因為仍需要歐洲共同體的制度來處理一些事務；另一方面，英國也宣稱執行遷徙自由上遇到的困難，再加上歐洲共同體組織僅在一些必要程序上才有權力介入，這個事實強化了國家在處理恐怖主義、移民、國籍等問題上不受限制的權限。

申根條約同時向我們說明了，在移民事務上這種政府間協議的潛力與局限何在。申根協議也因為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與希臘的加入而得到強化，而它們也決定要在申根協議的範圍上圍起更加嚴密的外部邊界。申根資訊體系也在成形，而最後落腳於斯特拉斯堡；同時，申根成爲了政府間努力朝向內部毫無疆界控制理想邁進的象徵（請參考Spencer, 1990）。

在1990與1991年時，政府間合作的架構與歐洲共同體的形態都面臨了類似的難題。從那之後，出現了各種提議，希望能共同承擔難民與尋求庇護者這個愈來愈重的包袱，尤其因爲有些國家接收了其中大部分的人；簽證的政策已成爲歐洲共同體組織的權限；政府間對難民、移民、庇護者議題上的合作也被含納成爲所謂馬斯垂克的第三項重要決議。歐洲共同體組織介入移民與邊界管制的議題愈來愈深，在1991年時，歐洲共同體要求各國採行相同的移民規範與政策，而不僅將移民問題視爲邊界管制下衍生的次議題。至於政府間合作的組織，如移民工作小組，它們核心的關懷之一：非法移民議題，也必須仰賴歐洲共同體層次進行的行動；另外在推動驅逐出境上的努力也同樣如此。

客人？外人？

愈來愈多人認同在一個行動自由區域裡的移民與難民政策必須要一致，再加上歐洲共同體與跨政府機構的專業能力日益提升，因此製造出了一長串該被執行的工作項目。一份「不受歡迎的外國人士」名單已準備好要在各執行機構間傳閱，而對公務人員在邊界控管的各種事務上進行的一般訓練也已就緒；另外，一個交換邊界穿越與移民相關事務的新資訊交流中心也即將成立；最後，在家庭團聚上的規範也已進一步地趨於一致。更多朝這個方向努力的工作在1993年6月於哥本哈根舉行的WGI（Working Group on Immigration的簡稱，即移民工作小組）會談中已被執行，包括要求在內部對非歐洲共同體人士有更多檢查的措施，以及要求制定驅逐出境的明確標準。²⁵

在WGI的工作表上羅列的議題，包含範圍從對第三國國民提供短期契約，尤其是從東歐來的，到那些尚未取得歐盟成員國國籍的長期移居歐盟境內者。後者是歐洲共同體內針對國籍政策討論的一部分，因為任何一個歐洲共同體成員國授予申請人國籍，意味著此人享有在歐洲共同體境內所有的權利。同時，拒絕授予長期居民公民身分，愈來愈被視為是不恰當的、無法持續也不應維持的政策，因為這讓移民無法整合進入新社會裡，而這是當前十分重視的。即使是這方面限制最多的德國，也開始調整立場，承認自己的政策將成為歐洲共同體內的困難。²⁶

25. 針對非法移民的議題，已用盡方法勸導各國政府不要每當情況不在掌握中時，就經常試圖將它規範化；而是希望接收國與輸出國的政府們能彼此協調，同時設立配額制度來吸收那些有急迫需要的人。

26. 對歐盟而言，可能的選項是共同商議國籍政策，規定出歐盟境內各國每年核發新公民身分的上限；也很重要，在進行大規模的遣返回國動作時，要與第三國商議是否授權讓他們能歸化及有公民權利。簡

整合一致性的政策過程所產生的困難，因為環繞如何規範家庭團聚的討論，而更加被凸顯，但後者在原則上並未有異議，並在各國間有相當一致的看法。這項政策是基於對人權的歐洲協約（European Conven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的第八條而來，裡頭聲明人們有權過著正常的生活，認為家庭構成了社會自然且基本的要件，因此國家與社會應該予以保護。²⁷據此，移民有權在自己收入負擔得起、居住無虞、其申請被接受的情況下，接送家人一同來團聚。即使如此，這仍是西方中心下對權利的看法。因此，當法國與德國試圖對家庭團聚設限時，就被行政和憲法法庭認定有違反國際協議之虞給阻止了。在法國，1970年代末期的政府曾想禁止家庭團聚，但被議會給駁回了（Weil, 1991）。

129

在這項政策的細節規範上各國有著很大的差異。例如，來自馬格里布地區的移民在家庭團聚的規範下較為不利，這是因為他們居住的環境較差，同時在勞動力市場上的位置很容易遭到失業的威脅（Khader, 1991）。

許多人認為，在歐洲共同體的規範趨於一致的要求下，意味著相關的情勢將走向自由化，但仍有害怕家庭團聚會使移入數目增加的恐懼心理存在。但是，有些人（請參考 Khader, 1991）認為依親的數目不可能太過龐大，理由如下：在歐洲各國生活花費高昂的情況下，單獨住在這裡的人中很多可能不會選擇讓親人過來，更何況要找到適合一整個家庭居住的環境並

單地說，急需討論的議題就是，規範公民身分的不同制度如何對整個歐盟產生衝擊。

27. 在1975年簽定的ILO協約第143條也承認家庭團聚能滿足人道主義與社會融合的需求。

客人？外人？

不容易；另外在本身還與母國保持連繫，又希望下一代在母國接受教育的情況下，不太可能將老一輩與小孩都帶離母國，因此在大多數的勞動遷移例子裡，是與家人分離的。許多人在異地工作了幾年後，仍存著有朝一日回到家鄉去的盼望。

目前仍舊沒有所謂歐洲共同體的移民政策，也沒有所謂歐洲共同體的規範公民身分政策，但歐洲共同體漸漸取得了專門處理這類事務的權限與權力。它也與各國政策共同分享在制度上的責任，而制度上大多的責任事實上仍屬政府與政府之間的，而非歐洲共同體能掌握。歐洲共同體的組織也不受民主程序的控制，因此其權力無法在各方面受到約束，這個事實在歐洲共同體被挑戰的敏感領域上更是顯而易見，例如在個人的公民自由議題上。這也意味著歐洲共同體的政策推行上，在各國議會的討論與追認上經常會遭遇困難。然而，各種情勢匯合在一起的新局面仍使各國政府與歐洲共同體，可以共同努力地在歐盟內進行協調一致性的移民和難民政策，而這與幾年前的局勢相較起來可是天差地別。

第七章

今日的移民政策該如何制定

這一章將運用本書所談到的歷史，發展出幾項我認為很重要的主軸，以便增進我們的知識並有助於移民政策擬定。第一個主軸就移民潮仍被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所限定。在接收國的集體社會想像或是一些巷議雜談裡，總是把移民與難民想像成是從四面八方無止盡地湧入的洪水；然而，這絕非今日的實際狀況，即使在沒有邊界控管的過去也不是如此。第二個主軸是在其他如經濟、政治、文化方面跨國化過程的影響下，反映在移民與難民的政策上，也有日趨跨國化的傾向。各國政府仍在許多事務上享有主權，但它們日漸被含納入一張權利與規範的網絡裡，與其他的實體鑲嵌在一塊——從歐洲共同體組織到捍衛難民人權的法庭。第三個主題是對今日的歐洲而言，可供選擇的康莊大道只有一條，就是與定居的難民與移民共同努力，協助他們完全融入社會裡；透過保障文化與宗教的多元性架構來達成上述的目標，將成就公民社會的一環，這一環能將我們緊緊繫在一起，而不是區隔開來。

133

上述三個主題同樣也涵蓋了部分的難民議題，畢竟一旦他們定居下來後，所遭遇的情況常常與移民是十分雷同的。同

客人？外人？

134

時，我們也必須針對這群尋求避難者的情況，維持某些特定的措施；當前的情勢督促我們修正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制定的日內瓦協約對難民的定義，這將決定那些想逃離迫害者能否有機會一償所願。本章也會討論難民的問題，但僅限於他們與移民共同面臨的部分。

勞動遷移是鑲嵌在特定脈絡的過程

過去兩個世紀以來的證據顯示，勞動遷移在地理上與時間的持續上是有模式可循的，絕非不可逆轉的洪流。同樣地，用大規模入侵的觀念來想像也有問題，雖然移民大多來自較貧窮的地區，但他們一般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也從來不像龐大洪流般，「入侵」的這種事情更是從未發生過。甚至在政府還未對邊界完全掌握控管並缺乏技術與組織能力可以控管的時代，也只有某個地區或國家裡的少數人可以遷移。

在從前的時代，有些地區裡窮人遍佈，區域間薪資與工作機會上的差異懸殊，又沒有邊界的管制，為什麼窮人們沒有全部（或大多數）移往較富裕的地區呢？

勞動遷移發生在特定體系的脈絡裡，並且當中似乎存在著多樣機制，成就了遷移的規模、持續時期、地理位置。從巨觀社會的角度來看，這些都可被視為平衡機制的一種。我們或許可以這麼說，正因為勞動遷移從未演變為大規模入侵，因此它一直是某個體系的一部分，且受到這個體系特質的決定。歐洲的勞動遷移歷史告訴我們，從未有過鉅大、長時間且過量移民潮出現。

招募工作與（經常是特定空間上、特定範圍裡的）網絡的

重要性、長期進行且連繫起特定起終點巡迴遷移的頻率，這一切都指出了遷移是鑲嵌在特定體系裡，並為這個體系所形塑的事實；這個事實早在國家能控制邊界之前就已存在，因此我們知道不僅僅是移民政策這類東西才能產生出形塑遷移的結果。一般來說，除了個別遷移者的意願之外，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遷移潮的形態與持續與否，常常還包括了某種特定地理區內的體系。

135

我們可以從許多方面標示出這類體系的特徵：經濟方面（例如19世紀的的大西洋貿易、歐洲經濟共同體、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政治—軍事方面（幾個歐洲國家建立的殖民體系、美國對中美洲的介入）；跨國性的戰爭層面（例如因為歐洲幾場主要的戰爭引發的大規模難民潮）；文化—意識形態層面（能提供每個人「美好生活」的西方民主意象對社會主義國家產生的衝擊）。

然而，儘管明白體系對勞動遷移在地理、持續時間、規模上的形塑；儘管知道人口成長十分緩慢、死亡率又高、勞動短缺情況又很危急，但是移民工人在19世紀時就已被歧視，被整個大社會底下的許多團體所憎惡。今日，爭論或許集中在種族與文化的議題上，但事實上這只是用新的內容來承載舊有的激情：將外來者與「他者」給種族化。今日，「他者」被刻板地再現化為另一個不同的種族與文化。事實上，從外顯的型態以及廣義的歐洲文化來看，移民始終被標識為「他者」。遷移被認為是兩個世界之間的移動，即使是在同一個區域或國家內進行的，像是東德移往西德。

雖然移民與難民的數目常常十分可觀並被視為「他者」，但即使在歐洲，失控的洪流與「被入侵」的經驗卻似乎從未主

客人？外人？

宰人們的想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才有了改變。國際體系的形成與強化使得邊界控制及國籍的問題浮上檯面，而出現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難民」定義主要也是出於國際體系，這定義與更廣泛的人權概念、尋求庇護是普遍人權等概念，只有薄弱的連繫。

136 在19世紀大多時期，「移民」被建構為一個範疇的方式與今日大不相同，因為當時的邊界控制並不嚴格，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後，各國政府才行使主權力求邊界控制。邊界的集中控制之所以產生，部分原因是因為國家掌控所有的邊界與境內領土的能力有所增長。這種想把所有領域的活動都加以管制與「國家化」的渴望，為「國家」的歷史寫下嶄新的一頁。而另一方面則因為國際體系的強化。

今日，在歐洲共同體的制度成形、國際性體系發生變化、冷戰結束的情勢下，來自貧窮國家的移民與難民一度又再被混為一類，認定為他們都是來自東方、南方的人們，基本上都是為了滿足經濟上的需求而來。與當前經驗及人們觀感較近似的或許是19世紀的情況，而非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或大部分的冷戰時期。

我認為去面對以下這個問題是很重要的，即探究勞動遷移究竟是不是一個經濟與社會體系運作或演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簡單地說，這個論點的邏輯如下：如果移入現象是由一個個尋求更好生活的個人加總而成，那麼從接收國的角度來看，移入現象就是一個外生的過程，也就是說受到與接收國家無關的因素形塑與影響下出現的過程；接收國因此被強加上幫助這群人適應的責任。在貧窮與人口過剩的情況更加嚴重的時期，這類論點將轉變為針對移出現象的另一平行論點，至少

是潛伏著這樣的論點。接收國被視為是一個被動的旁觀者，面對著在自己領域及控制之外的過程正在發生，因此如果想避免遭受這場「侵入」的襲擊，它們唯一的選擇就是緊緊地關上邊界。

然而，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如果移民現象受到接收國經濟體系的操作影響，包括直接的人才招募在內，那麼接受國就不能自稱為僅是個外於整件事務的被動旁觀者。如此一來，移入現象便成為接收國經濟的成長過程裡，在空間與時間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至少在一些特定衰退與重整的時期裡，情況是如此，就像1970年代與1980年代美國經歷了去工業化，但是血汗工廠卻取代了有工會參與的工作。移入現象發生在國與國之間不平等的脈絡下，但光靠不平等是不足以形成的（請參考Sassen, 1988; 1998, ch2）。這種不平等還必須被激發為一股推動遷移的力量——透過有組織的招募工作、新殖民主義下的連帶關係等等。接收國的經濟、政治與社會條件成為影響移入潮流的因素。移入的人潮或許會等待勞動力需求的轉變，或是工作機會飽和與否的時機，但同時他們也不斷按照接收國的情況來調整自己的腳步，即使這些調整可能不盡理想。因此，一旦在1990年代初期德國的工作機會並不多，同時德國又容許由東向西的通勤遷移，尤其是由前東德往西德的遷移時，移入德國之波蘭人的成長率就下滑了。人潮的規模與持續的時間為這些條件所影響：它絕不是只受另一地的貧窮及人口增加所影響下的外生過程，因此自然會依照接受國的情況而做調整。

如果規模與持續時間全面都受到接受國的條件所影響，那麼也就有可能制定出合理且有效的移民政策。要去管理一股有模式可循、被某些條件影響的移民潮，所使用的方法是非常不

客人？外人？

同於要控制一股「侵入」的浪潮。有效的政策執行方式並不必然意味移民潮及其定居的情況能與接受國完全協調一致，現實生活裡這是不可能出現的：移入現象是由人類所建構而成的，而在過程裡，人總是帶著意志、能動性（agency）、多重認同以及自我生命軌跡，這些因素都讓現實中的移民並不吻合那些考量接收國的政經體系或社會的利益下所看到的、界定的移民範疇。在這個議題上沒有絕對的證據，但卻有模式可循，也有過去曾經存在而已結束的模式可循，它們可以告訴我們，移入現象如何由一連串受制約的事件所構成，如何開始與結束，如何在特定的地理範圍內運作；所有人口移入的組織與運作，都大大地受到接受國的政治、經濟與社會所制約。

遷移的地緣政治

將人口輸出與人口移入國家緊緊在一起的機制，原則上以多種形式呈現出來，但其中有兩種是最顯著，並且能解釋大多數的遷移是如何開始的。一個是過去殖民與當前新（或準）殖民狀態的連帶關係。第二種是經由政府直接開啓，或是因政府支持的誘因促使雇主進行的有組織招募行動，這類招募行動常常與第一種情況一併發生，但終究大多的遷移人潮仍能取得某種外於組織性招募機制的自主性。儘管組織性招募以及隨之而成的將某些國家建構為勞力輸出國所產生的遷移，在許多方面看來都與往昔的殖民連帶所產生的相差很多，但兩者之間仍有相似之處。在很多方面上，勞力輸出國是處於從屬的位置，並在媒體或政治上都被一直被再現為一個勞力輸出國，這種情況也發生在上個世紀裡，那時一些勞力輸出地區不但處在經濟上從

屬的地位，在準政治地位上也是。原屬波蘭後來割讓給德國的領土就是這樣的情況，使得這個地區產生了顯著移往西德或其他地方的波蘭「裔」遷移潮，在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也是如此，另外還有持續將自己再製為提供歐洲其他地方勞力供給國的義大利。

知道了存在著遷移的地緣政治這個事實後，也可以進一步發現有許多例子都與這種情況類似。在大不列顛當中有6%的外籍居民是來自以前亞非兩洲裡的統治區或殖民地；來自歐洲的移民比例相當低，並且有約有四分之三是來自愛爾蘭這個一度也是「殖民地」的地方。舉例來說，幾乎沒有移民是從土耳其或南斯拉夫來的，而這兩地的移民卻占德國外籍人口裡的最大宗。居住在歐洲而來自印度次大陸及英屬加勒比海地區的移民，幾乎都住在大不列顛裡。

繼續沿著這些軸線來探索會發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頭10年裡，移往德國「移民」裡占絕大多數的就是流離失所而要重新定居回德國的800萬德裔人。另一個主要的來源則是在1961年柏林圍牆築起之前來自東德的300萬人。幾乎所有的德裔人都到了德國，不然就是前往海外。但在歐洲的希臘移民裡有86%都住在德國，同樣地土耳其移民裡有80%，南斯拉夫移民有76%。較近期以來，德國將勞動招募或尋求勞力來源地區的觸角伸向葡萄牙、阿爾及利亞、摩洛哥、突尼西亞，而這些國家的移民大多數都住在法國。簡而言之，在德國的例子裡可以看到的，首先是根植在對東方地區長期宰制歷史下的大量遷移現象，其次是循著傳統上勞力輸入與輸出國之間的機制在運作的，來自較低度開發國家的移入現象。

做為歐洲長期主要的人口移入國，法國在1960年代晚期

客人？外人？

後排名落到德國之後，成為第二多的國家；去殖民化使得200萬法國人自海外返回。在戰後成長高峰期時，一股全新的遷移潮正從法國在北非前勢力範圍裡發展；幾乎所有定居在歐洲的阿爾及利亞人都住在法國，而86%的突尼西亞人與61%的摩洛哥人也如此；幾乎所有來自目前仍為法國控制的海外領土的移民，像是法屬安地列斯群島、大溪地、法屬蓋亞納，都定居在法國，但也有84%定居在歐洲非本國的葡萄牙人與西班牙人住在法國。就像前幾章裡提到的，法國向義大利與比利時招募移工的歷史也非常悠久。

荷蘭與比利時皆接收了不少來自前殖民帝國管轄下的人民，它們也接受了來自像義大利、摩洛哥、土耳其這類勞力輸出國的外籍工人。瑞士同樣地接受了來自傳統勞力輸出國的工人，像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南斯拉夫與土耳其。後來有些自發性的人潮會主動進入，但在這之前，這三個國家都會有組織地招募外來的工人。瑞典接收了93%的芬蘭移民，它也像這裡提到的其他國家一樣，有著廣大的招募工人區域，當中也包括了地中海地區的傳統勞力輸出國。

當某個特定的勞動遷移人潮行之久遠後，其目的地會愈來愈多元，這也告訴我們外於舊殖民或新殖民連帶而生的特定自主性被開啓了。來自義大利與西班牙的移民是長期居留人口中的大宗，如今也分布在許多國家裡。在歐洲的義大利移民有三分之一住在德國，27%住在法國，24%在瑞士，15%在比利時。目的地的多樣性仍是有所限制的這個事實，也讓我們看出了這些人潮漸漸演變為遷移的體系。另一方面，愈來愈多近期的勞動遷移現象都顯示了極高程度的地理集中特性，這是在典型人潮流動初期會有的模式。今日在歐洲所有的勞力輸出國

中，人數最多的移民團體是土耳其人，在德國就有150萬人。

一旦一個地區變成了明顯移出的區域後，這裡的發展似乎就很難趕得上那些勞力輸入地區，這主要是因為後者擁有高或至少較高的成長，因而累積了較多的優勢；而經濟發展的歷史也支持這樣的說法。歷史向我們闡釋說這樣的優勢，勞力輸出地區要不是根本難以趕上，就是在結構上難以成爲其中的一部分，畢竟成長空間的重要特徵就是這種不均衡的發展。歷史也告訴我們，必須經歷過好幾回的經濟階段，才能克服累積下來的劣勢以及被排除在成長動力體系之外的窘境。我們不應過於死板或機械式地看待這些普遍的論點，但對義大利與愛爾蘭而言，這樣的觀察是很貼切的，即使如今它們也吸收外來移民，但兩個世紀輸出勞動力的事實從總體經濟的角度來看，仍不是個優勢，只有少數的個人與地方能由此獲利。如今，當新經濟時代啓動之際，義大利與愛爾蘭也各自以不同的方式成爲新成長動力裡的一環。

簡而言之，我們可以這樣分析，當今日的勞動接收國愈來愈富有與發達，它們也持續擴張其招募或影響的勢力範圍，涵蓋了更多國家以及各種移出移入的機制，其中有些根植於過去的殖民關係，其他與晚近生成的各國發展參差有別的局勢有關，後者也同時構成了今日許多遷移現象的基礎。勞動遷移現象鑲嵌在不平等的機制下，不斷將各地區用勞力輸出或輸入的標籤加以標示；儘管如此，定義上的模糊地帶仍然存在，最明顯的像是中歐、愛爾蘭與義大利，這些在今日也接受許多移民的國家。

跨越國家的管制

141

本書所涵蓋的兩個世紀，再加上大量包括西歐與美國的移民相關學術文獻，都告訴我們許多跨國的管制行動。本書的目的是想探知是否今日的移民潮具有地理上、時間上以及制度上的界限，這也有助於去解決移民從哪裡到哪裡、何時、是誰在進行等等的定義問題。這些跨國的管制行動大大有助於我們能夠瞭解移民，進而知道在制定政策上有哪些選擇。

（一）移出數目永遠只占一個國家人口裡的一小部分。我們如今知道，除了那些受迫離開的難民外，大多數的人是很不願意離開自己家鄉的村子或小鎮。墨西哥大部分的人並未到美國去，而大部分的波蘭人也未曾嘗試到德國去。因此，1980年代末期從東歐進入德國的移民裡，大多數是來自羅馬尼亞的吉普賽人（也就是羅姆人）與德裔人，這兩種為著非常特殊理由而遷移的人群。有少數人因為生存空間被壓縮，因而無論如何都得走；此外在一群潛在移出者的灰色地帶，他們有可能離開或留下，端視外在的拉力因素是否夠強。然而，在貧窮國家裡很大一部分的人口是不會考慮要移出的。

在邊界尚未管控、國家實際上無科技與行政上能力如此做的19世紀裡，情況已經如上一段所描述的那樣。那時移出現象僅侷限在少數人上，即使我們在國家的次地區上來看，情況仍是如此。例如，義大利南部的一些地區曾達到歷史上最顯著的移出程度，但當我們把焦點集中在地理規模上較小的一些地區時，會發現即使在從義大利大規模移出到美洲的高峰期，最高的比例也不過是每1,000人中有40人。

在今日歐盟境內，成員國國民可以輕易地四處移動到別的

國家，以及各成員國間在所得水準上有著可觀差異的雙重條件下，整個情況仍是如此。近期歐洲的資料顯示，在歐盟居民裡很少有跨國界的移動出現；在總數3億4,000萬的人口裡，約只有1,500萬歐盟居民工作的國家，與其持有公民身分的國家是不同的，而這樣的人大多數是非歐盟成員國的國民，因此他們工作身處的國家實際上也是他們在歐盟裡定居的唯一國家；而只有500萬歐盟成員國國民的工作地點不是其持有公民身分的國家。

（二）移民永遠是一個國家人民的少數。移民占歐盟人口裡不到5%，在1,500萬移民裡有500萬（36.4%）人來自成員國，剩下的來自第三國，所以第三國移民占全歐洲人口不到3%。例如，因為文化與宗教因素難以融入而引發許多激辯的馬格雷布地區移民，在歐盟八個主要成員國裡的數目有200萬人，這占了歐盟移民人口裡的14.5%，占了歐盟境內來自非歐盟成員國的移民的21.2%，只占歐洲人口總數的0.62%。即使因為非法移民與已歸化移民的考量，馬格雷布移民總數預估會加倍，他們也尚未超過歐盟人口總數的1.3%。類似的關切也集中在土耳其人身上；但是，即使土耳其在歐盟境內的移民絕大多數聚集在德國，他們占德國人口的比例也不到2%。

142

更普遍來看，除了盧森堡之外，沒有任何一個歐盟國家的非國民占總居民人數的比例超過10%。例如德國與法國的國民占總居民人數的比例都達到了93%，在西班牙、葡萄牙與希臘更高達99%，其他的國家則大多介於這兩種極端之間。

（三）返鄉式遷移（return migration）的情況十分可觀，除非母國的軍事政治局勢不容許他們返回。例如，目前我們知道在世紀之交時前往美國的義大利人裡，有大約60%回來義大

客人？外人？

利。較近期的1970年代以來，歐盟某國國民跨越國界定居他國的比例也逐漸下滑，有部分是因為來自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的移工返回了母國。我們也看到不單是在地中海地區，在美洲不斷來回式的遷移（circular migration）也日益普遍，這些證據都向我們透露著返回式遷移成爲一種特別的現象，需要我們將移出與移入的地區都視爲是單一經濟、社會、政治體系的一部分，而移民對自己是否要遷移的個別抉擇也是在這個體系裡做成的。

（四）一個重要的趨勢是永久定居現象的形成，而會做這樣選擇的移民就比例上來看是變動很大的，但絕不可能是所有人都這麼做。即使在返回母國的比率很高，或是當地政府的政策不希望永久定居人數增加的情況下，上述的趨勢仍是有可能發生的。我們在所有接收移民的國家裡都看到這種現象在發生，包括像日本（如來自菲律賓、泰國及其他亞洲國家的新非法移民）、沙烏地阿拉伯這類極度緊閉的國家，以及西方較開放的國家。

143

對於這個現象進展的瞭解上，歐洲各國產生了很大的分歧。因此，英國的政策制定者已從移民現象最早期的階段發覺定居的情況已經出現了，但德國的政策制定者卻還普遍停留在客工（*gastarbeiter*）的觀念上。然而姑且不論政策走向如何，所有國家當今都擁有一群已定居下來的移民，其中許多人也在此生下後代。不論只是擁有永久居留權或已因爲出生的緣故成爲公民，他們大多仍在某些方面被視爲是「非我族類」。在法國即使已成爲了法國人，但他們仍被以移民（*immigrés*）來指稱，而在荷蘭、瑞典、比利時，大多數移民仍被以少數團體來稱呼；在英國也被叫做少數族裔，儘管英國除了「異族」的少

數團體外，原本就已有不列顛人的少數族裔存在：蘇格蘭人、威爾斯人與愛爾蘭人。

（五）在後二次大戰時期所有西方經濟體裡，非法移民皆成為了普遍存在的事實，不論該國特定的政治文化與遷移政策如何，這也包括日本在內。都已經引起了一連串重新思考關於該如何實行管制及該向哪些地方實行的問題（相關討論請參考 Sassen, 1996, ch3）。雖然非法移民的事實暗示著不論國家的政策如何，仍有可能進入國境之內；但根據所得到的資料顯示，大多數非法移民來自的國家與合法移民相同，而且一般來說前者比後者的數目少。這個事實再次指出了非法移民現象受約束的程度，同時它也可能與合法移民一樣，受類似的體系條件所形塑；因此，它同樣在範圍與規模上是有限的。

（六）移民是一個非常多樣的過程：當中包括想永久定居的人，以及尋找短期工作而想不斷來回的人。兩個今日主要的模式就是不斷來回式的遷移以及永久定居。在尚未以系統化的方式將邊界控制制度化的19世紀，主要的模式就是不斷來回式的遷移。我們也知道當邊界在1973到1974年間關閉時，外國居民永久定居的人口出現了大幅的增加，這暗示說如果還可以不斷來回的遷移，或許這些增加的定居人口裡有些就不會出現。很多人之所以遷移都是為了補貼在母國家戶的收入，而在兩國間鉅大的所得差異的情況下，他們只需待在平均薪資高的國家一陣子就足夠了。

還有一個重要的問題是，得知上述這些差異是否有助於今日政策的制定。我們看到愈來愈多的移民在新國度裡，並非尋找一個新家，他們自認為只是跨越了國界，甚至只是在一個全球勞動力市場裡移動而已。我們知道，當非法移民被合法化

客人？外人？

後，通常會在母國永久的居住下來，而到移民國工作幾個月，這種選擇在可以自由來回移動的前提下變得可能。我們知道有些今天在德國當清潔工的波蘭女性只想（並感覺自己在財務上有這個需要）一年從事這種工作三或四個月，然後大多數的時間在自己家鄉的小鎮上生活；有些在義大利的非洲移民也是這種情況。想要成爲永久居民的人相較於外籍居民人口總數而言，比例上與數目上似乎都小的多。

從外籍工人成爲定居者

在1970年代發生外籍工人轉爲移民或族裔團體的變化，使得現存的融合機制變得不合適了，而這種不合適在主要的移民接收國家裡也成爲許多全國性或地方性衝突的主因。在法國，共產黨與工會不再能有效整合外籍工人，因爲本身機構已受到失業、去工業、政治挫敗的影響而受損；法國的學校體系做爲文化與經濟上整合利器的效果也愈來愈差（Schain, 1985）。德國所採行的客工體制很顯然排除了整合的可能，而這體制也在家庭團聚以及外籍人士永久居住人口的攀升等問題上產生了衝突，這也包括了已達學齡的第二代所引發的爭論。至於英國，其帝國的公民身分也與下述情況產生衝突，即愈來愈多人利用帝國的公民身分進入英國，這項的轉變並不在該政府的預期之中。

在移入人口大多是勞動力且受到相當多管制的1950年代與1960年代，他們自然而然地被整合入自己的工作環境中。這是勞動力需求帶動移入的情況。隨著家庭團聚與第二代的年紀愈來愈大，居住、教育、鄰近的社團都成爲了他們出現的重

要制度性場所。

歐洲共同體組織的改變也讓移民有另一塊在民族國家之外的場域可以發聲，而最終移民自己也能成為政治行動者與政治人物（請參考 Withol de Wenden, 1994; Body-Gendrot, 1993）。融合的問題不再僅限於工作場所裡，而發聲的媒介也急遽地增加。

大多數人都贊同唯一合理的政策為必須要聯合大家，同時確保現有居民的穩定與完全的整合。移民人口的不確定性是不好的，將帶來歧視與危險（Body-Gendrot, 1993）。有證據顯示，像鼓勵移民的結社及文化活動將有助於整合，這意味著一種不同的整合形式，不像以往在一個理性抽象的國族概念下，認定移民就得被同化，像是原本法國的概念。

即使在德國，也有愈來愈多人承認該國不斷仰賴一些外來勞動力，以及外籍居民社區將持續存在的事實；外籍公民（*ausländische Mitbürger*）這個詞彙——一種外籍準公民身分（*denizenship*）的形式——愈來愈常被用來指稱在德國體制底下一種的特定成員身分——相對於原本客工的概念。在許多充斥大量移民人口的德國城鎮，當地政府經常反對給予移民在地方選舉上的投票權，因為此舉被認為會引起民眾普遍的反感；相對於此，德籍的遷出者則持續被鼓勵選舉地方顧問委員會，以供當地政府諮詢。但是，我們在德國也能感受到那股朝向更大規模自由化的趨勢：因此，Schleswig-Holstein（譯註：德國北部的一州）與漢堡都試圖授予移民地方性選舉的投票權，雖然還未開始實行（請同時參考 Hoffmann, 1990; Oberndörfer, 1989）。

只是很明顯的是，他們本身的投票權遠不足夠來幫助或推

客人？外人？

動整合的進行。例如，英國境內的大英國協或愛爾蘭移民擁有完整的政治權利，並有高比例的人已登記為公民；但他們仍以顯著的比例集中在薪資較低的工作上。法定的權利並不必然能消除敵視非裔加勒比海人（Afro-Caribbeans）的種族主義情況，也無法讓他們自覺受到不公平對待的感覺消失（請參考 Wrench, Brar and Martin, 1993）。

146

純粹使用法律手段的功效是有其限制的，我們可以清楚地從以下這個事實裡看出來，即第二代在德國與法國的學校、勞動力市場裡的表現都不好，即使這兩個國家法律上的差別很大（Wilpert, 1988；Body-Gendrot, 1993）。而即使在移民長期以來就擁有地方投票權的瑞典，年輕的移民仍覺得受到歧視（Drobnic, 1988）。

在大多數歐洲國家裡，都有以反移民、種族主義為訴求的政黨（Husbands, 1988），儘管對取得公民身分的規定已有所放鬆：法國就有民族陣線（National Front）的勒朋（Le Pen），他在1988年的總統大選第一輪投票裡成功地贏得了14.4%的票數；¹在德國也於1989年時，在西柏林的共和黨（Republican Party）及黑森（Hesse，譯註：德國中部的州）的國家民主黨

1. 值得注意的是在法國歷史上以及當代，都存在著訴諸種族文化的陣營，打著國籍與移民的爭議來運作；它們強調許多移民根本不可能被同化。儘管能見度一直都很高，但具此政治傾向的路線很少獲得多數支持。當政府想在1986到1987年間改革，將公民身分的取得加上更多限制時，遭受到人民的反對而做罷；然而，民族主義與排外情結很明顯地是可以與出生地主義共存，在許多時期都曾出現過，而在1980年代又再次因為民族陣線而並存，並在1993年在某個程度上算是受到人民的壓力而促成了國籍法的改革。當前又出現了新的右派民族主義，更強烈地訴諸血統與血緣上的共同體觀念，已不再是同化主義，而是希望排除外人。

(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 身上看到了成功。強烈的反移民情緒，即使在瑞典也變得十分明顯，在那裡試圖擴大投票權使移民能參與全國性選舉的提議被否決。在瑞士，因為外國人滲透 (Überfremdung) 的問題日益受到關切，因此有 1970 年代的黑溪提案 (Schwarzenbach initiative) 試圖要減少外籍勞動力與外籍人口的數量，而在 1981 年試圖改善在瑞士的外國人之地位的提案則以 84% 的比例被否決 (Hoffman-Nowotny, 1985)。

有些調查的數據指出，多數移民其實並不想取得他們所居住之國家的公民身分，即使已待上 20 年之久。²Hammar (1985) 的研究發現移民並不傾向接受歸化。認同、對母國的忠誠、渴望回去，以上所有因素造成了他們不願意的結果。即使在移民未積極考慮回母國的情況下，這結論仍然成立，像可以在很多第二代移民的身上看到那樣。

在各種重大變化不斷出現，移民對歸化又興趣缺缺的條件下，我們或許應質疑，是否公民身分是整合移民成為公民的最

-
2. 一則 1984 年在瑞典所做的調查發現，與瑞典人結婚的移民相較於其他移民，有著較高的歸化意願。在母國擁有財產以及計畫返回者則歸化的意願低。三分之一的人並不確定自己是否想歸化。Hammar (1985) 發現在瑞典的芬蘭人如果可以保留原本的芬蘭國籍的話，是願意接受歸化的。在德國一項 1984 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受訪者中有 13.4% 說自己對取得德國公民身分非常感興趣，而有 32.1% 說自己稍感興趣，其餘的答案基本上都是沒興趣；其中希臘人與南斯拉夫人是最感興趣的，土耳其人與西班牙人是最不感興趣的。在這個調查裡，我們看到在居住時間與對取得公民身分感不感興趣，這兩件事之間直接產生關係：住的愈久，愈感興趣；例如，在住了 15 年或甚至更多的人們當中，有 21% 非常感興趣，但不感興趣的比例不論居住時間長短，仍然維持一樣；因為居住時間而造成比例上的改變主要是從那些稍感興趣的人轉移到非常感興趣的。

終與最有效率的方式。Hammar (1990) 與 Layton-Henry (1990) 都曾建議說，「外籍準公民身分」或許是一種方式，讓移民能在不必取得新公民身分的情況下，被賦予完整的權利，這種方式使得移民能夠成為更明確的集體行動者。³在歸化過程裡，有兩種層次上改變的可能：一種是在地位上改變為政治社群的正式成員，另一種是在兩個不同的國家裡所享受的權利上有所改變。移民通常不願意放棄在母國享有的權利（像是返鄉、財產權、繼承權、參與全國性選舉的權利），但也不想完全整合入居住的國家裡。再者，歸化過程裡常常充斥了許多關於認同與忠誠的問題，但是移民其實並不願接受這些。外籍準公民身分將授予完整的權利（包括就業、居住與社會權利），但不包括參與全國性選舉或是擔任公職。

147

儘管法令的直接衝擊產生對整合的限制，但第二代移民傾向不歸化的情況仍需被討論。今日所有西歐國家裡，我們都看到了他們之中愈來愈高比例無法完全參與政治民主過程。愈來愈多人認識到，將歸化程序給自由化，並允許雙重公民身分是很重要的，也有愈來愈多人認為即使是不願歸化的人，只要他們住在這個出生、成長的國家，都應該被授予完整的政治權利。另一種想法是有關新公民身分的，認為不必然要透過歸化

3. Denizen 這個詞彙原本指一位被16世紀的英國王室以皇家特許證書 (royal letters patent) 授予公民身分的外國人 (Cohen, 1987)。在現代的用法裡，這個字強調的是傳統上明確二分外國人與公民之間的區別已漸漸模糊，而有大量的外國公民已與其居住的國家建立起親密、密集、長期且穩固的關係。雖然他們是外國人，卻仍是這個國家的一分子。如果這樣的身分被廣為承認，將提供在成為公民或非公民的二分選擇下另一個替代的可能 (Hammar, 1990; Layton-Henry, 1990)。Baubock (1994) 的研究，曾針對過去幾種被考慮過的公民身分形式，是這類分析中最細緻的一個。

來取得成爲該國一分子的身分，而是透過在一個社群裡的參與及居住（Wihol de Wenden, 1994）。

經濟上的整合是非常重要的。總體上高失業率以及移民裡較高於平均的失業率都很容易導致這樣的想法，即認爲移民人口是多餘的。但這必須正確地放在以下脈絡來解讀。將勞動力市場的組織與結構條件考慮進去，能讓我們在分析這些證據時得出不同的觀點。在移民所擔任的大部分工作裡，真正有效的勞動力供給是遠低於失業率所告訴我們的；針對這些工作的有效勞動供給包括了數目多變的本國人，他們曾擔任過這樣的工作，或願意接受這樣的工作，但這個數目是遠低於失業者人口的。另一方面，移民在高階、薪資高、白領的工作上，的確與本國人在競爭相同的職缺。

我們之中有很多人是在辦公桌前工作的，從來不知道在建築工地上工作一整天，或是花上一整晚來打掃辦公室的感覺究竟是如何。我們缺乏徹底疲憊不堪、肌肉長期疼痛、常在高度危險與可能導致工殤環境下工作的實際經驗。我們也不知道低薪、自己的身體日漸老化、幾乎無升遷可能、鮮少享有先進社會的主流「文化」會投注給專業人士與技術人員的尊敬，這一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必須終身忍受的生活條件究竟是何滋味。對所有先進國家（如今也包括日本）的經濟而言，有著很好的理由要持續招募外來的勞動力（Sassen, 1998, ch4），保有這種勞動力是在先進經濟體裡必須的，因爲在其中至少兩項主要過程的結合中，使外來勞動力成爲系統性的條件之一：對這類工作不斷的需求，以及一種可以宣稱先進經濟體必須擁有高教育水準的文化。

148

從經濟體的結構條件的觀點來看，我們必須知道在過去兩

客人？外人？

個世紀裡，歐洲大多數地方的勞動力需求很明顯是變動不定的。在1970年代與1980年代的大半時期，失業率都非常高，而工作機會的淨成長則很低。在1975到1985年裡，歐洲共同體共失去了總數達100萬個的工作機會，日本是600萬，美國則是2,100萬；但其中多數是低薪兼職的工作。在1985年之後，工作機會的情況就有些好轉了，在1985到1988年間的就業數成長了4%，在工作總數上就增加了480萬個。新工作機會主要並不是落在失業者身上，而是接受了280萬個工作機會的女性，另外還有剛加入就業市場的年輕人。在1990年EEC針對就業情況的報告裡指出了勞動力短缺的問題，服務業工作機會的增加需要更多願意接受低薪的非技術工人加入，同時也需要擁有高技術的工人；歐洲對上述兩種人都有所短缺。

歐盟的人口結構指出其人口嚴重的老化、年輕勞動力與進入職場新鮮人的比例縮減的事實。在歐盟3億4,000萬的總人口裡有大約69%，也就是2億2,000萬人是適齡就業人口（working-age population）；在1990年時15到24歲間的年輕人占從事經濟活動人口（active population）的23%，倘若目前的趨勢（包括關閉移入的大門）持續下去，到了2025年時將只剩18%。老化的現象將減少勞動力供給並製造更多的社會成本；年輕勞動力的縮減將使新進職場者的供給也減少，這群人是最具潛力去學習新技術，也最有意願接受在職學習或額外訓練的。

中歐與東歐在1990年時的總人口數是1億4,000萬人，其中有9,300萬人即約65%為適齡就業人口，並有6,000萬人有工作，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此地區的女性勞動參與率高達60%。在此我們也看到人口與勞動力的老化現象：總人口裡只有22%

是低於25歲以下。

在東西歐人口結構上的雷同暗示著，移出的現象將受限，而西部未來所需要的將無法輕易地為來自東部的移民所滿足。因此很快地，甚至在當前似乎就可能再次面臨勞動力市場的短缺，而急需願意從事低薪或具有高技術的移工加入。在西歐的歷史裡可以清楚看到勞動力需求與供給之間的不斷循環，然而當這塊大陸正值失業高峰期時，它卻很難記起過去的歷史來對當前的局勢做判斷。被結構與組織所決定的勞動力短缺或許將再度出現的這個可能性看似微乎其微，但西歐過去確實曾發生過。

在學界研究裡逐漸產生一致的共識，認為對各種不同類型的遷移做出區分是愈來愈重要的工作，判斷它是暫時性還是永久性的，以及移民具備的教育背景的鉅大差異性。如今知道有一群永久性移民的人口將使我們更強調兩項工作的重要，包括對永久移民的完全整合工作，以及讓想住在他們母國的暫時性遷移者更加便利。在移民問題上普遍被一般人視為極具傷害性的就是移民被視為一個分離的階級，他們被再視為不隸屬於地主國的一群人。這種情況下確實會製造出我們正被「他者」「入侵」的感覺。

移民政策的跨國化（transnationalizing）

在已開發的世界裡以特定國家為單位，用一組與移民、民族國家、疆界相關的概念所制定出的政策，都具有一個基本的架構（Sassen, 1996, ch3）。在此我們並不想將前幾章討論過的各國政策上的諸多差異給最小化，包括德國在內的一些國家的

客人？外人？

150

移民政策是基於血統主義，而包括法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則基於出生地主義。在有些國家內取得公民身分是很方便的，像是瑞典；但在其他如瑞士的國家內卻不是這樣。包括德國與法國在內的有些國家會將返回式遷移的政策給明確制度化，包括金融上的誘因，但其他國家卻很少會正式紀錄下返回式遷移的現象，像是美國。在一些如加拿大與美國的國家裡，存在著將移民者整合進來的政治文化與認同形塑過程，但在像德國與日本的其他國家裡，就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儘管存在著這麼多的差異，各國的移民政策及其相關執行機關，基本上在移民現象上卻呈現出匯合的情勢。在竭力管制的努力裡，我們看到了國家的主權與邊界控制是（不管是地面上的或機場裡的）居於核心地位。再者，移民政策也被這樣的認知所形塑，即認為移民是移出者個人行動的結果，而接受的國家與整個遷移過程毫不相干，只擔任被動接收的角色。

但是，我們看到了遷移現象裡的地緣政治，而一般而言，國家早在邊界控制出現之前就已涉入，就像我們之前討論過的殖民與新殖民連帶的現象。但還有一個有關交易與權利的廣闊大綱，是超越了民族國家的範圍，並讓民族國家的主權僅侷限在邊界控制與移入事務上。經濟活動的全球化、歐洲共同體組織的形成、圍繞在人權與公民權上的努力，以上是三個最顯而易見的例子，也是本節將要討論的主題。

全球經濟在1980年代遭逢鉅大的轉變。在這10年間，管制的解除與愈來愈多經濟活動和市場走向國際化，成為所有高度開發國家經濟政策上的明顯特徵。全球經濟趨勢讓國家經濟政策制定上出現了新的架構。隨著國家經濟政策日益開放，這個新架構很明顯要強化歐洲單一市場，並形構區域貿易集團，

像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或東南亞正在組織的。這架構的核心是對國家邊界的定位，進行嶄新的思考：邊界不再是強徵稅賦的地方，而是保障貨物、資金與資訊能自由流通的可穿透膜。18世紀的自由貿易觀預設了在不同國家經濟體間的自由移動，而21世紀的經濟本身是超越國家的（trans-national）經濟，在其中的政府是用來協調而非控制經濟活動的。根據我的理解，當談到資金流動與特定勞動力部門的議題時，這些政策將導致國家領土部分的去國家化（denationalizing）（請參考 Sassen, 1996）。

151

可以確定的是，不論是舊有的邊界圍牆或是民族國家，都不會消失。在這波轉變中所涵蓋的困難與複雜性都在一件事上可以明顯看出，就是當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ATT）會談之烏拉圭回合，決議要促使經濟體對服務業來回移動做進一步開放時，各國在各自進行追認的過程中遭遇重重困難。然而，克服這些困難的不懈努力同時向世界各國政府施加經濟上的壓力，促使它們拋棄國家經濟政策的舊觀念，並能用新的角度來思考如何將經濟活動最大化與管理它。

另一方面，高度開發國家的移民政策的架構仍深植於過去；當我們前進到21世紀之際，移民政策仍未對邊界、國家在經濟整合上扮演角色的改變有所回應。⁴邊界控制仍是管理移入現象時的基本機制。除此之外，移民政策的架構仍將勞動遷移視為個人行動的結果，接受國仍被再現為被動的地位；移

4. 我在其他地方檢視了是否存在著某種架構可以替代旨在管制移入的邊界控制，以及是否日漸整合的全球經濟或自由貿易集團，能幫助我們找到管制這類流動的架構（請看 Sassen, 1999, *Immigration Policy in a Global Economy*, prepared for the Century Fund, New York City）。

客人？外人？

入現象的原因似乎不受接受國家的控制或在其能力管轄範圍之外；移民政策變成是否願意寬厚地接納移民的決定。

在這種認知下，我們看不到以下的觀點，即接受國政府部門或廠商的國際活動可能有助於與人口輸出國間建立經濟上的連結，這個連結的作用可能不只成為資金與政治的橋樑，也可能成為遷移流動的通路（Sassen, 1988）。那種舊有的觀點強調的是個人受到的推力因素，忽視了體系層面的連結。世界各地的證據相當清楚地顯示在遷移的地理分布上有著明確可見的模式可循，並且主要的接受國傾向自他們的勢力範圍裡吸取移民。這種情況適用於各種不同的國家，包括美國、法國或日本。今日，我們可以清楚看到過去的殖民帝國搭起了橋樑，但卻很不容易看到當前跨國經濟活動的形式是如何同時建立起橋樑的。

152

經濟跨國化意味著發起移入現象的責任不全都是移民者自己該負擔的。某些國家的難民政策並未將移入現象的重擔自移民者身上卸除。歐洲前殖民強權時常對前殖民地的移民或難民，施以特殊的對待方式。從美國的難民政策，尤其是對印度支那移民，也的確看得出政府對創造遷移潮上必須負上一部分的責任。很清楚的是在經濟遷移的例子比起在戰爭引發的難民潮，要更難以辨識出國家所必須承擔的責任，只因在前者在本質上，這種影響要更為間接。當政府在經濟活動上扮演的角色逐漸從管制到協調時，它們在移民政府上的角色也如同在其他政治經濟方面那樣，變得愈來愈模糊不清。

更全面地考察將提供我們在分析上及經驗上有範圍的認識，而不是無邊無際的模糊印象。今日在歐盟裡明顯可見的各種跨國經濟、文化、政治體系都傾向擁有特定的地理範圍，它

們發生在城市之間的關係中，或是在連結跨越國界的工廠與產品配送中心的生產鏈上，或是跨國的文化與政治次社群裡。不少遷移就在為交易而產生的地理範圍裡流動，這應該有助於政府們面對那些日益擴大，而它們也理應處理的跨國政治、經濟、文化體系。在歐盟裡的移入現象或許將漸漸演變為一種跨越國界的體系。

單一市場的計畫已產生了鉅大的衝擊，使得各種與自由來去移動相關的議題日益受到重視，而這點正是打造內部無邊界共同體所必備的條件；歐洲共同體的組織缺乏法律上的權限去處理這些議題，但仍得開始去面對它們。歐洲共同體組織在這類議題上的受挫日益嚴重，像是簽證政策、家庭團聚與遷移的政策——所有這些議題在形式上都是個別國家的獨占權限，而各國政府也在這些過去曾是國家獨占的範疇內，抵抗歐洲共同體的介入。但如今不論在法律上或實際上，介入這些議題已可被接受，同時也是無可避免的，儘管在公開上的宣稱與此相反，在各國政治的再現上看到的仍是移民政策緊緊地掌握在個別政府的手中，被視為是國家主權管轄的事務之一；同樣地，政治上的再現仍持續將歐盟各成員國視為非人口移入的國家。

153

愈來愈顯而易見的是，移民與難民政策的許多面向與歐洲共同體的法定權限有交集出現，在此主要的核心關鍵在於人身自由的移動，以及形塑單一市場下伴隨的社會權利。實際上歐洲共同體被賦予愈來愈重要的角色，而各國是移入國家的事實也慢慢被承認。貨幣與經濟上的統一將有賴工人與其家庭更有彈性的移動，而對當前各國針對歐盟成員國之非歐盟國民加以規範的移民法律造成了愈來愈多的問題，這尤其是1980年晚期以來增加最快的移民來源，非歐盟國民無權利以旅客或工人

客人？外人？

的身分遷移至歐盟的另一國。根據現行的政策，這意味著在歐盟領土之內的邊界控制，而1986年的單一歐洲法所暗示「境內無邊界」的宣稱也訂在1992年12月31日開始實施，⁵同時也需要加強對外的邊界。愈來愈多人體認到需要有一個全歐盟共同推行的移民政策，而這在過去長期以來是被個別國家所反對的；而在蘇維埃集團崩解，難民數量快速增加後，這樣的需要變得更加急迫，雖然朝向各成員國移民政策更緊密的統一大方向，進展仍十分緩慢。

不單是像英國或丹麥這些國家的政府反對撤去內部邊界的作法，也有人擔心撤界將強化對移民或少數族裔篩選控制上的角色。再者，代表難民與尋求庇護者發言的組織也認為，撤界將使他們更難取得庇護或找到避難所，只因連帶地將對外部邊界的控制更加嚴格——歐洲堡壘綜合症（Fortress Europe syndrome）。少數族裔則擔心對他們身分有額外的檢查，以及當成員國採取最大同質性做為一致的政策標準時可能使他們更難達成家庭團聚。

但是，仍有另一條途徑可以使移民政策的制定，不再侷限在個別國家的政府。政府們發現自己已陷在一個關於權利與行動者的廣大網絡裡，重重包圍了他們施加在移民決策上的主權

5. 勞動力市場的整體概念是說工人能去到有勞動力需求的地方，在那裡他們能找到工作。再者，在歐盟關心對新移工封鎖自家邊界的情況下，有些人認為如果在歐盟境內能有移工勞動力的彈性化趨勢產生，也十分合理，像是假如某成員國發生勞力短缺，需要移工進來補充，即可訴諸另一個具有高度就業率的國家。根據我對來自歐洲與美國的資料解讀，要達到快速的調適事實上有賴政府的介入：人們不能依賴市場來產生出理想的結果。但是，這種將勞力供給調整到勞力有需求的方式僅限於移工充斥的產業或工作。這種方式也能讓某些移民團體在地理上不再如此集中，也能將移工含納入打造跨國之歐洲的過程。

(Hollifield, 1992)。參與政策辯論與制定的政治行動者遠較20年前來的多：包括歐洲共同體組織、反移民傾向的政黨、聲稱或確實代表移民且為移民權利奮鬥的組織所形成的廣大網絡、移民社團、本身是移民的政治人物，尤其是第二代。理念差異甚大的各國議會代表，對於政府彼此間的協議與歐洲共同體的程序皆秘密進行且缺乏民主過程，有著愈來愈多的不滿，這種情形可能延續到移民政策制定上的某些層面。簡而言之，移民的政策擬定過程不再侷限在狹隘的政府各部會間或行政互動層次上，公眾的意見與公開的政治辯論已成為移民政策形塑角力場域裡的一環。各政黨也依據對移民現象的立場來尋求自身的定位。

另外，目前也有一些國際協議已產生了效果，使得國家在控制移民現象上的主權受到限制（Hollifield, 1992; Jacobson, 1996）。也有一些定居移民的權利是受到法定權力的廣泛保障。事實上，目前正形成一套圍繞在國際協議與協約，以及移民所獲得各種權利的政治制度，來對國家的角色進行限制。⁶這是一個嶄新的階段，與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啓國家幾乎能絕對控制這些事務的階段大不相同。有許多例子能反映出這樣的發展情況。前一章裡曾提到法國與德國想限制家庭團聚的舉動，被行政與憲法法庭以違反國際協議為由來阻止。法庭也一貫地支持定居的移民享有許多權利，結果也限制了政府控制這些事務的權力；同樣地，法庭也限制政府想禁止尋求庇護者進入的權力。上述各種過程，再加上移民現象與移民本身政治化後的總體效果，已使得整個西歐的移民與難民政策產生了逐漸匯合的

6. 例如，聯合國大會於1990年12月18日所通過的保障所有移工及其家庭的國際協約（Resolution 45/158）。

客人？外人？

情勢。

155

過去這幾年間所看到更普遍的討論與瞭解之所以會產生，很大一部分是爲了回應所有這些國家共同遭遇的客觀情況，包括從經濟活動的跨國化到由法庭與國際協議所維護的移民、難民權利的網絡。這跟過去相比，儘管只過了幾年，但卻有顯著的轉變。每個國家的歷史、文化遺產，愈來愈強迫各國參與這些當前的現況，在其中也開啓了國家角色一個嶄新的紀元，並標誌出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這個階段的告終。

結論

本書所提出的事實及論點都告訴我們，遷移並不是自然而然發生的，而是被製造出來的；同時，遷移發生的地點並非各國之間可能的排列組合而已，而是有模式可循的。再者，移工現象也有模式可循，在各接收國中我們很少看到，移工們在工作類別與產業的分布情況和本國人是一樣的。最後，雖然遷移現象一直存在，但我們確實可以發現它在過去兩個世紀以來，有明顯的分期以及不同的模式。簡而言之，國際遷移現象是被製造出來、有模式可循，並鑲嵌在特定的歷史階段中。

對這些特性的認識也讓我們在看待移民政策的問題時，不單圍繞在那些熟悉的範圍內，像是邊界控制、家庭團聚、歸化制度及規範公民身分的法條；而本書中針對開啓的新問題，也提供了三個分析與解釋的面向。

第一個面向是關注勞動遷移是如何鑲嵌在更廣大的社會、經濟、政治結構之中的，同時最終在其分布的地理區、持續的時間及規模上的界線何在。遷移的地緣政治是存在的，事實上

遷移現象也是體系裡的一環：兩者同時決定了遷移現象的界限何在。遷移現象絕非以入侵的方式在進行；即使是在邊界控制仍極微弱甚至不存在的19世紀裡，遷移現象並非如此進行，更何況是在今天。不論是移入或移出的現象，一直以來都僅是該國人口裡的一小部分人在進行。

遷移現象不只是個人決定的加總，而是被既存的政治經濟體系所形塑、模式化的過程，如果我們能接受上述的觀念，那麼控制與管理的執行就變得可行。在遷移現象所鑲嵌的體系裡包括了自己各種的管制力量，外流的人口往往只是極少數，同時很明顯的是當情況超過限度時，我們就會看到許多回流返鄉式遷移的發生，以及（或是）移入現象趨於減少；這個過程可能要花上幾年的時間，但它確實會發生。

156

第二個面向是移民現象具有高度分殊化的性質，尤其是在不斷來回式遷移以及永久定居之間的差異愈來愈重要。如果我們接受移民現象是一種有界線、內部分殊的過程，而不是來自貧窮國家的大規模入侵的話，那麼制定移民政策就變得更加可行。例如，旨在確保永久居住的移民能完全融入社會的政策，就應減少威嚇的成分。如果我們知道移民的範圍何在，那麼很重要是整合移民的方案必須根據對文化與宗教差異之承認的架構，這也會讓方案更加可行。

第三個面向是今日的移民政策制定有跨國化的情況。一方面是全球各經濟體的連結，另一方面是伴隨著移民本身投入政治行動，一個由權利與法庭決議所組成的廣大網絡，兩者同時減少了國家在移民（與難民）政策制定上的自主性。在經濟、文化與人權爭議等層面上日益朝跨國化的趨勢下，有上述的發展應該不令人驚訝。

客人？外人？

在回顧過去20年來，西歐各國緊湊的變化已進入尾聲之際浮現出一個遲疑的想法：這些長時間居住在此的移民與難民，真的成爲今天的居民了嗎？更廣泛地說，後殖民的歷史是否部分地在這些過去的宗主國中被持續下去，而我們的移民或難民是否爲後殖民移民的一環？我們已經透過歷史，確實地描寫了這些在世界各地的西方殖民地中，擔任辛苦、被鄙視之工作的定居者。移民擔任低薪、危險、辛苦的工作，是否是今日繁榮社會裡的殖民地呢？我們是否已在先進經濟的中心裡，創造出了新的邊緣地帶，特別是在美國與西歐的大城市裡呢？並且是否是因爲這些在我們當中的「邊緣地帶」無法成清洗迷思的對象呢？本國人與移民皆受其苦的失業現象是否也是當代在我們之中的邊緣地帶，只是如今無法再透過大規模的移出來使它轉移到遙遠的另一地去？

157

歐洲各國，包括政策上有極端差異的德法兩國，在過去至少兩個世紀以來，不斷地含納「外來」的男男女女。很重要的是，歐洲不斷散播這樣的形象與再現，認爲這塊大陸的遷移史僅限於過去大規模移出的現象而已，這種偏頗的論點已到達扭曲事實的地步，同時也不斷阻礙更合理的政策制定。不論來自遠在天邊或僅有咫尺之隔的移入人口，一直都是歐洲歷史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表格 I
1986-1996 年間以下歐洲國家中外籍人口的總數，
以及其占全國人口的百分比

單位：千人與百分比

	1986	1990	1996
奧地利	314.9	456.1	728.2
	4.1	5.9	9.0
比利時	853.2	904.5	911.9
	8.6	9.1	9.0
捷克共和國	198.6
	1.9
丹麥	128.3	160.6	237.7
	2.5	3.1	4.7
芬蘭	17.3	26.3	73.8
	0.4	0.5	1.4
法國	...	3596.6	...
	...	6.3	...
德國	4512.7	5342.5	7314.0
	7.4	8.4	8.9
匈牙利	142.5
	1.4
愛爾蘭	77.0	80.0	118.0
	2.2	2.3	3.2
義大利	450.2	781.1	1095.6
	0.8	1.4	2.0
盧森堡	97.3	113.1	142.8
	26.3	29.4	34.1
荷蘭	568.0	692.4	679.9
	3.9	4.6	4.4
挪威	109.3	143.3	157.5
	2.6	3.4	3.6
葡萄牙	...	107.8	172.9
	...	1.1	1.7
西班牙	293.2	278.7	539.0
	0.8	0.7	1.3
瑞典	390.8	483.7	526.3
	4.7	5.6	6.0
瑞士	956.1	1100.3	1337.6
	14.7	16.3	19.0
英國	1820.0	1723.0	1972.0
	3.2	3.2	3.4

註：資料來源皆是官方的人口正式記錄與外籍人士登記記錄，除了法國與英國（人口普查）之外。葡萄牙與西班牙（居留許可）、愛爾蘭與英國（勞動人口調查）的資料，除非在他處有特別註明，不然皆以該年12月31日的人口為準。

資料來源：這些表格皆徵引自 SOPEMI, 1998. *Trend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Continuous Reporting System on Migration Annual Report*. Paris: OECD.

客人？外人？

表格2
1986-1996年間外籍人口進入以下歐洲國家的數目

單位：千人

	1986	1990	1996
資料根據官方正式的人口紀錄			
比利時	39.3	50.5	51.5
丹麥	17.6	15.1	...
芬蘭	...	6.5	7.5
德國	478.3	842.4	708.0
匈牙利	...	37.2	9.4
盧森堡	7.4	9.3	...
荷蘭	52.8	81.3	77.2
挪威	16.8	15.7	17.2
瑞典	34.0	53.2	29.3
瑞士	66.8	101.4	74.3
資料根據居留與工作許可的記錄			
奧地利	224.2
法國	38.3	102.4	74.0
英國	216.4

註：因為各國採用的登記標準不一，根據官方人口記錄的資料之間並不全然可互相比較；如荷蘭、挪威，尤其是德國，都將為數可觀的尋求庇護者的人數計算在內。

表格3
1986-1996年間從以下歐洲國家移出的外籍人口

	單位：千人		
	1986	1990	1996
比利時	31.8	27.0	32.4
丹麥	4.3	4.6	...
芬蘭	...	0.9	3.0
德國	347.8	466.0	599.1
盧森堡	5.5	5.5	...
荷蘭	23.6	20.6	22.4
挪威	8.4	9.8	10.0
瑞典	15.4	16.2	14.5
瑞士	52.8	59.6	67.7

註：資料來自官方的人口記錄。

表格4
1986-1996年間以下歐洲國家中外籍人口的三年遷移數目

	單位：千人		
	1986	1990	1996
比利時	7.5	23.4	19.5
丹麥	13.3	10.5	...
芬蘭	...	5.6	4.5
德國	130.5	376.4	148.9
盧森堡	1.9	3.8	...
荷蘭	29.2	60.7	54.8
挪威	8.4	5.9	7.2
瑞典	18.6	37.0	14.9
瑞士	14.0	41.8	6.5

註：資料得自表格2與表格3。

客人？外人？

表格 5
1986-1996 年間外籍工人進入以下歐洲國家的數目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奧地利	18.0	15.3	17.4	37.2	103.4	62.6	57.9	37.7	27.1	15.4	16.3
比利時	2.2	2.4	2.8	3.7	...	5.1	4.4	4.3	4.1	3.0	2.2
丹麥	3.1	2.7	2.8	2.4	2.4	2.1	2.1	2.2	2.7
法國											
永久居留	9.9	10.7	12.7	15.6	22.4	25.6	42.3	24.4	18.3	13.1	11.5
臨時工作許可 ^(註1)	1.4	1.5	1.9	3.1	3.8	4.1	3.9	4.0	4.1	4.5	4.8
德國	37.2	48.1	60.4	84.8	138.6	241.9	408.9	325.6	221.2	270.8	262.5
匈牙利	25.3	51.9	41.7	24.6	19.5	18.6	18.4	14.5
愛爾蘭	1.2	1.4	3.8	3.6	4.3	4.3	4.3	3.8
義大利	125.5	123.7	85.0	99.8	111.3	129.2
盧森堡	8.4	10.5	12.6	14.7	16.9	16.9	15.9	15.5	16.2	16.5	18.3
西班牙	19.8	85.0	52.8	17.4	23.5	36.6	...
瑞士	29.4	33.6	34.7	37.1	46.7	46.3	39.7	31.5	28.6	27.1	24.5
英國											
長期	7.9	8.1	10.4	13.3	16.1	12.9	12.7	12.5	13.4	15.5	16.9
短期	8.0	9.4	11.8	12.2	13.8	12.6	14.0	13.3	12.9	15.6	16.8
受訓人員	2.8	2.9	3.8	4.2	4.8	3.5	3.4	3.5	3.8	4.4	4.0
總數	18.7	20.4	26.0	29.7	34.6	29.0	30.1	29.3	30.1	35.5	37.7

註 1：最多居留 6 個月。

表格 6
1986-1996 年間季節性移工進入以下歐洲國家的數目

單位：千人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奧地利	24.3	26.3	17.6	20.4	15.8
法國	87.7	76.6	70.5	61.9	58.2	54.2	13.6	11.3	10.3	9.4	8.8
德國	-	-	-	-	-	-	212.4	181.0	155.2	192.8	220.9
義大利	1.7	2.8	5.8	7.6	8.9
荷蘭	1.0	0.9	0.5	-	-
挪威	4.3	4.3	4.7	4.6	4.5	5.0	5.4
瑞士	142.8	150.8	154.0	156.4	153.6	147.5	126.1	93.5	83.9	72.3	62.7
英國	3.6	4.2	4.4	4.7	5.5

表格 7
1986-1996 年間以下歐洲國家中外籍與在國外出生的勞動人口之數目，以及其占總勞動人口的百分比
單位：千人與百分比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外籍勞動人口的數目											
奧地利 ^(註1)	155.0	157.7	160.9	178.0	229.5	277.2	295.9	304.6	316.5	325.2	328.0
比利時	5.3	5.4	5.4	5.9	7.4	8.7	9.1	9.3	9.7	9.9	10.0
丹麥	179.2	176.6	179.4	196.4
法國	6.2	6.1	6.1	6.5
德國	60.1	62.7	65.1	66.9	68.8	71.2	74.0	77.7	80.3	83.8	83.8
匈牙利	2.1	2.1	2.2	2.3	2.4	2.4	2.6	2.7	2.9	3.0	3.0
愛爾蘭	1555.7	1524.9	1557.0	1593.8	1549.5	1506.0	1517.8	1541.5	1593.9	1573.3	1604.7
義大利	6.5	6.3	6.4	6.6	6.2	6.0	6.0	6.1	6.3	6.2	6.3
盧森堡	1833.7	1865.5	1910.6	1940.6	2025.1	2179.1	2360.1	2575.9	1559.6	2569.2	2559.3
	6.8	6.9	7.0	7.0	7.1	7.5	8.0	8.9	8.9	9.0	9.1
	31.7	33.4	15.7	17.6	20.1	21.0	18.8
	0.4	0.4	0.5	0.5	0.5
	33.0	33.0	35.0	33.0	34.0	39.3	40.4	37.3	34.5	42.1	52.4
	2.5	2.5	2.7	2.7	2.7	2.9	3.0	2.7	2.5	2.9	3.5
	285.3	296.8	304.8	307.1	332.2	332.2
	1.3	1.4	1.5	1.5	1.7	1.7
	58.7	63.7	69.4	76.2	84.7	92.6	98.2	101.0	106.3	111.8	117.8
	35.6	37.6	39.9	42.4	45.2	47.5	49.2	49.7	51.0	52.4	53.8

表格 7 (續)
1986-1996 年間以下歐洲國家中外籍與在國外出生的勞動人口之數目，以及其占總勞動人口的百分比
單位：千人與百分比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外籍勞動人口的數目											
荷蘭	169.0	176.0	176.0	192.0	197.0	214.0	229.0	219.0	216.0	221.0	218.0
	3.2	3.0	2.9	3.1	3.1	3.2	3.4	3.3	3.2	3.2	3.1
挪威	49.5	47.8	46.3	46.3	46.6	47.9	50.3	52.6	54.8
	2.3	2.3	2.3	2.3	2.3	2.4	2.5	2.5	2.6
葡萄牙	45.5	48.7	51.8	54.9	59.2	63.1	77.6	84.3	86.8
	1.0	1.0	1.0	1.1	1.3	1.4	1.6	1.8	1.8
西班牙	58.2	69.1	85.4	171.0	139.4	117.4	121.8	139.0	161.9
	0.4	0.5	0.6	1.1	0.9	0.8	0.8	0.9	1.0
瑞典	215	215	220	237	246	241	233	221	213	220	218
	4.9	4.9	4.9	5.2	5.4	5.3	5.3	5.1	5.0	5.1	5.1
瑞士	566.9	587.7	607.8	631.8	669.8	702.5	716.7	725.8	740.3	728.7	709.1
	16.4	16.6	16.7	17.0	18.9	17.8	18.3	18.5	18.9	18.6	17.9
英國	815.0	815.0	871.0	914.0	882.0	828.0	902.0	862.0	847.0	899.0	878.0
	3.4	3.3	3.4	3.5	3.3	3.0	3.6	3.4	3.4	3.5	3.4

註1：相較於1990年8月至1991年6月間外籍人士擔任工作的數目，此處1990與1991年的數據已根據當時短期的工作許可過度發放而做過調整。

客人？外人？

表格 8
1986-1997 年間尋求庇護者進入以下歐洲國家的數目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奧地利	11.4	15.8	21.9	22.8	27.3	16.2	4.7	5.1	5.9	7.0	6.7
比利時	6.0	4.5	8.2	13.0	15.4	7.6	26.5	14.7	11.7	12.4	11.6
捷克共和國	1.8	2.0	0.9	2.2	1.2	1.4	2.0	2.1
丹麥	2.7	4.7	4.6	5.3	4.6	13.9	14.3	6.7	5.1	5.9	5.1
芬蘭	-	0.1	0.2	2.7	2.1	3.6	2.0	0.8	0.8	0.7	1.0
法國	27.6	34.3	61.4	54.8	47.4	28.9	27.6	26.0	20.4	17.4	21.4
德國	57.4	103.1	121.3	193.1	256.1	438.2	322.6	127.2	127.9	116.4	104.4
希臘	6.3	9.3	6.5	4.1	2.7	2.0	0.8	1.3	1.4	1.6	4.2
愛爾蘭	0.1	-	-	0.1	0.4	0.4	1.2	3.9
義大利	11.0	1.4	2.3	4.7	31.7	2.6	1.3	1.8	1.7	0.7	1.4
盧森堡	0.1	0.0	0.1	0.1	0.2	0.1	0.2	0.2	0.2	0.3	0.4
荷蘭	13.5	7.5	13.9	21.2	21.6	20.3	35.4	52.6	29.3	22.9	34.4
挪威	8.6	6.6	4.4	4.0	4.6	5.2	12.9	3.4	1.5	1.8	2.3
波蘭	0.6	0.8	3.2	2.9
葡萄牙	0.2	0.3	0.1	0.1	0.2	0.6	2.1	0.8	0.5	0.3	0.4
西班牙	3.7	4.5	4.1	8.6	8.1	11.7	12.6	12.0	5.7	4.7	3.7
瑞典	18.1	19.6	30.0	29.4	27.4	84.0	37.6	18.6	9.0	5.8	9.7
瑞士	10.9	16.7	24.4	35.8	41.6	18.0	24.7	16.1	17.0	18.0	23.9
英國	5.9	5.7	16.8	38.2	73.4	32.3	28.0	42.2	55.0	37.0	41.5

註 1：此表中義大利、盧森堡、波蘭、西班牙的數據是統計自 1997 年 1 月至 9 月為止。

表格9
1988-1996年間以下歐洲國家中取得該國國籍的人數，以及其占該國外籍人口的百分比
單位：千人與百分比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本國國民與外國人 的區別是普遍被 接受的國家									
奧地利	8.2	8.5	9.2	11.4	11.9	14.4	16.3	15.3	16.2
比利時	2.5	2.5	2.4	2.5	2.2	2.3	2.4	2.1	2.2
	8.5	46.4	16.4	25.8	26.1	24.6
	0.9	5.0	1.8	2.8	2.8	2.7
丹麥	3.7	3.3	3.0	5.5	5.1	5.0	5.7	5.3	7.3
	2.7	2.3	2.0	3.4	3.0	2.8	3.0	2.7	3.3
芬蘭	1.1	1.5	0.9	1.2	0.9	0.8	0.7	0.7	1.0
	6.0	8.1	4.2	4.7	2.3	1.8	1.2	1.1	1.4
法國	74.0	82.0	88.5	95.5	95.3	95.5	126.3	92.4	109.8
	2.7
德國	40.8	68.5	101.4	141.6	179.9	199.4	259.2	313.6	302.8
	1.0	1.5	2.1	2.7	3.1	3.1	3.8	4.5	4.2
匈牙利	...	1.1	3.2	5.9	21.9	11.8	9.9	10.0	12.3
	7.3	8.7
義大利	4.5	4.4	6.5	6.6	7.4	7.0
	0.6	0.5	0.7	0.7	0.8	0.7

表格 9 (續)
1988-1996 年間以下歐洲國家中取得該國國籍的人數，以及其占該國外籍人口的百分比

單位：千人與百分比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本國國民與外國人 的區別是普遍被 接受的國家									
盧森堡	0.8	0.6	0.7	0.6	0.6	0.7	0.7	0.8	0.8
荷蘭	0.7	0.6	0.7	0.5	0.5	0.6	0.6	0.6	0.6
挪威	9.1	28.7	12.8	29.1	36.2	43.1	49.5	71.4	82.7
西班牙	1.5	4.6	2.0	4.2	4.9	5.7	6.3	9.4	11.4
瑞典	3.4	4.6	4.8	5.1	5.1	5.5	8.8	11.8	12.2
瑞士	2.7	3.4	3.4	3.5	3.5	3.6	5.4	7.2	7.6
英國	8.1	5.9	7.0	3.8	5.3	8.4	7.8	6.8	8.4
	2.4	1.6	2.8	1.3	1.5	2.1	1.8	1.5	1.7
	18.0	17.6	16.8	27.7	29.3	42.7	35.1	32.0	25.6
	4.5	4.2	3.7	5.7	5.9	8.5	6.9	6.0	4.8
	11.4	10.3	8.7	8.8	11.2	12.9	13.8	16.8	19.4
	1.2	1.0	0.8	0.8	1.0	1.1	1.1	1.3	1.5
	64.6	117.1	57.3	58.6	42.2	45.8	44.0	40.5	43.1
	3.5	6.4	3.2	3.4	2.4	2.3	2.2	2.1	2.1

註：除非在他處註明，以上數據包括所有取得該國國籍的方式，包含按照一般歸化程序，符合年齡、居住時間的要求而取得者，（在結婚、收養或其他與居住、血緣相關的情況發生之後）透過自願的聲明而取得國籍者、恢復原國籍者，以及藉由其他特殊方式取得該國國籍者。歸化的比率（即占外籍人口的百分比）指的是取得該國國籍者的數目占該年初外籍人口總數的百分比。

參考書目

- Abadan-Unat, Nermin. "Implications of Migration on Emancipation and Pseudo-Emancipation of Turkish Wome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1 (1977) 31-57.
- Alter, George. *Family and the Female Life Course: Women of Verviers Belgium, 1849-1880*. Madison, Wis.: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8.
- Amersfoort, Hans, van. "Ethnic Residential Patterns in a Welfare State: Lessons from Amsterdam, 1970-1990." *New Community* 18 (1992): 439-56.
- Amman, H. *Die Italiener in der Schweiz: Ein Beitrag zur Fremdenfrage*. Basel, 1917.
- Anderson, Michael. *Population Change in North-Western Europe, 1750-1850*. London: Macmillan, 1988.
-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58.
- Aries, P. *Histoire des populations françaises*. Paris: Seuil, 1971.
- Bade, K. J. "Massenwanderung und Arbeitsmarkt im deutschen Nordosten von 1880 bis zum Ersten Weltkrieg: Überseeische Auswanderung, interne

客人？外人？

- Abwanderung und kontinentale Zuwanderung," *Archiv für Sozialgeschichte* 20 (1980): 265-323.
- . "Transnationale Migration und Arbeitsmarkt im Kaiserreich: Vom Agrarstaat mit starker Industrie zum Industriestaat mit starker agrarischer Basis." In *Historische Arbeitsmarktforschung*, edited by T. Pierenkemper and R. H. Tilly. Göttingen: Vandenhoeck and Ruprecht, 1982.
- . "Kulturkampf auf dem Arbeitsmarkt: Bismarcks 'Polenpolitik' 1885-1890." In *Innenpolitische Probleme des Bismarckreichs*, edited by O. Pflanze: 121-42. München: R. Oldenbourg, 1983.
- . *Vom Auswanderungsland zum Einwanderungsland? Deutschland 1880-1980*. Berlin: Colloquium, 1983.
- . "Labor, Migration and the State: Germany from the late 19th Century to the Onset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In *Population, Labour and Migration in 19th Century and 20th Century Germany*: 59-8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87.
- Bailyn, Bernard. *Voyages to the West: A Passage in the Peopling of America on the Eve of the Revolution*. New York: Knopf, 1986.
- Bairoch, Paul.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Levels from 1750-1980."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1 (1982): 269-333.
- Balbo, Laura and Luigi Manconi. *I Razzismi Possibili*. Milano: Feltrinelli, 1990.
- Bardet, Ihan and Norman Furniss, eds. *Turkish Workers in Europe: An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Bloomington, Ind.: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5.
- Baubock, Rainer and Dilek Cinar. "Briefing Paper: Naturalization Policies in Western Europ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17(2), 1994.
- Benedict, Philip. "Was the Eighteenth Century an Era of Urbanization in Franc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21 (1990): 179-215.

- Benveniste, Annie. *Le Bosphore à la Roquette: La communauté judeo-espagnole à Paris, 1914-1940*. Paris: Editions L'Harmattan, 1989.
- Berger, John and Jean Mohr. *A Seventh Man: Migrant Workers in Europe*.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75.
- Berkner, Lutz and Franklin Mendels. "Inheritance Systems, Family Structure and Demographic Patterns in Western Europe, 1700-1900." In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nging Fertility* edited by C. Tilly: 209-23.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Best, Geoffrey. *Humanity in Warfare: The Modern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Law of Armed Conflict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 Beteille, Roger. "Les Migrations Saisonnières en France sous le Premier Empire: Essai de synthès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7 (1970): 424-41.
- Bezza, B. *Gli italianifuori d'Italia*. Milan: F. Angeli, 1983.
- Blanc, M. "Immigrant Housing in France: From Hovel to Hostel to Low-Cost Flats," *New Community*, 11 (1984): 225-33.
- Blaschke, J. and A. Germershausen. "Migration und ethnische Beziehungen." *Nord-Sud Aktuell*: 3-4, 1989.
- Blaschke, Karlheinz.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von Sachsen bis zu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Weimar: Bohlau 1967.
- Biythell, Duncan. *The Handloom Weavers: A Study in the English Cotton Industry during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 Body-Gendrot, Sophie. *Ville et Violence: L'irruption de Nouveaux Acteur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3.
- Body-Gendrot, Sophie, Emmanuel Ma Mung, Catherine. Hodier, eds. "Entrepreneurs Entre Deux Mondes: Les Créations d'Entreprises par les Étrangers: France, Europe, Amérique du Nord." Special issue, *Revue*

客人？外人？

-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8, no. 1 (1992): 5-8.
- Böhning, W. R. "Integration and Immigration Pressures in Western Europe." *International Labour Review* 130 (1991): 4.
- . "Some Thoughts on Emigration from the Mediterranean Basin."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3 (March 1975): 251-77.
- . and Denis Maillat. *The Effects of the Employment of Foreign Workers*. Paris: Organization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Division of Manpower and Social Affairs, 1974.
- . and M.-L. Schloeter-Paredes (eds). 1994. *Aid in Place of Migration*. Geneva: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 Boissevain, Jeremy. "Les Entreprises Ethniques aux Pays-Bas."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8, 1 (1992): 97-106.
- Boisvert, Colette Callier, 1987. "Working-Class Portuguese Families in a French Provincial Town: Adaptive Strategies." In *Migrants in Europe: The Role of Family, Labor and Politics*, edited by H. Buechler and J. M. Buechler: 61-76.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 Bonneff, M. *La vie tragique des travailleurs: enquêtes sur la condition économique et morale des ouvriers et ouvriers d'industrie*. Paris: M. Rivèr and cie., 1914.
- Bonnet, Jean-Charles. "Les italiens dans l'agglomération lyonnaise à l'aube de la 'Belle Epoque,'" *Affari Social! Internazionali* 3-4 (1977): 87-103.
- . *Les pouvoirs publics français et l'immigration dans l'entre-deux guerres*. Lyon: Centr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1976.
- Bouvier, Jeanne. *Mes Memoires: Ou 59 années d'activité industrielle, sociale et intellectuelle d'une ouvrière, 1876-1935*. Paris: Maspero, 1983.
- Boyer, Armand. "Les migrations saisonnières dans la Cevenne vivaroise." *Revue de géographie alpine* 22(1954): 571-609.

- Boyer, Robert ed. *La Flexibilité du Travail en Europe*. Paris: La Decouverte, 1986.
- Brettell, Caroline. *Men Who Migrate, Women Who Wait: Population and History on a Portuguese Parish*.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6.
- Britschgi-Schimmer, I. *Die wirtschaftliche und soziale Lage der italienischen Arbeiter in Deutschland: Ein Beitrag zur ausländischen Arbeitsfrage*. Karlsruhe, 1916.
- Brosnan, P. and F. Wilkinson. *Cheap Labour: Britain's False Economy*. London: Low Pay Unit, 1987.
- Brown, C. *Black and White Britain*. London: Heinemann, 1984.
- Bruan, Rudolf. "Early Industrialization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the Canton of Zurich." In *Historical Studies of Changing Fertility*, edited by C. Tilly, 289-334.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 Brubaker, Roger. *Citizenship and Nationhood in France and German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Brouwer, Lenie and Marijke Priester, 1983. "Living In Between: Turkish Women in Their Homeland and in the Netherlands." In *One Way Ticket: Migration and Female Labour*, edited by A. Phizacklea, ed.,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 Brun, F. *Les français d'Algerie dans l'agriculture du Midi mediterranéen*. Gap: Editions Ophrys, 1976.
- Bruschi, Christian. "Le droit d'asile: l'Europe à l'heure des choix." In *Migrations Société* 12(1990): 47-72.
- Brym, R. "The Emigration Potential of Czechoslovakia, Hungary, Lithuania, Poland and Russia: Recent Survey Results," *International Sociology*, vol. 7 (1992): 387-95.
- Buechler, H. and J. M. Buechler eds. *Migrants in Europe: The Role of Family*,

客人？外人？

- Labor and Politics*. New York: Greenwood Press, 1987.
- Bundesanstalt für Arbeit. Presseinformation 68-91. Nürnberg, Germany, 1991.
- Butt Philip, Alan. "European Union Immigration Policy: Phantom, Fantasy of Fact?" *West European Politics*, edited by Martin A. Schain and Martin Baldwin-Edwards, vol.17 n.2(1994): 168-92.
- Cafiero, U. "Inchiesta nei circondari di Sora e di Isernia," *Bollettino dell'Opera di Assistenza*, I 1(1901): 1-17.
- Cannistrano, Philip V. and Gianfausto Rosoli. *Emigrazione, Chiesa e Fascismo: Lo Scioglimento dell'Opera Bonomelli*, (1922-1928). Rome, 1979.
- Canevari, Annapaola. "Immigrati Prima Accoglienza: E Dopo?" *Dis T Rassegna di Studi e Ricerche del Dipartimento di Scienze del Territorio del Politecnico di Milano*: 53-60. 9/Settembre, 1991.
- Carlsson, Sten. "Chronology and Composition of Swedish Emigration to America." In *From Sweden to America*, edited by H. Runblom and H. Norman, 114-48.
- Castles, Stephen, Heather Booth and Tina Wallace. *Here for Good: Western Europe's New Ethnic Minorities*. London: Pluto Press, 1984.
- Castles, Stephen and Godula Kosak. *Immigrant Workers and Class Structure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Castles, Stephen and Mark Miller. *The Age of Migration*. London: Macmillan, 1993.
- GEE. *L'emploi en Europe*. Bruxelles, European Commission, 1990.
- CEMAT. *Draft European Regional Planning Strategy, Vol. One and Two*. Luxembourg: CEMAT., 1988.
- Central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Statistic Yearbook of the GDR*, Berlin, 1990.
- Cerese, Francesco. "Expectations and Reality: A Case Study of Return Migr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to Southern May," *International*

- Migration Review* 8(1974): 245-62.
- Chaliand, Gerard and Yves Ternon. *Le Génocide des Arméniens*. Brussels: Editions Complexe, 1980.
- Chatelain, Abel. "Migrations et domesticité féminine urbaine en France, XVIIIe siècle-XX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47(1969): 506-28.
- . *Les migrants temporaires en France de 1800 à 1914*, 2 vols. Lille: Publications de l'Université Presses de Lille, 1976.
- Cheshire, P. C. and D. G. Hay. *Urban Problems in Western Europe*.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 Chesnais, Jean-Claude. *Les migrations d'Europe de l'Est vers l'Europe de l'Ouest: de l'histoire (1946-1989) à la prospective (1990-2000)*. Rapport au Conseil de l'Europe, 1996.
- Chevalier, Louis. *La Formation de la population parisienne au XIX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Françaises, 1950.
- . *Classes laborieuses et classes dangereuses à Paris pendant la première moitié du XIXe siècle*. Paris: Plon, 1958.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s *Labouring Classes and Dangerous Classes in Pari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73.
- . "L'émigration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Etudes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1947): 127-71.
- Clark, Peter. "Migration in England During the Late Seventeenth and Early Eighteenth Centuries." *Past and Present* 8(1979): 57-90.
- Cohen, R. *The New Helots: Migrant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vision of Labour*. London: Avebury, 1976.
- Collicelli, Carla. "Il Problema Dei Rientri e la Nuova Immigrazione." Conferenza Internazionale Sulle Migrazioni. Roma: 13-15 Marzo, 1991.
- Coquant, Andre. "Du village de Yesilyazi au quartier des Chamarda a Druetz

客人？外人？

- (Eure et Loire).” *Hommes et migrations: Documents* 1021(1981): 1-23.
- Corbin, Alain. *Archaisme et modernité en Limosin au XIXe siècle (1845-1880)*, 2 vols. Paris: Marcel Riviere, 1975.
- Cornelius, Wayne A., Philip L. Martin, and James F. Hollifield (eds). *Controlling Immigration. A Global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 Costa-Lascoux, J. “Chronique législative.”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2(1984): 179-240.
- . “L’acquisition de la nationalité française, une condition d’installation.” In *Question de nationalité: Histoire et enjeux d’un code*, edited by S. Laarcher. Paris: CIEMI, L’Harmatan, 1987.
- . *De l’immigré au citoyen*. Paris: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1989.
- Cressy, David. *Migration and Communication between England and New England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Crew, D. *Town in the Ruhr: A Social History of Bochum, 1860-1914*.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9.
- Cross, G. S. *Immigrant Workers in Industrial France: The Making of a New Labouring Class*.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3.
- Curtin, Phillip D. *The Atlantic Slave Trade: A Census*.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9.
- Davis, Natalie Z. *The Return of Martin Guer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 Depauw, Jacques “Amour illegitime et société à Nantes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E.S.C.* 27(1972): 1155-81.
- de Bryas, Madeleine. *Les Peuples en marche: Les migrations politiques et économiques en Europe depuis la guerre mondiale*. Paris: 1926.
- de Michelis, G. *L’emigrazione italiana nella Svizzera*. Roma, 1903.

- de Tinguy, A. "Emigration soviétique: quelles perspectives?" In *La Nouvelle Alternative* no. 2, December 1991.
- de Vries, Jan. *European Urbanization: 1500-180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 . "The Population and the Economy of the Preindustrial Netherland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15(1985): 661-82.
- Deyon, Pierre. *Amiens, capitale provinciale: Étude sur la société urbaine au 17e siècle*. Paris: Mouton, 1967.
- Didion, Maurice. *Les Salariés étrangers en France*. Paris: V. Giard and E. Briere, 1911.
- Direction de la Documentation Française. "Politiques d'Immigration en Europe," *Problèmes Politiques et Sociaux* no. 530, 21 February 1986.
- Dollot, Louis. "Les Immigrations humaines" (Paris 1965); *World 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edited by Franklin D. Scott.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 Hill, 1968.
- Drobnic, S.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Yugoslav Immigrants in Sweden,"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6(6), 1988.
- Dupaquier, James. *Histoire de la population française*, 4 vol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Françaises, 1988.
- Dyer, C. *Population and Society in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 1978.
- Eitis, David. "Free and Coerced Transatlantic Migrations: Some Compariso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8(1983): 253-80.
- Fainstein, S., I. Gordon and M. Harloe, 1993. *Divided Cities: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ocial Change in London and New York*. New York: Blackwell, 1992.
- Faist, Thomas. "How to Define a Foreigner? The Symbolic Politics of Immigration in German Partisan Discourse, 1978-1992." *West European*

客人？外人？

Politics 17 (2), 1994.

Fassmann, Heinz. "A Survey of Patterns and Structures of Migration in Austria 1850-1900." In *Labor Migration in the Atlantic Economies*, edited by Dirk Hoerd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5.

Fenske, Han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German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3(1980): 332-47.

Fohlen, Claude. *L'industrie textile au temps du Second Empire*. Paris: Plon, 1956.

—. Introduction. In *L'émigration française. Etudes de cas. Algerie, Canada, Etats Unis*. edited by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Nord-Américain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e, 1985.

Foner, Nancy "Women, Work and Migration: Jamaicans in London," *Urban Anthropology* 4(1975): 229-49.

Fouche, N. Preface, and "Les passeports delivres à Bordeaux pour les Etats-Unis de 1816 a 1889. In *L'émigration française. Etudes de cas. Algerie, Canada, Etats Unis*, edited by Centre de recherche d'histoire Nord-Américaine.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e, 1985.

Fontaine, Laurence. "Solidarités familiales et logiques migratoires en pays de montagne à l'époque moderne," *Annales: E.S.C.* 45(1990): 1433-50.

Franzoi, Barbara. *At the Very Least She Pays the Rent: Women and German Industrialization 1871-1914*.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85.

Frost, Martin and Nigel Spence. "Global City Characteristics and Central London's Employment," *Urban Studies* vol. 30, no. 3 (1992): 547-558.

Fuchs, Rachel G. *Poor and Pregnant in Pari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97.

Furnrohr, W. *Afrika im Geschichtsunterricht europäischer Länder; Von der Kolonialgeschichte zur Geschichte der Britten Welt*. Munchen. 1982.

Gabaccia, Donna. *From Sicily to Elizabeth Street: Housing and Social Change*

- among *Italian Immigrants, 1880-1930*. Albany, N.Y.: SUNY Press, 1984.
- Garden, Maurice. *Lyon et les Lyonnais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Belles Lettres, 1970.
- . “Le bilan demographique des villes: Un système complexe.” *Annales de demographic historique*: 267-75, 1982.
- Gide, C. and M. Lambert “Les troubles d’Aigues Mortes,” *Revue d’Économie Politique*, 839-41. Sept.-Oct. 1983.
- Gillette, A. and A. Sayad. *L’Immigration Algerienne en France*. Second edition. Paris: Éditions Entente, 1984.
- Girard, Alain and Jean Stoetzel. *François et immigrés: L’attitude française et l’adaptation des Italiens et des Polonais*. INED-Travaux et Documents, Cahiers 19 et 20.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3.
- Goldstein, Sydney. “The Extent of Repeated Migration: 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Danish Population Register,”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59(2064): 1121-32.
- Gordon, Ian and Saskia Sassen. “Restructuring the Urban Labor Markets.” In *Divided Cities*, edited by S. Fainstein et al., 105-138. Oxford: Blackwell, 1992.
- Grafeaux, Serge. *Mme Santerre: A French Woman of the People*. New York: Schocken Books, 1985.
- Gravier, J. F. *Paris et le desert français*. Paris: Le Portulan, 1947.
- Green, Nancy. “L’Histoire comparative et le champ des études migratoires.” *Annales: E.S.C.* 45(1990): 1335-50.
- . “‘Filling the Void’: Immigration to France Before World War I.” In *Labor Migration in the Atlantic Economies*, edited by Dirk Hoerd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5.
- Gridaudi, Maurizio. *Itinéraires ouvriers: Espaces et groupes sociaux à Turin au debut du XXe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e l’E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客人？外人？

Sciences Sociales, 1987.

Guey, P. *Peregrination des "barcelonettes" en Mexique*. Grenoble: Presses Universitaires, 1980.

Guillaume, Pierre. *La population de Bordeaux au XIXe siècle: Essai d'histoire sociale*. Paris: A. Colin, 1972.

Guillon, M. "Les étrangers dans les grandes agglomérations françaises, 1962-82," *Espace, Populations, Sociétés* 2(1986): 179-90.

Gullickson, Gay. *Spinners and Weavers of Auffay: Rural Industry and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in a French Village, 1750-185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Gunman, Myron. *Toward the Modern Economy: Early Industry in Europe, 1500-1800*. New York: Knopf, 1988.

— and Etienne van de Walle. "New Sources for Social and Demographic History: The Belgian Population Registers,"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 (1978): 121-43.

Hagen, William W. *Germans, Poles and Jews: The Nationality Conflict in the Prussian East, 1772-1914*.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Hajnal, John. "Two Rinds of Pre-industrial Household Formation Systems." In *Family Forms in Historic Europe*, edited by R. Wall and P. Laslett: 65-10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Hammar, T. *European Immigration Policy: A Comparative Stud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Harris, Ruth-Ann. "Seasonal Migration Between Ireland and England Prior to the Famine." In *Canadian Papers in Rural History* vol. 7, edited by D.H. Akenson: 363-86. Gananoque: Langdale Press, 1989.

Hart, Simon. "Gens de mer à Amsterdam au XVIIe siècle." *Annales de demographic historique*, 145-63, 1974.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edited by S. Thernstrom

- and A. Oriov, 1036-37. Cambridge, Mass. 1980.
- Hausserman, Hartmut and Walter Siebel. *Neue Urbanität*.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87.
- Head, Anne-Lise. "Quelques remarques sur l'émigration des régions prealpines," *Revue suisse d'histoire*, 29(1979): 181-93.
- Heisler, Barbara Schmitter. 1991.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the underclass. Questions of urban poverty, race, and citizenship." *Theory and Society*, 20: 455-483.
- Heitmann, S. *Soviet Emigration in 1990*. Berichte des Bundesinstituts für Ostwissenschaftliche und Internationale Studien no. 33. Bonn, 1991.
- Hily, M. A. "Qu'est-ce que l'assimilation entre les deux guerres? Les enseignements de la lecture de quelques ouvrages consacrés à l'immigration." In *Maghrébins en France: émigrés ou immigrés?*, edited by L. Talha, et al., 71-80. Paris: Editions du CNRS, 1983.
- Hitz, H. R. Keil, V. Lehrer, K. Ronneberger, C. Schmid, and R. Wolff. *Financial Metropolises in Restructuring: Zurich and Frankfurt en Route to Postfordism*. Zurich: Rotpunkt Publishers, 1993.
- Hobsbawn, Eric.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New York: Pantheon, 1987.
- . "The Overall Crisis of the European Economy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Past and Present* 5(1954): 33-53.
- . "Afterword: Working Classes and Nations." In *Labor Migration in the Atlantic Economies*, edited by Dirk Hoerd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5.
- Hochstadt, Steve. "Stadtische Wanderungsbewegungen in Deutschland 1850-1914." In *von Aretin zum 65 Geburstag*, 2 vols., edited by R. Melville, C. Scharf., M. Vogt, and U. Wengenroth, 2: 575-98. Stuttgart: Franz Steiner Verlag, 1988.
- . and James Jackson, Jr. "'New'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Migration in Early

客人？外人？

-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 31(1984): 85-92.
- Hoerder, Dirk, ed. *Labor Migration in the Atlantic Economies: The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Working Classes during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5.
- Hoffmann-Nowomy, Hans-Joachim. 1985. “Switzerland.” In *European Immigration Policy*, ed. T. Hamma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gen, Dennis and David Kertzer. “Longitudinal Methods for Historical Migrations Research.” *Historical Methods* 18: 20-30.
- Hollifield, James F. *Immigrants, Markets and State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 Husbands, C. “The Dynamics of Racial Exclusion, and Expulsion: Racist Politics in Western Europ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16(6), 1988.
-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Migration. *Profiles and Motives of Potential Migrants: An IOM Study Undertaken in Four Countries: Albania, Bulgaria, Russia and Ukraine*. Geneva: IOM, 1993.
- 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émographiques (INED). *L'argent des immigrés. Revue, épargne et transferts de huit nationalités immigrés en France*. Cahier de l'INED no. 94.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1.
- Jacini, S. “Die italienische Auswanderung nach Deutschland,”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5(1915): 121-43.
- Jackson, J. A. *The Irish in Britai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 Jackson, James, Jr. “Alltagsgeschichte, Social Science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Migrat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Germany,” *Central Europe History* 23(1990): 242-63.
- . “Migration in Duisburg, 1867-1890: Occupational and Familial

- Contexts,” *Journal of Urban History* 8(1982): 235-70.
- Jacobson, David. *Rights Across Borders: Immigr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Citizenship*.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Press, 1996.
- Jegouzo, Christopher. forthcoming. *The Life and Death of Industrial Languedo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Joly, Daniele, C. Nettleton and H. Poulton. *Refugees: Asylum in Europe?* London: Minority Rights Group, 1992.
- Jones, Garth Stedman. *Outcast London: A Study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asses in Victorian Socie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Jones, K and A. Smith.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ommonwealth Immigr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nd National Institute of Economic and Social Research, 1970.
- Journal fur Entwicklungspolitik*. Special Issue: *Migration*. Vol. XI, nr. 3, 1995. (Frankfurt: Brandes & Apsel Verlag).
- Kaelble, Hartmut. “Historical Research on Social Mobility. Western Europe and USA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1.
- . “Social Mobility in America and Europe: A Comparison of 19th Century Cities.” *Urban History Yearbook*.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81: 24-38.
- Kalvemark, Ami-Sofie. “The Country that Keeps Track of Its Population: Methodological Aspects of Swedish Population Records.” In *Time, Space and Man: Essays on Microdemography*, edited by J. Sundin and E. Söderiund: 221-43.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9.
- Kamphoefner, Walter. *The Westfalians: From Germany to Missouri*.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7.
- Katan, Y. “Le voyage ‘organisé’ d’émigrants: parisiens vers l’Algérie, 1848-49.” In *L’émigration française. Etudes de cas: Algérie, Canada, États-*

客人？外人？

Unis, edited by Centre de Recherches d'Histoire Nord-Américaine, 17-47.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85.

Kaufman, Franz-Xaver. *Bevölkerungsbeujegung zwischen Quantitat und Qualitat: Beitrage zum Problem einer Bevölkerungspolitik in industriellen Gesellschaften* Stuttgart: Ferdinand Enke Verlag, 1975.

Kero, Reino. "Emigration of Finns from North America to Soviet Karelia in the Early 1930s." In *The Finnish Experience in the Western Great Lakes Region: New Perspectives*, edited by Michael G. Karni, 212-21. Vammala, 1975.

Kertzer, David and Dennis Hogan. "On the Move: Migration in an Italian Community, 1865-1921," *Social Science History* 9 (1985): 1-23.

Khader, Bichara "Le Méditerranée entre les tentations solitaires et les projets solidaires." In *Développement du Maghreb dans la perspective du Marche Unique*, 1991.

—. "Immigration maghrebine face à l'Europe, 1993." In *Migrations Société CIEMI, Immigration maghrebine et Europe* 92, vol. 3, no. 15(1991): 17.

Kindleberger, C.P. *Europe's Postwar Growth: The Role of Labor-Suppl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Kintz, Jean-Pierre "La mobilité humaine en Alsace: Essai de présentation statistique, XVe-XVIIIe Siècles," *Annals de demographie historique* (1970), 157-83.

Kish, Herbert. "The Textile Industries in Silesia and the Rhineland: A Comparative Study in Industrialization." In *Industrialization Before Industrialization: Rural Industry in the Genesis of Capitalism*. edited by P. Kriedte, H. Medick, J. Schlumboh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Klee, Ernst, ed. *Gastarbeiter Analysen und Berichte*. Frankfurt: Suhrkamp Verlag, 1975.

- Knoke, A. *Ausländische Wanderarbeiter in Deutschland*. Leipzig, 1977.
- Koch, Fred C. *The Volga Germans in Russia and the Americas from 1763 to the Present*. University Park: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77.
- Kollmann, W. *Bevölkerung in der industriellen Revolution: Studien zur Bevölkerungsgeschichte Deutschlands*. Göttingen: Vandenhoeck und Reprecht, 1974.
- Kulischer, Eugene M. *Europe on the Move: War and Population Changes, 1917-47*.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8.
- Kunzmann, K. R. and M. Wegener. *The Pattern of Urbanisation in Western Europe 1960-1990*. Report for the Directorate General XVI of the Com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as part of the study "Urbanisation and the Function of Cities 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ortmund, Germany: Institut für Raumplanung, 15 March, 1991.
- Kurlic, Joseph. "L'immigration et l'identité de la France: mythe et réalité." *Pouvoirs*, no. 47 (1988).
- Kussmaul, Ann. *Servants in Husbandry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 Langewiesche, D. "Wanderungsbewegungen in der Hochindustrialisierungsperiode: Regionale, interstädtische und innerstädtische Mobilität in Deutschland 1880-1914." *Vierteljahrschrift für Sozial 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 64(1977): 1-40.
- Larrabee, F. St. "Down and Out in Warsaw and Budapest: Eastern Europe and East-West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6, no. 4 (spring, 1992).
- Layton-Henry, Zig ed.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in Western Europe*. Newbury Park: Sage Publications, 1990.
- Lebon, A. and G. Falchi. "New Developments in Intra-European Migration since 1974,"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4(1980): 539-79.
- Lequin, Yves. *Les Ouvriers de la région lyonnaise (1848-1914)*. Lyon: Presses

客人？外人？

- Universitaires de Lyon, 1977.
- LeRoyLadurie, Emmanuel. *Histoire de la France rurale, L'âge classique des paysans. 1340-1789*, vol. 2. Paris: Seuil, 1975.
- , *Histoire de la France urbaine. La ville classique*, vol. 3. Paris: Seuil, 1981.
- Levine, David. *Family Formation in an Age of Nascent Capitalis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7.
- , *Reproducing Famili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English Populatio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 Lis, Catharine and Hugh Soly. *Poverty and Capitalism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9.
- Livian, Marcel. *Le Parti Socialiste et l'immigration*. Paris: Anthropos, 1982.
- Lottin, Alain. "Naissance illégitimes et filles-mères à Lille au XVIII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17(1970): 278-322.
- Lowe, William J. *The Irish in Mid-Victorian Lancashire: The Shaping of a Working-Class Community*. New York: Peter Lang, 1989.
- Lucassen, Jan. *Migrant Labor in Europe 1600-1900: The Drift to the North Sea*. Wolfeboro, N.H.: Croom Helm, 1987.
- , "Dutch Migration, 1600-1900."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7e Congrès International des Sciences Historiques, Madrid. July, 1990.
- Macartney, C. A. *National States and National Minoritie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34.
- MacDonagh, Oliver. *A Pattern of Government Growth, 1800-1869: The Passenger Acts and Their Enforcement*. London: McGibbon and Kee, 1961.
- Marchaick, P. *Deutsche Ueberseeauswanderung im 19. Jahrhundert*. Stuttgart, 1973.
- Marie, C. "L'immigration clandestine en France." *Hommes et Migrations* 1059(1983): 4-21.

- Marrus, Michael R. *The Unwanted: European Refugees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 Mauco, Georges. *Les Etrangers en France: Leur role dans l'activité économique*. Paris, 1932.
- Mayer, Margit. "Shifts in the Local Political System in European Cities since the 80s." In *Competition, Regulation and the New Europe*, edited by Mick Dunford/Grigoris Kafkalas. London: Belhaven, 1993.
- Meijide, Pardo. *La emigración Gallega intrapeninsular en el siglo XVIII*. Madrid: Instituto Balmes de Sociología, 1960.
- Mendels, Franklin. "Protoindustrializatio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Pro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32(1972): 241-61.
- Messance. *Recherches sur la population des généralités d'Auvergne, de Lyon, de Rouen*. Paris: Durand, 1766. Reprint, Paris: Éditions d'Histoire Sociale, 1973.
- Miles, Robert and Annie Phizacklea. *White Man's Country: Racism in British Politics*. London: Pluto Press, 1984.
- Milza, P. "L'integration des italiens dans le mouvement ouvrier français à la fin du XIXe siècle et au debut duXXe siècle: le cas de la région marseillaise," *Affari Social! Internazionali* 3-4(1973): 171-207.
- Mingione, E. and E. Pugliese. "La questione urbana e rurale: tra superamento teorico e problemi di confini incerti," *La Critica Sociologica* 85(1988): 17-50.
- Mitter, S., e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Women's Employment: The Case of the European Clothing Industry*. Berlin and New York: Springer Verlag, 1989.
- Moch, Leslie Page. "Government Policy and Women's Experience: The Case of Teachers in France." *Feminist Studies* 14(1988): 301-24.
- . "Infirmities of the Body and Vices of the Soul: Migrants, Family and

客人？外人？

- Urban Life in Turn-of-the-Century France." In *Essays on the Family and Historical Change*, edited by L. P. Moch and G. Stark: 35-64. College Station, Tex.: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83.
- Moch, Leslie Page, et al. "Family Strategies: A Dialogue." *Historical Methods* 20(1987): 113-25.
- Moch, Leslie Page and Louise Tilly. "Joining the Urban World: Occupation, Family, and Migration in Three French Cities."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27(1984): 33-56.
- Mockmeier, W. *Die deutsche überseeische Auswanderung*. Jena, 1912.
- Molle, Willem. *The Economics of European Integration: Theory, Practice, Policy*. Aldershot: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990.
- Moltmann, Günther. "American-German Return Migration in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 Centuries," *Central European History*, 13(1980): 378-92.
- Morawska, Eva. "Labor Migration of Poles in the Atlantic Economy, 1880-1914,"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31(1989): 237-72.
- Morgan, David. *Harvesters and Harvesting, 1840-1900*. London: Groom Helm, 1982.
- Morokvasic, Mirjana. "Une migration pendulaire: les Polonais en Allemagne." *Hommes et Migrations* vol. 1155 (June 1992): 31-37.
- , ed. *Women in Migratio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Special Issue, 18(4) winter 1984.
- and Anne de Tinguy. "Between East and West: A New Migratory Space." In *Bridging States and Marke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Early 1990s*, edited by Hedwig Rudolf and Mirjana Morokvasic. 1993. Berlin: Die Deutsche Bibliothek, 1993.
- Mouillon, Marthe-Juliette. "Un exemple de migration rurale: De la Somme dans la capitale. Domestique de la Belle Époque à Paris." *Études de la*

- region parisienne* 44(1970): 1-9.
- Munoz-Perez, F. and M. Tribalat. "Mariages d'étrangers et mariages mixtes en France: évolution depuis la première guerre," *Population* 39(1984): 427-62.
- Nansen, Fridtjof. *Russia and Peace*. New York: Macmillan, 1924.
- Neubach, Helmut. *Die Ausweisungen von Polen und Juden aus Preussen 1885/86*.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67.
- Nichtweiss, J. *Die Ausländischen Saisonarbeiter in der Landwirtschaft der ostlichen und mittleren Gebiete des Deutschen Reiches*. Berlin, 1959.
- Noiriel, Gerard. *Longwy: Immigres et proletaires, 1880-1980*.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84.
- . "L'immigration en France: une histoire en friche," *Annales: Économies, Societes, Civilisations* 41(1986): 751-69.
- . *Le creuset français: 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XIXe-XXe siècles*. Paris: Seuil, 1988.
- Nugent, Walter. "Frontiers and Empires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The Western Historical Society* 20(1989): 393-406.
- Oberndöfer, Dicker. *Die Offene Republik. Zur Zukunft Deutschlands und Europas*. Feiburg: Herder, 1989.
- OECD. *Economic Survey: Germany 1989/1990*. Paris: OECD Publications, 1990.
- Office International de Migrations (OIM). *Mouvements migratoires des pays d'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le vers l'Europe occidentale*. Rapport au Conseil de l'Europe, 1990.
- Ogden, P. E. *Foreigners in Paris: Residential Segregation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Occasional Paper 11,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Queen Mary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 1977.
- . "Immigration, Cities and the Geography of the National Front in France."

客人？外人？

- In *Foreign Minorities in Continental European Cities*, edited by G. Glebe and J. O'Loughlin: 163-83. Wiesbaden: Steiner Verlag, 1987.
- and Paul E. White. "Migration in Later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y France: Social and Economic Context." In *Migrants in Modern France: Population Mobility in the Later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edited by P. E. Odgen and Paul White. London: Unwin Hyman, 1989.
- Okólski, M. "Poland" In *The Politics of East-West Migrations*, edited by S. Ardittis, 1992.
- . *Mouvements migratoires en provenance des pays d'Europe centrale et orientate*. Rapport au Gonseil de l'Europe, 1989.
- Paine, Suzanne. *Exporting Workers: The Turkish Ca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4.
- Parnreiter, Christof. *Migration und Arbeitsteilung. Auslander Innenbeschäftigung in der Weltwirtschaftskrise*. Wien: Promedia, 1994.
- Penninx, Rinus. "Immigrant Populations and Demographic Development in the Member States of the Council of Europe," *Population Studies* no. 13 (1984) Strasburg.
- Perkins, J. A. "The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Germany, 1850-1914," *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History* 10 (1981): 71-118
- Perrot, Michelle. *Les ouvriers en grève, France, 1870-1890* 2 vols. Paris: Mouton, 1974.
- Petras, Elizabeth McLean. "The Role of National Boundaries in a Cross-National Labor Market,"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 2(1980): 157-195.
- Phizacklea, Annie, ed. *One Way Ticket: Migration and Female Labour*. London: Routiedge and Kegan Paul, 1983.
- Pinchemel, Philippe. *Structures sociales et depopulation rurale dans les campagnes picardes de 1836 à 1936*. Paris: Colin, 1957.

- Plender, Richar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Law*. Leyden: A. W. Sythoff, 1972.
- Pluyette, Jean. *La Selection de l'immigration en France et la doctrine des races*. Paris, 1930.
- Poinard, Michel and Michel Roux. "L'émigration contre le développement: Les cas Portugais et Yougoslave." *Revue Tiers-Monde* 18 (Janvier-Mars 1977): 21-53.
- Poitrineau, Abel. "Aspects de l'émigration temporaire et saisonnière en Auvergne à la fin du XVIIIe siècle et au debut du XIXe siècle." *Revue d'histoire moderne et contemporaine* 9(1962): 5-50.
- . *Remues d'hommes: Essai sur les migrations montagnardes en France, aux 17e-18e siècles*. Paris: Aubier Montaign, 1983.
- . *La vie rurale en Basse Auvergn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Françaises, 1966.
- . *Les espagnols de l'Auvergne et du Limousin du XVIIe au XIXe siècle*. Aurillac: Malvoux-Mazel, 1985.
- Portes, Jacques. "Les voyageurs français et l'émigration française aux États-Unis (1870-1914)." In *L'émigration française. Études de cas. Algérie, Canada, États-Unis*, Centre de Recherches d'Histoire Nord-Américaine: 259-69.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85.
- Poussou, Jean-Pierre. *Bordeaux et le sud-ouest au XVIII siècle*. Paris: Éditions de l'École des Hautes Études en Sciences Sociales, 1988.
- Prost, A. "L'immigration en France depuis cent ans." *Esprit*, special edition, (1966): 532-45.
- Pugliese, E. "Aspetti dell' Economia Informale a Napoli," *Inchiesta* 13, 59-60 (January-June 1983): 89-97.
- Quante, P. *Die Flucht aus der Landwirtschaft*. Berlin, 1933.
- Rabb, Theodore. "The Effects of the Thirty Years' War on the German Economy,"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34(1962): 40-51.

客人？外人？

- Rabut, O. "Les étrangers en France," *Population* 28(1974): 147-160.
- Raman, Michael. "Mesure de la croissance d'un centre textile: Roubaix de 1789 à 1913." *Revue d'histoire économique et sociale* 51(1975): 470-501.
- Rath, Jan. "Voting Rights." In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in Western Europe*, edited by Zig Layton-Henry. London: Sage, 1990.
- Ravenstein, Ernest. *The Laws of Migration*. Reprint. New York: Arno Press, 1976.
- Redford, Arthur. *Labour Migration in England, 1800-1850*.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6.
- Renooy, P. H. *Twilight Economy: A Survey of the Informal Economy in the Netherlands*. Research Report, Faculty of Economic Science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984.
- Rogers, Rosemarie, ed. *Guests Come to Stay: The Effects of European Labor Migration on Sending and Receiving Countries*.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85.
- Roncayolo, M. *L'Imaginaire de Marseille*. Marseille: Chambre de Commerce et d'Industrie de Marseille, 1990.
- Rosoli, G., ed. *Un secolo d'emigrazione italiana: 1876-1976*. Rome: Centro studi emigrazione, 1978.
- Roudie, P. "Long Distance Emigration from the Port of Bordeaux, 1865-1920."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11 (1985): 268-79.
- . "Italian Migration to European Countries from Political Unification to World War I." In *Labor Migration in the Atlantic Economies*, edited by Dirk Hoerder.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5.
- Roy, Olivier. "Ethnicité, Bandes et Communautarisme," *Esprit*, Fevrier 1966: 37-47.
- Rudolph, Hedwig and Mirjana Morokvasic. *Bridging States and Market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in the Early 1900s*. Berlin: Die Deutsche

- Bibliofhek, 1993.
- Sabean, David. "Household Formation and Geographic Mobility: A Family Register Study for a Wurttemberg Village, 1760-1900," *Annales de demographic historique* (1970) 275-94.
- Sandicchi, P. "I fornaciai italiani in Baviera," *Bollettino dell'Emigrazione* 12(1912): 3-34.
- Sarna, Jonathan. "The Myth of No Return: Jewish Return Migration to Eastern Europe, 1800-1914." In *Labor Migration in the Atlantic Economies*, edited by D. Hoerder: 423-34.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1981.
- Sartorius von Waltershausen, A. *Die italienischen Wanderarbeiter*. Leipzig, 1903.
- Sassen, Saskia. 1998.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New Press.
- . 1996. *Losing Control? Sovereignty in an Age of Globalization*. The 1995 Columbia University Leonard Hastings Schoff Memorial Lectur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 *The Global City: New York, London, Tokyo*.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 . *The Mobility of Labor and Capital: A Study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nd Labor Flow*.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
- Schain, Martin A. "Immigrants and Politics in France." in *The French Socialist Experiment*, edited by John S. Ambler. Philadelphia: ISHI, 1985.
- Schechtman, Joseph. *European Population Transfers, 1939-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6.
- Schiaparelli, E. "Il traffico dei minorenni italiani per le vetrerie francese." *Bollettino dell'Opera di Assistenza*, I: 3-4. 1901.
- Schiller, Günther. "Auswirkungen der Arbeitskraftwanderungen in den Herkunftslandern." In *Ausländerbeschäftigung und Internationale Politik; Zur*

客人？外人？

- Analyse Transnationaler Sozial Prozesse*, edited by Lohrmann and Manfrass. München: Oldenburg, 1974.
- Schnapper, Dominique. "Cemralisme et federalisme culturels: les émigrés italiens en France et aux États-Unis," *Annales E.S.C.* (October 1974): 1141-59.
- . *La France de l'integration: Sociologie de la nation en 1990*. Paris: Gallimard, 1991.
- Schofield, Roger. "Age-Specific Mobility in an Eighteenth Century Rural English Parish." *Annales de demographic historique* (1970): 261-74.
- Schor, R. *L'opinionfrançaise et les étrangers en France, 1919-1939*. Paris: Publications de la Sorbonne, 1985.
- Sennett, Richard. *Flesh and Stone: The Body and the City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New York: Norton, 1994.
- . *The Uses of Disorder: Personal Identity and City Life*. New York: Norton, 1970.
- Senior, Carl. "German Immigration in Jamaica, 1834-38." *Journal of Caribbean History* 10-11(1978): 25-53.
- Sewell, W. H. *Structure and Mobility: The Men and Women of Marseille 1820-187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ik, E. "Policy Networks to Cope with Crisis: The Case of Transylvanian Refugees in Contemporary Hungary," *Innovation* vol. 3, no. 4 (1990): 729-748.
- Snell, Keith D.M. *Annals of the Labouring Poor: Social Change and Agrarian England 1660-190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Soboul, Albert. *La Civilisation et la Révolution Française*. Paris: Arthaud, 1970.
- SOPEMI (Système d'observation permanente pour les migrations). *Annual Report*. Paris: OECD, Directorate for Social Affairs, Man-power and

- Education, 1977.
- . *Annual Report* Paris: OECD Directorate for Social Affairs, Man-power and Education, 1992.
- . *Annual Report* Paris: OECD Directorate for Social Affairs, Man-power and Education, 1998.
- Sori, E. *L'emigrazione italiana dall'Unità alla seconda guerra mondiale*. Bologna: Il Mulino, 1979.
- Souden, David. "Movers and Stayers in Family Reconstitution Population, 1660-1780." *Local Population Studies* 33(1984): 11-28.
- Soysal, Yasmin. *Limits of Citizenship*.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 Spencer, Michael. *1992 and All That: Civil Liberties in the Balance*. London: Civil Liberties Trust, 1990.
- Statistical Office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Demographic and Labour Force Analysis Based on Eurostat Data Banks*. Luxembourg, 1987.
- Statistisches Bundesamt. *Statistisches Jahrbuch 1991 für das vereinte Deutschland*. Wiesbaden: Metler-Poeschl, 1992.
- Tapinos, G. *L'immigration étrangère en France, 1946-1973*. Cahier de l'INED no. 71.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75.
- . "Pour une introduction au débat contemporain." Extrait de "La Mosaïque en France, Histoire des étrangers et de l'immigration en France" sous la direction de Yves Lequin. Paris: Larousse, 1988.
- Tartakower, Arieh and Rurt R. Grossmann. *The Jewish Refugee*. New York: Institute of Jewish Affairs of the American Jewish Congress and World Jewish Congress, 1944.
- Thernstrom, Stephan and Ann Orlov, eds.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Ethnic Group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1980.
- Tedebrand, Lars-Goran. "Remigration from America to Sweden." In *Labor*

客人？外人？

- Migration in the Atlantic Economies*, edited by D. Hoerder: 357-80.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1985.
- Thomas, Brinley. *Mi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A Study of Great Britain and the Atlantic Econom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
- Thomas, Dorothy Swaine. *Social and Economic Aspects of Swedish Population Movements, 1750-1933*. New York: Macmillan 1941.
- Thranhardt, Dietrich (ed.) *Europe: A New Immigration Continent*. Hamburg: Lit Verlag, 1992.
- Tilly, Charles.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0*. Cambridge, Mass.: Basil Blackwell, 1990.
- . "Flows of Capital and Forms of Industry in Europe, 1500-1900" *Theory and Society* 12(1983): 123-42.
- . "Did the cake of custom break?" In *Consciousness and class experience in nineteenth century Europe*, edited by J. M. Merriman: 17-44. New York: Homes & Meier, 1979.
- Tilly, Louise. "Occupational Structure, Women's Work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Two French Industrial Cities, Anzin and Roubaix, 1872-1906." In *Time Space and Man: Essays in Microdemography*, edited by J. Sundin and E. Söderlund: 107-32. Atlantic Highlands, N.J.: Humanities Press, 1979.
- Tilly, Louise and Joan Scott. *Women, Work and Family*.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78.
- Tilly, Louise, Joan Scott, and Miriam Cohen. "Women's Work and European Fertility Patterns."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6(1976): 447-76.
- Todd, Emmanuel. "Mobilité géographique et cycle de vie en Artois et en Tascae au XVIIIe siècle," *Annales E.S.C.* 30(1975): 726-44.
- Tribalat, M. "Chronique de l'immigration," *Population* 38(1983): 137-59.

- , “Chronique de l’immigration.” *Population* 40(1985): 131-54.
- , J.-P. Garson, Y. Moulier-Boutang, and R. Silberman. *Cents Ans D’Immigration, Étrangers D’Hier François D’Aujourd’Hui*.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Institut National d’Études Demographiques, 1991.
- Turpin, Dominique. “Les solutions françaises: rapport général,” In *Immigrés et réfugiés dans les démocraties occidentales*: 38-30. Paris: Economica, 1981.
-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Centr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umanitarian Affairs. “Migrant Workers, No. 2: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ir Families.” New York, 1986.
- Universita Bocconi. “L’immigrazione Straniera in Italia: Esame, Interpretazione e Valutazione Comparate di significative Esperienze Europee.” Conferenza Nazionale Della’Immigrazione, 1990.
- U.S. Committee for Refugees. *World Refugee Summary*. Washington, D.C.1993.
- van de Walle, E. *The Female Population of Franc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 Vandervelde, Emile. *L’exode rural et le retour aux champs*. Paris: Alcan,1903.
- Verbunt, G. “France.” In *European Immigration Policy: A Comparative Prospective*, edited by T. Hammar: 127-6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 Vertone, T. “Antecedents et causes des evenements d’Aigues Mortes.” *Affari Sociali Internazionali* 3-4(1977): 107-38.
- Veuglers, John W. P. “Recent Immigration Politics in Italy: A Short Story.” In Martin Baldwin-Edwards and Martin A. Schain, ed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7 no. 2(1994): 33-50.
- Vieillard-Baron, Herve. “Le Risque du Ghetto,” *Esprit*, Fevrier 1991, 14-22.

客人？外人？

Voisard, Jacques and Christiane Ducastelle. *La question immigrée dans la France d'aujourd'hui*. Paris: Calmann-Levy, 1988.

Wareing, John. "Migration to London and Transatlantic Emigration of Indentured Servants, 1683-1775," *Journal Of Historical Geography* 7(1981): 356-78.

Watkins, Susan Cotts. *From Provinces into Nations: Demographic Integration in Western Europe, 1870-196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Weil, Patrick. *La France et ses étrangers*. Paris: Calmann-Levy, 1991.

Wentz, Martin, ed. *Stadtplanung in Frankfurt: Wohnen, Arbeiten, Verkehr*. Frankfurt, New York: Campus, 1991.

Werner, Heinz. "Migration and Free Movement of Workers in Western Europe." In *Les travailleurs étrangers en Europe occidentale*, edited by Philippe Bernard: 65-85. Paris: Mouton, 1976.

Werth, Manfred and Heiko Rorner eds. *Social Europe: Immigration of Citizens from Third Countries into the Southern Member State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Luxembourg: Office for Official Publications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 1991.

Wihtol de Wenden, Catherine. *Les immigrés et la politique*. Paris: Presse de la FNSP, 1988.

—. "The Absence of Right: the Position of Illegal Immigrants." In *The political Rights of Migrant workers in Western Europe*, edited by Zig Layton-Henry. London: Sage, 1990.

—. "Les migrations Est-Ouest," *Migrations Societe*. CIEMI, 92, vol. 3, no. 15(1991): 9.

—. "Immigrants as political actors in France." In Martin Baldwin-Edwards and Martin A. Schain ed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7 no. 2(1994): 91-110.

- Willcox, F. W. and I. Ferenczi eds. *International Migrations*, 2 vols.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929, 1931.
- Wilson, W. J. *The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Inner City, the Underclass and Public Poli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Wischenbart, Rudiger. "National Identity and Immigration in Austria-Historical Framework and Political Dispute." In Martin Baldwin-Edwards and Martin A. Schain eds.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17 no.2(1994): 72-90
- Wlocewski, S. *L'installation des italiens en France*. Paris, 1934.
- Wrigley, E. Anthony. "The Growth of Population in 18th century England: A Conundrum Resolved." *Past and Present* 98(1983): 121-50.
- Zeroulou, Z. "Mobilisation familiale et réussite scolaire." *Revue Européenne des Migrations Internationales* 1(1981): 107-17.
- Zolberg, Aristide R.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Policies in a Changing World System." In W. J. McNeill and R. S. Adams: 241-81. *Human Migration: Patterns and Policie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78.
- . "Contemporary Transnational Migration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Patterns and Dilemmas." In *U.S. Immigration and Refugee Policy: Global and Domestic Issues*, edited by Mary M. Kritz: 18-19. Lexington, Ky.: Lexington Books, 1983.

客人？外人？

索引

條目後的頁碼係原文頁碼，檢索時請查正文頁邊的數碼

A

- Albania 阿爾巴尼亞 114
- Algeria 阿爾及利亞 66, 99, 100, 102, 138, 139
- Alsace-Lorraine 亞爾薩斯－洛林 37
- America 美洲或美國（另見拉丁美洲）
- colonizing migration to 往美洲的殖民遷移 21-22
 - German emigration to 從德國往美洲的遷移 53, 54
 - illegal immigrants in 身在美國的非法移民 104
 - Italians to 到美國（或美洲）去的義大利人 68-69
 - Jewish refugees to 到美國去的猶太難民 78, 80, 81, 87, 93
 - late-19th-century migration to 19世紀末往美洲的遷移 42-43
 - World War I, migration after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往美洲的遷移 90
-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10-11
- anarchists 無政府主義者 38
- Antilles 安地列斯群島 99
- Argentina 阿根廷 68, 110
- Armenians 亞美尼亞人 89
- asylum seekers 尋求庇護者 106-9, 111, 115-16, 117, 124-28（另見難民）
- Australia 澳洲 42, 43, 69, 123
- Austria 奧地利 17, 36, 41, 42, 56, 68, 70, 103, 107, 112, 116, 118, 123

B

- Balkan refugee flows 巴爾幹難民潮 81-83, 89
- Balzac, Honoré de 巴爾札克 44, 45
- Belgium 比利時 15, 17, 38, 67, 93, 117, 118, 120, 139, 143
- Schengen Agreement 申根協議 127
- Blum, Leon 布律姆 94-95

border concepts 邊界概念 4-5, 149-151

Brazil 巴西 69, 106

Britain 英國 (見英格蘭、蘇格蘭)

Bulgaria 保加利亞 90, 114

C

Canada 加拿大 69, 87, 90, 123

Catherine the Great of Russia 俄國的凱瑟琳大帝 12

Chile 智利 110

China 中國 86

colonization movements 殖民帶來的移動 21-22

criminal activities 犯罪活動 115

Croats and Croatia 克羅埃西亞人與克羅埃西亞 8, 116

Czechoslovakia 捷克斯洛伐克 36, 111

Czech Republic 捷克共和國 100, 106, 108, 113, 115-6

D

Darwin, Charles 達爾文 61

Denmark 丹麥 38, 108

Discipline and Punish (Foucault) 《規訓與懲罰》(傅柯) 58

Dublin Convention 都柏林協約 108, 109, 126

E

England 英格蘭 (或英國) 11, 12-13, 15, 19, 20, 21, 23, 38-39, 67, 138

asylum seekers in 在英國的尋求庇護者 107, 108

citizenship and naturalization rates and policies 取得公民身分及歸化的比率與政策 117, 119, 120, 121, 143

Jewish refugees and 猶太難民和 95-96

refugee and immigration policies 難民與移民政策 81, 95-96, 108, 117, 121

European migration 歐洲的遷移 3-4 (另見特定國家)

anti-immigrant, racist parties 反移民及種族主義的政黨 146

客人？外人？

- Central European migration streams 中歐的遷移浪潮 115-16
- differentiated process of 的高度分化的過程 143-44
-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immigrants 移民的經濟整合 147-49
- extreme distances 超長距離的遷移
- foreign workers to settlers 從外籍工人成爲定居者 144-49
- free movement in European Union (EU) 歐洲聯盟(歐盟)境內的自由移動 124-30
- historical emigration levels 歷史上遷出的程度 141
- immigrant percentage in population 移入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 141-42
- integration process, clashes in 整合過程，及其中的衝突 144-49
- Jewish refugees, of 猶太難民(的) 56-57, 80-81
- labor migrations 勞動遷移 (見勞動遷移)
- novelist's depictions 小說家的描繪 44, 45
- religious refugees 宗教難民 11-12, 35
- return migration 返鄉式遷移 71, 142
- rural impoverishment 鄉村赤貧 14-15, 38-40
- rural industry, growth and decline of 鄉村工業，其成長與衰退 15-18, 38-40
- seasonal migrations 季節性遷移 10-11, 22-24, 41, 42, 46-49
- uncertain destinations 不確定的目的地 44-45
- European Union (UN) 歐洲聯盟(歐盟)
 - emigration levels 遷出的程度 141
 - freedom of circulation in EU 歐盟境內來回移動的自由 124-30
 - immigrant percentage in population 移民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 141-42
 - Maastricht provisions 馬斯垂克條約 101, 126
 - new (late 1980's) migratory patterns within 內部的新(1980年代末期)遷移模式 109-13
 -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immigrant policy 移民政策的跨國化 152-54
- External Frontiers Convention 外部邊界協約 126

F

- Finland 芬蘭 38, 108, 139
- Foucault, Michel 傅柯 58
- France 法國 11, 12, 15, 18-9, 20, 22, 37, 38, 41, 42, 51, 52, 100, 146
 assimilation via shared culture 透過共享的文化來同化 63-64
 asylum seekers in 在法國的尋求庇護者 107, 108, 109
 Auffay, study of 奧菲村，的研究 40, 43
 Bordeaux 波爾多 16-17, 22
 citizenship and naturalization rates and policies 取得公民身分及歸化的比率與政策 117, 118, 119, 120, 123, 143
 economic concerns 對經濟的憂慮 93, 94-95
 Edict of Nantes, revocation of 南特詔約，的撤消 12, 35
 emigration from 從法國遷出 52, 64-66
 family reunification issue 家庭團聚的議題 129
 illegal immigrants in 在法國的非法移民 105
 immigration patterns and policies 移入的模式與政策 63-64, 66-68, 74, 90, 91, 101, 102, 103, 104, 105, 117, 118, 119, 139, 143, 144
 Italians in 在法國的義大利人 68, 69, 70, 71-72, 91, 139
 military service exemption for foreigners 外國人免服兵役 67
 Paris 巴黎 19, 23, 86
 phylloxera plague 葡萄根瘤蚜蟲病 48-49
 post-World War II immigration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移入現象 101, 102, 103, 104, 105
 post-World War I immigration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移入現象 90, 91
 railroad construction in 法國的鐵路修築 41-42
 refugee policy in 法國的難民政策 36, 91, 93, 94-95, 108, 109
 Schengen Agreement 申根協議 127
 vineyards, seasonal migrations to 葡萄園，往那裡去的季節性遷移 46-49
- Franco, Francisco 佛朗哥 91
- Franco-Prussian War 普法戰爭 37
- Frederick the Great 腓特烈大帝 21

客人？外人？

Frederick William of Prussia 普魯士的腓特烈·威廉 12

G

GATT talks 關稅暨貿易總協定會談 151

Geneva Refugee Convention (1951) 1951年的日內瓦難民公約 51

Germany 德國 15, 20, 21, 37, 38, 41, 51-52, 65, 67, 138-39, 146

asylum seekers in 在德國的尋求庇護者 100, 106, 107, 108, 109, 117

citizenship and naturalization rates and policies 取得公民身分及歸化的比率與政策 117, 118, 119, 120, 123, 143, 144

family reunification issue 家庭團聚的議題 129

Foreigners Law (1990) 1990年的外籍人士法 119

illegal immigrants in 在德國的非法移民 106

immigration policies and attitudes 移民政策及態度 57-63, 74, 102, 103, 104, 106-8, 116, 143, 146

internal migration in (late 19th-century) 19世紀末在德國的內部遷移

Italians to 往德國去的義大利人 70, 72-73, 139

Jewish flight from 逃離德國的猶太人 91, 93, 95-96

Jews through 穿越德國的猶太人 56-57, 81

jus sanguinis and jus solis concepts 血統主義與出生地主義的概念 61-63, 117-18

late 19th-century emigration 19世紀末的遷出現象 53-54

migration through 穿越德國的遷移 56-58

Nazism, refugee flight from 納粹主義，逃離納粹的難民潮 90-96

North Sea migration system 北海遷移體系 24-28

Polenpolitik in 德國對波蘭人的政策 58-61

post-Cold War East-West migrations 後冷戰時期的東西向遷移 110-12, 116, 137, 144

post-World War II West Germany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西德 99, 102, 103, 104, 106-8

refugees, terms for 難民，的期限 35-36, 108-9

Schengen Agreement 申根協議 127

World War I, aftermath of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遺緒 88-89

Greece 希臘 89, 90, 100, 105, 109, 120, 127, 138

Gypsies 吉普賽人 106, 141

H

Holland 荷蘭 (見 Netherlands 荷蘭)

Hollandgänger 去荷蘭的人 7, 9, 10-11, 17, 19, 22

details of route and work 路線與工作的細節 28-29

North Sea system 北海體系 24-28

Huguenots 胡格諾派教徒 7

Hungary 匈牙利 11, 21., 36, 100, 106, 108, 111, 113, 115, 116

I

illegal immigration 非法移民 104-6, 115-16, 124, 143

immigration policies 移民政策 (另見特定國家)

anti-immigrant, racist parties 反移民，種族主義的政黨 146

Central European migration streams 中歐的遷移潮 115-16

European Union (UN) 見歐洲聯盟 (歐盟)

「foreigners,」 change in notion of 「外國人」，此概念的轉變 78

generally 概言之 4-5

illegal immigration and 非法移民與 104-6, 115-16, 124

labor migrations 見勞動遷移

permanent settlements, tendency toward 永久定居，的傾向 142-43

political rights of immigrants (present-day) 移民的政治權利 (當前的)
116-23

post-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01, 102-6

immigration polities 移民政策

systemic shaping vs. 「invasion」 fears 視為體系所形塑的，相對於視為「入侵」的恐懼 134-37

transnationalization of 移民政策的的跨國化 149-55

World War I, aftermath of 第一次世界大戰，其遺緒 77, 78, 79, 83-90

India 印度 100, 138

客人？外人？

Indonesia 印尼 99

Ireland 愛爾蘭 11, 17, 23, 34, 52, 65, 140

England, migrations to 英國，愛爾蘭往英國的遷移 41, 138

Italy 義大利 15, 19, 23-24, 38, 51, 52, 65, 67, 68, 107, 108, 120, 139, 140, 144

emigration patterns (1876-1976) 1876到1976年間的遷出模式 68-75, 74, 99-100, 102

Fascism in 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 90, 91, 92, 93

illegal immigrants in 在義大利的非法移民 105

post-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99-100, 102

railroad construction, Italian labor in 鐵路修築，義大利工人從事的 41-42, 73

refugees from 來自義大利的難民 36, 90, 91, 94

return migration 返鄉式遷移 71, 142

Schengen Agreement 申根協議 127

vineyards of France, workers in 法國的葡萄園，在其中的義大利工人 49

J

Japan 日本 142, 143, 148

Jews 猶太人 56-57, 114

refugee movements of 的難民移動 77, 78, 79-81, 86-88, 91, 93, 94, 95-96

jus sanguinis 血統主義 61-63, 117-18

jus solis 出生地主義 61-63, 64, 117-18, 121, 123

L

labor migrations 勞動遷移 7, 12-13

career migration 職業所需的遷移 43-45

Central European migration streams 中歐遷移潮 113-16

craft workers 手工業工匠 9-10

criminal activities 犯罪活動 115

- East-West, new and renewed 東西向，新興和再興的 110-13
- geopolitics of 的地緣政治 137-40
- historical emigration levels 歷史上遷出的程度 141
- Hollandgänger 去荷蘭的人（見去荷蘭的人）
- Italians 義大利人 68-73, 99-100（另見義大利）
- misunderstanding of migration flows 對遷移潮的誤解 1-3
- Napoleonic routes generally 拿破崙時代大略的路徑 8-9, 29-31
- new (late 1980's) migration patterns 新興的（1980年代末）遷移模式 109-13
- North Sea system 北海體系 24-28（另見去荷蘭的人）
- post-World War II European needs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的需求 99-103
- railroad construction 鐵路修築 41-42, 49, 73
- rural industry (18th-19th century), growth of 鄉村工業（18至19世紀），的成長 15-19
- seasonal systems 季節性體系 10-11, 22-24, 46-49
- systemic shaping vs. 「invasion」 fears 視為體系所形塑的，相對於視為「入侵」的恐懼 134-37
- 「tourists」 from former Soviet Union 來自前蘇聯的觀光客 113-16
- vineyards, to 葡萄園，去 41, 42, 46-49
- women 女性 19-20
- lace making 繫帶的製作 16, 19
- Latin American 拉丁美洲 42, 43
- French emigration to 從法國往拉丁美洲的遷移 65-66
- League of Nations 國際聯盟 79, 83, 84, 88, 89-90, 92
- Lincoln, Abraham 林肯 61
- linen manufacturing 亞麻的製造 15-16, 17
- Lost Illusions* (Balzac) 《幻滅》（巴爾扎克） 44, 45
- Louis Philippe of France 法國的路易菲力普 36
- Lutherans 路德派教徒 7
- Luxembourg 盧森堡 103, 123, 142
- Schengen Agreement 申根協議 127

客人？外人？

M

Marx, Karl 馬克思 33

Mazzini, Giuseppe 馬志尼 36

Mexico 墨西哥 141

migration flows 遷移潮 (見歐洲的遷移、勞動遷移)

Morocco and Moroccans 摩洛哥和摩洛哥人 100, 105, 120, 125, 138, 139

Mussolini, Benito 墨索里尼 91

N

NAFTA 北美自由貿易協定 150

nail making 鐵釘的製造 16, 17-18, 19

Nansen, Fridtjof 南森 84

nationalism 民族主義 78

Balkans 巴爾幹半島諸國 82-83

jus sanguinis and jus solis concepts 血統主義及出生地主義的概念
61-63, 117-18

Netherlands 荷蘭 15, 17, 38, 93, 99, 117, 125, 139

Amsterdam 阿姆斯特丹 10-11

citizenship and naturalization rates and policies 取得公民身分及歸化
的比率與政策 117, 118, 120, 122, 123, 143

Hollandgänger 去荷蘭的人 (見去荷蘭的人)

Schengen Agreement 申根協議 127

New Zealand 紐西蘭 42, 43

North Africa 北非 66, 105

O

Origin of Species (Darwin) 《物種起源》(達爾文) 61

Ottoman Empire 鄂圖曼帝國 7-8, 77, 82, 83, 90

P

Pakistan 巴基斯坦 100

Palestine 巴勒斯坦 95-96

- Peter the Great of Russia 俄國的彼得大帝 12
- Poland 波蘭 8, 36, 37, 68, 93, 94
- partitioning of 被瓜分 56, 138
 - Polenpolitik in Germany 德國對波蘭人的政策 58-61
 - post-Cold War migrations 後冷戰時期的遷移 100, 106, 107, 108, 113, 114, 115, 116, 137, 144
 - refugees after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難民 85-86
 - Russian and Austrian Poles 來自俄羅斯與奧地利的波蘭人 41, 42, 58, 59-60
- population and food 人口與食物 38-40
- Portugal 葡萄牙 36, 99, 105-6, 109, 110, 119, 127, 138, 139
- prostitution 賣淫 115
- Prussia 普魯士 12, 56, 60

R

- racism 種族主義 146
- railroad construction 鐵路修築 41-42, 49, 73
- Red and the Black* (Stendhal) 《紅與黑》(斯湯達爾) 44, 45
- refugees 難民 5-6
- asylum seekers 尋求庇護者 100, 106-9, 111, 115-16, 117, 124-28
 - Balkans, refugee flows from 巴爾幹半島諸國，來的難民潮 81-83, 89
 - crisis in Europe 歐洲的危機 87-88
 - early 19th-century political refugees 19世紀初的政治難民 35-38
 - EU free movement concerns and policies 對歐盟境內自由移動的關切與政策 124-30
 - Fascism and Nazism, flight from 法西斯主義及納粹主義，為躲避之而逃難 90-96
 - 「foreigners,」 changes in notion of 「外國人」，的概念之轉變 78
 - Greece, in 希臘，在 89
 -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難民事務高級專員公署 79, 84, 88, 90, 108

客人？外人？

- Jewish refugees 猶太難民 77, 78, 79-81, 86-88, 91, 93, 94, 95-96
- post-Cold War East-West migration 後冷戰時期的東西向遷移 111
- pre-World War I mass movements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大規模移動 77-83
- religious refugees 宗教難民 11-12, 35
- terms for 的期限 35, 108-9
- World War I, aftermath of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遺緒 83-90
- Revolutions of 1848 1848年的革命 33-35
- Roosevelt, Franklin D. 小羅斯福 93
- Rumania 羅馬尼亞 106, 113, 114, 116
- Russia 俄國 12, 21, 37, 41, 42, 43, 56
 - famine of 1921 1921年的飢荒 86
 - Jews forced from 被俄國強制驅離的猶太人 56-57, 81, 86-87
 - refugees after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難民 85, 86
 - Soviet Union, migration from 蘇聯，離開的遷移 113-16

S

- Saudi Arabia 沙烏地阿拉伯 142
- Schengen Agreement 申根協議 105, 108, 109, 125, 127
- Scotland 蘇格蘭 11
- Serbs 塞爾維亞人 85
- Seven Years War 七年戰爭 21
- Slater, Samuel 史拉特 12
- Slavophiles 親斯拉夫派 61
- Slovakia 斯洛伐克 113, 116
- Slovenia 斯洛維尼亞 116
- South America 南美洲（見拉丁美洲）
- Soviet Union 蘇聯（見俄國）
- Spain 西班牙 11, 18, 19, 22, 23, 36, 67, 91, 93, 94, 105, 120, 127, 139
 - post-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 100, 102
 - refugees in 在西班牙的難民 107, 108, 109-10
 - vineyards of France, workers in 法國的葡萄園，西班牙的工人 49

- Stendhal, , M.H.B. 斯湯達爾 44, 45
 sugar beets 甜菜 42, 56
 Surinam 蘇利南 99
 Sweden 瑞典 52, 103, 107, 108, 117, 118, 119, 120, 123, 139, 143
 Switzerland 瑞士 15, 38, 52, 67, 103, 146
 citizenship and naturalization rates and policies 取得公民身分及歸化的比率與政策 117, 118, 120, 121-22, 123
 Italians in 在瑞士的義大利人 69, 70, 73, 139
 refugees, recipient of 難民, 的接納者 36

T

- Thackeray, William 薩克萊 44, 45
 transnationalization process 跨國化的過程 149-55
 TREVI Group 特維小組 125, 126
 Tunisia 突尼西亞 100, 138, 139
 Turkey 土耳其 89, 90, 100, 102, 119, 120, 138, 139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透拉 54

U

- United Kingdom 英國 [見英格蘭(英國)、蘇格蘭]
 United States 美國 [見美國(美洲)]
 Uruguay 烏拉圭 110

V

- Vanity Fair* (Thackeray) 《浮華世界》(薩克萊) 44, 45
 vineyards 葡萄園 41, 42, 46-49

W

- Weber, Max 韋伯 43-44, 62
 Wolff, Eric 伍爾夫 7
 women 女性 16-17, 43
 labor migration of 的勞動遷移 19-20, 43, 103-4

客人？外人？

World War I 第一次世界大戰 5, 6, 61

refugees after 後的難民 83-90

state role in aftermath of 的遺緒裡的國家角色 77, 78, 79, 83-90

World War II 第二次世界大戰 5

Fascism and Nazism, refugees from 法西斯主義與納粹主義，逃離的
難民 90-96

Y

Yugoslavia 南斯拉夫 100, 102, 106, 107, 108, 115, 120, 125, 138